

20 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烟雨霏霏的黎明

[苏联] 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曹苏玲 沈念驹 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第三辑）

间谍

托诺-邦盖

巴比特

在少女们身旁

德尔玛莪无尽的流亡

老妇还乡

船长与大尉

烟雨霏霏的黎明

圣女桑塔

独粒钻石

ISBN 7-5016-0166-6/I·163
定价 18.00元

烟雨霏霏的黎明

[苏联] 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曹苏玲 沈念驹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据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УСТО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НЕНИЙ, ТОМ 4,5,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8 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雨霏霏的黎明/(苏联)帕乌斯托夫斯基著;曹苏玲 沈念驹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6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66-6

I. 烟… II. ①帕…②曹…③沈… III. 散文-作品集-苏联-现代 IV. I51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6659 号

责任编辑:刘引梅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烟雨霏霏的黎明
Yan Yu Fei Fei De Li Ming
〔苏联〕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016-0166-6/I·163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抒情散文大师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俄罗斯重要作家之一，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曾受到克鲁普斯卡娅，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人的高度评价，波兰曾授予他文学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也曾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其《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金蔷薇》等中译本而在我国享有广泛声誉。

一

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生于莫斯科一位铁路统计员家里，青少年时代是在乌克兰度过的。他在基辅第一古典中学毕业后，进基辅大学自然历史系学习了两年，然后转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是在中学时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他中断大学学业，上前线当了卫生兵，后来在各地当过工人，电车司机，水手，渔民，记者。

一九二三年他回到莫斯科，成了俄罗斯通讯社的编辑。一九二五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相逢的船》。一九三二年写出成名作《卡拉－博加兹海湾》，此后辞去公职，当了专业作家。《卡拉－博加兹海湾》和《科尔希达》这两部以改造大自然为题材、弘扬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主旋律的中篇小说，成为前苏联三十年代文坛上的大事，使帕乌斯托夫斯基名闻遐迩，同时标志着他开始进入创作上的成熟期。

此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莫斯科东南远郊之外一个叫梅晓拉的荒凉而迷人、遍布森林而又有不少湖泊的地方，以及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纯朴的俄罗斯人。从此他常住在这儿的村子里，写出了《森林的故事》等许多名篇。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还有写十二月党人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故事》，写文学创作的散文集《金蔷薇》，自传体长篇小说《生平故事》，以及大量短篇小说、随笔、游记及剧本等。早期还有带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幻想家》，惊险性的长篇小说《亮闪闪的云彩》。苏联在解体前最后一次出版了他的九卷本文集。

在苏联万象纷呈的文学界，数十年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帕乌斯托夫斯基没有去歌功颂德，没有去粉饰现实，也没有写"离经叛道"作品，他一直在走自己认定的路，终于成了一位写抒情散文的大师，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形成某些评论家所推崇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派"，后继者有邦达列夫，纳吉宾，巴克兰诺夫，卡扎科夫等不少名家。

二

帕乌斯托夫斯基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为"南方"系列，包括《卡拉－博加兹海湾》等。第二为"北方"系列，包括《北方的故事》，《米哈伊洛夫树林》等。第三为"梅晓拉"系列，这是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其最多产，最主要，也最成熟的创作阶段写出的作品，其中有：《梅晓拉地方》，《森林的故事》，《破旧的独木舟》，《宝藏》，《电报》，《野蔷薇》，《烟雨霏霏的黎明》，《"273"护林哨所》等。

贯穿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一条主线，是人与大自然的主题。他是通过俄罗斯大自然来表现俄罗斯人的。他对大自然的

着墨，既多又美。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让人感受到的最大特点，在于一个“情”字。他写人，写草木，写动物，写大自然时，都透出浓浓的情来。他的作品不追求写轰轰烈烈的事件，写叱咤风云的人物，甚至谈不上有什么反面人物和尖锐矛盾的冲突，然而，通篇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氛，营造出一种诗的意境，笔意轻灵地描绘出俄罗斯大自然的风光美和俄罗斯人的心灵美。

这个“情”字，首先源于帕乌斯托夫斯基对祖国、对俄罗斯土地的强烈的爱。他在《梅晓拉地方》末段动人地写道：

“初看起来，这是一片静静的、十分平常的土地，它上面的天空也并不清朗。但是对这片普通的土地了解得越多，便会爱得越深，几乎为之痴迷……对这样地方的爱，是不会忘记的，是绝对忘不了的，如同初恋一样。”

即使身处国外美丽的地方，帕乌斯托夫斯基也思念着俄罗斯。他在《巴黎掠影》中写道：

“身处巴黎，我有时清晰地想像着梅晓拉这个地方……一踏上故土，我便会对潮润的小小赤杨树叶上每一条脉络都感到最强烈、最温柔的爱，到那时，我便会认清终极的、不可替换的俄罗斯之美……”

这个“情”字，从某方面说来是帕乌斯托夫斯基自己所谓的“浪漫主义情调”或“浪漫情调”。他说过：“我觉得我的散文的一个特色，是它的浪漫情调。”

帕乌斯托夫斯基青少年时代曾迷恋过异域情调。对现实生活中的美视而不见，脑子中尽想像着从未见过的大西洋海景，热带风光，以及其他种种奇异景物。这种迷恋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早期作品中曾有反映，使他的创作陷入了危机。等到他意识到自己不懂现实生活以后，便“毫不可惜地把过去硬写出来的东

西付之一炬……十年之久没有握笔，漫游各地……换了许多职业，贪婪地吸收周围所见的一切”。

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帕乌斯托夫斯基认识到现实生活比想像的世界更丰富，更有意思，终于放弃了异域情调。他说：“异域情调本身是脱离生活的，而浪漫情调却牢牢植根于生活，并以它宝贵的液汁为营养。我放弃异域情调，但是没有放弃浪漫情调，也永远不会放弃它——不会放弃它那一团起净化作用的火，对于人性的激情和心灵上的慷慨，不会离开它那永远不安静的状态。”“浪漫情调不允许人虚伪、无知、胆怯和残酷。浪漫情调中蕴涵着使人高尚的力量。”

在梅晓拉那个初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地方有了较深的新体验以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笔法也有了变化，他渐渐写得比较简朴，比较凝练，抛弃了浮艳之物，懂得了最朴实的心灵和最不起眼的东西的力量和诗意。

帕乌斯托夫斯基还认为：“一切东西都具有浪漫性，尤其是科学和知识。一个人知道得愈多，他便感受得愈深，诗意便把他包围得愈紧，他也就愈幸福。”这就说到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另一个特色了，那就是知识在创作中的作用。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中，植物的名称和特性，景物的描写等等，都是很准确的。有一年夏天，他几乎全忙于收集各种各样花草，根据植物图鉴弄清它们的名称和特色，并记在本子中。他还读航海指南，了解海洋和有关用语。他还是个钓鱼的行家。他总在寻求各种有用的知识。由于他知识丰富，朋友们戏称他为“帕乌斯托夫斯基博士”。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强调知识，非但不会破坏诗意，而且正好相反，“人类知识的任何领域，都蕴涵着无穷的诗意”。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有更强的艺术洞察力和感受力，才能有更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帕乌斯托夫斯基甚至告诫人们：“不懂得林中

空地和沼泽上都长什么草，天狼星从哪儿升起，白桦树和山杨树叶有什么区别，山雀会不会南飞过冬，黑麦何时开花，起什么风会有雨或干旱，会是阴天或晴天……就不要写书。”

还值得一提的是，出于对俄罗斯大自然的爱，帕乌斯托夫斯基自从一九四〇年第一次写出以森林为题材的《破旧的独木舟》以后，还于五十年代初期的作品中，经常写到人在自然界合乎理性的活动问题，呼吁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自然美，不仅保护它避免发生天灾，而且避免现代文明的不合理发展。帕乌斯托夫斯基甚至把批判的矛头公开指向当时滥伐树木的苏联科学院。在告别人世前的一封信中，他还惦记着“森林在变稀，我们应该保护每一棵树木”。

帕乌斯托夫斯基所写的人物，既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政治领袖，也有普通百姓。他写名人，是想找出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精英的特殊性格。但他更多、更愿意写的是无名的普通百姓：手艺人、农民、牧童、摆渡人、巡林员、护林员、管浮标人和乡村孩子。他热爱纯朴的俄罗斯人，他们“劳动朴实，心思明朗，对人怀善意。而且不仅对人，就是对每一只好野兽，对每一棵树都怀善意”。他的人物往往在俄罗斯大自然中出现，跟大自然融为一体，是大自然中的一员。

在人物塑造上，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的前后期有一些变化。在前期重于写事和情节，轻于人物塑造，如本书开篇的《英勇》。再如成名作《卡拉－博加兹海湾》也差不多如此。这部弘扬当时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主旋律的报告文学，虽曾轰动一时，但由于人物性格不够丰满鲜明，数十年以后事过境迁，读来毕竟不那么动人心弦了。到了创作的成熟期，尤其是在梅晓拉地方有了新体验以后，帕乌斯托夫斯基便轻于写事和情节，而重于人物塑造，重于写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而且他展现一个人物，往往并

不通过正面的重大事件，而是通过一些似乎偶然发生的小事。在这类小事中，帕乌斯托夫斯基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营造出浓郁的抒情气氛，在俄罗斯的美丽景物同人物心态、情绪互相交融之中，描画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的道德风貌来。即使写卫国战争题材，也往往如此，有的甚至像田园诗一般。最有代表性的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两个名篇：《雪》和《烟雨霏霏的黎明》。这样的作品是具有永远感人的魅力的。难怪帕乌斯托夫斯基被评论家誉为读者情绪的“导演”。至于人物的外表，他往往不多着墨，只给予寥寥几笔的勾画。帕乌斯托夫斯基描写人物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多写人的善，而少写人的恶。他避免写重大的矛盾冲突，甚至写细小的冲突也往往只是点到为止，并且予以缓解，把侧重点放在抒“情”上，这种写法本来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套路，或者说是一种切入点，不过有时也留下值得商榷之处。他的某些小说之所以显得平淡，就可能是由于缺乏冲突或淡化冲突，影响到人物性格的展现和丰满，也可能是由于上文所说的“情”写得还不够充分。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笔法，在“梅晓拉”以后的作品中变得较简朴了。他说过：“空气愈透明，阳光就愈明亮。散文愈透明，它的美就愈完善，它在人的心中的反应也愈强烈。”他在笔法上追求朴实无华的同时，对作品结构的处理也经常十分放松。他说过：“每一位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有时也想写得十分自由，根本不顾文学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确实如此，他的不少短篇作品，既像小说，又像随笔或旅行笔记。作者还往往以讲故事人的身份在其中出现，甚至交代写作的地点、企图，还发表一些有关创作的观点。有时候，在一篇作品中，荒僻而鲜活的大自然，纯朴而可爱的俄罗斯人物，加上这位多情而又多思的作者，三者彼此贴近，互相交融，构成一幅似乎天人合一的图景，读后真令人想

摆脱纷扰的尘世，身临其境去享受那“洋桃花源”式的人生。

帕乌斯托夫斯基是很讲究语言的。他所用的词汇量似乎并不很大，但是他不用生僻的方言和虽然时髦却注定短命的词汇，而是使用十分规范的语言。普普通通的俄语基本词汇，一经他组合，便成了十分清丽的、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屠格涅夫。所以从语言的角度讲，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也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写作技巧，他本人在晚年所写的《金蔷薇》中也多有透露，这部以文学笔法来研究艺术的心理学及其特性，讲作家劳动的作品，正是一本非教科书式的“文学教科书”。

苏联学者阿奇卡索娃对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写作技巧说过这样一段言简意赅、值得仔细揣摩的话：

“从‘平凡的’梅晓拉风景中能够创造出‘不平凡的’印象，究竟是用的什么方法呢？在形象的接受上运用透视缩绘法（原指在绘画或浮雕中用透视法原理来描绘人体或景物，距离视者远的部分大大缩小。——引用者）的突然性，进行诗意比较和联想的感情效果，叙述时意境高远的抒情，遣词造句时语调和结构上的组织——为了制造某种情绪而调动文句旋律、节律、音响，这些便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艺术风格的主要‘秘密’。”

读者不妨用这几句话来细细品味被高尔基称为诗人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艺术风采。

潘 安 荣

1998.11.5. 于北京

目　次

英　　勇

小男孩正用彩色铅笔画画。他全神贯注，而且在认真地思考什么。后来，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眶里突然涌出了泪水。泪水顺着面颊流到被铅笔弄脏的手指上，孩子哽咽起来。

“爸，”他小声问，“人为什么不发明出一种长生不老的药呢？”

于是我不得不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

飞行员在雾中迷失了方向。

海洋气象站都挂出了通告，有一股强热气流正向欧洲上空移动。

时值冬季。没有落雪，但干树叶折断的喀嚓声使这座海滨城市的居民想起了冰块的脆裂声。这种声音是冬天特有的。

对于海上的雾和烟雾，这方面的专家，英国人泰勒和德国人乔治曾下过精确的定义：“热带暖气流如果冬季进入欧洲，最初会变为淡蓝色的烟雾，覆盖几百海里的海面，之后烟雾变成蒙蒙细雨。这种雾很稳定。”

飞行员舍巴林知道这一点。下边是卡拉达格山的深渊和嶙峋的山巅，覆盖着千年的苔藓和褐色的水皮。雾笼罩着山峰。它飞快地涌向山峦叠嶂的花岗岩峭壁，继而像一道白色的河流直冲九霄。这根雾柱是舍巴林惟一的定向标，他正顽强地驾着神鹰围着它兜大圈子。

大海发出冷漠而低沉的涛声。初冬的红日高悬在烟雾之中，将暗淡的古铜色的阳光投到湿漉漉的机翼上。

机舱里躺着一个发烧的小男孩。母亲坐在孩子身边。每次舍巴林回头总看见她嘴边深深的几乎像男人的皱纹。孩子快要死了。

舍巴林从草原把孩子接出来，是要把他送往海滨城市的医院。三小时前把孩子抬进机舱的时候，干燥的天空万里无云，飞檐上的蛛丝闪闪发光，没有任何起雾的迹象。

舍巴林明白，即使两三小时后，飞机能成功着陆，也已经迟了，孩子已无法救治了。浓雾中没有任何希望。

飞机昂扬地吼叫一声，冲入一团潮湿的不透风的雾中。孩子正在折腾，说胡话。

舍巴林突然发现下边一只神速飞翔的大鸟的影子。飞机！舍巴林即刻把座机拉高。

"冷凝处理！"随航机械师大声对他说。"总算能飞出去了！"

舍巴林点点头。另一架飞机展着银翼迎面一闪而过。舍巴林认出这是斯塔夫里基的飞机。

斯塔夫里基驾机在雾中穿行，机尾拖出一道道宽宽的带电粉尘组成的轨迹。粉尘吸引了雾的微粒，将雾化为大雨点。最初的雨点已经斜打到机舱的弦窗玻璃上。

雾已经沉到深深的山谷里，湿漉漉的卡拉达格山脉已经在斑斓的阳光下闪烁，舍巴林看见下边被雨水冲刷过的大地。大地的色彩不断闪变，使人眼花缭乱。

舍巴林稳稳地着陆了。

孩子从机场被送往医院。舍巴林从容地走下飞机。机场挤满了飞行员，他并没有感到吃惊，斯塔夫里基出动，他也没有感到奇怪。他知道，飞机除雾原是一件很复杂而费用高昂的事，但

这也没有使他感到奇怪,因为孩子的生命更加宝贵。

“这孩子究竟是谁呢?”舍巴林暗想。在接受飞行命令的时候,这一点他甚至也没有问。

傍晚,报纸出版的号外报道说,飞行员舍巴林将一个患脑震荡的约摸七岁的男孩送来本市。医生们认为孩子的情况几乎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在绝对安静和没有干扰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转机。

报纸发行一小时后,各街道就贴出了市苏维埃的通告,希望全体公民保持安静。值勤的民警中断了医院周围的交通。

但这些措施都是多余的。没有任何命令,全市都屏住了呼吸。这么一来,海涛声、风声和干树叶的哔唰声就听得更清楚了。

汽车都沿市区的周边悄悄地行驶。司机一向习惯于加大油门,高声鸣喇叭,现在却静静地坐在漆黑的驾驶室里,像在搞什么阴谋诡计。

一辆叫“茶炉”的破旧的出租汽车把司机们都惹恼了。这辆车突然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司机们尾追着它,挥舞着拳头,尖着嗓子小声威胁说:“没有好下场,鬼茶炉!”

卖报纸的不叫卖了。扬声器关上了。少先队员们组织了维护安静的小分队,但他们几乎没有事情可做。

没有人破坏安静,只出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那就是码头上的一名路灯工人,一个性格开朗的老人引起的。

他一路走,一路放声高歌,这座海滨城市的人都爱唱,爱笑。歌词是他自己编的。

路灯通明,无需靠星星,
天上也无需群星照明,
我们真开心呀,真开心,

因为不用摸黑把路行。

少先队员们把老人拦住了。他们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几杯酒下肚的路灯工人坐到马路上，哼哼哧哧脱掉皮鞋，蹑手蹑脚朝城根他那所孤零零的小屋走去。在胡同里，他小声警告过路的人。回到家，他就把猫从贮藏室放出来，免得它喵喵叫。后来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凸形的大怀表，听了听它嘀嘀嗒嗒的响声，然后把怀表放到桌上，用枕头蒙住，举起拳头警告了它一下。

第二件事发生在码头上，事后人们在海滨一带议论了很久。

应当说，自古以来海上就有运货的船只。这些货船在离漂亮的柴油船不远的地方，笨重地在浪尖上摇荡，发出轧轧的响声。柴油机船对它们很不友好，总侧目而视。夜幕降临，这些柴油机船的螺旋桨哗哗地掀着浪花，像耀眼的行星沉落一样，从海平线上消失。

正好一艘名为"海上劳动者"的这样的货轮，满载着屋顶铁叶驶近孩子住院的这个城市。

在距海岸十海里时，货船收到港口主任的无线电报，通知他们由于特殊情况，港口不定期停止卸货。

距港口两海里时，又收到第二份无线电报，命令该货船靠码头时，任何情况下都不准鸣笛，而"海上劳动者号"尖厉刺耳的笛声远近闻名。

"海上劳动者号"上的船员都喜欢取笑逗乐，他们像所有的海员一样，善于揣度猜测。尽管他们情绪都很好，但仍免不了担心，因为把两份难以捉摸的指令联系起来，足以说明这座海滨城市一定发生了重大事件。

"海上劳动者号"进港时，一艘摩托艇朝它驶去。港口主任登上甲板朝船长室走去。

港口主任从船长室出来时，海员们听到摸不着头脑的只言片语：

“……我们的医院就紧靠着海边……”

“海上劳动者号”船长登上舰桥，发布简短命令，要求货轮驶人锚地，就地抛锚。不要浪费时间！货不卸了！

船员们纷纷抱怨起来。于是船长将全体船员召集到前甲板上，向他们宣读了报纸上有关孩子的消息。

“你们自己也明白，城里不能有响动。咱们的货现在也不必瞎忙活。”

这次“海上劳动者号”也不像往常那样，在锚地只等候一天一夜。也没有人认识这个小男孩，但是一提到他，总是满怀深情。

期待中充满了种种朴实而忧伤的故事和想法。大家争相传阅岸上来的报纸。尽管人人都暗暗地为这个不相识的男孩的命运担忧，如果是二十年前，海员们会认为这种担心显得可笑，甚至不可理解，现在他们却为此而暗自感到自豪。

是为自己感到自豪，还是为港口主任感到自豪，海员们也说不清。可是在迎接港口主任时，他们全体脱帽，之后又向他那穿着闪亮制服的背影长久地行注目礼。

城市屏息静气，一片沉寂。它给居民们一种孤独与清新之感。在敞开窗户的房间里沉睡一夜之后，周身每一个毛孔都浸透了清晨的清新和朝阳。思绪一扫疲惫与尼古丁的困扰，地平线渐渐远去，渐渐消失，展现出新的海岸、海岬陆地，为激情和诗提供了新的营养。

城市寂静无声，这么一来，海涛声、风声和干树叶的哔唰声就听得更清楚了。粉色的法国梧桐树叶的沙沙声特别响。可什么也不能与震耳欲聋的涛声相比。

孩子发病的第三天，这个城市又遇到了新的考验。码头的桅杆上挂起了风暴的信号。风暴像千百列快车轰轰隆隆自海面滚滚而来，强风暴总是在万里无云的天气突然掀起。当发蓝的天空亮到极点时，也就预示着风暴的来临。

市苏维埃已向市民发出了第二号紧急通告。通告说，对于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噪声已采取消除措施。在发明人恩斯特监督下，医院正在完成一套设备的安装，以便严密隔绝外界的噪声。

风暴预计在半夜到来，因此，必须在风暴到来之前完成被称之为"隔音屏"的设备安装。

安装工们正在医院里动作敏捷地静悄悄地工作。时间不多了。风已将一条条苍白的云带送上城市的高空。风暴逼近了。刚刚掀起的阵风已经吹过广场，将一堆堆干枯的秋叶向果园卷去。

夜幕降临前是孩子病情变化的关键时刻，而正好在这时，风暴袭来了。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卷着浪花，伴随着柔弱无力的海鸥沙哑的哀鸣和尖叫登上岸来。大地颤抖了，山林在摇摆，发出低沉的树涛声，一艘艘轮船烟囱里吐出的浓烟拖着长声呼啸着冲向空寂无人的街道。

在第一次风暴袭来前几分钟，恩斯特接通了"隔音屏"。他被批准进入孩子的病房，以便检验"隔音屏"的性能。

在震耳欲聋的风暴肆虐下，恩斯特缓步上楼。绝对的安静使恩斯特清晰地听见自己肺部咻咻的呼吸声。恩斯特走进病房，暗淡的灯光映照着一片静寂。只有因不远处浪涛的汹涌引起地板震颤才使人感觉到风暴的存在。

但恩斯特并没有留意。他望着孩子。孩子睡了，微张着嘴，睡梦中露出微笑。他听见孩子均匀而平静的呼吸。他忘记了

“隔音屏”，忘记了风暴，也没有留意医生和穿白大衣的少妇。她坐在孩子床边。他事后才回想起她热泪盈眶，泪水缓缓地滴到膝上，使他大为吃惊，尽管只短短的一瞬。

少妇抬起头来，恩斯特明白这是孩子的母亲。她站起来朝恩斯特走去。

“他会活着，”她说，突然微微一笑，眼望着恩斯特背后很远的地方。恩斯特回头看了一下。背后没有人。

“您太伟大了，”她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您！”

“别这么说，”恩斯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和咱们国家的每一位劳动者一样伟大。不比他们更好。您幸福吗？”

“幸福！”

“您看，”恩斯特说，“创造幸福，这是崇高的劳动。全国都在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您不必感谢我。”

半小时后，全市得知孩子已转危为安。

正与风暴搏斗的广播站即刻将这一消息送向夜空，送向海洋，送向全国各个角落。

保持安静的命令撤销了。

在已成强弩之末的风暴声中，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汽车的喇叭声、升上屋顶的旗帜呼啦啦的飘扬声，还有阵阵钢琴声，它们都在表示祝贺。掌管路灯的老汉也唱起他新编的质朴的小调。

> 我让条条林荫道大放光彩，
> 祖国为它纵情高唱吧，
> 我老汉为你，年轻人，干杯！

宣布全市放假。暴风雨住了，像往常一样，无边无际的大海

风平浪静。风暴不知退到大海尽头的什么地方去了，它的波浪拍打着绵延数百海里的海滩，清澈的海水冲刷着礁石，法国梧桐的红叶和温煦的、贴近地面的阳光在水上荡漾。

您如果在初冬时节来过海边，您想必会记得那仿佛在晨睡时的轻松的呼吸，您想必会记得那被暴风雨洗涤过的淡蓝色的空气，远处的海面上耸立着一排褐色的山岬，大海轻轻地将金光闪闪的水波和薄雾送到山脚下。

“海上劳动者号”上的海员们第一次听到平静的海面上回荡着贝多芬的交响曲。船似乎被乐声高高地托到平稳的浪尖上，因此当水手长特地登上甲板查看船是否挣脱了锚，他这样做就完全合情合理。大可不必像润滑工那样去取笑他了。

傍晚，一艘名为“奥西安诗歌号”的英国轮船进港。整个城市像火红的瀑布自山顶飞泻到寂静的海上，全体船员们为眼前这一派节日的奇景感到吃惊，他们彬彬有礼地问港口主任发生了什么事。港口主任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他们。

这时，飞行员舍巴林从住处走出来。远山上飘着雪花，高悬在天空的明月将魔幻般的月光洒向银白色的雪野。

舍巴林在屋旁的花园里遇到一位少妇。她是孩子的母亲。她朝飞行员走过来，感谢他搭救了她的孩子。

在路灯灯光和朦胧的夜色下，她脸色苍白，但欢快而美丽，舍巴林感到吃惊。她搂住飞行员的脖颈，吻了他一下，舍巴林感到一阵透心的凉意，仿佛霜花在他唇上融化了。

他们像孩子似的手牵着手走下山坡，一同进城，他们看见英国船桅杆上灯光一明一灭。舍巴林懂莫尔斯电码，于是停下脚步，大声读英国人发出的信号：

> 苏维埃船只的员工们。诸位海员们，祝贺你们，你们拥有这样美好的祖国，令我们万分羡慕。

小男孩不再用彩色铅笔画画了。他脸上的泪水已经干了，只是睫毛还有些湿润。他笑了，问：

"那是谁的孩子？大家的吗？"

"啊，当然是大家的！"我回答说，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

1934年12月，雅尔塔

曹苏玲 译

猫－小偷儿

我们绝望了。不知怎样才能抓住那只棕黄色的猫。它每夜都来偷吃我们的东西。它很机灵，很会躲藏，因此，我们谁也没有清清楚楚地看见过它。过了一星期我们才算弄清它的一只耳朵被撕裂了，脏兮兮的尾巴也被斩断了一截。

这是一只丧尽了良知的猫，一个到处游荡的强盗。我们背地里叫它小偷儿。

鱼、肉、酸奶油、面包，它无所不偷。有一次，它甚至把贮藏室里一个盛蚯蚓的洋铁罐抓出来了。但它并没有吃，一群鸡跑过来，把我们贮存的蚯蚓吃了个精光。

吃撑了的鸡都躺在太阳地里哼哼。我们围着它们骂，但鱼是钓不成了。

我们几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盯住那只黄猫。

村里的孩子们也帮着我们。有一次他们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天刚亮的时候，那只猫叼着一串鲈鱼，蹲了一下就穿过菜园飞快地跑掉了。

我们跑到地窖里一看，发现网绳不见了。网绳上穿着十条肥实的鲈鱼，那还是在普罗尔瓦河上捕到的。

这已经不是偷，而是明目张胆地抢劫了。我们发誓一定要把它抓住，为它的土匪行径狠狠地揍它一顿。

这只猫在当天晚上就被抓住了。它从桌上偷了一段肝泥肠，叼着它爬到一棵白桦树上去了。

我们开始摇树。猫把香肠弄掉了，香肠打到鲁维姆头上。猫从上边恶狠狠地看着我们，厉声号叫起来。

猫已无法脱险了，它决定冒险。它发出吓人的号叫，从白桦树上跳到地上，像足球一样弹跳了一下，就飞快地蹿到屋檐下去了。

房子很小，坐落在一处荒废的花园里。每天夜里我们都被野苹果从枝头落到木屋顶上的声音惊醒。

房子里堆满了钓鱼竿、猎枪霰弹、苹果和枯树叶。我们只在这里过夜，而整个白天，从早到晚都在大大小小的河汊子和湖边度过。我们在那里钓鱼，在岸边的丛林里点燃篝火。

要到湖边去，必须从很深的茂密的草丛中踏出一条羊肠小道来，草花在头顶上摇曳，把黄灿灿的花粉撒落到我们肩上。

傍晚，每当我们带着被野玫瑰刺划破的累累伤痕，疲惫不堪，被太阳烤焦了，拎着一串串银光闪闪的鱼归来，每次总发现那只到处流窜的黄猫又干出越轨的事。

但是，猫终于落网了。它钻进屋底下惟一的一个小洞里。而这个洞没有另外的出口。

我们在洞口放上一只破渔网，开始等待。可是猫并没有出来，它像一个地下的魔鬼，令人厌恶地号叫着，一刻不停，也不嫌累。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过去了……到该睡觉的时候，猫还在房子下边呼喝，号叫不止，我们特别恼火。

于是我们把村子里皮匠的儿子列昂卡叫来了。列昂卡的胆大机灵是出了名的。我们要他帮我们把猫从房子底下拖出来。

列昂卡拿来一根钓丝拴在白天钓到的一条拟鲤的尾巴上，把鱼从洞口扔到地窨里。

号叫声止住了。我们听见咯吱咯吱和恶狠狠咬牙的声音，

猫咬住了鱼头。它死死地咬住不松口。列昂卡往外拉钓丝。猫也拼命顶住不让步，列昂卡的力气毕竟比猫大，而且那猫也不愿放弃这条肥美的鱼。

过了一会儿，猫头在洞口出现了，猫嘴里还紧紧地咬着鱼。

列昂卡抓住猫的后脖颈，把猫揪出来放到地上。我们总算第一次把它看了个清清楚楚。

猫眯着眼睛，掀起耳朵，戒备地夹起尾巴。原来这是一只瘦骨嶙峋流浪街头的野猫，尽管它经常偷食，毛色火红，肚子上还带白点。

鲁维姆仔细地打量过这只猫以后，迟疑不决地问：

"咱们拿它怎么办呢？"

"狠揍一顿！"我说。

"不解决问题。"列昂卡说。"它从小就养成习惯了。好好喂它一顿试试。"

猫眯缝着眼睛等着。

我们听从了列昂卡的建议，把猫弄到贮藏室里，给它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有烤猪肉、鲈鱼冻、煎奶渣饼和酸奶油。

这顿饭，猫吃了足有一个多小时，然后晃晃悠悠地从贮藏室里出来，蹲在门口，用它那绿色的无赖的眼睛望着我们和低空的星星，洗起脸来。

吃完以后，它一面呼哧呼哧地嗤着鼻，一面用头蹭着地，显然，这大概在表示它很开心。我们真担心它会把后脑勺上的毛蹭光了。

然后，它翻身抓住自己的尾巴，咬了一会儿，吐出来，伸直身子躺在炉边，安静地打起鼾来。

从那天起，它就跟我们混熟了，而且不再偷食了。

第二天早晨，它甚至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好事。

几只鸡爬到花园里的一张桌子上，你推我搡，叽叽喳喳，啄起盘子里的荞麦粥来。

猫气得直发抖，悄悄朝这几只鸡溜过去，耀武扬威地吼了一声，就跳到桌上去了。

几只鸡绝望地惨叫着飞起来，把牛奶罐打翻了，鸡毛也刷掉了，它们急急忙忙溜出了花园。

在最前边飞跑的是一只傻乎乎的长腿公鸡，一边打着嗝儿，它的绰号叫“细脖子瓦罐”。

猫用三只脚爪追赶那只公鸡，用另一只前爪扑打公鸡的后背。公鸡身上扬起尘土和鸡毛。猫每打一下，公鸡身上就发出嘭嘭的响声，仿佛猫在拍打一只皮球。

之后，公鸡倒下抽搐了片刻，直翻白眼，轻轻地呻吟。给它泼了些凉水，它才缓过气来走开。

从那时起，鸡就再也不敢偷食了。它们一见猫就咯咯地叫着，争先恐后地跑到房子下边去了。

黄猫像这里的主人和守卫似的，常常在房子和花园周围走来走去。它总用头在我们腿上蹭。它是要我们感谢它，弄得我们裤腿上都是火红色的毛球。

我们给它改了名字，把小偷儿改成了民警。尽管鲁维姆坚持说这样不太合适，但我们相信民警们不会为此责怪我们的。

1936年

曹苏玲 译

最后一个魔鬼

老大爷去格卢霍耶湖采野马林果，回来时吓得脸都变了。他在村里到处嚷了很久，说湖上出鬼了。他指着被撕破的裤子为证，说鬼好像啄了他的腿，撕破了麻布，还把膝盖抓伤了一大块。

没有人相信老大爷的话。有些好生气的大妈们甚至嘀咕说，鬼生来就没有长鸟嘴的，湖上从来也不闹鬼，况且，革命后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鬼——因为布尔什维克已经把鬼连根消灭了。

不过村里的妇女们还是再也不去格卢霍耶湖采野果了。她们自然羞于承认革命后二十年了，她们还怕鬼，因此，当别人责备她们时，她们就避开目光，拿腔拿调地回答说：

“哎—呀—呀，宝贝儿，现如今连格卢霍耶湖上也没有野果子了。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荒的夏天呢。你自己想想吧，干吗要白跑，要糟蹋鞋呢？”

不相信老大爷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很古怪，而且不走运。都管老大爷叫“百分之十”。这个绰号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不明白。

“给我取这么个外号，老弟，”有一次老大爷解释说，“是因为我身上只剩下原先的百分之十的力气了。一头猪把我咬伤了。那哪里是一头猪啊，简直是一只狮子！它一跑到街上，哼哼吱吱一叫，周围的人都跑光了！妇女们抱起孩子跑到屋里去了。男

人们出来,手里都拿着干草叉,那些胆子小的,根本不出来。简直是一场土耳其战争!那头猪闹得可厉害了。

“你听我说后来的情况。那头猪钻进我的小屋里,一边哼哧,恶狠狠地用眼睛盯着我。我当然用拐杖给了它一家伙。我说:‘走开,宝贝儿,见你的鬼去吧!’它即刻跳起来,噌地一下朝我扑过来!它把我撞倒,我躺在地上,大喊大叫,它不撒嘴地咬我,撕扯我!瓦西卡·茹科夫大喊起来:‘快去把救火车开过来,用水把它滋走,因为现如今禁止杀猪!’人们你推我搡,大喊大叫,可猪还是咬我,撕扯我!乡亲们好不容易才用连枷把它赶走。我进了医院。医生大为吃惊。他说:‘德米特里,从医学的角度看,你顶多只剩百分之十了。’现如今我就靠那百分之十支撑着。瞧瞧,咱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啊,老弟!至于那头猪,还是用爆破弹打死的,别的子弹都不管用。”

傍晚,我们把老大爷请来,详细探问出鬼的事。村里的街道上空扬着尘土,飘散着一股股刚刚挤出的鲜奶的奶香,乡亲们把牛群从林间空地赶回来了。妇女们在篱笆门旁苍凉而亲昵地唤着小牛:

“佳卢什,佳卢什,佳卢什!……”

老大爷说,他是在湖汊的地方碰到鬼的。在那里,那鬼朝他猛扑过去,用鸟嘴啄了他一口,他跌倒在马林丛里,拼命喊叫起来,后来,他跳起来,一口气跑到戈列洛耶沼泽地。

“心差点儿没蹦出来。竟然会出这种事!”

“那鬼是什么模样?”

老大爷搔了搔后脑勺。

“它嘛,像一只鸟,”他迟疑地说。“叫声很凶,沙哑,像得了感冒。鸟不像鸟,鬼知道是什么。”

“咱们是不是上格卢霍耶湖去一趟,还真有点邪乎呢,”等老

大爷喝过茶，吃过面包圈，走了以后，鲁维姆说。

“总该是有点什么，”我回答说，“尽管这位老大爷是从斯帕斯克列皮基到梁赞一带最不起眼的老头儿。”

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我带了一支双筒猎枪。

我们是头一次去格卢霍耶湖，因此请老大爷做向导。起初他以他的“百分之十”为借口，拒绝了我们，后来同意了，不过要求集体农庄为此给他两个工作日的工分。农庄主席，共青团员廖尼亚·雷若夫哈哈大笑说：

“到那里再看吧！要是通过这次探险你能把妇女们的愚昧想法从她们脑子里赶走，我就给你记。现在出发吧！”

于是老大爷画过十字，就一起走了。一路上他不愿意再讲出鬼的事，多半时间都沉默不语。

“它吃什么东西吗，那个鬼？”鲁维姆打趣地问。

“该是吃小鱼吧，爬上岸就大吃野果子，”老大爷擤着鼻涕，说。“它大概也得靠点什么为生吧，别看它是鬼。”

“它是黑色的吗？”

“你看见就知道了，”老大爷含糊地说。“它变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我们在松树林里整整走了一天。没有路，我们穿过干涸的沼泽，一片浮萍，脚陷入齐膝深的褐色苔藓里。

针叶林里溽热难熬。蝼蛄叫个不停。干燥的林间空地上，螽斯像雨点似的在脚下乱跳。青草委顿地打蔫了，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松树皮和草莓味。松树梢上的天空里一动不动地悬着几只鹰。

溽热折磨着我们。树林已达到白热的程度，它仿佛在炽烈的阳光下悄悄阴燃。甚至似乎有一股烧焦的味道。我们都没有抽烟。我们害怕划一根火柴，树林就会像干刺柏一样劈劈啪啪

地燃烧起来，一股白烟会袅袅地飘向太阳。

我们不时在茂密的白杨和白桦林里歇脚，穿过丛林来到潮湿的地方，呼吸野草和树根散发的阵阵腐菌的气味。

我们在歇脚的地方躺了很久，倾听着树梢头仿佛海浪拍岸的松涛声，高空中微风拂动，那风一定很热。

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才来到湖边。寂静的夜幕悄悄地将树林笼罩起来，林中一片昏暗。隐约可见最初的星星像滴滴银色的水珠闪烁光芒。成群的野鸭低沉地鸣叫着，向栖息地飞去。

下边的湖被密不通风的灌木丛包围着，发着微光。黑糊糊的水面上漾起一个个大圆圈，那是鱼儿在夕阳下戏水。

夜幕在林区边缘拉开了，丛林中漫长的黄昏越来越浓重了，只有劈啪燃烧的篝火划破林中的寂静。

老大爷坐在篝火旁，用手掌挠着干瘦的胸脯。

"喂，米特里，你的鬼在哪儿呢?"我问。

"在那边，"老大爷含糊地朝白杨丛那边挥了挥手。"你着什么急呀? 天亮咱们再去找吧，现在晚了，天黑了——等一等吧。"

天亮时我醒了。从松树上滴下暖暖的雾珠。

老大爷坐在篝火旁，正匆匆地画十字。他那湿润的胡须在微微颤动。

"你这是做什么，老大爷?"我问。

"跟你们来找死了!"老大爷喃喃地说。"你听，叫唤呢，该死的! 听见了吗? 把大伙儿都叫醒吧!"

我侧耳倾听。一条鱼似醒非醒，在水里扑腾了一下，随后传来一阵刺耳的狂叫。

"喂!"有谁在叫。"喂! 喂!"

黑暗中传来扑腾的声音。一个什么动物在水里重重地拍打着，接着那个凶狠的声音又得意地吼叫起来：

“喂！喂！”

“三手圣母救命吧！”老大爷结结巴巴地嘟哝说。“听见它咬牙了吗？我这个老糊涂，怎么会跟着你们跑到这里来了！”

湖上传来一阵奇怪的劈啪声和敲击木头的声音，仿佛有孩子在那里用木棍打架。

我把鲁维姆推醒。

“哼，”老大爷说，“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可是什么也不知道！还要我带着你们。哼，见你们的鬼去吧！”

老大爷简直吓傻了。

“去开枪打吧，”他生气地嘟哝说。“苏维埃政府也不会喜欢这么做的。难道能开枪打鬼吗？亏你们想得出来！”

“喂！”鬼怪又拼命叫起来。

老大爷用厚呢上衣蒙住头，不响了。

我们爬到湖边。雾气在草丛里沙沙作响。一轮巨大的白色太阳缓缓地升到湖水上空。

我拨开岸上有毒的浆果丛，朝湖上看了一下，慢慢地举起枪来。

“看见什么了？”鲁维姆低声问。

“奇怪。这是一只什么鸟，我真不知道。”

我们小心地站起来。有一只大鸟在黑糊糊的水面上游动。它的羽毛闪烁着柠檬色和玫瑰色。看不见头，它的头和长长的脖颈都扎在水里。

我们呆住了。那只鸟把有鸡蛋那么大的小脑袋从水里抬起来，头上生着鬈毛。一个带着红色皮囊的大喙，好像粘在头上似的。

“鹈鹕！”鲁维姆喊道。

“喂！”大鸟用警告的口吻回答，并用它火红的眼睛瞥了我们

一眼。

大鸟嘴里露出一段肥大的鲈鱼尾巴。鹈鹕抖动了一下脖子，好把鲈鱼送到胃里。

这时我想起包香肠的报纸。我连忙跑到篝火那边，从背囊里抖出香肠，把油污的报纸摊开，读了用黑体字排的如下通告：

> 动物园在沿窄轨铁路转移途中，一只非洲产鹈鹕脱逃。该鸟特征：羽毛粉红色和黄色，大喙，带一只储鱼的皮囊，头生绒毛。该鸟已进入老年，脾性凶狠，不喜儿童，并可能袭击他们。但很少触犯成人。有发现者请通知动物园，奖金从丰。

"喂，咱们该怎么办？"我问，"开枪打死太可惜了，可是到秋天它会饿死的。"

"让老大爷去报告动物园，"鲁维姆回答说。"顺便还能弄点钱。"

我们去找老大爷。老大爷半天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一言不发，眨巴着眼睛，一个劲地搔他那干瘦的胸脯。等他明白过来，他才战战兢兢地走到湖边去看鬼。

"这就是它，你的林妖，"鲁维姆说。"好好看看吧！"

"咦—咦—咦，老弟……"老大爷吃吃地笑着说。"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事情明摆着——不是鬼。让它自由自在地待在这里抓鱼吃吧。谢谢你们啦。让乡亲们不再担惊受怕了。现在姑娘们又要到这里来采野果子了——等着瞧吧！这种怪鸟，我从来没见过。"

白天我们抓了些鱼，拿到篝火旁。鹈鹕也连忙爬上岸，一瘸一拐地来到我们歇脚的地方。它眯起眼睛瞥了老大爷一眼，似乎在竭力回忆什么。老大爷哆嗦起来。可就在这时，鹈鹕突然

看见一条鱼，鹈鹕张大嘴，又像敲木头似的啪的一声把嘴闭上，喂地叫了一声，接着就拼命拍打翅膀，用鸭掌似的脚爪跺起来。从旁听起来，真像鹈鹕在踩一只很重的抽水机。

篝火上腾起炭灰和火星。

“它这是干什么？”老大爷吃惊地问。“疯了吗？”

“它要鱼吃呢，”鲁维姆解释说。

我们给了鹈鹕一条鱼。它把鱼吞下后，又用翅膀扇起风来，还蹲下跺着一只脚爪，要鱼吃。

“走开，走开！”老大爷朝它嘟哝说。“上帝会给你的！哎，翅膀扇得没完了！”

一整天鹈鹕都围着我们走来走去，又是叫，又是吼，但不让我们抓住它。

傍晚，我们走了。鹈鹕爬到一个土墩上，在我们背后扑打着翅膀，生气地大叫：“喂，喂！”它大概对我们把它丢在湖上不满，要求我们回去。

过了两天，老大爷进城，在集市广场上找到动物园，讲了鹈鹕的事。从城里来了一个枯燥无味的麻子，把鹈鹕带走了。

老大爷从动物园领到四十卢布，他用这钱买了一条新裤子。

“我这条裤子是头等货，”他常常扯着裤腿说。“一直到梁赞都在议论我这条裤子呢。据说，还上了报纸。这只又瘸又蠢的大鸟让我们全农庄都出了名。瞧瞧，咱们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啊，老弟！”

1936年

曹苏玲 译

金色冬穴鱼

割草季节，最好不要到草甸子附近的湖上去钓鱼。我们明知道这一点，但还是到普罗尔瓦湖去了。

不愉快的事从鬼桥那边就开始了。

穿得花花绿绿的妇女们正在那边堆草。我们决定从她们旁边绕过去，可她们还是看见我们了。

“小伙子们，上哪儿去呀？”妇女们喊着，哈哈大笑起来。“整天钓鱼，无所事事！”

“姐妹们，相信我的话，他们准是上普罗尔瓦湖去！”绰号叫预言家的瘦高个子寡妇格鲁莎喊道。“这些倒霉蛋，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整整一夏天，妇女们都拿我们寻开心。不管我们钓到多少鱼，她们都假惺惺地说：

“钓到的鱼够给自己做碗鱼汤，就算是走运的了。我的彼得卡前几天钓回十条鲫鱼。那鱼才真叫肥呢，直从尾巴上往下滴油。”

我们明知道彼得卡只钓回两条瘦鲫鱼，但是我们没有做声。对于这个彼得卡，我们心中有数：他偷走了鲁维姆的英国鱼钩，跟踪找到了我们下鱼饵的地方。按照钓鱼的规矩应该狠狠地揍他一顿，但我们原谅了他。

当我们来到没有刈过的草地时，妇女们才安静下来。

甜甜的团酸模拍打着我们的胸脯。肺草浓浓的香甜味使温

暖着梁赞大地的阳光也像流动的蜜汁。我们呼吸着温馨的草香，丸花蜂在周围嗡嗡地叫，蝈蝈也叫个不停。

百年的柳树树叶闪烁着淡淡的银光，在我们头顶上沙沙作响。普罗尔瓦湖上飘来睡莲和清凉洁净的水气。我们定下心来，抛下鱼钩，可绰号叫“百分之十”的老大爷突然从牧场上蹒跚走来。

“唔，鱼怎么样？”他眯起眼睛望着闪烁着阳光的湖面，问。“钓得着吗？”

人人都知道，钓鱼的时候是不能说话的。

老大爷坐下来，点上一支马哈烟，开始脱鞋。他朝他的树皮鞋看了好久，大声叹气说：

“割草割得这双树皮鞋算是破完了。不——这会儿鱼不会上钩，这会儿鱼都吃饱了。鬼知道它们要吃什么饵。”

老大爷不响了。一只青蛙在岸边有气无力地叫起来。

“瞧瞧，总算哇哇地叫了，”老大爷嘟哝着，看了看天。

草场上笼罩着暗淡的玫瑰色薄雾。透过雾气露出一片苍白的蓝天，灰白的柳树上空悬着一轮黄色的太阳。

“热风！”老大爷叹了一口气。“看样子后晌会来一场及时雨。”

我们没有说话。

“青蛙也不会平白无故叫的，”老大爷解释说，我们都愁眉苦脸，默不作声，他感到有些不安。“老弟，一场大雷雨要到来之前，青蛙总显得烦躁不安，到处跳来跳去。不久前，我在摆渡的船夫那里过夜，我们在篝火上煮了一大锅鱼汤，一只不会小于一公斤重的青蛙突然跳到锅里，也就一锅煮了。我说：‘瓦西里，咱们吃不成鱼汤了。’可他说：‘一只青蛙有什么了不起！卫国战争的时候，我到过法国，那里吃青蛙的有的是。吃吧，别害怕。’于

是我们把鱼汤喝了个精光。”

“没事吗?”我问。“能吃?”

“味道好极了,”老大爷回答说,眯起眼睛沉吟了一下。“要不要我用韧皮给你编一件上衣?老弟,我已经用韧皮编了上衣、裤子、背心,三件套,给全苏展览会了。编树皮鞋,整个农庄都没有比我编得更好的了。”

过了两个小时,老大爷才走开。我们的鱼,当然也没有上钩。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打鱼人拥有更多形形色色的敌人了。首先是孩子们。他们会在你背后,一站几个小时,紧紧地盯着鱼漂,这要算好的了。

遇到糟糕的时候,他们会在附近洗澡,像马一样吐着水泡,或突然钻到水里。这时你只好收起钓竿,另换地方。

除了孩子、妇女和爱唠叨的老大爷,我们还有更厉害的敌人:那就是沉在水下的树根和蚊虫、浮萍、雷雨、连阴天、湖面和河面涨水。

在沉有树根的地方钓鱼是很诱人的,那里常常暗藏着行动迟缓的大鱼。它们慢慢地、准确地咬住鱼钩,把鱼漂深深地拖到水底,将钓丝编到树根上,再将钓丝连鱼漂一起扯断。

被蚊虫叮咬后那种刺痒的感觉,使我们浑身发战。夏天过去一半,我们已经被蚊子叮咬得血迹斑斑,疮块累累。

在炎热无风的日子里,天空一连几昼夜在同一个地方纹丝不动地悬着一团团棉花似的大块云团,这时,河湾和湖面上就会出现类似苔衣似的小水藻——浮萍。水面上覆盖着绿色的黏糊糊的一层,厚得连鱼网的铅锤都穿不透。

在雷雨即将到来的时候,鱼就不上钩了。它们害怕雷雨,害怕大地被远处的雷声震得微微颤动时那一片沉寂。

连阴天或涨水的时候，鱼也不上钩。

因此，有雾或清新的早晨就太好了，水面上的树影一直伸到很远的地方，紧靠岸边的水中，成群鼓着眼睛的雅罗鱼悠闲自得地游来游去！这样的早晨，蜻蜓总喜欢落在羽毛做的鱼漂上，我们屏息静气地盯着鱼漂，突然鱼漂连蜻蜓一起慢慢地斜着沉人水中，蜻蜓的爪子一沾水就飞起来了，而这时正有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鱼紧紧地拉住钓丝在水底游动。

一尾尾雅罗鱼像鲜活的银片落到茂密的草地上，落到蒲公英、三叶草丛中，跳来跳去，真是美妙极了！那被树林团团围住的湖面上，悬在半空的晚霞、袅袅的云雾、凉飕飕的百合花茎、篝火劈劈啪啪的响声、野鸭的鸣叫，这一切都美妙极了！

老大爷说得不错，将近傍晚雷雨来了。先是在树林里轰轰隆隆地响了很久闷雷，之后一道灰幕直冲云天，远处的草垛上掠过最初闪电的闪光。

我们在帐篷里一直坐到深夜。半夜里雨停了。我们燃起一堆大篝火，把衣服烤干了。

夜间的鸟儿在牧场上凄婉地鸣叫，一颗苍白的星星在黎明前普罗尔瓦湖上的高空闪烁。

我打了个盹。鹌鹑的叫声把我惊醒了。

“该喝茶了！该喝茶了！该喝茶了！”它在附近什么地方的野蔷薇和鼠李丛中鸣叫。

我们攀着树根和野草顺着陡峭的山坡下到水边。湖水像一块黑玻璃闪着光芒。湖底的沙土上可以看出蜗牛爬过留下的一道道痕迹。

鲁维姆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抛下钓钩。几分钟后，我听见他吹口哨招呼我。这是我们钓鱼的暗语。吹三次短声，意思是：“放下一切，快到这里来。”

我轻手轻脚来到鲁维姆身边。他一声不响朝我指了指鱼漂。一条怪鱼上钩了。鱼漂晃来晃去,忽左忽右,不停地抖动,但不往下沉。

它开始向一边倾斜,几乎沉到水里,但即刻又浮上来。

鲁维姆惊呆了,只有特别大的大鱼才会像这样咬钩……

漂子突然嗖的一下漂到一边,停下来,竖直了,然后慢慢地沉下去。

"沉下去了,"我说。"快起竿!"

鲁维姆提了提钓竿。钓竿弯成弓形,钓丝嗖的一声扎入水中。那条看不见的大鱼紧紧地拖住钓丝,慢慢地兜圈子。阳光透过白柳丛投到水面上,我看见水下一道鲜亮的青铜色闪光,这是我们钓到的那条鱼正蜷曲着往水底退去。过了几分钟我们才把鱼拖上来。原来是一尾硕大的、动作迟缓的黑鳞黑嘴的金色冬穴鱼。它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慢吞吞地摆动着肥厚的尾巴。

鲁维姆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点上一支烟。

我们不再继续钓鱼,收起鱼竿,踏上回村的路。

鲁维姆背着冬穴鱼,鱼沉甸甸地搭在他的肩上。水珠从鱼身上滴下来,鱼鳞像昔日寺院的金顶,闪着耀眼的光芒。天气晴和时,那圆顶从三十公里之外都能看见。

我们故意穿过牧场,从妇女们面前经过。她们一看到我们就扔下活儿,来看冬穴鱼。她们都像在看刺眼的太阳,用手挡住闪光。

妇女们都不做声。之后,从这群穿得花花绿绿的队伍里传来兴高采烈的低语声。

我们大大方方、若无其事地从这群妇女们中间走过去。她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拿着草耙,长出了一口气,在我们背后说:

"瞧他们扛的鱼多漂亮,眼睛都刺疼了!"

我们扛着鱼不慌不忙地穿过整个村子。老大妈们从窗口探出身来目送我们。孩子们不停地追着我们问：

“叔叔，叔叔，你们这是在哪儿钓到的？叔叔，叔叔，用什么钓的？”

“百分之十”老大爷弹了弹冬穴鱼坚硬的金色鱼鳃，笑着说：

“好哇，这下子娘儿们可要闭上她们的嘴了。不然她们总是跟你嬉皮笑脸没个完。现在可就另说了，不是开玩笑。”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避开这些妇女们绕道了。我们迎面朝她们走过去，她们亲切地对我们大声说：

“你们就敞开钓吧！要是能给我们送上点鱼也不坏呀！”

就这样，公正取得了胜利。

1937年

曹苏玲 译

引 路 人

辽阔的沼泽林区在飞机的浮船下晃动。林木已经变黄了，落叶了。一轮太阳悬在秋雾弥漫的林中空地上空。

“司令员同志，”飞行员在便条上写道，“请允许在附近湖面上降落：发动机出了毛病。恰好这一带湖泊很多。”

司令员在看书。他不情愿地放下书，看完字条，随手在上边写道：“太扫兴了，但别无他法。”然后把字条还给飞行员。飞行员看了一眼便条，开始操纵飞机下降。

司令员没有体验过比在飞行中读书更大的享受了。这是他惟一可以安安静静读书的时刻，——大地在下边慢慢地飘动，寂静，清晰，像一幅地图，湖泊像溅在地图上的水珠。

军长重新打开书，可正在这时浮船已撞击水面。湖水像炸开来似的哗哗啦啦掀起泡沫，飞机在湖上溅起水花，向林木葱茏的湖岸冲去。

司令员朝舷窗外瞥了一眼。飞行员正操纵飞机向岸边的小屋滑行。阳光在老林上空照耀。风仿佛将湖面蒙上一层淡白的轻纱。湖面上撒了厚厚的一层落叶，连驾驶舱里都透着落叶扑鼻的甜丝丝的清香。

小锚发出欢快的响声。司令员打开机舱的小门侧耳倾听。几百公里的大片森林上空是一派久违了的沉静。连啾啾的鸟鸣

声也听不到。这样的寂静只有无风的夜里才会有，这时一根枯草发出轻轻的沙沙声都会使您感到意外，让您的心急促地突突直跳。

“我们这是降落在什么地方？”司令员问。

“这里是沼泽林区，”飞行员回答说。“离这里一百公里就是切尔诺贝利市。”

“你能肯定那里有一座城市吗？”

“好像有，”飞行员含糊地小声说，有些窘。

“好，那就修发动机吧。”

可不能迟到。司令员要飞赴南方的海滨。那里有一支舰队正等他到达以后出海进行秋季演习。

从岸上惟一的小屋那边驶来一只破旧的小木船。一个人站在船上划桨。

小船驶近飞机，那人从船上向司令员喊道：

“我还纳闷，是什么仙鹤从天而降呀？我心想，怎么回事，什么原因呢？该不是出大毛病了吧，老乡？”

“什么大毛病也没出，”飞行员回答说。

“那好，那好，”树林里的人和气地同意说。“就信您说的吧。您大概是从莫斯科来的吧？”

“从莫斯科来，”司令员回答说。

“那就上船吧，上我们那里坐坐，尽管我那小屋不起眼。我是这里的护林员。”

司令员坐上摇摇晃晃的、渗满水的小船。

飞行员留下来修飞机。

上岸后，司令员朝树林扫了一眼，在晚霞映照下，它很快显得苍凉，但却金光闪闪，司令员吸了一口凋零的野草气味，笑了。

“你们这里真不错啊！应该是打猎的好地方吧？”

"莫斯科可能更好,"护林员说。

"那咱们就换换吧,"司令员开玩笑说。

"简直是笑话!"护林员说。"在这里,什么地方什么鸟掉了毛我都知道。拿天堂的生活来换,我也不会离开这片林子。"

司令员走进小屋。墙上贴着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司令员看见这些照片中,在谢甫琴科[1] 的照片旁边,还贴着他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显得年轻,笑容可掬。司令员脱下军帽,用大手掠了一下灰白的头发,坐到条凳上。护林员下地窖取牛奶和奶酪去了。

晦暗的屋角里传来一阵悲戚的嗡嗡声。司令员向四周看了一下,地上坐着一位老人,双目明亮,但已失明。老人膝上摆着一把乌克兰里拉琴,它不知被多少穷人粗糙的手抚弄过,已经磨得发亮了。老人慢慢地转动骨制把手,已经开裂的小木轴转起来,叩击着琴弦,发出暗哑的嗡嗡声。

"你是本地人吗,老大爷?"司令员问。

"不,我是从普里皮亚基来的。我要去切尔诺贝利,去基辅,如果体力顶得住,我要一直到海边去。"

"怪老头,"司令员心想。

里拉琴的琴声依旧轻轻而悲凉地嗡嗡响着。

护林老人进屋来,把一罐牛奶和一大片黑面包放到桌上。他说这个穷困的老人是从普里亚皮基那边来的,是附近农庄的一个孩子领来的,那孩子把他送到我们这里就走了。

现在要把老人护送到切尔诺贝利,但一直抽不出空来。

老人没有人带路。现在姑娘和小伙儿们都上学了,上哪里去找人带路呢?他准备一个人跋涉到海边去,不知道他要去做

---

[1] 谢甫琴科(1814—1861),乌克兰诗人。

什么，说是去找女儿。

“你还是给我唱一段吧，大爷，”司令员请求说，一面掰开黑面包，泡到一杯牛奶里。

“多谢你的这番好意，”老人回答说。“现在大家都忙忙叨叨，顾不上听老段子了。”

老人沉吟了片刻。

“我给你唱一段小曲儿吧，讲的是关于我，老科尔多布，和一些孤苦伶仃的盲人和残疾人，”老人平静地说，司令员不禁打了个冷颤。“你就静静地听吧。”

老人摘下帽子，默默地拨弄里拉琴，弹奏了许久。

“蒙着尘土的杂草啊，在路边枯萎，”他忧伤地吟唱起来，“饱经人世沧桑的人啊，心力交瘁。眼泪像小河里的水潺潺流淌啊，没有人理会。”

琴声中断了。在一片沉寂中，老人平淡地大声吟唱道：

她孤孤单单啊，活在世上，
历尽磨难啊，苦度时光。
母亲没有给她洗过脸，给她梳过妆，
也没能给她一块夹腌猪油的面包，一盘红菜汤，
那是因为啊，她母亲三年前已埋进了坟场。

里拉琴又嗡嗡地响起来，琴声高亢，苍凉。

小小孤女啊，天天替地主老财把牛放，
可怜她呀，夜夜睡在草堆旁。
草原的暴风雨啊，时时逞疯狂，
电闪雷鸣啊，一闪一闪地掠过草堆上。

盲人讲述起暴风雨如何将草原上的牛群赶散，小姑娘怎样丢失了一头最好的奶牛，东家又怎样连夜把她赶出家门，连一块

面包也没有给她。

擦干泪水啊，孤女去流浪，
叫不应坟墓里不能复生的亲娘。
泪水浇灌着人生，
忧愁编织成命运，
上帝啊，已把孤女遗忘。

老人又不做声了。里拉琴发出吱吱哑哑的声音。

“听吧，我的好人啊，”老人对司令员说。“世间没有比孤儿的泪水更酸楚的了。”

他紧按住琴弦，又说唱起来：

孤女跑呀跑，不知去何方，
路遇哥萨克，已是夜茫茫，
倾诉孤女苦，声声泪汪汪。
好心哥萨克，将孤女领回房，
见过当家人——这是我老娘，
收养孤女啊——嘱咐一声：“娘，
我在大路上，遇到这小姑娘，
世上孤女苦啊，你要待她胜亲娘，
我去找地主，和他把理讲。”

里拉琴又急促地响起来，老人厉声唱道：

并不是电闪雷鸣在天空游荡，
是熊熊的火舌吞噬了庄园。
真理永不灭，农奴有力量，
野草啊，还没有长满地主的坟场。
嗨，奋起吧，草原上和森林里的人们啊！

嗨，奋起吧，不幸的人们啊！

咆哮吧，乌克兰，暴动吧，乌克兰！

让明晃晃的枷锁铿锵地响吧，乌克兰，

农奴们奋起争取自由，夺取土地，自己的命运自己掌！

里拉琴响了许久才停下来。司令员推开面包谛听。这支哀婉的曲子使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那遥远的年代，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在寒冷的秋夜，赶着一匹老马；孩子身上只穿一件光板皮袄，破破烂烂，毛也掉了。

放牧时，疲惫不堪的老马总是无精打采，在雨中一站就是几小时，一动不动，仿佛在想什么，眼睛在流泪。

母亲将小皮袄补了又补，小皮袄却破了又破，母亲因为担忧和荒诞的预感而常常哭泣。父亲去南方的矿山，从此杳无音讯。

"是啊，童年啊，"司令员说着，抬起头来。

"我就是在地主家那场大火里烧伤了眼睛，"老人戴上帽子说。"战争前一年，我就失明了。这个世界上我只剩一副嗓子了。"

"那个小姑娘在什么地方呢？"司令员问。

"我有二十年没有见到她了，"老人回答说，"盖达马克[①]袭击我们的村子，她就跟着红军队伍穿过沼泽走了。她就这样消失在众多城市和茫茫人海之中了。我再没有别的亲人，只剩下她一个了。我花了许多年，到处找她。上个月我回到村里，农庄主席跑来对我说：'你的闺女找到了。奥斯塔普回来休过假，他在海军服役。他看到过她，她打听你，可这个傻瓜说你已经离开村子走了，在外边受苦，八成已经死了。她一直哭。我从奥斯塔普那里抄来了她的地址。这就是！'"

---

① 盖达马克，一九一八年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乌克兰反革命武装。

老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用一只颤巍巍的手递过来。

司令员借着煤油灯光看了看地址。灯罩上落着一层毛茸茸的灰，大概入冬以后就没有点过了。

“老大爷，你得走很远呢，”司令员说。“要一直到海边。路很远，要走很久。”

“我只担心一件事，怕走不到，”老人回答说。“我上年纪了，没有早先那样的力气了。”

飞行员进来报告说，再过两个来小时就修完了，天亮可以起飞。

“我们不会迟到吧?”司令员问。

“刚好准点到达。”

夜里，司令员没有睡。

他走出小屋。刚迈出门槛，周围浓重的夜色、沙沙的响声和阵阵寒意就向他袭来。湖畔的杨树急匆匆地把树叶哗啦哗啦地摇了一阵，就平息了。

“是啊，童年啊，”司令员思忖着，点起一支烟。“一切都像童年时一样，寂静的夜、北斗星、露水、潮湿的叶丛里栖息的鸟儿在沉睡中不时发出的聒噪。”

司令员朝东方看了一下。在黑沉沉的树枝间，天狼星闪着绿色的寒光——临近黎明时分了。

司令员回到小屋里。大家都入睡了。

“老大爷，”司令员小声呼唤着。

盲人在角落里动了一下。司令员擦着一根火柴。老人坐在地上，背紧靠着墙，用闪亮的、失明的眼睛望着黑暗。

“老大爷，”司令员又说，“收拾一下吧。我们带上你，把你送到海边。”

老人在黑暗中，没有做声。

"带上里拉琴，用袋子装上点吃的。过一小时咱们就起飞。"

老人没有做声。司令员又擦着一根火柴。

老人依旧坐在那里。从他睁开的双眼流下几滴泪珠。

"我料到了，"他小声说。"我料到了，我的好人。"

一小时后，随着隆隆的马达声，飞机在湖上激起一道黑浪，飞向空中，转弯往南方飞去；在南方林中空地和荒野上空低垂的木星隐隐地闪着浅灰色的光亮。

起飞前，飞行员朝坐在机舱里的盲人看了一下。老人的脸皱着。他用刺人的袄袖拭了拭眼睛，喃喃地说：

"哎呀，老傻瓜，这真成故事了！"

"请允许我报告，"飞行员对司令员说。"要多飞两百公里。我们会误了上舰的。"

"您是不会迟到的，"司令员笑着回答说。

四小时后，飞机冲破微微浮动的银白色空气，降落到一片绿色的波涛上，阳光明媚，马达轰鸣，附近是渔民的黄色小屋，红色的岩石，暖洋洋的浪涛有节奏地拍打着海岸。

这座滨海的小城似乎还在沉睡，当司令员像引路人似的小心翼翼地牵着这位身穿旧粗布外衣，用里拉琴自弹自唱的老艺人在石铺的街道上行走时，街道上空无一人。

码头附近的岸上警察从照片上就认出司令员，他本想举手行军礼，但突然不知所措，只连忙摆动了一下胳膊，就尴尬地躲到拖上岸的平底船后面去了。

"好了，咱们到了！"司令员说着，在一所小屋旁停下来。

篱墙上挂着蓝色蛛网似的细细的渔网，一只黑猫卧在翻转的小舢舨上，眯起眼睛懒洋洋地望着司令员。

"老大爷，我给你开篱笆门，"司令员小声说，"进了门您可要

自己走了。我还要赶路。”

“我能自己走，能自己走，我的好人，”老人不知所措地回答说。

司令员打开篱笆门，把老人领进门，随即闪到一旁。透过野葡萄丛，他看见一个年轻女子飞快地顺着阳台台阶跑下来，听见她悲喜交集地喊了一声，他连忙掏出一支烟，一边走，一边点上，从陡峭的石阶上一步步跳下来，穿过纵横交错的小胡同，快步朝海边走去，飞机正在那里等他。

黄昏时分，机翼下展现出一片深深的海湾。在雾霭中，在掠过的灯火下，舰旗猎猎地响，信号灯闪闪烁烁，海鸥击水，鼓噪，南方舰队在锚地飘荡，它喷着浓烟，等待司令员上舰，以便出发作秋季演习的航行。

司令员迟到了两小时。

1938 年

曹苏玲 译

破旧的独木舟

列车停了。这才听见一只熊蜂被卷在车窗的窗帘里，发出嗡嗡的声音。

“这是什么站?”包房里一个睡意朦胧的声音问。

“中途停车，”列车员回答说。他匆匆穿过车厢，一边用麻絮擦手。

纳塔莎从车窗探出身去。一大片森林从高高的路基一直伸展到地平线的尽头。森林上空一片浓重的乌云，遮蔽了半边天空。一群群白色的鸟在乌云前慌乱地翻飞，犹如蒲公英的花絮。

天边轰地响起一声雷，雷声缓缓地从森林上空滚过。隆隆的雷声响了很久，仿佛它已围绕大地兜了一圈。雷声陷入森林就平息了一下，但当它爬上林间小路和空地时，声音显得比原来更加沉闷了。

“好大的雷雨啊!”纳塔莎背后有人说。

她回头一看，包房门口站着她的旅伴，一位青年导演。

“好大的雷雨啊！真是妙极了!”他又说，审视着雷电交加的天空，那神情宛如天空是舞台布景。“您知道那是什么鸟吗?”

“不知道，”纳塔莎回答说。

“那是野鸽，”戴角制眼镜的老林管所主任说，对纳塔莎微微一笑。“您怎么不知道？还是十年级学生呢!”

“我是城里人，”纳塔莎回答说，即刻感到有些窘。

列车震动了一下，缓缓向后退去。天色突然昏暗了。忽地

一阵狂风吹开车窗的窗帘，吹翻了小桌上插着鲜花的茶杯。发黄的水哗哗地流了一地。

一道电光从一扇扇车窗旁闪过，森林里随即传来可怕的、干巴巴的爆裂声，仿佛一棵大松树被折断了。

“出什么事了？”一个穿淡紫色睡衣的瘦小女人拖着哭腔问，从第一声雷起，她那刺刺不休的说话本领就已经失去了光彩。

旅客们连忙抬起车窗，观看乌云。闪电一亮就能看见云团里不祥的大洞，卷起的旋风和纷纷洒落的混浊的雨点。黑色和灰色的尘埃结成大块的灰团向大地倾泻。在可怕的黑暗中，只有那同一棵白色的、干枯的白桦，在每一次闪电中闪现。这棵树周围还有其他成千上万棵树木，在狂风中喧嚣，不知为什么那道白光每次总是从黑暗中选中这棵白桦，令人费解。

“列车员，究竟出什么事了？”穿淡紫色睡衣的女人大声喊道。“我们为什么要开倒车？”

“前边的路被冲坏了，”列车员愁眉苦脸地回答说。“您瞧，多大的暴风雨啊！现在列车正开回西涅泽尔基。在那里等待把路修好。”

“真不像话！”小个子女人说着，惊恐地眯起眼睛，砰的一声关上包房门。

死气沉沉的森林在模糊的闪光中一振，仿佛又活过来：树枝像撕破的黑色衣袖在风中抖动，它们都伸向同一个方向，伸向那乌云低垂中露出的最后一线天空。这些树木仿佛追逐着那即将逝去的晴空，向苍天求救。

倾盆大雨哗哗地泼洒到车顶上。

“霹雳一声，电闪雷鸣，”林管所主任突然蹦出一句。

导演的目光里露出笑意。

“这是谁说的，”纳塔莎问。

“卢克莱修[1] 的诗，”林管所主任回答说，脸红了。

从一切看来，林管所主任感到既幸运，又有些尴尬。他感到幸运，因为现在他正要去克里米亚度假，他从童年时代起就离开那里了。他只记得荆棘丛生的陡峭海岬和从非常遥远的地方涌到崖脚的海水的拍溅声。

同行的旅客却使他尴尬。他们过分讲礼貌，他们的睡衣，关于疗养生活的话题都使他不自在。他们只在他们彼此间谈论这个话题，跟他却从来不谈。当他们随便谈到旅馆、旅馆的看门人和林肯牌轿车等时，他觉得这些人过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个层次，跟他这个出门时才穿一套崭新灰西装的林管所主任完全不搭界。跟他同行的这些旅客眼都很尖，他们似乎已经看出这是他惟一的一套西装，而且是科斯特罗马城普普通通的裁缝缝制的。他很爱惜这套西装，也就很羡慕那个导演。那导演往铺位上一倒，把一双白白净净的手插到非常讲究的西裤口袋里。他抽的是“精品”牌香烟，他一点也不在乎解开纽扣的西服上衣会被揉皱，也不在乎烟灰会落到他随便打了个结的非常漂亮的领带上。

同行的旅客中惟一不使林管所主任感到窘迫的是纳塔莎。她是一个腼腆、苗条的姑娘。她的头发总是被从车窗吹进来的风吹乱，还一天有好几次被细小的沙子吹迷了眼睛。

有一次林管所主任帮她把沙子从眼睛里弄出来，但是当纳塔莎递给他一块洒过一点香水的透明手帕让他用时，他还是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林子里的大老粗，”林管所主任暗自想。“真是乡巴佬。”

“西涅泽尔基，多漂亮的名字，”导演喃喃地说。“西涅泽尔

---

① 卢克莱修（约前 99—前 55），古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

基！西涅泽尔基！蓝色的湖！[1] 应当记住。"

"这里有许多湖，在这一带森林里，"林管所主任说。

"您熟悉这些地方吗？"

"是的……多少有一点儿吧……十五六年前，我在这里工作过：植树育林。"

"啊，这很有意思！"导演拿腔拿调地说，但是林管所主任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出，没有人对这事会感兴趣。"我们太不走运了。今天遇上暴风雨，为什么不在明天下呢？"

"是啊，真是够倒霉的，"林管所主任同意说。

他心里想，他早就打算到西涅泽尔基，到老地方来，可一直没有打定主意。现在列车要在西涅泽尔基停一两个小时，一直等到把路修好，可在他所熟悉的这个荒凉的车站上，除了站台上几只鸡走来走去，忙自己的事之外，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是啊，太遗憾了！"林管所主任叹气说。

纳塔莎也很着急。克里米亚她还没有去过，在她的想像中那是一座蔚蓝色的、雾蒙蒙的、散发着石竹馨香的地方。她盼望尽快看到大海。据说，大海总是突然在面前展开，像高空的乌云。

西涅泽尔基车站上空荡荡的。值班室窗口透出煤油灯光，很难说是天已经晚了，还是因为下雨天色昏暗下来。

雨住了。森林里飘来一股湿锯末的气味。

瓦西里老大爷抖搂了一下大车里的湿稻草，看了一眼火车，说："这些人来来回回走，究竟是往哪里去呀？"

他的小马连头带耳朵都伸到装着燕麦的口袋里，急匆匆地

---

[1] 在俄语中，西涅泽尔基这个地名与蓝色的湖发音近似。

嚼着燕麦，一边听老大爷咕哝，一边等着他惯常的一声吆喝："哟，鬼家伙！吃公家的粮食吃刁了嘴啊！"他喊过这一声之后，小马只好深深地喘一口气，无精打采地拉起大车，踏上归途，顺着沙土路朝湖边走去。

可瓦西里老大爷突然把缰绳一甩，快步朝列车走过去。他走到一节有灯光的软卧车厢跟前，用鞭杆敲了敲车窗玻璃。

"彼得·马特维夫！"他用变了调的微弱声音喊道。"彼得·马特维夫！"

车窗里，林管所主任正站在走廊里跟纳塔莎说话。他朝老人仔细看了看，打开车窗。

"怎么，不认识了？"老大爷问，含蓄地一笑。"可我从老远就认出你来了，从大车上就认出来了。你说说，哪阵风把你刮到这里来了！"

"瓦西里！"林管所主任喊了一声，快步来到通过台，然后跳到沙地上，拥抱老人。"过得好吗？"

"活着，"老大爷回答说，一面用衣袖揩了揩脸。"想方设法活下去吧。其实死神已经在附近转悠了，只是没想到来护林哨所找我就是了……你把我们忘了，彼得·马特维夫，说真的，忘了！可没有你，我们这里的事情，直说吧，简直不像话。"

"怎么会这样？你们那里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像没听说？"老大爷不相信地问。"彼得·马特维夫，你好像生来就不看报纸？"

"怎么了？你就直说吧，别绕弯子了。"

"我用不着绕弯子。我们区里的报纸已经登了好多次了，"老大爷叹气说。"登了一次又一次，可实际上全都白搭。看来，单靠写文章是推不动的，也保护不了森林。"

"你说什么呀？"林管所主任问。"别绕弯子了，直说吧。"

老大爷把帽子摘下来，扔到被石油染黑的沙地上。

“哎呀，彼得·马特维夫，彼得·马特维夫呀！你的幼树林已经没有了。”

“烧掉了吗?”林管所主任惊讶地问。

“怎么会烧掉？上天保佑，我们这里还没有发生过火灾。可打今年春天起，林子就被毛毛虫吃掉了，它们吃林子好像事先都讲好了，现在，大概已经吃掉了一半，这些该死的毛毛虫。新来的林业技术员什么也办不了。要知道，他们不让他发挥积极性，也不给他杀虫药，他只能到处打报告，不管谁来，他总是那句话：‘州里没给答复。’我们就这么干坐着，裤子都磨破了。‘没给答复，没给答复’，可林子啊！”老大爷大声说着，哽咽了。“彼得·马特维夫，咱们造了多么好一片林子啊！松树一棵挨一棵，简直像一对对标致的亲姐妹！老实说，信不信由你，我每次一进林子，就把帽子摘下来，站在那里什么都忘了。林子长得多好啊！”

老大爷拾起帽子，看了看，就把它扣到乱蓬蓬的、灰白的头发上。

“该怎么办呢，瓦西里?”林管所主任说着，回头看了一眼。纳塔莎正站在车厢的梯台上，皱起双眉，听老大爷诉苦。

“如果父亲丢下自己的孩子不管，”老大爷伤心地说，“他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且，他也会在人民法庭上受到审判。可是树怎么样呢？树不会开口说话。树能向谁去诉苦呢？只能向我这个傻瓜，护林巡查员诉苦。”

“该怎么办呢，瓦西里?”林管所主任不知所措地说。

“授粉，”老大爷没有听林管所主任说话，喃喃地说。“今年春天花粉成熟以后，刮起风来，花粉被吹到湖上，像一片金黄色的粉雾。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花粉。”

老大爷沉默了片刻。

“彼得·马特维夫，”他拉住林管所主任的衣袖，恳求说。“给我老头一点面子，咱们一块儿到湖上去看看吧。你只要跟我说该怎么来挽救它，我是说那片林子，然后你还是继续走你的路，以后我来想办法对付。”

“怪人!”林管所主任说。“要知道，火车过两三个钟头就要开了。亏你想得出来!”

“绝对开不了!”老大爷把握十足地说。“它走不了。有两公里的铁路被冲坏了。最早也得等到明天吃中午饭的时候才能走。”

林管所主任又回头看了一下纳塔莎。她还是照旧皱着眉头，看着老大爷。

“咱们去找一下值班员，”老大爷当机立断说。“只要他还有一点点良心，他一定会向你证实我的话。怎么样，咱们走吧!”

“我真拿你没办法!”林管所主任生气地说。“你这些话都把我闹糊涂了。”

“您去一下吧，彼得·马特维夫，”纳塔莎突然说。“来得及。”

“您以为我能来得及?”林管所主任说着，笑了，突然觉得精神起来。“您觉得我能来得及?”

“要不要我跟你们一道去?”纳塔莎问。

“哎呀，漂亮的小姐，亲爱的同志，”老大爷说，向纳塔莎深深鞠了一躬。“就凭你这句得体的话，怎么能不带你一道去呢?咱们走吧。我们上林子里到处转悠一下，你就待在湖边玩吧。我们这里的湖里都是银水，全苏联独一无二。”

“好了，咱们去找值班员吧!”林管所主任说。“老弟，你可把我完全闹糊涂了。”

值班员说，恐怕要等到明天中午道路才会修好。

林管所主任、老大爷和纳塔莎动身到湖上去了。他们这一

走，在旅客们中间引起非议和疑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旅客们都会大喊大叫："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知道吗，会误车的。"

小马扇着耳朵，不紧不慢地拖着大车——因为夜里看不见遭受虫害的树林，也就不可能想出什么招数来。

车轮轧轧地碾过杂草丛生的昏暗的道路。森林里一片沉寂，纳塔莎觉得这寂静像夜间的流水一样深沉。只是从潮湿的幼树林里偶然传来一两声不知什么鸟睡意朦胧的鸣啭。

近午夜时分，乌云散去了，松林顶上的天空开始有寒光闪烁。但是纳塔莎认不出那些星星，一个个星座都被交错的树枝遮挡着，看不出她所熟悉的原来的轮廓。

森林地带神秘而广袤，像海洋一样在昏暗的夜色中向四周伸展开去，空气中散发着霉味和湿树叶的气味，从不曾被人们惊扰过的小丛林气味刺鼻，天空上繁星不停地闪烁。纳塔莎说话时声音变得很轻，连老大爷和林管所主任说话也都压低了嗓音。

"我们这地方是禁伐区，"老大爷叹着气，喃喃地说。"森林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世界上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睡吧，睡吧！"一只刚刚睡醒的鸟儿在头顶上什么地方鸣叫。"睡吧，睡吧！"

"我就要睡了，"纳塔莎暗想，想到这次出乎意料的运气，她笑了。由于高兴，她甚至感到有些冷，她希望这一夜无休止地延长下去，让大车无休止地不慌不忙地轻轻碰撞着树根，让森林变得越来越茂密，越来越神秘。

"唔，咱们好像是到了，"老大爷说。

天色亮了一些。纳塔莎朝周围看了一下，一点也不明白：路边是一片繁星点点的天空，掀着浪花漂向看不见的岸边。

"湖泊，"林管所主任说。"瞧，湖里有多少星星，简直像在秋天一样！"

一只狗嘶哑着嗓子在叫。大车在护林哨所旁边一片黑黢黢的柳树下停下来。栖架上的鸡被惊动了。老大爷走进哨所，点上铁制的煤油灯，给纳塔莎和林管所主任照路。

纳塔莎走进小屋。这间陈旧的、用原木搭建的小屋里，散发着强烈的炉灰和干薄荷的气味，洋溢着暖意。

纳塔莎喝了一杯牛奶，就立刻倒在一张由于年久而磨得发亮的宽凳上睡着了。老大爷往她的头下垫了一件新粗呢上衣。

她醒来时，时间还很早。一轮淡白的太阳高悬在森林上空。小屋里没有人，只有一只狗趴在桌子底下抓跳蚤，不时惊讶地看看她。

"可别误了车啊！"纳塔莎突然想起来，就跳起来理了理头发。

挂钟大概早就停了，悬挂钟摆的地方的水瓶布满了蜘蛛网。

纳塔莎来到阴凉的前室。狗也跟着出来，讨好地用尾巴拍打着水桶和堆在地上的马具。

一个人也不在。纳塔莎打开通往门廊的门，舒了一口气。紧靠着门外是一片圆形的清澈的湖，笼罩在隐约的薄雾之中。高大的森林倒映在湖中。白色沙岸边的湖水是那样洁净，仿佛很轻，没有一点分量。一些银白色的小鱼轻轻摆动着尾巴，在湖水中睡去了。

湖岸上有一只被拖上岸的独木小舟，由于年久发旧，已经干裂而且发灰了。纳塔莎在湖里洗了个澡，穿好衣服，来到小船旁。船里还有一条长凳。纳塔莎坐到凳上。凳子已经被太阳晒热了。

独木舟的裂缝里长出高高的花草。正好在纳塔莎脚下一丛挺秀的柳叶菜绽放着粉红色的花朵。拴在一根生锈的铁杆上的船头上长着一棵蜡菊，从船底下的沙土里蹿出几棵杜鹃泪。周

围散发着强烈的菖蒲和松木刨花的香甜味。黑狗卧在独木舟旁打了个哈欠。蝼蛄在深深的地下咕咕地叫。

“火车会怎么样呢?”纳塔莎心里想,她觉得奇怪,想到火车,但一点也没有感到惊慌。

她就这样坐了近一个小时。她听见湖那边的林间空地上有鹤群喁喁私语,接着,一只野鸭绝望地叫了一声,于是又复归寂静。

最先回来的是老大爷。他亲切地和纳塔莎打招呼,然后在木舟旁的沙地上席地而坐,说:

“火车的事,你别担心。让我先抽口烟,然后套上我的小马送你去车站。你去吧,愿你一切顺利,到有温泉、有金顶大教堂的城市去吧,愿你在那里生活幸福。”

“可彼得·马特维夫呢?”

老大爷笑着说:

“他这就回来。他现在已经不着急了!”

“怎么回事?”纳塔莎吃惊地问。

“他会讲给你听的,”老大爷回答说,一面在船帮上磕净开裂的烟斗里的烟灰。“听我说,这只小船有多少年数了呢?年数不比我小。我跟它同年。你看看,小船上长满了各种花草。这个,我们这里管它叫瞌睡花,”老大爷指着杜鹃泪说。“你看看它,看看这朵花,白天打瞌睡,可一到晚上就开了,散发出一股蜜一样的香气,就这样,一直开到早晨。说实话,这只破船,已经用得超出它的年限了。不久前,护林员来过一趟,开玩笑说:‘瓦西里,你还不如拿它煮土豆,干吗让劈柴白扔着呢?’可我心里想:‘不,还不到拿它煮土豆的时候,还要等一等。’”

“舍不得吗?”纳塔莎问。

“当然舍不得。你想,尽管它完全朽了,可生活中还能派上

用场。”

“怎么呢?”纳塔莎问。“我不明白。”

“这有什么要明白的!”老大爷生气了。“这只小船是成了废物,可它的每条缝里都长出花草来。看着它,我有时候就会想:‘我这个糟老头子说不定对生活也有点用处吧。’我这不正努力这样做。你不用害怕白了头。要紧的是心里不要出毛病。我这话说得对不对?”

“对,”纳塔莎回答说,笑了。

“这就对了! 相信我的话吧!”

林管所主任朝这边走来了。老大爷哼哼着站起来,去套他的小马。林管所主任显得神情严肃又尴尬。他问纳塔莎睡得怎么样,早晨喝过牛奶没有,接着就不做声了。

“我们不会误车吧?”纳塔莎问。

“不会,我想不会,”林管所主任回答说,脸红了,随后,他不看纳塔莎,又说:“是这样,我不走了。”

纳塔莎感到吃惊,没有说话。

“是的,我不走了!”林管所主任愤愤地说。“这里的事情原来是这样……一句话,没有我,他们可能什么也办不了。森林要完蛋了。要知道,自己种的,心疼啊……”

“我明白,”纳塔莎说。

“一般说来,我承认,我在这里要比在克里米亚更好一些。只可惜疗养证白白浪费了。哎,由它去吧! 不过我恳求您,请您把我的手提箱交给老大爷,让他给我带回来。”

“好吧,”纳塔莎说着,叹了一口气。“我还真有点羡慕您呢。”

“喔,鬼家伙!”老大爷在哨所的小屋旁用沙哑的声音喊道。“吃公家的饲料吃刁了嘴啊!”

"好吧，再见了！"纳塔莎说着，胆怯地握了握林管所主任的手。

列车沿着平缓的弯道疾驰，纳塔莎认出昨晚列车就是在这里遇上了风暴。车厢轰隆轰隆地飞驶过一条清澈的小河，纳塔莎竟然来得及看清桥边一块落满灰尘的木牌上写着"莫什卡河"的字样。

一道宽阔的彩虹架在森林上空，湖那边什么地方正下小雨。

纳塔莎觉得这道彩虹就是进入由彼得·马特维夫和老大爷掌管的神秘禁伐区的大门，那里每天都有野鹤报晓。

远处灌木丛中，清澈的水闪着粼粼的波光。莫非是湖吗？纳塔莎从车窗探出身去。久久地凝望着叶丛间的水光，凝望着彩虹，她的心抽紧了。要是能在这里一直待到秋天该多好啊！

机车像在告别似的长鸣一声，森林开始将这短促而嘹亮的笛声传送开去，送往难以通过的密林，从那里突然又传回响亮的、参差不齐的回声。

1939 年

曹苏玲 译

老 厨 师

一七八六年一个冬天的傍晚，维也纳城郊的一间小木屋里，一位失明的老人，杜恩伯爵夫人从前的厨师快要死了。其实，这甚至不能算是一间屋子，而是花园深处一间破旧的岗棚。花园里堆满了被风刮落的枯朽树枝。一走动，树枝就在脚下嚓嚓咯嚓地响，于是用链子拴在窝里的一只狗就开始低声唔唔地叫。它也快要死了，像它的主人一样，老了，不能汪汪地叫了。

几年前，这位厨师被炉子的热气熏瞎了眼。从那时起，伯爵夫人的管家就让他住到这间岗棚里，时不时给他几个佛罗伦[1]。

厨师和他女儿玛丽亚住在一起，她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小屋里全部家什只有一张床、几条瘸腿的板凳、一张笨重的桌子、满是裂纹的瓷盘瓷碟和玛丽亚的惟一财产——一架拨弦古钢琴[2]。

这架拨弦古钢琴已经太老了，只要周围有什么声响，它的琴弦就会轻轻地和着唱很久。厨师开玩笑说这架琴是“看家的哨兵”。只要有人进屋，它都会发出颤巍巍的苍凉琴声欢迎他。

玛丽亚给临终的老父亲擦过身，穿上冰凉干净的衬衫，这时老人说：

“我从来不喜欢神甫和修道士。我不能请牧师听忏悔，但是

---

① 佛罗伦，旧时佛罗伦萨的金币或银币，后来在欧洲许多国家通用。

② 拨弦古钢琴，十六至十八世纪一种有键拨弦乐器，是钢琴的前身。

临终前我要净化一下我的心灵。”

“那怎么办呢?”玛丽亚惊慌失措地问。

“你到街上去,”老人说。“把碰到的第一个人请到家里来,听取一个临终人的忏悔吧。谁也不会拒绝你的。”

“咱们这条街多荒凉啊……”玛丽亚小声说了一句,披上头巾出去了。

她跑着穿过花园,好不容易打开生锈的小门,停下脚步。街上空无一人。风把落叶刮得满街跑,昏暗的天空落下冰冷的雨点。

玛丽亚等了很久,侧耳谛听。她终于觉得似乎有人沿着围墙走过来,边走边哼着小调。她朝前走了几步,迎过去,和他撞了个满怀,于是尖叫了一声。那人收住脚步,问:

“什么人?”

玛丽亚抓住他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转述了父亲的请求。

“好吧,”那人平静地说。“我虽然不是神甫,但没关系。走吧。”

他俩进到屋里。凭着烛光,玛丽亚看出这人身材瘦小。他把淋湿的斗篷一下子脱下来,扔到长凳上。他穿着优雅、朴素;烛光把他的黑坎肩、水晶纽扣和花边硬领照得闪亮。

这个陌生人还很年轻。他完全像个孩子似的甩了一下头,理了理上了粉的假发,麻利地把凳子拉到床边,坐下来,俯下身,愉快地注视了一下临终人的面孔。

“您说吧!”他说。“也许我不是用上帝赋予的权力,而是用我所从事的艺术的力量,让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轻松下来,并卸下您心灵上的重负。”

“我干了一辈子活儿,直到双目失明,”老人小声说,并把陌生人的一只手拉到自己身边。“干活儿的人是没工夫去犯罪的。

我的妻子,她叫玛尔塔,她害上肺病以后,医生给她开了许多种贵重药品,还叮嘱要给她吃鲜奶油和无花果,喝滚热的红酒,我于是从杜恩伯爵夫人的一套茶具中偷了一只小小的金盘子,把它砸成碎块卖了。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心里很难过,我对女儿隐瞒了这件事,一直教育她,别人的东西一点也不要动。"

"伯爵夫人的仆人中有人为这事受到牵连吗?"陌生人问。

"我发誓,先生,绝对没有,"老人回答说,哭起来。"要是我知道黄金救不了我的玛尔塔,我怎么会去偷呢!"

"您叫什么名字?"陌生人问。

"约翰·梅耶,先生。"

"那好,约翰·梅耶,"陌生人说,把一只手放在老人失明的双眼上,"您在人们面前没有罪。您所做的,不是罪过,也不算偷窃,相反,说不定还该算是您对爱情奉献的壮举。"

"阿门!"老人小声说。

"阿门!"陌生人重复说。"现在您告诉我您最后的心愿吧。"

"我希望有人能照顾玛丽亚。"

"这由我来做。您还希望什么呢?"

这时,即将逝去的老人突然露出微笑,大声说:

"我希望能再一次看见玛尔塔,像我年轻时看到她那样。我想看见太阳,看见这座古老的花园百花盛开的春天。但这是不可能的,先生。您别因为我这些傻话生我的气。我这病大概把我完全闹糊涂了。"

"好吧,"陌生人说着站起来。"好吧,"他又说,走到拨弦古钢琴旁边,坐到钢琴前的凳子上。"好吧!"他第三次大声说,急促的琴声突然从岗棚里飘散开来,仿佛千百颗玉珠散落到地上。

"听吧,"陌生人说。"一边听,一边看。"

他弹奏起来。玛丽亚过后回忆起当琴键在这个陌生人的手

指下发出第一个音符时他的面孔。他的前额异常苍白，烛光在他暗淡的眸子里摇曳。

古钢琴多年来还是第一次发出这样嘹亮悦耳的琴声。这琴声不仅充满了岗棚，而且充满了整个花园。那只老狗从窝里爬出来卧着，歪着头，警觉起来，轻轻地摇着尾巴。天空开始飘湿乎乎的雪花了，狗却只抖动了一下耳朵。

"我看见了，先生！"老人说着，从床上微微欠起身来。"我看见和玛尔塔相遇的那一天了，那天她因为难为情，打破了牛奶罐。那是冬天，在山里。天空像湛蓝的玻璃一样透明，玛尔塔笑了。她笑了，"他又说，倾听着丁当的琴声。

陌生人弹奏着，一边望着黑洞洞的窗口。

"现在呢？"他问，"您看见什么了吗？"

老人默默地谛听着。

"难道您没有看见，"陌生人一面弹奏，一面匆促地说。"夜由黑变蓝，之后由蓝变成蔚蓝色吗？暖融融的阳光已经从什么地方的上空投射下来，您家这些古树的树枝上已经绽开了白色的花朵。依我看，那是苹果树上的花，尽管从这里，从房间里看过去，它们像大朵的郁金香。您看，第一道阳光已经投射到石砌的围墙上，把围墙晒暖了，上边直冒热气。可能是浸透着融雪的青苔水气正在蒸发吧。天空变得更高，更蓝，更美了，鸟儿已经成群地从古老的维也纳上空往北飞去了。"

"这些我全都看见了，"老人喊道。

古钢琴的踏板轻轻地吱吱响着，钢琴奏出庄严的乐声，这仿佛不是琴声，而是千百人在欢呼。

"不，先生，"玛丽亚对陌生人说，"这些花一点也不像郁金香。这是苹果树，只开一夜花。"

"是的，"陌生人回答说，"这是苹果树，但是花瓣特别大。"

“玛丽亚，把窗户打开吧，”老人请求说。

玛丽亚打开窗户。一股冷空气破窗而入。陌生人弹奏得柔和而徐缓了。

老人倒在枕头上，急促地喘息起来，双手在被子上摸索。玛丽亚朝他扑过去。陌生人中止了弹奏。他坐在古钢琴旁一动不动，仿佛沉迷在自己的琴声中。

玛丽亚尖叫了一声。陌生人站起来，走到床前。老人喘吁吁地说：

“我像许多年前一样清楚地看到了一切。但是我不能不知道……名字就死去。名字！”

“我叫沃尔夫康·亚马德·莫扎特，”陌生人回答说。

玛丽亚离开床边，双膝几乎触到地，向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深深施礼。

当她直起腰来时，老人已经死了。窗外已是朝霞满天，洒满湿润雪花的花园沐浴在霞光中。

1940年

曹苏玲 译

礼　　物

每当秋季临近，我们常常开始议论，说自然界的许多事情都不是按照我们的愿望安排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很长，持续很久，夏天比冬天要短许多，而秋天更是一闪即逝，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像一只幸福鸟从窗外掠过似的。

护林员的孙子万尼亚·马利亚温爱听我们谈话。这孩子有十四五岁。他常常从乌尔任斯基湖那边他爷爷的岗棚到我们村里来，有时提一篮白蘑，有时拎一筐越橘，有时干脆空着手，上我们这里来做客，听我们聊天，看《环球》杂志。

厚厚的《环球》杂志的合订本与一些船桨、灯笼和一只旧蜂箱都乱扔在贮藏室里。蜂箱本来涂了白色的胶粘剂，如今胶粘剂大块大块地从干燥的木板上剥落了，木板散发出一股陈蜡的气味。

有一次，瓦尼亚拿来一棵连根挖出的小白桦。他用湿青苔包住树根，外边还用椴树皮席裹上。

"这是送给你们的，"他说着，脸红了。"一件礼物。请把它栽到一只大木桶里，然后放在一间暖和的屋子里，它一冬天都会是绿油油的。"

"你真是个怪人，为什么把它挖出来？"鲁维姆问。

"你们不是常说你们舍不得夏天吗？是爷爷出的主意。他说：'去吧，你上去年烧掉的那片林子里，那里有两岁的小桦树，密得像草一样，走都走不过去。你挖一棵给鲁姆·伊萨耶维奇

(爷爷这样称呼鲁维姆)送去。他总惦着夏天,这样一来,整个严寒的冬季都会给他带来夏天的感受。等到外面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的时候,看看这些绿叶,他当然会感到快活的。'”

“我不只是舍不得夏天,更舍不得秋天,”鲁维姆说着,摸了摸白桦的很小的叶子。

我们从板棚里找来一只木箱,装上土,把这棵小白桦种下去,把箱子靠窗放到阳光最充足,最暖和的房间里。过了一天,耷拉下来的白桦树枝都支棱起来,整个小树精神抖擞,当过堂风闯进屋来,一下子砰的一声把门吹得关上时,小白桦树的叶子甚至也沙沙地响了。

花园里已经是秋天了,我们的白桦树依旧碧绿苍翠,生机盎然。槭树变成深绛红色,像火焰一样;卫矛的叶子也成了粉红色,凉亭上的野葡萄已经干枯了。连花园里的白桦有些地方也一缕缕发黄了,就像还不算老的人头上出现的最初的白发。屋里的白桦却越来越年轻了。我们看不出它有丝毫凋萎的迹象。

有一天夜里,出现了第一场霜冻。寒气吹到房间的窗玻璃上,玻璃蒙上了一层水气,屋顶上也洒满了一粒粒霜花,霜花在脚下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只有星星似乎对这初寒的来临感到高兴,它们比温暖的夏夜更显得明亮了许多。那天夜里我被一阵悠长悦耳的乐声唤醒,原来是黑夜里吹奏出的牧笛声。窗外的朝霞已经隐约露出了鱼肚白。

我穿好衣服来到花园里。刺骨的寒风像冷水浇头,使我睡意顿消。已是朝霞满天。东方湛蓝色的天空变为火红的烟雾,像烈火中腾起的浓烟。这烟雾渐渐豁亮起来,变得越来越透亮;透过薄雾已经能够看到远处明丽的天空金黄色和玫瑰色的彩云。

没有风,但花园里的树叶仍纷纷飘落。白桦树,一夜之间,连树梢都变黄了,树叶像连绵的苦雨从树上落下来。

我回到屋里，屋里暖融融的，令人昏昏欲睡。在熹微的晨光中，小白桦依旧挺立在木箱里，但我突然发现一夜之间，它几乎完全变黄了，已经有几片柠檬色的树叶落在地板上。

房间里的温暖也没能保住这棵白桦。过了一天，它的叶子就全落光了，它似乎不愿意落在它的成年朋友们后边；它的成年朋友遍布于寒冷的森林、丛林之中，遍布于秋天潮湿的广阔的林中旷地里。

瓦尼亚·马利亚温、鲁维姆和我们大家都很难过。我们本来已经深信，即使今冬飞雪的日子，在明丽阳光和欢快的炉火红色的火舌照耀下的房间里，这棵白桦会依旧碧绿苍翠。对于夏天的最后的怀念破灭了。

当我们把试图保住白桦树的绿叶的故事，讲给我们熟识的林管所主任听时，他笑了。

“这是规律，”他说。“自然界的规律。如果树木不把树叶落光过冬的话，会有许多情况使它们遭致死亡——会死于积雪的重压，树叶上的雪越积越多，会压断最粗壮的树枝；还有，到秋天树叶会积存许多对树木有害的盐类；最后，树叶会在冬天继续蒸发水分，而冻结的土地不再向树根提供水分，那么树木就必然会死于冬旱，死于干渴。”

但是，绰号叫“百分之十”的米特里老大爷得知了关于白桦树的这个小故事，却有他自己的说法。

“你呀，老弟，”他对鲁维姆说，“你先活到我这把年纪再来跟我争吧。否则，你总跟我争个没完没了，你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开动脑筋好好想想。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更善于思考问题。需要我们操心的事少，我们就常常琢磨这世界上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这些关系又该怎么去解释。就拿这棵白桦来说吧。你不用告诉我那个林业区主任是怎么说的，我事先就知道他会说什么。他

这个人很鬼，听说他待在莫斯科的时候用电流烧饭。这可能吗?"

"可能，"鲁维姆回答说。

"可能，可能!"老大爷学着他的腔调说。"可你看见过电流吗? 如果电流像空气一样，是无形的东西，你怎么可能看见呢? 白桦树的事，你还是听我说吧。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友情呢? 当然有。可是人都目空一切。他们认为只有人才有友情，于是他们在一切其他生物面前神气活现。可是，老弟，友情是无所不在，到处都能看到的。俗话说，牛和牛做朋友，燕雀和燕雀做朋友。你要是打死一只公鹤，母鹤就会委靡憔悴，心神不定，不住地哀鸣。各种花草树木之间，应该说，也有友情。如果所有森林里的白桦树叶子都落了，你那棵白桦树怎么会不落叶呢? 如果冬天，它们都受尽煎熬，而它却在炉边烤火，暖融融的，保养得很好，到了春天它又有何面目去见它们，能有什么话好对它们说呢? 同样也应该讲良心啊。"

"哎，老大爷，你简直胡说，"鲁维姆说。"跟你讲不清楚。"

老大爷哧哧地笑起来。

"理亏了吧?"他挖苦说。"认输了? 还是别跟我较劲了，没你的好处。"

老大爷笃笃地拄着拐杖走了。他感到很得意，而且深信在这场争论中他赢了我们大家，除我们之外还赢了林业区主任。

我们把白桦移植到花园里的围墙旁边，把它落下的黄叶收集起来，夹到《环球》杂志里晾干。

我们为在冬天保留对夏天的记忆所作的努力，也就这样告终了。

1940 年

曹苏玲 译

告别夏天

冷雨连绵不断地下了好几天。花园里呼呼地吹着潮湿的风。下午四点钟，我们就已经点上煤油灯，这不禁使人感到夏天已经彻底结束，大地已越来越堕入迷茫的雾霭，堕入不舒适的黑暗与寒冷之中了。

十一月末，这正是农村最苍凉的时刻。猫蜷缩在一张旧扶手椅里，整天睡觉，每当黑乎乎的雨水打到窗上时，它就在梦中抽动一下。

道路都被冲坏了。河上漂流着像打过的蛋清似的黄色泡沫。最后的几只小鸟也都躲到屋檐下去了；已经有一个多星期，米特里老大爷也好，万尼亚·马利亚温也好，林业区主任也好，谁都没有来看过我们。

最好的时候要数傍晚。我们生起火炉。炉火劈啪作响，跳跃的红色火苗映到原木墙上和那副老的旧木刻上，那是画家勃留洛夫[①] 的木刻像。他仰身靠在扶手椅里，注视着我们，仿佛也和我们一样，把一本打开的书放在一旁，思考读过的内容，倾听敲打木屋顶的雨声。

灯都燃得很亮，一只残破的铜茶炊反复唱着自己单调的歌。只要把它一端进屋，房间里顿时显得舒适，也许因为窗玻璃蒙上了水气，看不见那日夜敲打着窗户的孤零零的白桦树枝。

---

① 勃留洛夫(1799—1852)，俄罗斯著名写生画家，水彩画家，肖像画家。

喝过茶以后，我们围坐在炉旁看书。这样的晚上，读查尔斯·狄更斯感人肺腑的长篇巨著，或翻阅沉重的旧杂志《田地》[1] 和《美术评论》的合订本，该是最惬意的事了。

入夜，一只达克斯种红毛小狗丰季克常常在梦里哭泣。这时就得起来用一块厚实的破呢子把它包上。丰季克睡得迷迷糊糊，它会轻轻地舔舔你的手，向你表示感谢，然后长出一口气，又睡去了。屋外一片漆黑，风雨之声大作，一想起倘使有人在黑魆魆的大森林里遇上阴雨连绵的夜晚，真是不寒而栗。

一天夜里，我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惊醒。我觉得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聋子。我闭目躺着，侧耳倾听了许久，终于弄明白，我并没有聋，只不过屋外变得异乎寻常的安静罢了。这种安静也就是所谓的"死寂"。雨住了，风停了，喧闹不安的花园也沉寂了。只听见一只猫在睡梦中不时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睁开眼。屋里充满了白色的柔和的光辉。我起身来到窗前，窗外白雪皑皑，一片静谧。雾气迷蒙的天空，在令人目眩的高处，悬着一轮孤月，在它的周围有一圈黄色的月华在微微闪光。

是什么时候落下了这第一场雪呢？我走到挂钟前。周围这么亮，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挂钟的黑色指针正指着两点。

我半夜睡着了。这么说，就在这两小时内，大地就大变样了，短短两小时内，严寒就魔术般地征服了田野、森林和花园。

我隔窗看见一只灰色的大鸟落到花园里一棵槭树的树枝上。树枝摇晃起来，雪从枝头飘落。那只鸟慢慢直起身来飞走了，雪却依旧像从枫树上洒下的玻璃雨珠似的纷纷飘落。之后，一切又复归寂静。

---

① 《田地》，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八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带插图的周刊。

鲁维姆醒了。他朝窗外看了许久，舒了一口气，说：

"这场初雪把大地装点得好漂亮啊。"

大地披上了盛装，像一位娇羞的新娘。

可到了早晨，结了冰的道路，门廊上的落叶，从雪里露出来的发黑的荨麻秆，到处都咯咯吱吱响。

到喝茶的时候，米特里老大爷一瘸一拐地来了，他来为这场初雪向我们道喜。

"这一下田地可洗了个痛快，"他说，"还是用银盆盛雪水洗的呢。"

"米特里，你从哪里来的这一套？"鲁维姆问。

"难道不是吗？"老大爷笑着说。"我已故的母亲说的，她说，很久很久以前，漂亮姑娘们都是用银罐盛第一场雪洗脸，这样会青春永驻。老弟，这还是早在彼得大帝以前的事呢，那时候，这一带森林里还常有强盗出没，抢劫客商呢。"

入冬的第一天，家里真待不住。我们就到森林里的湖上去了。老大爷一直把我们送到森林边上。他本来也想到湖上去，可他"骨头酸痛，去不了"。

森林里肃穆，豁亮，寂静。

周围静悄悄的，仿佛在沉睡。从阴沉沉的高远的天空偶尔飘下零星的雪花。我们轻轻地朝它们哈气，它们就化成清澈的雨滴，之后又变得浑浊了，结成块，像玻璃珠似的滚到地上。

我们在森林里一直转悠到黄昏，走遍了所有我们熟悉的地方。成群的灰雀蜷缩在覆盖着雪的花楸树上。

我们摘了几串冻了的红花楸果，这是夏天和秋天留下的最后纪念了。

一个名叫拉林诺塘的小湖上总漂着许多浮萍。此刻湖水黑而透明，入冬时浮萍都沉到湖底去了。

靠近湖边结了一层玻璃似的冰。这层冰晶莹剔透，甚至离得很近都很难看出来。我看见岸边水里有一群拟鲤，就朝它们投了一个小石子。石子咚的一声落到冰面上，只见拟鲤的鳞片闪了一下，鱼群就钻到深水里去了，冰上只留下被石子砸出的一个小白点。单凭这一点，我们推测岸边已经结了一层冰。我们用手掰碎了几小块零星的冰。冰块发出碎裂的声音，还在我们手指上留下一股混杂着雪和越橘的气味。

什么地方的林间空地上有小鸟飞过，发出哀怨的鸣叫。头上的天空非常明亮，非常洁白，可是在靠近地平线的地方就变得阴沉，呈现出一片铅灰色。孕育着雪的阴云正从那里缓缓地飘过来。

森林里越来越暗，越来越沉静了，终于密层层的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雪落到黑色的湖水里融化了，雪花搔着面颊，雪将森林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雾气。

冬天开始主宰大地，但我们知道，如果用手扒开覆盖在地面上的雪，那么在松软的积雪下面还会找到生长在森林中的鲜花，我们知道，炉火总会在火炉里劈啪作响，我们知道，山雀会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过冬，而在我们看来，冬天也像夏天一样美好。

1940 年

曹苏玲 译

旅途中的对话

我们俄罗斯有许多小城镇的名字取得很有趣，很亲切．诸如：佩图什基（小公鸡）、斯帕斯克列皮基、克拉彼夫纳（荨麻）、热列兹内古斯（铁鹅）。这些城市的居民都亲切有趣地称这些城市为"小城"。

就在这些小城之一的斯帕斯克列皮基发生了一件事，我想讲给你们听听。

小城斯帕斯克列皮基的确很小，很幽静。它在梅晓拉沼泽地带，隐没在小松树林、沙地和星星点点的小芦苇荡之间。城里有一座电影院，一座几乎是克里米亚战争年代留下来的老棉纺织厂，有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当年诗人叶赛宁曾在这所学校里学习过。不过，说实在的，这座小城没有任何特别了不起的地方。还是老样子，好奇的孩子们脸上长满了雀斑，成了棕黄色，老太婆们慈悲心肠，木匠们肩上挎着铮铮的锯，墓地上的杨柳洞孔累累，乌鸦也依旧哇哇地叫。

离斯帕斯克列皮基不远有一条窄轨铁路通过。我在刚刚开春时乘火车经过这里。列车夜里到达斯帕斯克列皮基。黑乎乎的车厢里一下子就挤满了棉纺厂活泼爱笑的姑娘们。接着，一个战士背着背包上来，在我对面坐下，向我借火。

一个年轻女子和老大妈来为战士送行。她俩没有说话。战士也不做声。不过她们两人之中的一个偶尔碰碰战士的衣袖，悄悄对他说：

"你可要写信啊,万尼亚。"

"尽量吧,"战士回答。

黑暗中辨不清两个妇女的面孔,但听她们说话轻言细语,可以断定她们都很善良,随和。她们是战士的母亲和妹妹,她们的目光透着亲切,对人们满怀爱心,但这种爱心却被我们的人民不怎么恰当地称之为"怜悯"。

什么东西在我脚下转来转去,毛烘烘,热乎乎的。它肯定是认错人了,用热辣辣的舌头舔起我的手来。战士吃惊地叫了一声"德莫克!"接着笑了。两个妇女也笑起来。

"到底还是跑来了,"战士说。"跑来送主人。让女列车员撞上,可有你好受的!难道能准许狗上火车!"

"这种情况下可以,"黑暗中一个沙哑的声音回答说,一只看不见的手拿着的一个带小发动机的袖珍电筒随即亮了。

一束微弱的光投到地板上,之后,照见一只灰狗,目光里含着愧悔的神情:它卧在战士的两腿之间,飞快地摇着尾巴。从它整个的神情可以看出,它是想说明,它当然知道上车是违反制度的,但是它恳求不要把它赶下车,允许它跟主人告别。

"德莫克,我的好伙伴,"战士说,"我们怎么就没有发现你啊!"

"我把它锁在屋里了,"老大妈似乎在替自己表白。

"从门下边钻出去的,"年轻女子补充说。"下边有块板松动了。"

"真跑了不少路啊!"战士难过地叹了口气。"十二公里啊!不是吗?外边一片漆黑,一路泥泞,多难走啊!瞧瞧,浑身都湿透了!"

"畜生什么都懂,"车厢里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打仗它也懂。它也知道危险。我们涅纳什金,去年德国飞机常常飞过,有

两次扔了炸弹，把杜尼娅·巴雷金娜的牝牛炸死了。从那以后，只要一听到鬼子飞机的声音，一群鸡就一溜烟地躲到房檐底下去了。"

"连畜生也恨他们！"拿电筒的人说。"这些年连狗一听见它们就爹毛。看恨到什么分儿上吧。"

"简直胡说！"女列车员说。"狗怎么能分得出飞的是他们的飞机，还是咱们的？"

"你问问他怎么知道的，"一个沙哑的声音回答说。"你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对任何人都绝对不相信。一张火车票你能在手里摆弄上十分钟。张张票你都觉得有假。"

"狗什么都能分辨，"战士有意出来打圆场说。"他们的飞机响声特别。像狼嗥。"

"你才像狼嗥呢！"女列车员反唇相讥。

火车头猛然一动。缓冲器可怕地哗啦哗啦响起来，咝咝的蒸气声就更可怕了。棉纺厂的姑娘们尖叫着朝车门口跑去，原来她们是在为一个伙伴送行。两个妇女向战士匆匆道别，跳下车时，车已经开动了。

"德莫克！"她们在黑暗中追赶着火车，焦急地喊道。"德莫克！"

"德莫克！"战士站在通过台上，四下里张望着，喊道。可德莫克连影子也不见。

"狗丢了，真想不到！"战士回到坐位上，不知所措地嘟哝说。"你看看，真倒霉！"

"它在这儿呢，万尼亚叔叔，"黑暗中一个孩子的声音说。"躲在我脚底下呢，浑身直哆嗦。"

"谁在说话？"战士问。"列昂卡，是你吗？"

"是我。"

“是列昂卡·库贝什金,从科贝连卡来的吗? 库兹马·彼得罗维奇的儿子?”

“正是我。”

“让我坐到你旁边吧。”

战士挤到孩子跟前坐下。他把手伸到下边,摸到浑身发抖的狗。他提住狗的后脖颈,把狗抱到膝上。

“你看看,惹下麻烦了吧,”战士说。“德莫克死缠着,拿它没办法! 我家那两位女同胞在车站一个劲地叫它,肯定累坏了。可现在该怎么办呢?”

“什么办法也没有,”女列车员说,“我只能让你跟这只狗在科贝连卡下车。这种时候还带着狗瞎逛! 狗打票了吗?”

“没有,”战士说。“我可没带它来,是它自己爬上车躲到脚底下的。”

“它自己上来的也好,不是它自己上来的也好,”女列车员回答说,“关我什么事。我只要票,还有就是必须征得这节车厢里旅客的同意,另外还要出示它的健康证明。现在还玩狗,算什么时髦。”

“哎呀,你未免太过分了!”黑暗中一个沙哑的声音说。“没良心! 应该通点人性。一点头脑也没有,就知道死抠收费的规章制度!”

“看我不教训你!”女列车员威胁说,但没有让她把话说完。

车厢里大吵大嚷起来,女列车员只好走开了。她砰的一声带上门,坐在门口的老大妈吓得直画十字:

“天哪! 这样很容易把头碰破!”

“列昂卡,我听说,你已经有一年没有收到你父亲库兹马·彼得罗维奇的信了,”战士停顿了一下,说。

“没有收到。他一直没有来信。”

"你别担心。也有人没被弹片擦伤一点，好好地活着，可他没有写信。"

"是条件不允许吗?"一个沙哑的声音问。

"有时是条件不许可。有时候那人就是这种个性。"

"如果一个人整整一年都没有消息，那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了，"坐在门口的老太婆说。"哎哟哟!"

"您就不能不说丧气话吗?!"战士恼火地说。"你们这些老太婆说话没个正经，只会说丧气话。一会儿在路上捡到一只破鞋底，就说大祸临头！一会儿麻雀飞进屋，又是不祥之兆！梦见马就是有火灾。你们想出的名堂也太多了。孩子等着父亲，盼他回来，可你偏偏让他产生怀疑。我倒想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么说!"

"瓦尼亚叔叔，我可一点也不担心，"孩子小声说。"我爸爸活着。我今天刚知道的。"

"是有同志碰见他了吗?"

"不，不是有同志碰见他了。我是从银幕上知道的。"

战士目不转睛地望着孩子。

"从什么银幕？你疯了!"

"哎，没有，万尼亚叔叔，我以少先队员的名义向您保证，我没有疯。三天前，瓦利亚·洛博夫刚从克列皮基来到科贝连卡，他对我说:'列昂卡，想看看你爸爸在战场上的雄姿吗？想看就搭头班火车去克列皮基，到电影院去看影片《斯大林格勒》。你在电影里能看见你爸爸活着，安然无恙。'我于是坐车去了，而且去了电影院。孩子们在门口挤来挤去，都没有票，谁也不让进。我被他们挤得离门口越来越远，电影院里开演的铃声响了。我哭起来。被这群孩子气哭了。孩子们嘲笑我，说:'瞧呀，真爱生气!'我立刻向他们讲明了我的情况。他们对我嚷嚷起来:'你干

吗不早说，小滑头！已经开演了！'于是用拳头捶门。出来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民警，已经上岁数了，他喊道：'走开！我把你们这些小调皮鬼全抓起来！'孩子们把我推到前边，异口同声地大声向民警讲述了我来电影院的原因。民警拉住我的上衣，把我拽进门，说：'那好，进去吧。不过当心，不能骗人。'有三个孩子跟着溜进来了。我于是坐下，看电影，简直可怕极了。我一直等着。突然看见我爸爸头戴钢盔满院子跑，一边跑，一边射击，后边的战士也跟着跑。他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刚强。我大喊了一声，以后的事就不记得了。我好像一下子睡着了，等醒过来，才发现我是在电影院的经理室里。我坐在长沙发上，经理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姑娘，穿一件棉袄，正喂水给我喝，民警站在一旁说：'我在这家影院值勤已经两年了，还是头一回遇上这种事。'后来，经理让我等一会儿，说完就走开了。电影散场之后，她拿来一张有我爸爸的电影胶片，说：'好好收着，等有机会就洗出来。'"

"让我看看！"战士说。

孩子从衣兜里掏出用纸包着的一张胶片。那个声音沙哑的人打开手电筒照着胶片。战士小心地拿出胶片，对着光细看起来。

"可惜！"他叹了一口气。"画面太小，而且都是反着的！看不清楚。我真想看看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库兹马·彼得罗维奇，太想看了。"

"孩子，你真幸福，"声音沙哑的人说。"太幸福了！"

"可我们这些不开窍的老太婆，"坐在门口的老大妈嘟哝说，"还一个劲地骂电影。说是在眼前一个劲儿地乱晃，弄得人眼花缭乱！"

"你还说一个劲儿地乱晃！"战士说。"听见是一段什么样的

故事了吗？听过这段故事，真不知该感谢谁好。”

“真该好好谢谢，”老大妈同意说。“感谢得到了安慰，感谢看到了父亲。真是太好了！”

火车头鸣起笛来，开始刹车了。

“科贝连卡到了！”孩子说着，站起来。“好了，我该下车了。万尼亚叔叔，您把德莫克交给我吧。我明天一早给您送回家去。”

“总算有救了！”战士高兴地说。“不然我心里真不踏实。德莫克太可怜了。你可要把它拴紧了。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你爸爸。代我，伊万·加夫留辛，问好。好了，机灵鬼儿，再见了！”

战士轻轻拍了拍德莫克的背脊和耳朵，然后又抚摸了一下。孩子抱起它，藏到上衣里，连忙跑出去了。我跟着他来到通过台上。列车开动了。德莫克在孩子的衣襟下轻轻地尖叫。

一片片寒冷的水洼里映着闪烁的星斗。林中吹来的风送来一股解冻的冰的气味。树林中的湖泊地带现在还很黑，很可怕，靠湖边的地方，大概已经开始解冻了，一只只骨瘦如柴的狼迈着机警的小碎步，从树林里跑出来，到化冻的湖面上饮凛冽的湖水，它们东张西望，吸着空气；被埋在雪下的上了冻的越橘和草根也散发出气味。

我走进车厢，听见战士说：

“这一切真不知该感谢谁，”他说着，吸了一口烟，香烟的火光照出了他胡子拉碴的脸。

车窗外，松林里的风声越来越响了。列车驶入一片开阔的森林地带。

1943年

曹苏玲 译

雪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搬进波塔波夫老汉家的房子刚一个月，老汉就去世了。只剩下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带女儿瓦里娅和老保姆住在这里。

这所房子很小，只有三间，坐落在城边的小山上，俯瞰北面的河。在房子和花木已经凋落的花园后边是一片白刷刷的小白桦林。乌鸦从早到晚在树林里哇哇地叫，黑压压的一片在光秃秃的树梢上翻飞，仿佛密布着一片彤云。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离开莫斯科后，对于这座偏僻的小城，这里的小屋，吱吱作响的小门，对于静得能听见煤油灯的灯焰嗞嗞响的寂静的黄昏，对于这一切，她好久都不能习惯。

“我真傻！”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心里想。“我为什么离开莫斯科，抛弃剧院，抛弃朋友们呢！其实我可以把瓦里娅送到普希金诺的保姆家，那里不会遭到空袭，我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天哪，我真傻！”

但是现在回莫斯科已经不可能了。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决定去军医院——这座小城里有好几所医院——演出，她的心情也就平静下来。她甚至对这座小城渐渐产生好感，特别是到了冬天，城市被皑皑的白雪覆盖。天气不太冷，阴沉沉的。河水好久没有上冻，碧绿的水面上腾起薄雾。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对这座小城和陌生的房子已经习惯了。对音色不准的钢琴，对挂在墙上的笨重发黄的护航舰照片

也都习以为常了。老波塔波夫生前曾在军舰上当过机械师。他那铺着褪了色的绿呢子的案头，摆着"霹雳号"巡洋舰的模型，他曾在这艘战舰上服役。不准瓦里娅动这只模型。其实什么也不准她动。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知道波塔波夫有一个儿子，现在在黑海舰队当海员。写字台上靠巡洋舰模型旁边摆着一张他的小照片。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每每拿起照片仔细端详，就会皱起纤细的双眉，陷入沉思。她总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面孔，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远在她不如意的婚姻以前。可究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呢？

海员用沉着而又稍带嘲弄的目光凝望着她，似乎问："怎么？您难道真的想不起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吗？"

"真想不起来了，"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悄声回答说。

"妈妈，你在跟谁说话？"瓦里娅从隔壁房间喊起来。

"跟钢琴，"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笑着回答说。

仲冬时节，写给波塔波夫的信源源不断地寄来，信都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把信都整齐地放在写字台上。一天夜里，她醒来。玻璃窗上映着晦暗的雪花。波塔波夫留下的灰色公猫阿尔希普在长沙发上打盹。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披上睡衣，来到波塔波夫的书房，在窗口停下来。一只鸟从树上悄悄飞起来，将雪抖落，洁白的雪粉飘洒下来，窗玻璃被蒙上了一层薄霜。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点燃了案头的蜡烛，坐到扶手椅里，久久地凝望着一动不动的烛焰。随后，她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封信拆开，朝周围看了看，就读起信来。

亲爱的爸爸，我已住院一个月了。伤势不太重。伤口正在愈合。请你千万别担心，别一支接一支抽烟。我求

求你！

我常常想念你，爸爸，也想念我们的家和那座小城。一切都似乎很遥远，仿佛在天边。我一闭眼就看见自己打开小门，走进花园。那是冬季，下雪天，但是通到悬崖顶上那个旧亭子的小路，却打扫得干干净净。丁香花丛挂满了霜花。屋里炉火劈啪作响，飘散着桦木的烟气。钢琴已经调好了，你往烛台上插上了带螺纹的黄蜡烛，那还是我从列宁格勒带回来的。钢琴上依旧摆着《黑桃皇后》序曲和浪漫曲《致我远方故乡的海岸》的乐谱。门铃响吗？我没来得及装上。我真的能再看到这一切吗？真的一到家就能用瓦罐打家里的井水洗脸吗？你记得吗？唉，要是你知道我远在他乡对这多么钟爱该多好啊！你不要觉得奇怪，我很认真地对你说，每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常常回想起这一切。我知道，我不仅在保卫整个祖国，而且在保卫着我心中最钟爱的那个小小的角落——保卫你，保卫我们的花园，我们的头发蓬乱的孩子们，河那边的小白桦林，甚至还有我们的公猫阿尔希普。请不要笑话我，也别摇头。

说不定我出院后能请短假回一趟家。说不准。最好还是不要等我。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在桌前坐了许久，瞪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蔚蓝中初露的曙色。她想，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个陌生人从前线回来，倘若他在这里遇到外人，看到这里的一切都不是他期望的样子，他会感到很难过。

早上，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要瓦里娅拿一把木锹，把通到悬崖顶上那个旧亭子的小路清扫干净。亭子已破旧不堪，木柱已经发白，长满了青苔。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动手装门铃，门铃上刻着一行很风趣的铭文："我挂在门上，请多拉几下！"塔季

扬娜·彼得罗夫娜拉了一下门铃。铃声很响亮。老猫阿尔希普不快地抿起耳朵，生气地从门厅出去了，这悦耳的铃声显然令它生厌。

白天，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满脸通红，急得两眼都发黑了，她从城里请来一个老调音师，是个捷克人，但说话和生活习惯都俄罗斯化了。他管修理打气炉、煤油炉、洋娃娃、手风琴，也为钢琴调音。他的名字很可笑，叫涅维达尔[1]。这个捷克人调完音说，这架钢琴尽管旧了，但是很好。其实他不说，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也早知道了。

他走后，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翻遍了写字台所有的抽屉，找出一包带螺纹的粗蜡烛。她把蜡烛插在钢琴的烛台上。傍晚，她点燃蜡烛，坐到钢琴前，整所房子里飘扬着琴声。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弹完琴，熄灭了蜡烛，几个房间又都飘散着一股带枞树清香的烟味。

瓦里娅再也忍不住了。

"你为什么动别人的东西?"她对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说。"你不准我动，可你自己却动? 门铃、蜡烛、钢琴，你都动过了。把别人的乐谱放到钢琴上。"

"因为我是大人，"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回答说。

瓦里娅沉下脸，多疑地瞥了她一眼。这时的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完全不像个大人。她光彩照人，更像在皇宫里失落了玻璃鞋的金发姑娘。这个金发姑娘的故事还是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亲口讲给瓦里娅听的。

还在火车上的时候，尼古拉·波塔波夫中尉就盘算他跟父亲

---

① 俄语译音，意为：没有见过的事或东西，稀罕物。

顶多只能待上一昼夜。他的假期很短，几乎都耗在路上了。

火车是午后到的。在车站上，中尉就从他认识的站长那里得知，父亲已在一个月前去世了，一位莫斯科的青年歌唱家带着她的女儿住在他家里。

“是疏散的，”站长说。

波塔波夫没有说话，他望着窗外，旅客们穿着棉袄和毡靴，提着水壶在站台上跑来跑去。他头直发晕。

“是啊，”站长说。“他是好人。可就这样，也没等到看见儿子回来。”

“回头的车是什么时候？”波塔波夫问。

“明天早上五点，”站长回答说，沉吟了一下，接着又说：“您就上我家住一宿吧。我老婆会给您烧茶做饭。没必要回家了。”

“多谢，”波塔波夫说着，就出去了。

站长望着他的背影，摇摇头。

波塔波夫穿过市区，来到河边。河上笼罩着灰蒙蒙的天空。天空和大地之间斜飘着稀疏的小雪花。乌鸦在路上的粪堆旁走来走去。天擦黑了。从河那边的树林里吹来一阵风，吹得眼睛流泪了。

“有什么可说的呢！”波塔波夫说。“来迟了。现在这座小城、这条河、这房子，一切对我说来都是陌生的了。”

他转过身来，朝城郊的山崖瞟了一眼。挂满霜花的花园，黑乎乎的房子都在那边。烟囱的炊烟袅袅，风把烟雾吹向小白桦林。

波塔波夫漫步朝他家的房子走去。他决定不进去，就从家门口过一下，也许看一眼花园，在老亭子里站一会儿。想到他父亲的房子里住着毫不相干的外人，他觉得受不了。还是眼不见，心不烦，赶快离开这里，把过去忘掉！

"没什么,"波塔波夫心里想,"人总归一天比一天成熟,会用更缜密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一切。"

傍晚,波塔波夫来到家门口。他小心翼翼推开小门,门还是吱扭响了一声。花园仿佛被惊动了。从一根树枝上刷地一声落下一团雪。波塔波夫转身看了一下。通往凉亭的小径上的积雪,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波塔波夫来到亭子里,用双手扶着陈旧的栏杆。远处树林后边的天空泛着淡淡的红色,想必是月亮从云中升起了。波塔波夫脱下军帽,用手掠了一下头发。周围一片沉寂。只有山下传来空桶撞击的丁咚声,那是妇女们去冰窟窿打水。

波塔波夫轻轻倚着栏杆,小声说:

"怎么回事?"

有人轻轻碰了一下波塔波夫的肩膀。他回头一看,背后站着一个裹着厚披巾的年轻女子,面色苍白,庄重。她用乌黑的眼睛默默地凝望着波塔波夫。大概是树枝上洒落到她睫毛和面颊上的雪正在融化。

"戴上帽子吧,"她小声说。"您会着凉的。进屋去吧。别在这里站着了。"

波塔波夫没有做声。这女子拉着他的衣袖,顺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路走去。波塔波夫在门廊前站下来。他觉得喉咙发紧,透不过气来。这女子又小声说:

"不要紧,请别为我担心,一会儿就会好的。"

她跺了跺脚,把靴子上的雪抖掉,震得门里的门铃丁丁当当响起来。波塔波夫出了一口长气,感到心里松快了。

他走进屋,尴尬地嘟哝了一句什么,在前厅脱下军大衣,闻到一股淡淡的桦树的烟味,接着就看见了阿尔希普。阿尔希普卧在长沙发上打哈欠。长沙发旁站着一个梳小辫的小姑娘,正

用欢快的日光注视着波塔波夫，不过她没有看他的脸，而是看他袖子上的金袖章。

"来吧！"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说，把波塔波夫领进厨房。

瓦罐里盛着清凉的井水，挂着一条熟悉的绣着橡树叶的亚麻巾。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出去了。小姑娘给波塔波夫送来一块肥皂，眼看他脱下制服上衣，洗脸。波塔波夫还觉得不自在。

"你妈妈是谁？"他问小姑娘，脸红了。

他这样问，是想找个话头。

"她自以为是大人，"小姑娘诡秘地悄声说。"其实她根本不是大人。她比我这个小姑娘还要坏。"

"为什么？"波塔波夫问。

小姑娘没有回答，笑着从厨房跑出去了。

一晚上波塔波夫都被一种古怪的感觉所困扰，他仿佛在一个模糊却又非常真实的梦境中。家里的一切都如他所盼望见到的那样。钢琴上依旧摆着那些乐谱，依旧点着同样的螺纹蜡烛，不时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照亮了父亲的小书房。连他从医院寄来的信也都摆在桌上，用旧罗盘压着，这是他父亲经常放信的地方。

喝过茶，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把波塔波夫带到小树林后边他父亲的墓前。暗淡的月亮已高高升起。柔弱的月光映照着白桦树，在雪地上投下淡淡的树影。

后来，天已经很晚了，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坐到钢琴前，轻轻地弹了一遍琴键，转身对波塔波夫说：

"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您。"

"兴许吧，"波塔波夫回答说。

他看了她一眼。烛光从侧面投过来，照亮了她的半边脸。

波塔波夫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停下来。

"不，我想不起来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转过身来，惊慌地瞟了波塔波夫一眼，没有说什么。

波塔波夫睡在父亲书房的长沙发上，但是他睡不着。在这所房子里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宝贵的，他不愿意放过。

他躺着倾听阿尔希普偷偷摸摸的脚步声，倾听滴滴答答的钟声，倾听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在关着的门外跟保姆小声说话。后来，说话声停了，保姆走开了，但门底下的那道光线并没有熄灭。波塔波夫听见翻书页的沙沙声，想必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在看书。他猜想她不睡是为了到时候叫醒他赶火车。他本想对她说，他也没有睡着，但他不敢说。

四点钟的时候，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轻轻推开门叫波塔波夫。他动了一下。

"您该起来了，"她说。"我真不愿意把您叫醒！"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穿过沉睡的市区，把波塔波夫送到火车站。第二遍铃响过之后，他们才道别。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把双手伸给波塔波夫，说：

"来信吧，"她说。"我们差不多像一家人了，不是吗？"

波塔波夫没有说什么，只点点头。

几天后，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收到波塔波夫从途中写的信。

> 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我当然记得，但是我不愿意在家里跟您谈那件事。您记得一九二七年秋天在克里米亚吗？还有利瓦狄亚公园里的老法国梧桐？昏暗的天空，苍白的大海。我正沿通往奥连达的小路走。路旁的一张长椅上坐着一个姑娘。约摸十六七岁吧。她一看见我就起身向

我走过来。当她走到和我面对面时，我看了她一眼。她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书，若无其事地从我身边匆匆地走过去。我停下来久久地望着她的背影。那个姑娘就是您。我不会搞错的。我望着您的背影，当时就感到一个可能毁掉我的一生，也可能给予我巨大幸福的女子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明白，我会不惜任何代价爱上这个女子。我那时就想，我一定尽全力找到您。我当时这么想，脚下却没有挪动。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克里米亚和那条小路，我在那里只见到您短短的一瞬，以后就永远失去了您。但生活对我是仁慈的，让我又与您重逢。倘若一切顺利，您需要我的生命，那么我的生命自当属于您。不错，我在父亲的写字台上找到了已经被拆开的我写的信。我明白了一切，只能从远方向您致谢了。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把信放到一边，用模糊的眼睛望着窗外被白雪覆盖的花园，说：

"我的天，我平生从来没有到过克里米亚！从来没有！但是，现在这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值得向他说明，让他失望，也让我自己失望吗？！"

她笑了，用手捂住眼睛。窗外是一片夕阳，不知为什么淡淡的霞光迟迟不落。

1943 年

曹苏玲 译

右　　手

护卫艇机枪手吉洪·里亚勃佐夫是普斯科夫近郊人。他的村子被德寇占领了，他的母亲正如他推测的，也死了，所以当他受伤的右手被截去后，他就无处可去了。吉洪是在彼得宫[1] 附近挂的花。

吉洪在石岛的医院里住了很久。每到夜间他总是醒来，小心翼翼地撩开沉重的窗帘边缘——吉洪的病床紧靠窗户，——望着花园里白茫茫的雪夜，倾听着。空荡荡的城里和寒冷的大地上寂然无声，似乎一切生灵都已沉入不会苏醒的梦乡，甚至连战争也了无痕迹了。但结冰的树木会突然冒出黄色的火光，而且高射机枪也常常会打响，仿佛榔头敲击着铁制的甲板。这时吉洪便掩上窗帘，长叹一声：

“伙伴们都在战斗，可我……”

他不吭一声，闭上双眼久久躺着，使劲咬紧牙关，咬得颧骨也痛了起来。

“……我却躺在这儿，像一头阉猪，一头河马。”

伤口久未愈合。吉洪被送往沃洛格达，运送时沿着湿冰，经过拉多加湖。歼击机在空中轰鸣，发出各种声音，保卫着冰上之路。吉洪又被从沃洛格达转移到比斯克城，西伯利亚最偏远的腹地。

---

① 彼得堡郊外的原沙皇离宫，系彼得一世于一七〇九年所建的建筑群。

夏季，吉洪在比斯克出了院，被录用在别洛库里哈当守护人，这是一处位于阿尔泰山麓的小疗养地，以富有疗效的山水而著称。吉洪被派到距别洛库里哈三公里的地方，守护一座位于山间小河别泽米扬卡上的一座未完工的堤坝。

吉洪住在一间低矮的茅屋里，茅屋背靠大山，紧贴着小河。别泽米扬卡河上流淌着清澈的瀑布，在岩石间汩汩作响，仿佛在对拥挤的河床发脾气，而小河的上方则低低地垂挂着各式各样的树丛：齿菌，野马林果树和沙棘，简直叫你无法走到河边。吉洪三四天去一趟别洛库里哈，取面包、盐、米，其余时间坐在坝边煮粥，阅读一本破烂不堪的有趣的书，这本书是他向护士要来的。书名是《被歧视的人》。

时间过得很慢。四周了无人迹。整个夏季只有一次，有个花白头发的猎人沿小道从吉洪的茅屋边走过，但是吉洪没能和他说上话。老头全然是个聋子，疑心很重，所以待他走后吉洪甚至懊丧地在他后面啐了一口。

后来秋季到了，显得生气勃勃。吉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秋季：没有一丝微风，天空也没有一缕云彩。阳光下森林被照得一片金黄，仿佛是西伯利亚心灵手巧的铁匠用黄金锻造出来似的，被锻造出来的还有每一根树枝，每一片树叶，每一根小茎。花鼠在四面八方叽叽欢唱，越橘树丛上，长满青苔的漂石上，露水到中午也不干，这些漂石上开着鲜红的花朵，宛如在青苔之中燃烧着一堆堆小篝火。每到夜间吉洪就如在石岛一样常常醒来，望着低矮的窗外，窗外闪耀着同一颗星星——天上所有的星星中最亮的一颗。星星甚至在河里反照出来，而河水也在和它游戏，将它的光线打碎，想取出来揉进瀑布里，用泡沫掩盖起来随身带走，就像人们用手掌护着烛焰将灯台带走一样。但是河

水做不到。

临近九月底，清晨草叶已经因霜冻而发出吱吱声，于是吉洪开始准备过冬的柴火。用一只手锯柴和劈柴都很艰难。吉洪吃尽苦头，精疲力竭，一次在气头上他扔掉斧头，差点哭起来。去它的，这些柴火！

响起了斧子碰击石块的砰砰声，树丛里，堤坝那边，顿时有什么东西沙沙响了起来，还有石子撒落的声音。

吉洪凝神望去，只见白桦树枝晃动起来。干枯的树叶从树上纷纷落下。

“难道是野兽？”吉洪想道。

翌日清晨，远处从河的上游开始传来斧头砍伐的低沉声响。说不定这不是斧子砍伐的声音，只不过是啄木鸟在敲击树木。吉洪暗自一笑——还不是这花花绿绿的朋友又忙活开了，敲着，操劳着，从树皮底下把蚂蚁抠出来。

可是白天，小河上开始向堤坝这边漂来劈细的白桦木柴。吉洪把柴火捞起来，在岸上垛好，但是小河仍然把新的柴火送过来，而且源源不断。别泽米扬卡河从哪儿冲来这些柴火呀？

傍晚柴火不再漂来，但是到清晨又开始漂来。远方的松树上啄木鸟朋友还是敲个不停。吉洪一面收集柴火，一面微笑着。“我要养条狗，”他思忖道。“就给它取名叫沙里克。我将生个炉子，再烤着炉火看书，就这样过冬。”

第二天傍晚堤坝后面又有东西沙沙地响起来。吉洪猫起腰，躲进树丛里，于是看见了两个戴着退色的红领巾的男孩。他们穿过密林向下游走去，拿着斧子和锯子。一个瘦瘦的，脸色苍白；另一个也是瘦瘦的，浅色头发，身上的衣服都被齿菌刺刚破了。

“站住！”吉洪轻声喊道，从树丛里站起来。

两个孩子站住了，锯子落了下来。他们本来想溜走，但是没来得及，便侧目望着吉洪。

吉洪走到他们跟前，于是真相大白了。

孩子们说，战前他们住在列宁格勒郊外一个很大的少先队营。战争爆发了，所有没有父母的少先队员都被从这个营地送往伏尔加河，再从那里送到别洛库里哈。

就这样他们两个少先队员常到河边的瀑布下钓一种彩色的茴鱼，有好几天在偷偷地注视着吉洪，像循迹跟踪的猎人和侦察员一样跟踪他，看见他艰难地劈柴火，就决意帮助他。他们在河的上游找到一些旧木柴，上面长满了齿菌，便开始将它们劈成小块，流送到吉洪的茅屋边。

叙述的是那个长着浅色头发的孩子，那个脸色苍白的则没有吭声，露着笑容，但是吉洪心里明白，这个孩子别看他一声不响，在这件事情上他可是发起人。

吉洪送他们到小河上的木桥边，一路上询问他们怎么失去双亲的。他得知那个脸色苍白的孩子是西班牙人，名叫米古艾尔。吉洪摇起头来：战争把人搅乱到什么程度！于是当时就用米佳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个脸色苍白的孩子。

从这一天起开始了吉洪和脸色苍白的孩子之间的友谊。他常来看望吉洪，带来面包、烟草，和吉洪一起采集荚蒾[1]，把它晒干，听吉洪讲波罗的海舰队的故事。

男孩也慢慢地选出俄语词汇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在马德里，法西斯杀害了他的老父亲，剩下他一个人，就徒步向法国走去，但是没有走到。沿途一个美国人收留了他，让他坐进汽车，送到一个海滨城市，安顿到一艘开往英国的轮船上，苏联使馆又

---

① 忍冬科植物，核果可食。

从那里把他送到了列宁格勒。

冬天来临了，狭小的山谷积满了齐耳深的雪。但是小河却不乐意了，它忙忙碌碌地将水渗进雪里，渗出一个个洞穴，又将小冰块撞击到石头上，发出丁当的声响。

冬季，男孩来得少了。只有一次他在吉洪的小屋里待了两天，当时下了暴风雪，山岳震荡，像上千架飞机在轰鸣，雪瀑越过山崖滚落下来。

吉洪把屋子烤得暖暖的，然后坐在炉边向孩子徐徐朗诵苦役犯瓦尔让动人的故事。念完以后，他说：

"米佳，等战争结束了，世界上就会有许多热闹和欢乐了。我和你要过上新的生活！咱们回家，到列宁格勒去。你将成为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我就在你身边，当个没有文化的爸爸。只是你别为我害臊。"

孩子忧郁地笑着，望着炉火。吉洪把沉甸甸的手放到他头上，补充道：

"在我们中间你不会成为孤儿。当然，我们的人民心地单纯，有点粗鲁，但是待人诚恳。米佳，你不用担心。"

这时孩子抬起眼睛，腼腆地望了望吉洪严肃的面容。

"谢谢，"他说，"我知道。"

春天刚开始的时候，米古艾尔对吉洪说，两个星期以后他们的少先队营要回到莫斯科近郊。吉洪没有说话，但是第二天他刮了脸，穿上水兵短呢衣，戴上水兵帽，到别洛库里哈去找少先队营的首长，一个高个子，有一双眯起的笑眼。吉洪两颊绯红，一脸尴尬，低头望着自己的足球鞋，向高个子解释说，由于米古艾尔是个孤儿，没有一个亲人，所以他吉洪打算把孩子收为义子。

"不，"高个子微笑着说，"他在我们这儿会更好。请相信我，

里亚勃佐夫同志。这件事您考虑得并不好。过一两年我们再看看。过一两年请您来我们这里。”

“早一些来不行吗?”吉洪低声问。

“怎么不行,早一些来也可以,”高个子微微一笑。

“好吧,请原谅!”吉洪站了起来,出门时一只肩膀被门框挂了一下。

出发这一天,孩子来和吉洪告别。吉洪在道路拐弯处发现了他,便急忙蹑手蹑脚地溜进森林里,躲在岩石后面,一面卷着烟卷儿,一面听着孩子在呼唤他。

“有什么关系,”吉洪轻声说,“走了就走了。还告别干吗!”

米古艾尔走的时候很伤心,心中忐忑不安。

少先队营离去了。从那以后吉洪好久没有去别洛库里哈。他不再刮脸,夜里辗转反侧,痛恨地望着春天的群山。这些山岭开满了野花,直至山巅,连村里的老婆婆们望着山岭也口齿不清地称赞天堂般的地方和清新的空气。可是在吉洪看来,世界上没有比这些美好的山岭更阴郁、更能引起愁思的地方了。

“我是谁也不需要的人,”吉洪想,而这种不被需要的意识是迄今为止他生活中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

春末,吉洪突然有了打算。夜里他往水兵袋里装了些东西,少量面包、盐,便步行去比斯克铁路。少先队营的地址他缝在水兵服的衬里里。吉洪步履轻快,吹着口哨,大地在他脚下燃烧。

在卡通河岸上他等渡船等了两个小时。大嗓门的年轻农妇们牵着怎么也不肯走的马匹往渡船赶。笨重的白北鲑在河里击水。一个老太太戴着一双颜色不同的无指手套:左手是灰的,右手是黑的,她坐在大车上久久端详着吉洪,对他怀着怜悯——年纪轻轻,相貌堂堂,却少了一只手——最后还是鼓起勇气问道:

“亲爱的,你背着背包,又缺了一只手,赶路不容易,上哪儿

去呀？看你艰难地赶着路，脸上还在笑。你把痛苦不当一回事。"

"我去看儿子，"吉洪回答。"懂吗，老人家？去看儿子！"

"妻子死了还是怎么的？"

"我没有妻子，"吉洪淡淡一笑。

"你可别笑话我这老太婆！"老婆婆十分生气。"我也有两个儿子在前线。"

"我不是笑话您，"吉洪望了一眼老婆婆。"我的儿子……是领养的……我就是去看他的。我将住在他身边。"

"哦，原来是领养的！"老婆婆露出了笑容。"那你说，他大概跟你很亲吧？"

"非常亲，"吉洪答道。"和别人一样，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更亲的人了。"

"怪不得我看出来了，你那么高兴呢，"老婆婆说。"缺一只手，是个残疾人，可心里挺高兴。"

渡船发出吱吱声启动了，顿时阳光强烈地射到水面上，使吉洪眯起了眼睛。再见了，西伯利亚的群山！

1943 年

沈念驹 译

草原雷雨

一间旧得发灰的木屋紧紧依傍着峡谷上的山坡。峡谷一边的上面一棵棵光秃秃的柳树被春风吹拂得呼呼直响；底下，一条涓涓小溪经过一顶变形的德军钢盔，在潺潺流淌。

钢盔早就弃置在小溪里，一年多了，已开始生锈，但是从镇子里出来的孩子们却对它碰也不碰。也许是由于孩子们无事不出家门，也许是由于如今孩子们对地雷已有了经验。你一碰这样的钢盔，旁边的地雷就轰的一声炸响了——于是"崩茨"！在孩子们的语言里，"崩茨"意味着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故，也包括突然死亡。

屋子里住着一个绰号叫"巴塔哥尼亚人"[1] 的地理教师伊万·卢基奇。之所以这样叫他，是因为他那高高的个子，红红的、饱经风吹的脸庞。伊万·卢基奇孑然一身，不善言谈，战前许多时间在第聂伯河的一条小船上度过——钓鱼。

除了伊万·卢基奇，现在屋子里还住着一个十岁的男孩尤尔卡，他是从逍遥岛来的一个鳏居渔民的独生子。"巴塔哥尼亚人"几乎每年夏季都要看望尤尔卡的父亲尼基福尔·别斯彼列奇内，和他一起去第聂伯河上的小岛捕野鲤鱼。

德寇就要到来时，尼基福尔带了尤尔卡到赫尔松去找伊万·卢基奇，说他自己，尼基福尔，要和渔民一起乘渔帆船到金布恩

---

① 阿根廷境内三个不同语族的印第安人的总称。

去，在那里打德国鬼子，就如当年永远值得怀念的"扎波罗热人的小伙子"打土耳其人那样。

末了，尼基福尔把尤尔卡紧紧拉到身边，摸摸他的头发说：

"在这儿等爸爸回来。听伊万·卢基奇的话，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生活中要明白什么样的事理。"

尼基福尔喜欢说得煞有介事，叫人捉摸不透。

尼基福尔走后过了一天，伊万·卢基奇打算带尤尔卡避开德国人，但是不得已留了下来：没有工具渡过第聂伯河。伊万·卢基奇把自己的船给了战士们，船上多余的位置却没有。

德寇很少到镇上来。他们对屋顶上用生锈的白铁皮打补丁的简陋小屋和潮湿的小菜园不感兴趣。德国鬼子驻扎在城里，砍伐叶卡捷琳娜[1] 时代就已种下的花园当柴火，抓走犹太人往草原上运，在市剧院开设了一个军官音乐"娱乐场"。

伊万·卢基奇和尤尔卡正在挨饿。尤尔卡在峡谷里采酸模，他们就靠吃酸模过日子。还有不多的一点灰蒙蒙的面包干和马铃薯作储备。德国鬼子禁止到第聂伯河捕鱼。为此伊万·卢基奇很不痛快。尤尔卡也不好受：他自幼看惯了陡岸下梭子鱼的争斗，闻惯了芦苇的气息。

白天，城里和镇上都不得安宁。到夜晚也不见得好些，不过伊万·卢基奇和尤尔卡却觉得夜间比较安全，仿佛峡谷里的黑暗用一堵墙将他们和鬼子隔开了。昏暗中伊万·卢基奇用铁闩闩上门，用帘子掩上窗，点起一盏老式的小铜灯，在桌上沿灯的两边摆上沉重的一册册精装的《田地》周刊，一天下来，他只有到这时才第一次开始安详地抽起用掺和着干荨麻的马合烟卷起来的烟卷儿。

---

[1] 指叶卡捷琳娜二世，一七六二年起为俄国女皇。

尤尔卡坐在桌边，望着伊万·卢基奇的房间，他觉得房间里每一件东西都是饶有趣味和充满生机的：桌子上彼得里编纂的硕大地图集，绿色的硬封面上烫着金字，积满灰尘、装着种子的烧瓶，橡木书橱，做成瑞士小屋样子的台钟。小屋旁站着一个泥做的少女，穿一条有带子的红裙子，腰间拴一根硬裙带，正在给一群同样用泥做的白色小绵羊喂草。这台钟一昼夜慢四个小时。墙上挂着画：苏里科夫[①]的《苏沃罗夫翻越圣哥达山口》，艾瓦佐夫斯基[②]的《九级巨浪》和旅行家米克鲁希-麦克莱的一幅肖像，一个骨瘦如柴的长胡子的人，酷似伊万·卢基奇。

伊万·卢基奇坐进蒙着毯子的旧圈椅里，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只盛过鱼子酱的装渔具的铁盒子，久久凝视着钓钩、浮子、铅坠、鱼形鱼钩，叹着气。

书桌上发出烟草和药剂的气息。各个抽屉里放着一叠叠发黄的线格纸、绘有欧洲各国都城风光的立体镜、铜质望远镜和其他许多喜人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逐月减少。伊万·卢基奇将它们拿到小集市——旧货摊上去变卖，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竟还有人买它们。

然而，尽管伊万·卢基奇在变卖东西，他的身体还是迅速地虚弱下去，不久便不再像巴塔哥尼亚人了。他脸上的皮肤发青了，浮肿了。伊万·卢基奇抱怨天气冷，睡觉时连帽子也不脱。

解放的日子临近了。红军从东方推进过来，伊万·卢基奇越来越多地用旧圆规量着地图，估计着苏联军队抵达城市的日子。

一天夜里，伊万·卢基奇辗转反侧，久不成眠，甚至常常从床上起来。一片宁静。只是偶尔听到老柳树喧哗一阵又止息下

---

① 苏里科夫(1848—1916)，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

② 艾瓦佐夫斯基(1817—1900)，俄国画家，擅长画海景。

来，或者不知哪方的一架飞机从屋顶上高高的天空轰鸣而过。黎明时伊万·卢基奇唤醒尤尔卡，说：

“起来！你听觉比我强。”

尤尔卡一骨碌跳起来，走到窗前。清晨黑沉沉灰蒙蒙的。尤尔卡用袖子擦了擦蒙上水气的窗玻璃，将前额紧贴在上面。玻璃轻轻地丁当响了一下，于是一声遥远而强有力的轰鸣声徐徐掠过房屋，消失在峡谷里。继而又传来第二声，第三声。窗台上的木盘子里长出了伊万·卢基奇种的燕麦。它的细茎俯向窗玻璃，仿佛也在谛听大炮的轰鸣。

上午伊万·卢基奇到集市去打听消息。尤尔卡独自留在家里。他坐在被太阳晒热的地上，仔细翻阅一九〇七年的《田地》杂志。有人走近窗前，叩了几下。尤尔卡用这册《田地》挡住身子，从画册后面小心向外窥视。窗外站着的是邻居费多西娅老婆婆。

尤尔卡给她开了门。老婆婆进了屋，对着米克鲁希－麦克莱画了十字，悄声说：

“德国鬼子着慌了。他们走门串户，寻找游击队员的孩子和亲属。看样子他们的统治动摇了，所以想在完蛋以前对人们行凶作恶。伊万·卢基奇哪儿去了？”

“去集市了，”尤尔卡压低声音答道。

“那你得留神！”费多西娅婆婆说。“我们都知道你是伊万·卢基奇的孙子，但是说不定镇子里会冒出个坏东西，他比我们知道的多，会对德国鬼子说你实际上是什么人。到那时鬼子就会在横木上首先把你们俩杀死。”

“为什么杀他？”尤尔卡问道。

“就为你有个当游击队员的亲爸，而他把你藏了起来，”老婆婆答道。“当然是因为他的好心肠。你们俩应该到草原上去。

等伊万·卢基奇回来，你要告诉他。如果你被发现了，他也会被打死。而且房子也会被烧掉。”

“那么他一个人就不会被打死吗？”尤尔卡问。“如果没有我？”

“我怎么知道！”老婆婆答道。“兴许只有他一个人他们不会杀他。孩子，你应当想到他们真的不会杀他，因为没有一丁点儿证据。而你，就是证据呀！”

老婆婆走了。尤尔卡在屋子中央站了一会儿，抓起自己的羊皮袄和帽子走了出去，用一根木棒顶上了门，便猫着腰沿峡谷向草原上跑去。

草原刚开始从春季的泥泞中变干。山沟里到处流淌着溪水，在太阳晒到的地方黄色的款冬花已经盛开。

尤尔卡往离村庄更远的方向逃避。通向尼古拉耶夫的铁路沿线的电线杆向北方远去，并渐渐隐没。后来他看到自己面前的草原上有人，便折向南方。人们在挖土——也许是挖战壕和防坦克沟。

尤尔卡在一间旧窝棚旁边停下来。窝棚里一个人也没有，乱扔着一些霉烂的树枝和陈年的西瓜皮。也许这儿曾经是瓜地，这个窝棚里坐着一个看瓜老人，就如逍遥岛上的雷苏哈爷爷那样。

雷苏哈爷爷视力很弱，耳朵又聋。他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坐在窝棚里成天对想像中偷瓜的小孩儿瞎嚷嚷：“哼，小馋鬼，快从瓜地里滚开！看我从篱笆里拔出木棒，等我站起来，到那时你们就知道厉害了！”老爷爷在空荡荡的窝棚里的吼声把渔夫们逗乐了。“他多用心啊，”他们说。“整天喊个不停，可那些小子们硬是从他鞋子底下把甜瓜摘走啦。不过上帝保佑，让他看瓜吧，老人也得吃饭啊。”

尤尔卡捡起干西瓜皮，在羊皮袄上擦干净，啃起来。瓜皮很硬，和皮革一样，不过还是能嚼成酸溜溜的稀糊糊。

白天，天空蒙上一层白云，宛如一张毯子，起风了，刮得嫩草摆动起来。尤尔卡爬进窝棚，将干树枝翻动一番，便坐了下来，两手插进羊皮袄的袖子里，沉思起来。

今后怎么办？为了不让德国鬼子因为他尤尔卡而杀了伊万·卢基奇，他从城里逃了出来，逃是逃了出来，可是一片面包干也没有带，慌乱中竟忘了带食物。"我要静静地坐在窝棚里，一动也不动，像伊万·卢基奇告诉我的那样，要用鼻子呼吸，"尤尔卡想道，"只有到水沟取水的时候才出去。这样就能坚持整整一星期。而这整整一星期里也许我们的人会把德国人和他们的警察赶走，他们就来不及把我刺死。可伊万·卢基奇会怎么样呢？"

尤尔卡开始脸红起来。红晕浮上了他的双颊。

伊万·卢基奇会怎么想呢？我逃了出来，抛下他这个孤老头，自己却吓坏了。他哪能猜到尤尔卡只身逃出来是为了使他避开危险！而且无论如何不能给他留下字条：要是德国人来了，发现了——那就必死无疑。究竟怎么办？父亲总是说，世界上最坏的事莫过于丢下自己人让他去遭殃了。他还举例讲了哥萨克坟丘的故事，那里埋葬着被土耳其人杀死的扎波罗热人。那些扎波罗热人是被自己的一个哥萨克因为胆小而出卖给土耳其人的，就如尼基福尔说的："那个出卖同伴的哥萨克，第一个被土耳其人处死了。"

"活该处死，尤尔卡！活该！"尼基福尔补充说。

怎么办？难道跑回城里，向伊万·卢基奇解释，他，尤尔卡，为什么逃到草原去……

草原上，天黑了下来，风越刮越猛。低低的乌云从海边压过来。

"我要等到夜里,"尤尔卡打定主意。"夜里回到城里去,那时谁也看不见我,也抓不着我。然后再和伊万·卢基奇一起逃到草原去。"

尤尔卡双臂抱膝,低头靠在膝上不再动弹,并开始打盹。

他醒来时天已漆黑。风停了。尤尔卡小心地向外张望。草原上夜色茫茫,东方传来沉闷的隆隆声——看来一场雷雨正在逼近。"但愿不要下雨,"尤尔卡想道,望了望棚顶。棚顶上盖着草土块。在草土块掉落的地方,空洞在黑暗中透出隐隐的白色。

远处,草原上有一个人在呼喊。尤尔卡屏住气倾听着。呼喊声又响了一遍,不过已经比较远了。大概有人磕磕绊绊地在草原上走来走去,寻找着什么人,用哀怨的声音发出呼叫。

"是个疯子!"尤尔卡想。"难道一个正常人会在这样的黑夜里在草原上行走,明知肯定会送命还要高声大叫?"

尤尔卡抬起头,等待着。呼叫声没有再出现。又是万籁无声,连雷也不响了,于是尤尔卡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跳动,跳得很重,连眼睛都冒出了金星。

也许疯子发现了窝棚,不响了,正在偷偷向他逼近?

尤尔卡爬出窝棚,沿着潮湿的地面爬行起来,常被藤蔓绊住双脚。有人啪嗒啪嗒地踩着靴子,在黑暗中跑过,气喘吁吁地说着:"看你们这些黑心鬼,叫天打五雷轰!"说着又继续跑去。尤尔卡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可怕的夜晚。

天空黑得像黑炭一样,四周也黑得像黑炭一样,天空中哪怕有一颗星星闪亮也好!

蓦然间黑暗里闪出一片暗淡的红色火光,窝棚被照亮了——它就近在身边,——接着重新出现沉沉黑夜,继而一声巨雷沿着大地打了过来,使得尤尔卡的脑袋都缩了一下,痛了起来。天空中响起隆隆的爆裂声,争先恐后,此伏彼起,风声大作,狂暴

的黑夜呼啸起来。

尤尔卡跳起来，向草原上跑去。他绊了一跤，摔倒在地。有个黑黑的、湿湿的东西顺着地面，顺着他的羊皮袄响了起来，尤尔卡一下子还不明白，已经开始下雨了。从东方越来越频繁地传来接连不断的雷声，仿佛许多巨人在天空乱采乱挖，而从这个天空后面又展现出另一个由忧郁而恐怖的火焰组成的天空。每当这种光亮闪起的时候，尤尔卡看到只要齐鸣的雷声刚停，一个蓬头散发、预示凶兆的太阳便旋转着，闪烁着飞驰而过，随即在乌云后面消失。

太阳似乎以极快的速度在高空疾驰，与此同时却又在原地滞留不动。

"是梦还是怎么的？"尤尔卡想道，他撞到一个硕大而黑暗的东西上，倒了下去。"是农舍，"尤尔卡想。"整间屋子都歪了，坏了。"他抓住了农舍的一角，一只手伸进黏稠的泥浆，于是在一层泥浆下面他的手指碰到了冰冷的钢铁。闪电又亮了起来，尤尔卡于是看到了自己头顶上方嵌满泥土的坦克履带。它们被炸坏了，沉甸甸地、纹丝不动地悬着。散发出焦昧和汽油味。

尤尔卡急忙闪开，向后跑去，他的一条腿扭了一下。他跌倒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里他听到远处有上百个人在叫喊。"交火了！"尤尔卡大叫一声便什么也听不见了——只有泥土在他的牙齿间咯吱作响。

当他睁开眼时，清晨明净的天空轻盈的白云勉强地缓缓飘移，似乎想停下来，却又没有停下。眼睛无法看白白的云端——因为阳光太耀眼了。真想躺到这云层的边缘，在草原上空飘游。

尤尔卡侧目望去，却看不见大地。四面八方都是徐徐飘动的白云，他仿佛躺在空中，而辽阔的天空则如一架白云制作的旋转木马，在他周围若有所思地旋转。旁边有一只草原上的小鸟

在尖声啁啾。

尤尔卡抬起头，发现自己躺在一辆载重汽车里，一堆干麦秸上。汽车停着。

接着汽车的侧栏上露出一顶钢盔。尤尔卡缩成一团，盯着钢盔看，心怦怦跳起来。

钢盔徐徐抬起来，很快下面露出一个战士长满雀斑的脸，他的眉毛已被烧掉。战士默默地看着尤尔卡，神秘地向他眨了眨眼睛。尤尔卡微微一笑。

"啊哈！"战士说道，"看来您没有死，好好的？"

尤尔卡没有做声。

"彼得罗夫！"战士对一个人说，那个人显然坐在汽车旁边的地上。"这个公民好像是从聋哑院出来的。"

"不！"尤尔卡说，他的嗓音非常干哑，连他自己都觉得不自在。"我不聋。我从赫尔松来。您从哪儿来？"

"我们吗？"战士问。"我们是科斯特罗马人。到你们这里来组织一批德国造的厚呢子。"

汽车下面一个嘶哑的男低音说道：

"早晨好，年轻人。想吃点罐头吗？猪肉烧豆子？"

"您好，"尤尔卡低声回答，说着坐了起来。"我这就下来。"

尤尔卡从汽车里爬下来。低低的地平线上弥漫着烟雾。汽车旁边一堆碎石上坐着一个高个子的大胡子战士，正在开罐头。他望了望尤尔卡，向他点了点头。小个子的黑头发司机正在用抹布擦驾驶室的玻璃。

"阿鲁琼，"大胡子叫他，"过来坐下，切面包吧。豆子可是上等的。"

"我可不能切面包，"司机答道。"我浑身都是汽油味。在我身边就是抽烟也危险。"

就这样，尤尔卡和战士们开始认识了。他们向他讲述了天快亮时，草原上空刚露出鱼肚白时捡到他的过程。尤尔卡则在吃过罐头后壮起胆子对他们讲述了尼基福尔、伊万·卢基奇的事，还讲了他尤尔卡住在赫尔松，为了不使伊万·卢基奇吃德国鬼子的枪子儿而逃跑的情况。战士们一面听，一面用调羹在罐头里掏。

"所以，"满脸雀斑的战士说道，"经过审问查明，该公民，"战士装出一副凶相看了看尤尔卡，"系在金布恩打游击的一渔民之子，一老年教师之义子，该教师在公余之暇喜欢在第聂伯河上垂钓。我对您情况的理解对吗，年轻人？"

"对，"尤尔卡迟疑不决地回答，为防万一他又问道："那么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是夜莺之歌爱好者协会会员，"满脸雀斑的战士答道。

尤尔卡露出了笑容："雀斑"说的话非常有趣。不过大胡子战士和司机大概听惯了他说的话，继续在罐头里掏着豆子，对"雀斑"未加理睬。但是司机却说了话：

"别糊弄小孩子。我们是通讯兵。"

"问题在于，"大胡子战士说，"小伙子，你一个人到不了赫尔松。肯定到不了。还有许多危险——会有地雷，草原上还会有单个的德国兵，还有鬼知道什么东西。上车吧！我们要开到海边，阿鲁琼将从那里回赫尔松。他会把你送到那里。说定了？"

"说定了，"尤尔卡答道。"你们到海边去干什么？"

"你要知道的事多着呢——多得叫你连头发都掉光！"

不久汽车启动了。风在耳际呼呼响。烂泥块从车轮下面飞溅到嫩草上。汽车越往前开，风刮得越猛，满脸雀斑的战士唱那首尤尔卡感到陌生的歌曲的声音也越响：

哎，草儿长满小路！

尤尔卡已经有一种感觉,似乎战争在远方某个地方,这儿没有任何德国鬼子了。他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也许是由于战士们绝口不谈战争,也许是由于汽车正朝南向海边开去,行驶在荒无人烟的乡间土路上,而战斗却在一边,在西边进行。如果不是一群只有两个人押送的德军俘虏,尤尔卡可能把战争完全丢在脑后了。德国人仿佛被烟熏过似的,浑身发黑,他们的低帮靴子沉重地在烂泥里搅和。

汽车在一间渔民的小屋边停下。尤尔卡跳下车,眯起了眼睛——强劲的海风从广阔的前方迎面吹来,而悬崖下面,就在身旁,海水迎着他涌来,漫上沙滩,仿佛一面面镜子,卷起带咸味的尘土。

战士们从车里搬出一卷卷电线和箱子的时候,尤尔卡跑向了海边。海浪向上拱起来,海水透出绿玻璃瓶的颜色。然后海浪又轰鸣着向沙滩打去,夹带着卵石、铜炮弹壳和橘子皮退了回去。

远方,低低的海岸呈现一片黄色。海岸上空一个个黑球断断续续散布在天际。

“金布恩,”尤尔卡想道。“那里还有德国人。说不定尼基福尔正在那里和他们打仗,把最后一批鬼子赶出去,把他们一直赶进黑海,给海豚当晚餐。”

司机喊了一声尤尔卡,说该走了。尤尔卡走进小屋,和战士们告别。屋里空空荡荡,垃圾满地,有一张旧长凳,只在一个角落里挂着和他们逍遥岛农舍里一样的一幅圣像:披着银衣饰的黑爷爷,利基亚的圣徒尼古拉,渔民的保护神。圣像后面插着一条干柳枝,旁边墙上挂着一顶德军船形帽。

长雀斑的战士用艾蒿扎的笤帚打扫了小屋。他从墙上摘下船形帽,扔进了炉子里——那边,锅底下已经燃起了火。但是大

胡子战士用细劈柴把船形帽拨了出来，拿到户外扔进了草原。

“煮粥，”他说，“可是件干净的活。让德国鬼子的旧东西在旁边冒烟可不合适。”

尤尔卡向战士们道了谢，和他们告别。

“等等！”长雀斑的战士说道。“有件事要说。”

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只装饼干用的盒子，解开来，在里面仔细掏了一会儿，交给尤尔卡三个着了色的鹅毛浮子。一个上面画有蓝橙黄三色的横条，另一个上面画着很小的花和草，第三个上面画了许多彩色小点，小得像罂粟籽。

“我自己上的色，”长雀斑的战士说，“我也是渔民。到处都把这些东西随身带着。累了，就把它们拿出来看看，摸摸，于是就好像没有过疲劳一样了。浮子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可是你想一想，它给人的力量有多大。你会回忆起我们湖上的朝霞，树从，湖水平静，每天早晨水面上雾气蒸腾，沼泽地里鹤唳阵阵。真棒！真带劲！我的脚步马上就变得轻松起来。一个浮子拿着留给自己，另一个送给你爸爸，这一个，有花的一个送给你的老师。你就这样说：‘是谢梅奇金·伊万，一个渔民和战士，送的。为了表示敬意。’”

尤尔卡把浮子藏在帽子里，走的时候觉得怪不好意思，但却乐滋滋的。

中午时分，汽车进城时在小镇附近停了下来。尤尔卡跳下车，和司机道过别就向峡谷里自己的家跑去。城市上空依然青烟缭绕。天上铝制的飞机在吼叫，尤尔卡看见机翼上有小小的红星。

尤尔卡下到谷地里，跳过小溪，看见了小镇，便停住了脚步。镇子里墙灰剥落、灰不溜秋的农舍如白雪般熠熠生辉。妇女们掖起连衣裙下摆，正在用灰浆刷子粉刷墙壁，给窗户四周涂上蓝

花边。其中一个——嘴里没有牙齿、说话粗鲁无礼的赫里斯季娜——甚至在每个窗户上方画上了盛开的牡丹。

“你好!”赫里斯季娜对着尤尔卡大声说。“鬼子走了以后整个镇子里都在粉刷房子。今天咱们镇子就像天堂一样。伊万·卢基奇也在粉刷。”

尤尔卡向伊万·卢基奇的房子跑去。他老远就望见伊万·卢基奇站在一张凳子上,在高高的屋檐下用画笔涂抹。屋子里第一次窗户洞开,刚冲洗过的榕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伊万·卢基奇!”尤尔卡大喊一声,哭了起来。“您好!”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伊万·卢基奇回过头来,画笔掉了,他忙从凳子上爬下,向尤尔卡走去。伊万·卢基奇的眼镜片溅上了白粉浆。

伊万·卢基奇抓住尤尔卡的双肩,摇了几下,拥抱了他,吻了他,然后摘下眼镜。几滴浑浊的白粉浆从镜片上掉落到地上。伊万·卢基奇擦了擦眼睛说道:

“还活着!大概饿得跟小狼崽似的了?还说不饿呢!你干吗偷偷溜走?你以为我不知道。老弟,我什么都知道,都赞成。明天游击队要从金布恩回来,尼基福尔要回来了,可你却脏得像只小寒鸦。走!你去换身衣服,茶马上就煮开了。”

伊万·卢基奇又摇了摇尤尔卡的肩膀,带他进了屋。每个房间都显得喜气洋洋,透出清洁、春天和洗干净的地板的气息。窗边地板上两只麻雀竖起了羽毛正在争夺一条蚯蚓,用嘴巴咬住蚯蚓往自己一边拉。

一见伊万·卢基奇和尤尔卡,麻雀扔下蚯蚓,十分惊慌地飞出窗外逃走了。

“鬼东西!”伊万·卢基奇叫起来。“把蚯蚓偷吃光了。”

伊万·卢基奇望了望尤尔卡,脸红了,喃喃地说:

"你知道吗，早上我挖了整整一罐曲蟮。钓鲈鱼没有比它更好的鱼饵了。而且也许对鳊鱼也有用。就这样……挖了备用。"

这时尤尔卡从帽子里拿出两个上了色的浮子，递给伊万·卢基奇。

"这是一个当过渔民的战士送给您的，"他说。"是谢梅奇金·伊万送的。为了表示敬意！"

伊万·卢基奇接过浮子，小心地用一根手指摸了摸，露出了笑容：

"谢谢！这是祝我好运的。这样一个浮子漂在第聂伯河的水上，就像有些夏威夷岛上的花朵一样。就是说，我们喝过茶就动身去第聂伯河，尤尔卡。我的钓竿都完好无损。"

"我们去，伊万·卢基奇，"尤尔卡回答道。

窗外妇女们在愉快地彼此吆喝，赫里斯季娜在唱歌，麻雀在喳喳叫。开始吐青的柳树发出晒热的树皮的气息，城市和第聂伯河汛期泛出河岸的水面上空，飞机在蓝天闪烁着银光，成群结队地飞翔。

1944年

沈念驹 译

牧　童

露水又冷又多——名副其实的秋季的露水。它从高高的青草上溅到人的脸上，从树上滴进河里，在幽暗的水中激起一个个缓缓的圆圈。

我被这露水弄得浑身透湿，便生起了篝火。烟直冲落叶松和云杉的树梢。落叶松已经光秃秃的了。松针像短短的金发，细细的，虽然没有风，却一个劲儿地从树上掉下来。篝火旁的一棵松树上有一只鸟唧唧叫着。这只鸟似乎是此地林子里的理发师，它把松针剃落下来，把发剪弄得喀嚓作响，把针叶撒到下面，撒到我头上，撒到河里，撒到火堆上。

我一面烤干身子，一面望着河面。黄黄的松叶宛如一座座小岛漂在水上，被横倒在水中的树干挂住，停了下来。后面又有新的一堆堆树叶漂来。它们堵截了河水，然后开始徐徐打转，挣开树干上的枝杈，终于挣脱开了，漂流而去，有时遇到阳光时便像金子一样闪闪发亮，有时树丛的影子落到上面时便黯然失色，变得黑魆魆的。

自从和德国人开战以后，河上就留下了废弃的渡河工具——一座座长满柳叶菜和赤杨的筏子，还有搁浅在河滩上的一根根单独的原木。它们使周围的水泛起泡沫。

火堆附近的灌木丛刷刷地响了起来，一个湿漉漉的牛头从里面伸出来。奶牛闻了闻空气，很响地叹了口气，用额头上有一块黑斑的白脑袋向我点了点头。顿时，旁边什么地方啪的一声

鞭响，像打枪一样，有人喊了一声：

“你去哪儿，帕拉斯卡！钻哪儿去了，傻瓜？”

帕拉斯卡冲到一边，不见了，把树丛的枝条折断了。树丛里走出一个牧童——一个平平常常的牧童，我们在每一个村子里都能见到——矮小的个子，浅色的头发，戴一顶大帽子，穿一件破棉袄，拿一根长长的鞭子。他把鞭子拖在身后湿漉漉的草地上。

牧童用鼻子嗅了嗅空气，用拖到地上的袖子擦了擦鼻子，看了看我，用嘶哑的声音说：

“您好！露珠像水浇一样，一点办法也没有。”

“过来，烤烤干！”我提议说。

“这倒行，”牧童表示赞同，走近来蹲在篝火旁。“您是来旅行的吗？”

“大概是旅行的吧，”我答道。

“可我是放牧的，”小孩儿说。“我叫阿列克谢·库德什金。我在替我父亲干活。他在前线。说真的，我曾想尽办法要当饲马员，可农庄主席不收我。他说我不够格，个子不够。要了连卡。可连卡算什么马倌！要是我认真和他摔跤，一下子就赢了他。他个子倒挺高，可一点力气也没有。因为人的力气都在肩膀上，可他的肩膀很窄，像只山羊。”

男孩沉默了一会儿，后来突然问道：

“您见过密西西比河吗？在美国。”

“没有，没见过。怎么啦？”

“我真想看看它。听说这条河很大，比伏尔加河还大。那么您到过斯大林格勒吗？”

“到过。”

小孩露出了笑容：

“我爸爸为斯大林格勒负过伤，得过奖章。战前他在我们村

当牧人。"

"你从哪儿知道密西西比河的?"我问。

"从学校。也听爸爸讲过。他什么都知道,能说出每一根草叫什么名字,长在哪儿,有什么益处或害处。什么事都说得出个道道。关于我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金刚石山,只不过这些山埋在很深的地底下,要想挖到它们,得用机器挖上一百年,这是真的吗?"

"不知道,"我答道。"我好像没听说过这些山。"

"可是爸爸——他听说过!"小孩说,"他不是旅行家,可是对旅行的事什么都知道。您知道瓶子的故事吗?"

"什么瓶子?"

"送信的瓶子。"

"不知道。"

"现在我说给您听,"小孩说,"有一个旅行家乘海船在一个很大的海洋上航行。水手们当然造反啦。他们不愿意航海。他们家里有充足的食物,整个冬天生着炉子,有自己的奶牛和菜园,晚上还能上邻居家串门,下跳棋。可这里却只有炎热和海水——再没有别的了。所以他们就造起反来,把那个旅行家放到一只舢舨上,把他一个人放到了大洋上。他们自己却掉转风帆,往回驶去了。大洋把旅行家抛到一个无人岛上。您见过无人岛吗?"

"没有,"我答道。

"我们的河上有这样的岛,"男孩说。他的眼睛闪闪发亮,脸激动得通红。"一个岛上还有水獭呢。就这样,海浪把他抛到一座无人岛上。那里只有棕榈树在沙沙作响,还有鹦鹉在飞翔,啼叫,如果有淡水就更好了。于是他从小船上拿出一个瓶子,写了张字条,说他被抛到了这个岛上,他把字条封进瓶子里,扔进了

大海。水流带走了瓶子，它后来当然被一艘轮船的船员们捡到了，发了无线电，要求紧急救助这位旅行家。他得救了。海员们后来受到海事法庭的审判。”

“因为造反？”

“因为造反。还因为丧失人性。”

“阿廖什卡！”一个女人气呼呼地在远处喊了起来，“你到哪儿去啦！帕拉斯卡钻进园子吃菜啦。”

“我在这儿！”牧童喊了起来，“这就赶它出去。”

他站了起来，掩上棉袄的衣襟。

“真是个大祸害！”他说，“就是赶一群牲口也没有比赶这一头帕拉斯卡受罪。好，再见啦。”

他往灌木丛里跑去。远处传来啪啪的鞭子声和吆喝声：“往哪儿走，鬼东西！”还有奶牛愤愤不平的哞哞叫声。

我灭了篝火，沿河向下走去。每走一步它都令人觉得越来越神秘莫测、风景如画。有时沿岸耸立着银灰色小山杨林，仿佛两道屏障，而一棵棵孤立的山杨树上则挂着黄色的薹草，似乎有人将新的席草分挂在上头晒太阳。有时有窟窿的柳树横亘在河而上，仿佛一座桥梁，附近有圆鳍雅罗鱼跃出水面。有时河流浩浩荡荡地拐一个大弯，流入因秋季而显得金灿灿、蓝幽幽的森林。

岸边，河水有时沿着屡经冲刷的沙滩缓缓流淌，有时形成一个个静静的深潭。潭边隐约可见堆在底部浸泡的橡木。有一处展现出一个斜坡，被枫林染成一片红色，而枫林的浓荫里有一座古旧的小教堂，圆顶上锈迹斑斑。

趁着落日我走上了乡间土路。土路沿河岸并行延伸。河面上重又出现长满野草的木筏，从远处望去宛如一座座小岛。太阳正在下山，筏子上不知什么东西在难以忍受地发光。我凝目而视，但是怎么也看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是罐

头瓶呢还是玻璃碎片。

我小心地沿架设的原木走上筏子，俯下身去，看见一个普普通通的啤酒瓶。旋花在瓶颈上绕了好几圈。我捡起瓶子，对着光看了看。它用蜡封了口。里面有个白色的东西。这是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

我打掉瓶颈，掏出了信，但是无法阅读：信是用很淡的铅笔写的，而天却黑得那么快，已经分辨不清歪歪扭扭的字行。我得赶紧走，好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赶到铁路上。树丛里飘来树叶冰凉的气息。林间空地上还有一丝昏暗的光线。高处的天空中，云团如红色的火焰渐渐暗淡下去。

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是夜间到达的。在领略过荒凉的森林、寒冷的空气和孤寂以后，充满烟味和嘈杂的车厢使人觉得分外舒适。我在照明灯旁边的上铺躺下来，取出信来阅读。这是一封陈年旧信。根据不知何故用特别粗的笔迹写的日期判断，它在瓶子里躺了大约两年。

你好，爸爸。这是儿子阿列克谢·库德什金给你的信。你现在在前方打仗，我们过得还好，盼你回来。妈妈在放牛，我做她的帮手。可是我喜欢放马。因为放牛除了照看牛群还是照看牛群，什么也观察不到。骑上马有事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可跟着牛群，只有一条通往被烧焦的牧场和米佳树林的踩出来的小路。有许多东西那里都看不到。而我却喜欢什么都仔细观看，什么都知道。我真想乘上筏子从我们这儿漂到斯大林格勒去看你，可妈妈不让。还有，听说没有通行证也不能上前线。你要是把我带到身边运送弹药或做点其他什么军事方面的事就好了。我干得了。你偶尔也可以说些各式各样的事给我听——如果有战斗间隙的

话。我是把这封信装进瓶子里寄给你的，就像旅行家那样，因为我对通过邮局寄信不感兴趣。我们的河流向伏尔加河，瓶子沿伏尔加河一定能漂到你那里。要是瓶子不被水雷炸沉或被船上的翼轮打着，一定会被哪个战士发现，他读了地址就送到你手里。伙伴们说，斯大林格勒有四十八公里长，处处都在打仗！我用瓶子寄信，还因为不想让妈妈读到这封信，她常常因为想你而哭，她非常不喜欢我或者奶奶看见她掉眼泪。我们等着你安然无恙地回来，每天都想你。因此我至今仍是爱着你的儿子阿列克谢。

彼季卡，那个磨面工的儿子，已经当了飞行员。听说他曾从我们村子上空飞过，摇晃着翅膀打招呼，不过我没看见。橡树墩旁边那个水潭里鲱罗鱼多得不得了，简直多极了——人们白天黑夜都在捕捞。在波塔普爷爷家里，就是那个猎人，傻瓜狐狸夜里从笼子里叼走了鸭子标本——它弄错了。爷爷骂了两天。请给我写回信。

我在莫斯科非常为难：怎么处置这封信呢？到现在，阿廖沙[1] 父亲的地址当然已经改变。为了不使阿廖沙伤心，只好说几句谎话，加上一段附笔，把信寄回他的村子，说装着这封信的瓶子在里海被发现，被"克拉斯诺沃茨克号"轮船的船员们捡到，现寄回原地，因为斯大林格勒城郊的战事早已胜利结束，为了夺取进一步的胜利，收信人已开赴西部战线。

1944 年

沈念驹 译

---

① 阿列克谢的小名。

烟雨霏霏的黎明

轮船驶抵纳沃洛基已是黑夜。少校库兹明走到甲板上。下着毛毛细雨。码头上空空荡荡，只有一盏灯亮着。

“城市在哪儿呢？”库兹明思忖道，“漆黑一片，又下着雨，鬼知道怎么办！”

他瑟缩着身子，系上了外套的扣子。从河上吹来冷风。库兹明找到大副，问他轮船在纳沃洛基是否要停好久。

“大约停三小时，”大副回答，“要看装货的进度而定。您为什么问这个？您可是还得继续乘哪。”

“要送一封信。是住院时邻床托付的。送给他妻子。她在这儿，纳沃洛基。”

“哦，原来有任务！”大副缓了口气说，“伸手不见五指！听汽笛叫吧，否则就走不了啦。”

库兹明来到码头，沿着打滑的阶梯登上陡峭的河岸。听得见雨水落在灌木丛里淅淅沥沥的声音。为了让眼睛适应黑暗，库兹明站了一会儿，看见一匹没精打采的马和一辆歪斜的拉散客的四轮马车。马车上支起了车篷。车篷下面传来鼾声。

“喂，老兄，”库兹明大声说道，“睡得太好了，要错过好机会啦！”

马车夫转了个身，爬了出来，擤了擤鼻涕，用厚呢上衣的前襟擦了擦，这时才问：

“乘车吗？”

“乘车，”库兹明附和说。

“去哪儿？”

库兹明报了街名。

“远着呢，”车夫开始担心起来，“在山上。车钱不能少于二十五戈比。”

他拉起缰绳，泥泞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马车不情愿地启动了。

“怎么，纳沃洛基就你一个马车夫？”库兹明问。

“我们两个，都是老头。其余的人都打仗去啦。你去找谁？”

“找巴希洛娃。”

“我知道，”车夫热情地回过头来说。“您找的是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医生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女儿。她去年冬天从莫斯科来的，住在她父亲的房子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本人死了两年了，房子是他的……”

马车摇晃了一下，响起了丁零当啷的声音，从坑洼里爬出来。

“你要小心看路，”库兹明提醒他，“别四处张望。”

“路确实……”车夫低声含糊地说，“这里白天行车当然叫人提心吊胆，夜里没关系。夜里看不见那些坑坑洼洼。”

车夫不做声了。库兹明抽起了烟，往车里边靠去。雨点沙沙地打在张起的车篷上。狗在远处吠叫。闻得出土茴香、潮湿的栅栏和河面上湿气的味道。“半夜一点，不会再早了，“库兹明思忖道。顿时一处钟楼上颤悠悠的钟声真的敲响了一点。

“不妨留在这儿度过整个假期吧，”库兹明想，“光凭这空气一切都会过去，连同伤后的种种不愉快。在窗户向花园的小房子里租个房间。在这样的夜晚把窗户开得大大的，躺着，盖上被子，听雨水打在牛蒡叶上的声音。”

“您是她丈夫吧?”车夫问。

库兹明没有回答。车夫以为这个军人没有听清他的问题,可是再问一遍又不敢。“没问题,是丈夫,”车夫想,“听人家闲扯,她在战前就把丈夫甩了。应当认为说的不是实话。”

“喔!魔鬼!”他喊道,用马缰抽了一下瘦骨嶙峋的马,“雇你来和面的吗!”

“真糟糕,轮船晚点,偏偏又在夜里到,”库兹明思忖道。为什么在得知库兹明将路过纳沃洛基后巴希洛夫——他同病房的邻床——要请他亲手把信交到他妻子手里?“只好把别人叫醒,天知道人家还会怎么想!”

巴希洛夫是个军官,个子高高的,好嘲笑人。他喜欢说话,而且健谈。每当要说一句尖刻的话时,他先久久地、不出声地笑。应征入伍前他当过电影副导演。每天晚间他向同病房的邻床详细讲述著名的影片。伤员们喜欢听他讲,期待着他讲,对他的记性惊讶不已。他评价人、评价事、评价书都毫不留情,十分固执,任何一个想表示异议的人都会遭到他嘲笑。然而他嘲笑的方法又很狡猾——用暗示、说笑话;而被嘲笑者往往要过一两个小时才回过神来,意识到巴希洛夫让他吃亏了,于是想出一句恶毒的话回敬他。但是回敬当然已经晚了。

库兹明动身的前一天,巴希洛夫交给他一封写给妻子的信,这时库兹明第一次在他脸上发现茫然的笑容。后来在夜里,库兹明听到巴希洛夫在病床上辗转反侧,擤着鼻涕。“看样子他并非那种毫无情趣的人,”库兹明想,“你看,他好像在哭泣呢。那就是说他爱她。而且爱得很强烈。”

翌日一整天巴希洛夫没有离开库兹明,望着他,送给他军官用的水壶,临近出发时,两人一起喝了一瓶巴希洛夫储藏起来的葡萄酒。

“您干吗这么看我?”库兹明问。

“您是个好人,”巴希洛夫回答说,“您大概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亲爱的少校。”

“我是地形测绘员,”库兹明应道,“不过按气质说测绘员就是艺术家。”

“为什么?”

“流浪汉,”库兹明含糊地回答。

“流放犯、流浪汉和诗人,”巴希洛夫嘲弄地、朗诵似地说,“谁渴望当这种人,可是怎么也当不成。”

“这是谁的诗?”

“沃洛申[①] 的。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看着您是因为妒忌。就这些。”

“妒忌什么?”

巴希洛夫转动了一下玻璃杯,靠到椅子背上,冷冷一笑。他们坐在医院走廊的尽头,一张小藤桌旁。窗外,风把幼小的树木刮弯了,树叶沙沙作响,扬起满地灰尘。雨云从河边向城市飘来。

“我妒忌什么?”巴希洛夫重复了一遍问题,把自己红红的手放到库兹明的手上,“什么都妒忌。甚至您这只手。”

“我一点也不明白,”库兹明说道,小心地抽回了自己的手。和巴希洛夫冰冷的手接触使他感到不舒服。但是为了不让巴希洛夫觉察,库兹明拿起酒瓶开始斟酒。

“嗬,您不明白!”巴希洛夫生气地答道。他静默了一会儿,然后垂下眼睛说了起来,“如果咱们能换个位置就好了!不过总

---

① 沃洛申(1877—1932),原姓基里延科－沃洛申,俄罗斯诗人、著名水彩画家。

的说来这都是无稽之谈！两天以后您就到纳沃洛基了。您将见到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她将握您的手。所以我就忌妒您。现在您明白了吧？”

“嗨，您这个人！”库兹明不知所措地说，“您也会见到自己妻子的。”

“她对我来说不是妻子！”巴希洛夫激烈地说，“还好，您没有说‘夫人’。”

“对不起，”库兹明喃喃地说。

“她对我来说不是妻子！”巴希洛夫还是激烈地说，“她是一切！是我全部生命。好了，别再谈这件事了。”

他站起来，向库兹明伸出手：

“告辞了。不过别生我的气。我并不比别人坏。”

马车驶上了堤坝。黑暗更浓了。雨水在老白柳树丛中睡意朦胧地作响，从树叶上滴下来。马蹄在桥面上橐橐地响起来。

“还远得很呢！”库兹明叹了口气，对车夫说：

“你在房子跟前等我一会儿。拉我回码头……”

“这行，”车夫马上答应了，心想：“不对，看来不是她丈夫。如果是丈夫的话，大概总要待一两天。看样子是不相干的人。”

马车驶上了一条卵石铺的马路，颠簸起来，铁踏板哐啷哐啷作响。车夫把车拐到路边行驶。车轮轻盈地在潮湿的沙地上滚动起来。库兹明又沉思起来。

说到巴希洛夫忌妒他，其实忌妒心是没有的。巴希洛夫要说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和巴希洛夫在医院窗前谈话以后，倒是库兹明忌妒巴希洛夫了。“仍然不是那个意思吗？”库兹明懊丧地自言自语说。他没有忌妒。他只不过是感到遗憾。遗憾的是他已经四十岁了，可是还没有过像巴希洛夫那样的爱情。他

一直单身一人。

"夜晚,雨在空荡荡的花园里喧响,陌生的城市,从牧场飘来阵阵雾气,——生活也将这样过去,"库兹明不知为什么这么想。

他又产生了一种在这里留下来的愿望。他喜欢俄罗斯小城,那里从小台阶上可以望见河对岸的牧场,宽阔的上山的路,渡船上装着干草的马车。这种热爱使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他在南方一个海员家庭中长大成人。父亲遗传给他酷爱勘测、地图和浪迹天涯的性格。所以他当了一名地形测绘员。库兹明仍然认为选择这个职业是一种偶然,他想如果他生在另一个时代,也许会当一名猎手,新大陆的发现者。他喜欢这样设想自己,但是他错了。他的性格中没有这些人所禀赋的任何特性。库兹明腼腆,对周围的人很随和。两鬓微霜已道出他的年龄,然而看着这个身材瘦削、个头不高的军官,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会超过三十岁。

马车终于驶进了黑暗的小城。只有一所房子,大概是药铺,玻璃门里还亮着一盏蓝莹莹的灯。街道通向山上。车夫爬下驭手的座位,好减轻马的负担。库兹明也爬了下来。他略微落后几步,跟在马车后面走,突然感到了自己生活中种种叫人纳闷的事。"我在什么地方?"他思忖道。"某个叫纳沃洛基的地方,偏僻的荒野,马匹用蹄掌打出火花来。附近某地有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需要在深夜向她转交一封重要的、也许是不愉快的信。而两个月前却是前线,波兰,宽广而平静的维斯瓦河。真有点不可思议！这倒也好。"

山路走完了。车夫把车拐进旁边一条街道。有些地方乌云已经散开,头顶上的夜空中,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亮起了星星。星光在水洼里闪烁一下便灭了。

马车在一间带阁楼的房子前停了下来。

“到啦！”车夫说，“门铃在便门旁，右边。”

库兹明摸索着找到了拉铃的木把手，拉了一下，可是一点铃声也没有听到——只听到生锈的铁丝的吱吱声。

“再使劲点拉！”车夫建议说。

库兹明又拉了一下把手。屋内深处响起了铃声。但是室内依然一片沉寂，显然没有一个人醒来。

“嚅——！”车夫打起了哈欠，“雨夜的觉是睡得最死的。”

库兹明等了一会儿，更用力地拉了拉铃。木回廊里传来了脚步声。有人走到门口，停住脚步听了一会儿，接着没好气地问：

“谁呀？有什么事？”

库兹明想回答，但是被车夫抢了先。

“开门，玛尔法，”他说，“有人来找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从前线来的。”

“谁从前线来？”门后的人仍然没好气地问，“我们可不等什么人。”

“你们不等，可是却等到啦！”

门带着链子开了一道缝。库兹明在暗处报了姓名，说明了来由。

“天哪！”门内的女人惊叫起来，“给您添了多大的麻烦！我马上开门。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睡觉呢，您进来吧，我去叫醒她。”

门开了，库兹明走进了黑暗的回廊。

“这里有台阶，”那女人已经用另一种、温和的声音在提醒他了，“多坏的夜晚，您却赶来了！等一下，别碰伤了。我这就把灯点起来，——夜里我们都不点灯。”

她走开了，库兹明则留在回廊里。内室透出茶香和一种淡

淡的、令人愉快的气味。一只猫来到了回廊里，在库兹明脚边偎依了一会儿，打了一会儿呼噜，又回到黑暗的房间里，似乎邀请库兹明跟自己走。

在一扇微开的门里，微弱的火光抖动起来。

"请吧，"一个女人说。

库兹明进了房间。那女人向他鞠了一躬。这是一个高个子老太婆，脸色黧黑。库兹明竭力不发出声响，脱了外套和制帽，挂在门边的衣帽架上。

"您别担心，反正得把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叫醒，"老太婆微微一笑说。

"码头上的汽笛这里听得见吗？"库兹明压低了声音问。

"听得见，老爷！听得清清楚楚。难道是从轮船上来，还要回船上去！请这边坐吧，坐沙发上。"

老太婆走了。库兹明在有木靠背的沙发上坐下，犹豫了一会儿，掏出烟卷抽了起来。他心里躁动不安，这种不安使他生气。他被一种感情所左右，当你深夜来到一所陌生的房子，走进别人充满秘密和猜想的生活时，常有这种感情。这生活就像放着的一本书，这本书翻到第六十五页就被遗忘在桌上了。你看了看这一页，努力在猜测：这本书是写什么的？里面有哪些内容？

桌子上真的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库兹明站起来，向它俯下身去，一面谛听着门外匆促的低声絮语和衣服的窸窣声，一面默默念着早已忘却的句子：

当旅途的远方
头巾下闪现瞬间的目光，
做不到的事将变为可能，
遥遥征途不过小事一桩……

库兹明抬起头来环顾四周。低低的、温暖的房间重新唤起了他心中的愿望,想留在这个小城不走了。

这样的房间会令人产生一种特殊的、质朴无华的安适感;那里的餐桌上方悬挂着灯盏,上面套着乳白的灯罩;一幅画的上方装饰着一对鹿角,画面上是一个女病孩,床前有一只狗。这样的房间常会引来盈盈笑意,所以一切都显得不合时尚,早已为人淡忘。

周围的一切,连那只用绯红色贝壳做的烟灰缸,都在叙说着一种安宁、悠远的生活,因此库兹明又想到,如果能留在这里,像居住在这幢老屋里的人那样生活——从容不迫,在劳与逸、冬与春、雨天和晴日的交替中生活,该有多好。

不过在房内旧物中间也有其他一些东西。桌子上有一束野花——洋甘菊、肺草、野艾菊。看样子这束花采来不久。桌布上还放着剪刀和用剪刀剪下的多余的花茎。

旁边则是一本打开的勃洛克的书《遥遥征途不过小事一桩》。一顶小小的女式黑宽檐帽放在钢琴上的一本蓝色长毛绒照相本上。那是一顶一点儿也不悖时,完全现代的帽子。还有一只随意扔在桌上的带镍表链的手表。手表无声地走着,告诉人现在是一点半。还有一股总让人有点感伤的香水味,尤其在这样深沉的夜半时分。

一扇窗开着。窗外,几盆秋海棠后面,一丛湿漉漉的丁香花在窗里射出的微弱灯光下泛出白色。细雨在夜色中絮絮低语。沉重的水滴急促地敲打着铁皮漏水槽。

库兹明倾听看水滴的答答声。每一分钟都是不可逆转的,这个曾经困扰了人们千百年的思想恰恰在此刻,在深夜,在一间陌生的房屋里进人了他的脑海,几分钟后他将离开此地,永远不再回来。

"这是老之将至，还是别的什么？"库兹明思忖道，接着回过头去。

房门口站着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看得出她是匆匆赶来的，所以连头发也没有好好梳理。女子的一根发辫耷拉在肩头，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库兹明，一面不好意思地拿起辫子，用簪子把它插到后脑勺的头发间。库兹明点了点头。

"很抱歉，"那女子说着向库兹明伸出手去，"我让您久等了。"

"您就是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巴希洛娃吧？"

"正是。"

库兹明望着这女子。使他惊愕的是她的年轻和目光——深邃而略显忧郁的目光。

库兹明为自己的打扰表示歉意，接着从坎肩口袋里掏出巴希洛夫的信，交给了这位女子。她接过信，道了谢，没有读就搁到了钢琴上。

"我们干吗站着！"她说，"请坐！就请这边坐，坐桌子跟前。这儿亮些。"

库兹明在桌边坐下，请求允许他抽支烟。

"当然，抽吧，"那女子说，"看来我也要抽一支了。"

库兹明递给她一支带过滤嘴的烟卷，擦着了火柴。她点上烟，火柴的光亮落到她脸上，这时库兹明觉得这张专注的脸庞和那光洁的前额似曾相识。

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在他对面坐下。他准备她问长问短，然而她没有做声，望着窗外，那里依然响着单调的雨声。

"玛尔夫莎，"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说着向门口转过头去，"亲爱的，请把茶炊摆上。"

"不，您这子吗！"库兹明大吃一惊。"我得赶路。马车夫还

在外面等着呐。我要做的就是把信交给您,再说几句……关于您丈夫。"

"有什么好说的!"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说道,一面从花束里抽出一朵洋甘菊花,开始无情地扯下上面的花瓣,"他活着——我就感到高兴了。"

库兹明没有说话。

"别着急,"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像对老朋友那样朴实地说道,"我们会听见汽笛声的。轮船在天亮以前当然是不会开走的。"

"为什么?"

"我们这儿啊,老爷,在纳沃洛基下游,"玛尔法从隔壁房间里搭话说,"河上有一个大浅滩。夜里过滩是危险的。所以舵手都等天亮才走。"

"这是真的,"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证实说,"步行到码头只要十五分钟,如果从市立花园穿过去的话。我送您走。您让马车夫走吧。谁送您来的?瓦西里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库兹明微微一笑。

"是季莫费送他来的,"玛尔法从门后报告说,听得见她把茶炊烟筒弄得直响。"哪怕喝杯茶也好。这算什么呀——淋着雨来又要冒着雨走。"

库兹明同意了,走到大门口,向车夫付了账。马车夫久久没有离去,他一面在马旁边跺着脚,一面整理着后鞦。

待库兹明回来时桌子上已经摆好了一切。有带金边的蓝色旧茶碗,一罐煮热的牛奶,蜂蜜,一瓶开了封的葡萄酒。玛尔法把茶炊端了进来。

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请求原谅她招待不周,说她准备回莫斯科去,而眼下还在纳沃洛基,在市立图书馆工作。库兹明一直

等她最终询问巴希洛夫的情况，然而她没有问。库兹明因此更觉局促不安。还在住院的时候他就猜测巴希洛夫和妻子不和。而现在，看到她也不读信就把信搁在钢琴上，他对这一点就确信无疑了，于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巴希洛夫的嘱托，很对不起他。“大概待会儿她会读信，”他想道。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在巴希洛夫心目中如此重要、库兹明为此而在不适宜的时间来到这所房子所送的这封信，这里已经不需要，不感兴趣了。说到底，库兹明没有帮上巴希洛夫的忙，只是使自己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似乎猜到了这一点，说道：

“您别生气。有邮局，有电报局，我弄不懂他为什么要麻烦您。”

“这算什么麻烦！”库兹明急忙答道，停了一会儿后又补充说：“相反，这很好。”

“好什么？”

库兹明脸红了起来。

“好什么？”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提高声音再次问道，同时抬眼望着他。她望着他，仿佛努力在猜度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严厉地、探身向前、等待着他的答复。然而库兹明一声不吭。

“还是老问题，好什么？”她再次问道。

“怎么对您说呢，”库兹明思索着回答说，“这不是一般的谈话。我们所爱的一切，我们难得碰到。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凭自己来判断。一切好的东西几乎总是失之交臂。您明白吗？”

“不太明白，”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答道，皱起了眉头。

“怎么向您解释呢，”库兹明说道，一面对自己很生气，“您大概也常会碰到的。您从火车车厢的窗口突然看见白桦林里的空

地，看见秋季的蛛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于是您不由得想从行进的列车里跳出去，留在这片林间空地上。但是列车正从旁边驶过。您从窗口探出身去，向后望着，所有这些树林、草地、马匹、乡间大道，都在向那个方向远去，于是听到一种模糊不清的声响。什么东西在响——不清楚。也许是森林或者空气。或者是电话线。也可能是铁轨因火车的行驶而作响。在一瞬间就这么一闪而过，而你却会终生记住这一情景。”

库兹明不说了。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把酒杯推到他跟前。

“我这一生，”库兹明说，脸上泛起了红晕，就如当他一谈及自己总要脸红一样，“一直在期待的正是这样一些意想不到的普通的东西。如果发现了这些东西，那么常常会感到幸福。这种感觉不会持久，却是常有的。”

“那么现在也一样吗？”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问道。

“是的！”

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垂下了眼睛。

“为什么？”她问。

“说不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在维斯瓦河负过伤，躺在医院里。大家都收到来信，我却没有。我压根儿就收不到任何人的来信。躺着，当然要胡思乱想战后自己的未来，就如大家都胡思乱想一样。我想像那一定会是幸福的和非同寻常的。后来伤愈了，于是决定让我去休养。还指定了休养的城市。”

“哪座城市？”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问。

库兹明说了城市的名称。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没有回答一句话。

“乘上了轮船，”库兹明接着说，“两岸是乡村、码头。再就是令人厌烦的孤独感。看在上帝分上，请别以为我在诉苦。孤独之中也有不少好东西。然后就是纳沃洛基。我担心睡过头将它

错过了。我在夜深人静时走上甲板，心里想：在如此巨大、覆盖整个俄罗斯的暗夜中，在细雨蒙蒙的天穹下，有成千上万的各色人等在安睡，这多么奇怪呀！接着我乘马车来到这里，一直在心里嘀咕，我会遇见谁呢？"

"您究竟为什么事感到幸福呢？"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问。

"是这样……"库兹明忽然意识到了。"都好。"

他不响了。

"您怎么啦？说下去呀！"

"说什么呢？看我东拉西扯的，说了不该说的话。"

"说什么都行，"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答道。她似乎没有听清他后面那句话。"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补充说，"尽管这有点儿奇怪。"

她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雨还没有停。

"奇怪什么？"库兹明问道。

"雨还在下！"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说着转过脸来，"这样的相见。还有我们夜间的这番谈话，——难道这不奇怪吗？"

库兹明尴尬地缄默不语。

窗外湿漉漉的夜色里，山下某处的轮船鸣起了汽笛。

"行啦，也好，"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如释重负地说道，"听，汽笛响了！"

库兹明站了起来。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没有动。

"请等一等，"她平静地说，"让我们在上路前坐下。就像古代那样。"

库兹明重新坐下。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也坐下了，她开始沉思，甚至扭过脸不再看库兹明了。库兹明望着她高高的双肩、梳成发髻盘在脑后的辫子、颈部清晰的曲线，思忖道，自己明知身边有着一位风韵可人而此刻却十分忧郁的女人，因而心绪难

宁，如果不是为了巴希洛夫，他才不愿离开这座小城哩，他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住下来，一直待到假期结束。

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站了起来。在小小的过道里库兹明帮她穿上雨衣。她匆忙地戴上头巾。

他们出了门，沿黑魆魆的街道默默走去。

“天快亮了，”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说道。

河对岸的上空现出一抹饱含雨意的蓝天。库兹明发觉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打了个寒噤。

“您冷吗？”他担心地问，“您不该来送我。我自己会找到路的。”

“不，应该来送，”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简短地回答。

雨停了，但是水滴从屋顶上落下来，打在木板铺设的人行道上滴答作响。

街道尽头展现出一座市区花园。花园的篱笆门没有关。一进门就是一条草木繁茂、久无人迹的林荫道。花园里透出一股夜间的寒气，散发出潮湿沙土的气息。这是一座古老的花园，由于参天的椴树而显得漆黑一片。椴树已经开过花，发出淡淡的清香。花园里只吹来一阵风，它便哗哗地响了起来，仿佛它上空刚下过一场来势凶猛的大雨，却又倏然停住不下了。

花园尽头有一座峭壁耸立在河岸上，峭壁后面是黎明前雨蒙蒙的远景、山下浮标昏暗的灯光、雾气和夏季阴雨连绵的天气带给人的所有忧郁的情绪。

“我们怎么下去？”库兹明问。

“往这儿走！”

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拐到一条直通峭壁的小道上，走近一架通向下面黑暗里的木扶梯。

“把手伸给我！”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说，“这里许多梯级都

腐烂了。”

库兹明向她伸过手去，他们便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梯级之间长着被雨水打湿的野草。

在扶梯最后一段的平台上，他们站住了。已经看得见码头、轮船上红红绿绿的灯火。蒸气在嗞嗞地呼啸。库兹明意识到他马上要和这位素昧平生而又使他感到如此亲近的女人分手，而且对她说不出一句话——一句话！他的心不禁揪紧了。他在旅途上与她邂逅，她将自己戴着湿漉漉手套、紧紧用力的小手伸给他，小心地带他走过这架破旧的扶梯，每当扶手上方垂下湿树条，可能扎着他的脸时，她便轻声说道："请低头！"于是他顺从地低下了头。可他连一句表示感谢的话也没有说。

"咱们在此告别吧，"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说，"我不再往下走了。"

库兹明望了她一眼。头巾底下望着他的是一双惶惑不安、神色严峻的眼睛。难道就在现在，此时此刻，在她和他的生活中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变成一种令人神往的回忆？

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向库兹明伸过手去。库兹明吻了吻那只手，闻到了那同一种香水淡淡的清香，就是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他在黑黢黢的房间里第一次闻到的那种清香。

待他抬起头来，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说了句话，但声音是那么轻，所以库兹明听不清楚。他依稀觉得她只说了一个词"枉然……"也许她还说了什么话，但是轮船从河上喊叫起来，仿佛在抱怨烟雨霏霏的黎明和自己在大雨和雾中的漂泊生涯。

库兹明头也不回地向岸边跑去，穿过散发出蒲包和焦油气的码头，上了轮船，立刻登上空无一人的甲板。轮船已经启碇，叶轮正在徐徐转动。库兹明走到船尾，向峭壁和扶梯望去——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还在那里。天刚蒙蒙亮，很难看清她的面

孔。库兹明举起了手，可是奥尔迦·安德烈耶夫娜没有反应。

轮船离得越来越远，驱赶着长长的波浪涌向沙质的河岸，摇曳着浮标，而岸边的柳丛则发出急切的喧哗声，应答着船上叶轮的击水声。

1945年

沈念驹 译

电　　报

十月的天气罕见的寒冷而又阴雨连绵。木板房顶已经发黑。

花园里错杂丛生的野草倒伏在地，惟有篱边一棵小小的向日葵依然在开花，而且老也开不败，不凋谢。

草地上空，一团团松软的乌云从河那边有气无力地飘移过来，挂在树叶落尽的枝条上。雨执拗地从云团里降落下来。

道路已不能行走，也不能通行车马，牧人也不再驱赶牲畜到草地放牧。

牧笛声沉寂了，一直要到春季来临。每天早晨要起床并且看清那一成不变的景象，对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来说是越来越困难了：充满未生火的炉子那久久不散的苦涩气味的一个个房间，尘封的《欧洲通报》，桌子上发黄的茶碗，久未清洗的茶炊和挂在壁上的画像。也许是由于屋子里过于昏暗，而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的双目又出现了视神经萎缩性失明症，或者是由于年代久远画面发暗，不过画面上的确什么也分辨不清了。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只是凭记忆才认得出：这一幅是他父亲的肖像，这一幅，——小小的，装在金色镜框里的——是克拉姆斯科伊[①]赠送的礼物，他的肖像画《穿天鹅绒大衣的陌生女人》的草稿。

---

① 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俄国画家，美术家协会和巡回展览画派创始人之一。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的一生是在他父亲——一位著名画家——造的老屋里度过的。

画家晚年从彼得堡回到故乡，退休家居，在花园里侍弄花草。他已不能握笔：手臂发抖，而且目力减退，常闹眼病。

正如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常说的，这座房子是具有“纪念意义的”。目前它归州立博物馆保护。然而一旦她这个最后的户主撒手人寰，这间房子如何处置，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便不得而知了。

而在这个叫做“扎波里耶”的村子里，却无人可与叙谈画像、彼得堡的生活，以及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与父亲客居巴黎并目睹维克多·雨果葬礼的那些岁月。

这些事又不可能对玛纽什卡说，她是邻居，集体农庄皮鞋匠的女儿，一个小姑娘，每天跑来帮忙从井里打水、扫地、烧茶炊。

作为酬劳，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送给玛纽什卡一双皱皱巴巴的手套，几根鸵鸟羽毛和一顶饰有玻璃珠串的黑宽檐帽。

“给我这些东西干吗？”玛纽什卡声音嘶哑地问，一面大声用鼻子吸着气，“怎么，我是收破烂的吗？”

“你拿去卖了吧，亲爱的，”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轻声说。她身体虚弱，连大声说话也做不到，已经有一年了。“你去卖了吧。”

“交给废品站去，”玛纽什卡打定主意，便拿起这些东西走了。

有时火警瞭望棚的守卫过来串门，他叫季洪，瘦瘦的个子，长一头红棕色头发。他还记得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的父亲从彼得堡回来造房子、建庄园的情景。

当时季洪还是个娃娃，但他终生保持着对老画家的景仰。他望着他的画像，大声赞叹道：

"画的和真的一模一样!"

季洪只是出于同情而经常瞎忙一气，但还是帮着做了些家务：把花园里的枯树砍倒，一段段锯开，劈成劈柴。每次离开时他总要站在门口问一声：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你听没听说娜斯嘉是否有信来?"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坐在沙发上，没有吱声，——她驼着背，身材瘦小——一直在一只棕红色女式手提皮包里翻弄一些纸头。季洪擤了半天鼻涕，在门口转来转去。

"那好，"他没等到回音，便说道，"那我就先走吧，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

"走吧，季沙[1]，"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小声说，"走吧，上帝保佑你!"

他走了出去，小心掩上门，而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却轻轻地啜泣起来。窗外，寒风在光秃秃的树枝间呼啸，把最后的残叶吹落。小煤油灯在桌子上瑟瑟颤动，在这所无人照管的房子里，它似乎成了惟一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如若没有这盏微弱的灯，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真不知该怎么挨到天亮呢。

夜已变得漫长而难熬，如同失眠症一样。曙光总是姗姗来迟，不情愿地从没有擦洗的窗户里透进来。窗框间的棉絮上去年就落上一层发黄的秋叶，如今这些树叶已经腐烂变黑了。

娜斯嘉，她的女儿和惟一的亲人，住在遥远的地方，在列宁格勒。她最近一次来看她是三年以前的事了。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知道娜斯嘉现在顾不上她这个老太婆。他们年轻人自有他们的事情，有他们莫名其妙的需求，有他们的幸福。最好别去打扰。所以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很少给

---

① 季洪的小名。

娜斯嘉写信，但她静静地坐在压陷的沙发边上，天天都在思念她。房子里寂然无声，以致老鼠都受了这寂静的骗，从炉子后面跑出来，用两只后爪站着，鼻孔一扇一扇地嗅着凝滞不动的空气。

娜斯嘉也没有来信，但是每隔两三个月，快活的年轻邮递员瓦西里就会给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送来一张二百卢布的汇款单。她签名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把着她的手，免得她签错了地方。

瓦西里走了，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手里拿着钱，惘然若失地坐在那里。然后她戴上眼镜，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汇款单上的几个字。这几个字总是千篇一律：事务繁忙，不要说回来看她，就连写封像样的信的时间也没有。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小心地逐一翻弄着这厚厚一沓钱。由于上了年纪，她竟忘了这些钱根本不是娜斯嘉曾经拿过的那些钱，于是她觉得这些钱散发出一股娜斯嘉的香气。

好像是十月底的一天夜里，有人敲了半天花园深处的小门，那扇小门已经钉死好几年了。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紧张起来，花好长时间用厚厚的头巾把头包起来，穿上旧大衣，这一年里第一次走出了家门。她用手摸索着，走得很慢。冷气使她剧烈地头痛起来。被遗忘的星星耀眼地俯瞰着大地。地上落叶使她行走不便。

在小门边，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轻轻问道："谁敲门呢？"但是门外没有人回答。"也许是我的幻觉，"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说，蹒跚地往回走去。

她喘不过气来，在一棵老树旁停下来，伸手抓住了一根冰冷潮湿的树枝，认出这是一棵枫树。这树是她很久以前栽下的，那时她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姑娘，如今这棵树光秃秃地挺立着，无处

躲避这无所依归、寒风瑟瑟的黑夜。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怜悯起枫树来，摸了摸粗糙的树干，便慢慢地回到屋里。就在这天夜里，她给娜斯嘉写了封信。

"我心爱的女儿，"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写道，"我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回来一趟吧，哪怕一天也好。让我看你一眼，握握你的手。我老了，身体太虚弱了，不要说走路，就是坐坐躺躺都感到吃力，——死神忘记了来我这里的路。花园正在凋零，完全不是当年的景象了，不过我现在也看不见。现在正值糟糕的秋季。令人感到这么难过，好像一辈子都没有这个秋天那么漫长。"

玛纽什卡用鼻子抽着气，把信送到邮局去，塞了好久才把信塞进邮筒，然后往里面张望起来——那里有什么东西？但是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一只空洋铁筒。

娜斯嘉在美术家协会当秘书。工作忙得很。办展览，搞评比，这一切都由她操办。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的信是娜斯嘉上班的时候收到的。她没有看就藏进了手提包——她决定下班以后再看。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的来信常会使娜斯嘉发出如释重负的叹息：既然妈妈还能写信，那就表明她还活着。不过同时这些信也使她深感不安，仿佛每一封信都是一种无言的指责。

下班以后，娜斯嘉需要到年轻的雕塑家季莫菲耶夫的工作室去，看看他的生活情况，以便向协会理事会汇报。季莫菲耶夫抱怨工作室里太冷，老是说他受到排挤，没有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

在一处楼梯平台上，娜斯嘉掏出小镜子，往脸上扑了点粉，

轻轻笑了笑——现在她才喜欢自己了。由于她长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双冷漠的大眼睛，画家们都叫她索尔维格[1]。

给她开门的是季莫菲耶夫本人——他个子矮小，性情坚毅凶狠。他穿着长大衣，脖子上围一条大围巾，而在他脚上，娜斯嘉发现他穿着女式高靿毡靴。

“不用脱外衣，”季莫菲耶夫嘟嘟哝哝地说，“穿着吧，否则会冻坏的。请吧！”

他带娜斯嘉穿过幽暗的走廊，登上几级台阶，然后打开了通往工作室的窄小的门。

工作室里散发出一股油烟味。盛着湿黏土的桶旁边的地板上燃着一只煤油炉。一个个雕塑台上都放着盖上湿布的雕塑品。雪花在宽大的窗户外面斜斜地飘洒，使涅瓦河笼罩上一层雾气，融化在黑黝黝的河水中。风在窗口呼啸，吹得地板上的旧报纸哗哗抖动。

“天哪，好冷啊！”娜斯嘉说；她仿佛觉得，由于墙上杂乱无章地挂着那些白色大理石浮雕，工作室里显得更冷了。

“喏，欣赏欣赏吧！”季莫菲耶夫把一张被黏土弄脏的椅子挪到娜斯嘉身边，说道，“真弄不懂，我住在这个小黑屋里怎么还没有死掉。彼尔申的工作室里可有暖气，就像从撒哈拉吹来的一样。”

“您不喜欢彼尔申？”娜斯嘉谨慎地问道。

“暴发户！”季莫菲耶夫气呼呼地说。“工匠！他塑的人像肩膀不像肩膀，倒像衣服架子。他塑的集体农庄女庄员是个掖起围裙的呆板的村妇。他塑的工人像个尼安德特人[2]。他塑像时

---

① 易卜生诗剧《培尔·金特》中的女主人公。

② 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

用木头铲子。他的坏心眼多着呢，亲爱的，尽是坏心眼，简直像红衣主教！”

“让我看看您的果戈理吧，”为了改变话题，娜斯嘉提出了请求。

“到这边来吧！”雕塑家闷闷不乐地吩咐说，“不，不是那边！就在这个角上！对了！”

他从一个塑像上取下湿布，挑剔地左看右看了一番，然后靠近煤油炉子蹲下来，开始暖手，并说道：

“就是这一尊，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①！现在请看吧！”

娜斯嘉战栗了一下。一个鼻子尖尖的、拱肩缩背的人嘲弄地望着她，似乎把她看透了。娜斯嘉看见他鬓角上一根硬化的细血管在跳动。

“提包里那封信还没拆封呢，”果戈理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似乎这样说，“唉，你呀，你这只喜鹊！”

“怎么样？”季莫菲耶夫问，“一位严肃的老伯，是不是？”

“好极了！”娜斯嘉吃力地回答，“真的好极了。”

季莫菲耶夫苦涩地笑起来。

“好极了，”他重复说，“人人都说：好极了。无论是彼尔申、马季雅什，还是来自形形色色委员会的形形色色的行家都这么说。可那有什么用呢？在这里——好极了，而在那里，在决定我作为一个雕塑家命运的地方，还是这个彼尔申，却只是不置可否地哼哼几声——那就算完了。只要彼尔申哼哼一声，那就表示完蛋了！……叫你好几夜都睡不着觉！”季莫菲耶夫高声喊道，一面跺着脚在工作室里跑来跑去，“因为潮湿的黏土，两只手都得了关节炎。三年时间里读着有关果戈理的每一句话。梦见的

① 果戈理的名字和父称。这样称呼表示尊敬。

都是猪一样的嘴脸！”

季莫菲耶夫从桌子上拿起一堆书，在空中晃了晃，又使劲扔了回去。桌子上扬起一阵石膏粉尘。

“这些都是——关于果戈理的！”他说道，突然缓和下来，“怎么？我大概吓着您了吧？对不起，亲爱的，不过我可真的准备打架呢。”

“那好，咱们一起去打架，”娜斯嘉说着站了起来。

季莫菲耶夫紧紧握了握她的手。她抱着无论如何要使这个有天才的人摆脱默默无闻境地的坚定决心走了。

娜斯嘉回到协会，去见了协会主席，跟他谈了很长时间，她情绪激动，证明需要立即举办季莫菲耶夫作品展。主席用铅笔敲着桌子，经过一番斟酌，最后同意了。

娜斯嘉回到家里，回到她那位于莫伊卡河岸上、天花板上有镀金雕饰的古老房间里，只有在这里，她才读了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的来信。

“现在怎么走得了呢！”她说着站起身来，“难道现在我脱得开身吗！”

她想到那些超员的火车、途中要改乘的窄轨火车、颠簸的大车、凋零的花园、母亲必不可免的眼泪、乡间生活那种拖拖拉拉无法冲淡的枯燥乏味，于是把信放进了书桌抽屉里。

娜斯嘉为举办季莫菲耶夫作品展张罗了两个星期。

在这段时间里，她和这位性情乖僻的雕塑家吵了几次，又和好了几次。季莫菲耶夫把自己的作品送到展览会时，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他注定要使这些作品遭到毁灭。

“您不会有任何结果，亲爱的，”他幸灾乐祸地对娜斯嘉说，似乎她举办的展览不是他的，而是她自己的，“我只是在白白浪费时间，真的。”

起初娜斯嘉绝望了，感到很委屈，直到后来才明白，这些毫无道理的任性要求一文不值，都是装出来的，季莫菲耶夫从内心深处对自己行将举办的展览会感到非常高兴。

展览会是在晚上开幕的。季莫菲耶夫很生气，说雕塑品不能在电灯光下供人参观。

"那是死光！"他抱怨说，"乏味透了！煤油灯也比它好。"

"您到底要什么样的灯光呢，您这个难侍候的怪人？"娜斯嘉冒火了。

"要烛光！烛光！"季莫菲耶夫痛苦地叫嚷道。"怎么可以把果戈理摆在电灯光下呢！荒唐！"

出席开幕式的有雕塑家、画家。外行人听到雕塑家们的交谈，未必总能猜到他们对季莫菲耶夫的作品究竟是赞扬还是责骂。然而季莫菲耶夫却明白，展览会很成功。

一位头发花白、脾气暴躁的画家走到娜斯嘉跟前，拍了一下她的手：

"谢谢。我听说是您把季莫菲耶夫发掘出来的。您做得很好。因为，您知道吗，我们这里有许多人老是空谈对艺术家的照顾和关心，可是一触及实际问题，你就会遇到麻木不仁的目光。再次谢谢您！"

讨论开始了。大家说了很多，对这次展览大加赞扬，人们情绪激昂，而且每一个人的发言都提到了老画家所说的关于要关注人，关注一个不应当被忽视的年轻雕塑家的想法。

季莫菲耶夫无精打采地坐着，眼睛盯着镶木地板，不过还是斜眼看着发言的人，他不知道是否可以相信他们，也许现在相信为时尚早。

协会的女送信员出现在门口，她就是善良而头脑糊涂的达

涉。她向娜斯嘉作了个不知什么手势。娜斯嘉走到她跟前，于是达莎得意地微笑着把电报交给她。

娜斯嘉回到自己的坐位上，悄悄地拆开电报，读了一遍，但什么也没看懂：

"卡佳[1] 垂危。季洪。"

"哪一个卡佳？"娜斯嘉茫然无措地思忖道，"哪一个季洪？也许这电报不是拍给我的？"

她看了看地址：没错，电报是发给她的。这时她才发现纸条上细小的印刷体字母："扎波里耶"。

娜斯嘉把电报揉成一团，皱起了眉头。彼尔申正在发言。

"在我们的时代，"他说道，微微晃动着身子，扶了扶眼镜，"对一个人的关心正变为那种帮助我们成长和工作的美好现实。我幸福地发现，在我们中间，在雕塑家和画家们中间，也表现出了这种关心。我说的是季莫菲耶夫同志的作品展。能够办这个展览会，我们大家都应该表示感谢——但愿我们的领导不会见怪——协会的一名普通职员，我们亲爱的阿纳斯塔西娅·谢苗诺夫娜[2]。"

彼尔申向娜斯嘉鞠了一个躬，于是大家鼓起掌来。掌声久久不息。娜斯嘉窘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有人从后面碰了一下她的手。这个人就是性格暴躁的老画家。

"怎么样？"他悄声问她，同时用眼色指了指娜斯嘉手里被揉皱了的电报，"没什么不愉快的事吧？"

"没有，"娜斯嘉答道，"是这样……一个熟人拍的……"

---

① 卡捷林娜的小称。

② 娜斯嘉的本名和父称。

"哦!"老头含糊地说了一句,又开始听彼尔申发言。

大家都望着彼尔申,但是娜斯嘉一直觉得有一个人的目光,忧郁而锐利的目光在盯着她,因此不敢抬起头来,"这会是谁呢?"她想道。"难道有人猜到了? 多蠢啊。神经又控制不住了。"

她努力抬起眼睛,但马上把目光移开了:果戈理带着冷笑望着她。他鬓角上那根硬化的细血管似乎在沉重地跳动。娜斯嘉似乎觉得果戈理从咬紧的牙缝里轻轻地说:"唉,你呀!"

娜斯嘉迅速站起来,走到外面,在楼下匆匆穿上外衣,跑到了街上。

雨雪纷飞。伊萨基辅教堂上出现了灰蒙蒙的雾凇。晦暗的天空越来越低地压向城市,压向娜斯嘉,压向涅瓦河。

"我最最心爱的女儿,"娜斯嘉记起了不久前的那封信,"最最心爱的!"

娜斯嘉坐在海军部大厦旁边小公园里的长椅上,伤心地哭了起来。雪花在她脸上融化,和泪水交汇在一起。

娜斯嘉打了个寒噤,忽然间明白了,谁也没有像这位年迈体衰的、被人们抛弃的、住在寂寞的扎波里耶的老妈妈这样爱过她。

"晚了! 我是见不到妈妈了,"她心里说道,并且记起这是最近一年里她第一次说出这个童稚般亲切的字眼——"妈妈"。

她一跃而起,迎着扑面的飞雪急忙走了。

"这怎么会呢,妈妈? 怎么会呢?"她心里思忖着,什么也看不见,"妈妈!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我的生活中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啊。没有,也不会有更亲近的人了。但愿还赶得上,但愿她能见到我,但愿她能原谅我。"

娜斯嘉来到涅瓦大街上,向城里的火车站走去。

她来晚了。车票已经没有了。

娜斯嘉站在售票口，她的双唇在颤抖，她不能说话，她觉得只要她一说话，她就会号啕大哭起来。

上了年纪的戴眼镜的女售票员朝窗口望了一眼。

“您怎么了，女公民?”她不满地问道。

“没什么，”娜斯嘉答道，“我妈妈……”

娜斯嘉转过身，迅速向出口处走去。

“您去哪儿?”售票员大声喊道，“您该马上说明。请等一等。”

当晚，娜斯嘉乘火车走了。一路上，她觉得“红箭特快”开得慢慢腾腾，虽然这时列车正穿过夜幕笼罩的森林，一面喷吐着蒸气，发出一阵阵拖长的、警戒的鸣响。

……季洪来到邮局，和邮递员瓦西里低声说了一会儿，从他手里拿过电报纸，转来转去看了看，一面用袖口擦着唇髭，花了好长时间在电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些什么。然后他小心地折起电报纸，塞进帽子里，蹒跚地向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家走去。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已经十天没有起床了。她什么病也没有，然而一种昏昏沉沉的虚弱感压迫着她的胸膛，她的头部，她的双腿，使她呼吸困难。

玛纽什卡守着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已经六天六夜了，一直没有离开过。夜间她和衣睡在压陷的沙发上。有时玛纽什卡觉得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已经没有气了。于是她惊恐地抽泣起来，呼唤着说：

“奶奶? 奶奶? 你活着吗?”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盖在被子下面的手轻轻动了一下，于是玛纽什卡放心了。

从一大早起，房间的每个角落里都笼罩着十一月的昏暗，但却很暖和。玛纽什卡生了炉子。当欢快的火光照亮原木墙壁时，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在小心地叹息着，——炉火使房间变得舒适、方便了。很久很久以前，还是娜斯嘉在家的时候，房间里就是这样的。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闭上眼睛，眼睛里滚出一颗小小的泪珠，它沿着发黄的鬓角淌下来，没入花白的头发里。

季洪来了。他咳嗽着，擤着鼻涕，看得出他很兴奋。

"怎么样，季沙?"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有气无力地问。

"天变冷了，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季洪兴致勃勃地说，同时不安地瞧了瞧自己的帽子，"马上要下雪了。这是个好兆头。严寒会使道路变硬，——就是说，她乘车会好走一些。"

"谁啊?"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睁开眼睛，开始用干瘦的手哆哆嗦嗦地抚摩被子。

"还会有谁呢，还不是娜斯塔西娅·谢苗诺夫娜，"季洪似笑非笑地、得意洋洋地回答说，并从帽子里取出电报。"除了她，还会是谁呢。"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想坐起来，但办不到，又倒在了枕头上。

"看!"季洪说着，仔细地打开电报，递给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

然而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没有接，依然用央求的目光望着季洪。

"你念吧，"玛纽什卡用嘶哑的嗓音说，"奶奶已经不会读了。她视力很差。"

季洪惊恐地回头看了看，整了整领子，摸了摸稀疏的红棕色头发，便用低沉的、犹豫不决的嗓音念了起来："等我，已动身。永远爱您的女儿娜斯嘉。"

“不必了，季沙！”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轻轻说，“不必了，亲爱的。上帝保佑你。谢谢你的好话和好意。”

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吃力地转过身对着墙壁，好像睡着了似的。

季洪坐在寒冷的前厅里一条长凳上，低头抽着烟，吐着唾沫，唉声叹气，直到玛纽什卡出来招呼他到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的房间去。

季洪踮起脚走进房间，用整个手掌擦了擦脸，——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躺着，脸色苍白，显得很瘦小，仿佛安然地睡着了。

“没有等到，”季洪低声含糊地说道，“唉，她受的苦真叫苦，她遭的难真是无法形容！你看着吧，傻瓜，”他气呼呼地对玛纽什卡说，“要以德报德，别做那种轻浮的人。你待在这儿，我到村苏维埃去报告。”

他走了，玛纽什卡蜷起双腿坐在凳子上，身子瑟瑟发抖，目不转睛地盯着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

翌日，人们为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举行了葬礼。开始上冻了。下起了小雪。白天看上去白茫茫的，天空显得干燥、明亮，呈现出一片灰色，头顶上仿佛铺开一块洗干净的、上了冻的粗麻布。河对岸的远方一片灰蓝色。从那里飘来雪的浓烈而令人愉快的气味，飘来被初寒冻硬的柳树皮的气味。

参加葬礼的有老太婆和小孩子。把棺材抬到墓地去的是季洪、瓦西里和马利亚温两兄弟——两个小老头，长着像纯麻絮一样的须发。玛纽什卡和她弟弟沃洛季卡抬着棺材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的前方。

墓地在村外的河岸上。墓地上长着因附生的地衣而发黄的高大柳树。

路上遇见了女教师。她不久前从州府所在的城市来到这里，在扎波里耶村还不认识任何人。

“老师来了，老师！”男孩们悄悄说起来。

女教师很年轻、腼腆，长一双灰眼睛，还完全是个小姑娘。她见到送葬的队伍，便怯生生地停了下来，惊恐地望了望棺材里瘦小的老太婆。冰冷的雪花落在老太婆的脸上，没有融化。在州府所在的城市，女教师也有母亲——也是那样瘦小，总是为女儿牵肠挂肚，头发也是那样全都花白了。

女教师站了一会儿，便跟在棺材后面走了。老太婆们回过头来看她，悄悄地交谈着，说这姑娘多么文静，一开始管这些孩子，她会感到困难的——扎波里耶的这些孩子独立性很强，也很调皮。

女教师终于下了决心，问一位老太太，马特连娜婆婆：

“这位老太太大概是孤零零一个人吧？”

“哎，亲爱的，”马特连娜立即用责备的口气说起来，“你就当她是孤身一人吧。可她是那么亲切，那么热心肠。她常常一个人坐在自家沙发上，没有人可说话。真可怜！她在列宁格勒倒有个女儿，是啊，看来她是高升了。就这样，她死了，身边没有人，没有亲属。”

在墓地，棺材被放置在新挖的墓穴旁。老太婆们向棺材鞠躬，发黑的手碰到了地。女教师走到棺材跟前，鞠了一躬，吻了吻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干瘪发黄的手。然后她迅速挺直身子，转身向那座坍塌了的砖围墙走去。

围墙外面，在轻盈飞舞的雪花中，正是那片亲爱的、略显忧伤的故乡的土地。

女教师久久地望着，听着老人们在她背后交谈，泥土敲击着棺材盖，远处人家的公鸡用不同的音调在啼鸣——这预告着晴

朗的天气、微寒和冬季的宁静。

娜斯嘉在葬礼的第二天来到扎波里耶。她看到的只是墓地上的一座新坟——坟上的泥土已冻结成块了——和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寒冷昏暗的房间。生活仿佛早已离开了这个房间。

娜斯嘉在这个房间里哭了整整一夜，直至窗外开始透出昏暗而阴沉的蓝色曙光。

娜斯嘉悄悄地离开了扎波里耶，竭力不让任何人看见她，也不问她任何事情。她觉得，除了卡捷林娜·彼得罗夫娜，任何人都不可能解除她无可挽回的过错和不堪忍受的重负。

1946年

沈念驹 译

安努什卡

燥热的风刮了一个多星期。割草工抱怨说，公园里的草干枯了，变得像铁丝一样又粗又硬，根本割不动——时不时地还得把镰刀刃打直。

打直镰刀刃的丁当声、闷热的风、草原道路上扬起的尘柱——真是个难熬的夏天！土地龟裂了，池塘里的水干涸了，露出被小牛犊踩得留下一个个蹄印的塘底。

割草工承包了在休养所公园里割草的活儿。他们工作努力，每一丛灌木都不放过，却绕过了一棵椴树下的小土丘。他们之所以绕过去，是因为这个长满黄澄澄草穗的小土丘是安娜[1]姑娘的坟墓。

从休养所的守夜人谢苗老大爷前后不连贯的琐细叙述中弄清楚了这座墓的情况。一百年前，这一带住过一个沃罗涅日的小市民伊万·萨维奇·尼基京。他在顿河左岸的路边开了一家车马店，空闲的时候，常在自己厚厚的账本上记下自己创作的歌曲。按照谢苗的说法，是伊万·萨维奇亲手锯掉了安娜上吊自尽的那根树枝，把锯开的断面涂了一层白色颜料。多少年过去了，那颜料也没有退去。现在还能在椴树上当年长着这根树枝的地方看见白色的斑痕。

安娜是地主施利希滕家的演员。这个地主拥有许多名

[1] 本文标题《安努什卡》是安娜的小名。

马——黑色的，没有一点杂毛的，"像燕子一样"。伊万·萨维奇向他供应喂马的燕麦。

有一次伊万·萨维奇来到施利希滕家催讨燕麦的货款，正好遇上地主家里演出，见到了安娜。他和她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他来到施利希滕那里，请求地主允许安娜到莫斯科的首都剧院去演出，因为她有很高的天分。

他好求歹求，既按人情又按天理，还答应免去燕麦的欠款，并对施利希滕说，人民将会感谢他。但是别看施利希滕也喜欢说说笑笑，在自己庄园里连蹦带跳地跑来跑去，他却是个毫无趣味也不知尊重人的德国人。

他把伊万·萨维奇让到他书房的软椅上坐下，自己坐到他对面，紧紧按住他的双膝，和蔼地望着他的眼睛说道：

"你的想法是徒劳的，好像我破落到要为一个安娜而贪图你那几个燕麦钱。你把这些卢布收下，走你的吧。现在我不需要你的燕麦了。"

他拉开桌子抽屉——桌子上镶有珠母——取出一叠纸币，给了伊万·萨维奇。"我，"他说，"把所有的马和整个庄园都卖给了奥尔洛夫公爵，安娜我也要卖给他：他对这些东西胃口大着呢。我本人将去里加城，我要在那里住下来。所以，你的说情晚了一步。不过说情也没有用，因为如果事情不是那么突然，我无论如何不会把安娜卖掉，也不会放她到任何地方去。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钱，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伊万·萨维奇站起来说道："好吧，看来您既没有人格也没有心肝，您简直是只红毛德国狗！"说完他就走了，强忍住性子，免得当场把施利希滕结果掉。而安娜就于当天夜里在一棵幼小的椴树上上吊自尽了。

休养所公园四面围着土堤。割草工经常在土堤上休息，因

为那里总是刮着草原上来的风，能吹干他们汗湿的衣衫和额头。

起先割草工们默不作声，眯起眼睛，望着风把灰白色的燕麦吹得一起一落，他们歇足了便开始抽烟，这时和他们一起干活的谢苗便说道：

"我家的姑娘也叫安娜。不过如今世道和那时不同了！"

"你说什么？"一个割草工没有听清，又问了一遍。

谢苗关于女演员安娜和谢苗的女儿安娜（一个文静的姑娘）的故事，他们已经听过好几遍了，但是他们从来不打断他——不知是因为懒得说呢，还是因为乡下人喜欢听这长长的、连贯的日常生活故事。

"我是说，如今世道不同了！"谢苗又说了一遍，"现在清明了。你只要看看就知道了！"

谢苗开始讲他的故事，割草工们听着，一面搔着胸口，一面随声附和。没什么说的，谢苗没有儿子，可是命运没有亏待他，赐给他一个可爱的女儿。这可是确确实实的！没话可说！

当谢苗不再做声时，准有割草工会问：

"那么，你是说，她很快会来看你吗？"

"当然！"谢苗急忙回答说，惘然若失地微笑着，"她写信说：'过了圣彼得节[1] 我就回来。'但愿我能等到她回来！"

"你能活到那一天的，"割草工们懒洋洋地安慰他。

"应该能吧，"谢苗信心不足地说，"我现在就是气短。"

他低下头，开始编树皮鞋。他呼吸困难，发出哮鸣音。割草工们默默地相互递着眼色，后来有人开心地说：

"烟抽过了，就像打仗时发起攻击之前那样，现在该去割草了。说不定我们能在圣彼得节前把活干完。"

---

[1] 东正教节日，在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战争时期休养所关闭了。各个房间里和公园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小路上杂草丛生。成群结队的黑斑红甲虫在那里逍遥自在地晒太阳。架子上的书籍、窗帘、旧家具都蒙上了灰尘。休养员们遗忘在水罐里的花束干枯了。房间里弥漫着放置过久的插花水的霉味。

谢苗仍然怎么也不习惯寂静无人的状况。和战前一样，他每天夜间背着旧猎枪在公园里来回走动，自言自语，对娃娃们不再到花园里来摇落早熟的樱桃感到奇怪；他抬起头，久久倾听着看不见的夜航机在高空飞过，并猜测这是谁的飞机：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谢苗和女儿安努什卡住在普里瓦洛夫村，离休养所三公里，傍晚他才来这里守夜。而整个白天，休养所和公园被大家遗忘了，空无人迹。

后来，隆隆的炮声传到了公园里。休养所里出现了新主人——军人。炽热的、满是尘土的坦克开进了公园，隐蔽在椴树和槭树的绿荫下。战士们开始挖掩蔽部。他们把掩蔽部挖在草丛深处。头顶上密不透光的浓荫和挡住掩蔽部入口的野马林果枝叶——这一切使战士们备感亲切，情绪安定。

战争爆发前夕，安努什卡从七年制学校毕业了，到海獭禁猎区工作；禁猎区在乌斯曼河对岸的森林里。德国人逼近时，所有的海獭都从养殖场放回河里。但有一只老海獭说什么也不愿离开。它留在养殖场里，当禁猎区的工作人员撤离时，饲养这只海獭的任务便委托给了安努什卡。她经常从普里瓦洛夫到禁猎区来，给那只老海獭割山杨树枝，拔荨麻。每次海獭见到安努什卡，总是用后腿站起来，开始摇晃铁丝栅栏：看见有人来，它感到高兴。

集体农庄里工作很多——从早干到晚，但是安努什卡给海獭喂食没有落过一天。每天傍晚，她去禁猎区要经过潮湿荒芜的森林，经过乌斯曼河的木桥，她觉得自己走在无人居住的土地上——森林里竟是这么荒凉。只有在远方，在沃罗涅日城外有隆隆的炮声，而且总是从那一个地方传来。由于意识到战争就近在身旁，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敌人就站在她的田边，她的门口，安努什卡感到故乡的土地更加可爱、更加亲切了。

一路上，安努什卡像遇见老熟人似的，常常点头致意，一会儿向云雀窝点点头——这只云雀竟粗心大意地把窝筑在路边的水渠里，一会儿向小丘上的菊苣花点点头，一会儿向一丛长着厚树皮的小白桦点点头，一会儿向不知哪个女生弄丢的皱皱巴巴的旧发带点点头。安努什卡没有把它捡起来。

临近冬季的时候，普里瓦洛夫学校里办起一所医院。安努什卡开始在那里工作。她总放心不下老海獭，不过谢苗已经为海獭储备了截好的山杨树枝，海獭呜呜地叫了一阵，躺下冬眠了——不必每天去照看它了。

有一次医院里来了一批莫斯科的演员。他们在学校里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后来应伤员们之请，安努什卡也唱了几首歌。一个头发花白、个子高大、穿着短皮袄的女演员热烈地吻了安努什卡，说她有一副难得的好嗓子。安努什卡羞得眼睛都抬不起来了。战士们热烈地鼓掌，高喊"再来一个"。

高个子女演员和安努什卡一起到农舍去见谢苗，开始说服他准许安努什卡跟她去莫斯科，进戏剧学校学习。谢苗不知所措，什么也弄不明白，老是重复一句话：

"你们城里人看得更清楚。我不会把安努什卡藏起来，不让她过好日子。"

女演员离开以后，谢苗久久坐在长凳上，从破旧的带护耳的

棉帽里往外揪棉絮。安努什卡站在墙边,脸色苍白,心怦怦地跳,眼泪一个劲地流,怎么也止不住。她望着谢苗的白发,望着他那围着绿围巾的瘦削的脖子,由于怜悯父亲,由于不能决定自己究竟该怎么办而哭了。

"你妈妈玛尔法死了,"谢苗终于说话了,"她是个身体虚弱的女人。你怎么样呢?你比她结实还是怎么的?你是根小麦穗,还不是成年人。你会累坏的。莫斯科的生活可是把人忙得团团转啊。"

"就按您的意思办吧,爸爸,"安努什卡轻轻答道。

"我的意思很简单,"谢苗答道,"只要你觉得好,我就觉得好。去吧。我一个人就在这里慢慢地打发日子吧。就像你那只海獭。"

他站起来,走出屋去。安努什卡急忙跑过去跟着他。夜漆黑而寒冷。草原上卷起低吹雪。谢苗站在敞开的门口,说:

"别跟着我。"

安努什卡回到屋里,在长凳上坐下,她坐着,等着。谢苗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回来,他浑身是雪,一声不响,人也变老了。他笨拙地抚摸了一下安努什卡的头发,又说道:

"去吧!只是别作孽——别把我忘了……"

安努什卡抱住谢苗的头,吻了吻他那被雪打湿的头发。

过了一天,安努什卡跟演员们走了。

战争持续了很久,仿佛没有尽头似的。

安努什卡走后第三年的五月,天气凉爽而晴朗。五月的一天,天空由于寒冷而发绿,传来一个伟大的消息:我们胜利了,战争结束了。

时间在流逝,而安努什卡仍然没有回来,只写来几封短信。

休养所重又开放。谢苗依然在休养所公园里守夜,依然喜欢向休养者们讲述安娜姑娘的死和诗人伊万·萨维奇。但是关于自己的安努什卡,他对休养员们只字不提——怕他们认为他是个无聊的、好瞎扯的老头儿。谁知道他们呢,这些休养员!到这里来的人各色各样。就是对自己人,那些农庄庄员,谢苗同样什么也不说,——他不说他们也知道安努什卡在莫斯科,在那里一座很好的剧院里学习。

有一次,休养所所长把谢苗叫去,吩咐他不要对休养员讲女演员安娜的死。

"这是为什么?"谢苗感到受了委屈。"莫非我在撒谎。这是人人皆知的,早已过去的事了。"

"你犯不着多嘴多舌,"所长说,"现在人们都神经质得很。你白天对他们瞎扯,晚上他们就不敢从这棵椴树旁边走了。要不要把它锯掉?"

"锯掉是罪过,"谢苗说,"我不说就是了。"

六月将尽,夏天已经变短,可是安努什卡没有回来。每天夜间,启明星在草原上空,在小山丘上空熠熠闪烁——照耀着庄稼。

谢苗向所长请了假,到远处一个村庄的电报局去——决定给安努什卡发个电报。薄暮时分,酷暑消退时他动身了:白天根本不能赶路。不过走路反正是件苦事。谢苗蹒蹒跚跚地走着,常常在路边坐一会儿,吃力地喘着气,用手指把沾满灰尘的艾草揉软,闻闻它的气味——他认为这样会感到轻松一些。他久久望着,看傍晚的草原渐渐变蓝,看天空中雪白的云团被火焰似的晚霞映得通红,云团静静地停留在渐渐冷却的大地上空,等待着凉爽的夜晚来临。

天蝲在飞舞。土岗上灰色的风磨罩上了一层暗淡的金色。

"唉,安努什卡,"谢苗说道,吃力地站起来,"你能来看看就好啦!你不是在这里长大,光着脚跑遍了整个草原吗,可现在你在哪里啊?"

风磨在离道路不远的地方。磨坊门坎上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人,手里拿着拐杖。"是个新来的磨坊工,"谢苗寻思着朝风磨走去。他想和这个新来的人一起抽支烟,说说自己的心事。其实这算得上心事吗?女儿在莫斯科读书,经常安慰父亲,至于她没有回家,好久没有写信——这有什么要紧!莫斯科大着呢,莫斯科的工作——可不是他们乡下的活。也许那里的人整夜整夜不睡觉,大家都没有空。否则怎么管理这样的国家啊——光是运送粮食就得走成千上万公里呢!

磨坊旁边那个人抽着马合烟。一缕青烟径直冉冉上升,直达风磨的翼片。"好兆头!"谢苗想道,接着问了好,坐下点上烟抽起来,仔细看了看新来的磨坊工:看来是个好人,挺年轻,不久前刚从战场回来。

"我是去给女儿发个电报,"谢苗说。

"干吗要发电报?"磨坊工问道。

"不发电报不行了。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

谢苗开始不紧不慢地说起来。磨坊工抽着烟,冷冷地微笑。谢苗不停地说着。他说的已经不是安努什卡的事了,而是在回忆她。就是这样一个小姑娘,梳着浅色的辫子,文文静静的,像只小蝴蝶。走起路来也很轻盈,有时根本就听不见脚步声。人们都说——简直是个美人儿!主要的不是这一点。主要的是她温柔,勤劳,又那么尊敬父亲。世上只要有他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再好的生活也不需要了。可是现在她怎么样了——不清楚。

"应该高兴,老伯,"磨坊工说,"不必抱怨。"

"你说什么!"谢苗吃了一惊,"难道我抱怨了吗?高兴倒是

高兴，不过还是叫人牵肠挂肚。我要是有几个孩子就好了，可就这么一个。要是她不尊敬我或者为人轻浮，那也就算啦。那样的话我也不疼她啦。可她的心像一团火。好啦，再见。天亮之前我还得赶回家呢，老弟。”

谢苗道过别就走了。天黑下来了。一弯新月宛如一只细细的牛角挂在远方的小树林上空。小树林后面升起一片尘雾。接着南方开始变暗，远处的雷声说了一段自己可怕的故事，一道不祥的火光划破了天空。

谢苗加快了脚步。由于走得快，他停下来歇息的次数更多了，咳嗽也很费劲。由于咳嗽，头部和眼睛涨得通红。眼睛里流出了眼泪。

天空越来越黑了，仿佛从地底下长出一堵生铁铸造的墙壁，雷声像主人似的忙碌着，在前方、右方、左方隆隆作响。被月光照亮的白色尘土沿着草原向谢苗迎面袭来。“走不到了！”谢苗思忖道。

庄稼和青草刷刷地响起来。草原仿佛被天空的雷声劈开了。远处山谷里有一匹上了绊索的马发出哀怨的嘶鸣。

接着，电光一次接一次地闪动不已。从乌云那边刮来一阵寒风，黑压压的倾盆大雨席卷而来，发出可怕的哗哗声。

早晨，一辆载重汽车在草原上碰到谢苗，把他带了回来。他浑身透湿，得了寒热病。就这样，他没有来得及发电报。

休养所的女医生给谢苗做了听诊，摇了摇头。她每天两次到谢苗家来，但是他明白，这无济于事，他已活不久了。邻居们都来照顾他。谢苗躺在农舍里，但是农舍里闷热，于是他搬到穿堂间去。一个邻居老婆婆在门口给他铺了干草，他便躺在敞开的门旁边，盖着短皮袄，望着大路，依然在期盼着，怎么也不肯离开穿堂回屋里去。

夜里总是比白天感到轻松些，因为可以看见远方驶过的汽车稀稀落落的灯光。每一辆汽车都可能把安努什卡送回家来。

远方的林边出现了亮光，宛如一颗白色的星星，迎面徐徐移动过来，在土岗后面熄灭了；继而它那闪动不定的光亮重又出现，于是就能听见夜间发动机悠闲的嗡嗡声。谢苗动了动身子，抬起头来。光线射到他的眼睛上，掠过穿堂在墙上晃了晃就避开了，它经过这里继续向草原射去。

谢苗闭着眼倾听着。夜间草原上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声音。真是莫名其妙。

依稀听到远处火车的嘶鸣。"兴许是客车到站了，晚点啦，"谢苗心想，一面估摸着：她这就走出了车厢，搭上一辆载重汽车，汽车这就驶进了森林，经过护林哨所，过了桥，沿禁猎区驶去（"那只海獭想必也躺在那里，等着她回来呢，"谢苗心想），她这就到了村口。谢苗微微抬起身子，谛听着。然而草原上一片寂静，静得似乎听得见星星在小水桶里不时发出轻轻的拍击声。这只小水桶就放在旁边，里面浮着一只木柄勺。

谢苗恍恍惚惚觉得那个德国人施利希滕正坐在他背后，不时笑笑，说道："谢苗·叶夫谢伊奇，现在我不需要你的燕麦了。""你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谢苗低声回答，"你的爪子已被剁掉。我们现在过着当家做主的日子，你这老狗。"施利希滕不做声了，不知怎么就消失了，面穿堂里出现了一个来休养的姑娘，中学生廖利娅，她皱起眉头递给谢苗一杯苦水，并一直在轻轻责怪他不肯搬进屋里。于是谢苗惊奇地发现已经是白天了，土岗后面的草原上不知什么东西在猛烈地隆隆作响。"难道是康拜因吗？"他思忖道，"难道庄稼已经熟了，可她却仍然没有回来？"

"我骗了安努什卡，"他对廖利娅说，"我答应活到她回来的，可是我连这一点时间也熬不过去了。我就剩一口气了。"

谢苗依然想请廖利娅给安努什卡发封电报。夜里，他不知怎么在心里拟好了这封电报："为了父亲，你为人要清白，正直；回来一趟吧，到我坟上看看，——我会在地下等你。"但是这样的电报是不会被接收的。电报局里的人都很忙，有更多的电报要拍发。他们顾不上这个愚蠢的老大爷。活了这么大的年纪，什么事也解释不清。

白天，来看望谢苗的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女医生，有休养员，有所长，有邻居，但是谢苗闭着眼，装作睡觉的样子——这样他觉得好受些，他非常虚弱了。

暑气日渐消退，时令已近秋季。一天夜里，雨淅淅沥沥地打在树叶上、屋顶上。外面漆黑而温暖。黑暗中飘来被雨水打倒的荨麻的气味。雨点丁丁当当地打在一口破铁锅上；铁锅胡乱地扔在院子里，是谢苗喂鸡用的。谢苗听了一会儿，淡然一笑：这口锅是玛尔法在城里买的，她当时挺高兴，可如今谁也不需要它了。

由于下雨，呼吸变得轻松一些。谢苗微微入睡了。他就这样不知躺了多久，直到一束白光射到脸上他才醒来。农舍旁边停着一辆汽车，隆隆地响着。谢苗用颤抖的双臂支撑着，微微抬起身来，喊道："安努什卡，是你吗？"——说完，他便倒下不做声了。安努什卡吻着他的头，抚摸着他那瘦骨嶙峋的双肩和粗糙的面颊。从她手上冒出一股奇异的气味，也许是夜间青草的气味。

"你看，我回来了，"她说，"你看，我回来了，你怎么了？你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谢苗喃喃地说，"我就这样。有点虚弱。"

有人在屋里点上了灯。人们谈论着什么，争论着，然后把谢苗抬进屋里，安顿在一张宽大的长凳上，安努什卡在上面铺了一条干净的床单。

人们离去了。安努什卡给谢苗喝了浓茶，就一直在他身旁坐到天亮，握着他的手不放，一直微笑着，不让眼泪流出来。

谢苗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多漂亮的美人儿啊！她穿的连衣裙也是城市流行的，薄薄的，这样的衣服只有在节日里才穿呢。但是他的安努什卡仍然是从前的安努什卡，性情温柔，有一颗火热的心。

九月里，谢苗被安葬在安娜姑娘的墓旁边。人们给新墓铺上了草皮，后来秋天给它撒了厚厚一层树叶，使得红褐色的土一点也看不见了。根据安努什卡的请求，谢苗被葬在公园里，葬在他喜欢的地方。

每天清晨她都到坟上来；休养员们一看见安努什卡，便不再喧哗，彼此招呼着，尽量悄悄地从旁边走过去，以免惊扰她。她坐在墓旁的长凳上，凝视着草原，沉思默想。

在晴朗而凉爽的秋日，鸟儿向南方飞去。成熟了的籽实在干燥的果穗里发出哗啦啦的脆响。风卷起在阳光下显得透明的黄树叶，歪歪斜斜地四处飘散。每到傍晚，一排有几分寒意、微微发青的云彩弥漫在草原上空。

动身前，安努什卡到禁猎区去看望海獭。她一面走，一面像从前一样向她的老熟人——白桦姐妹，乌斯曼河上的木桥，松树林——点头致意。

老海獭仍然待在那只笼子里。安努什卡叫了它一声，海獭吃力地从鼻子里发出喘息声，用后爪站起来，开始用力摇晃铁丝网：它认出了安努什卡。

不久，安努什卡走了。第二年夏天，割草工又在公园里割草，并向休养员们讲述两个安努什卡的两个故事，但是谢苗已经不在了。一个故事讲的是早已过去的事，大概听起来不再那么有趣了，另一个故事却留在所有人的记忆里。在割草工们的转述中，这个故事看来大概是这样的：

谢苗送她走的时候，她只带了一个背包。她带到莫斯科的只有嗓子。一副洪亮的嗓子——这样的嗓子世界上哪里去找啊。可是她回来时却叫人认不出来了。简直是个大美人儿！谢苗有这么个女儿可真是好运气。他盼她等她，不指望能等到她回来：他得了重病，一种康复无望的疾病。可是仍不见她回来。她没有回来。当然，村里的女人们开始唠唠叨叨地抱怨，说什么这就是她，女儿的报恩，说什么老头子太得意了，他为这得意可吃足了苦头。这么说来他好像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了。她们说："她现在顾不上他。现在她要的是给她穿绫罗绸缎，给她端可可茶。"不过你们都知道，女人们就是说话尖刻。要是数落她们一顿，让她们感到害羞，她们就不吭声了，要不她们就闹得沸沸扬扬，就是大炮轰也制止不了她们。是啊，她毕竟回来了，而且给谢苗带来满满一屋子小礼品。虽然他没有再活多久，她还是把他打扮得干干净净，把屋子刷白了，像玩具一样漂亮。女人们当然不做声了，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安努什卡看不厌，夸不完。只要她一上街，准听到家家户户女人们的赞扬和深受感动的话语。这些人就是这么前后不一！人们羡慕起谢苗来了。有什么好羡慕的！他眼看就要熄灭了，像蜡烛一样。风一吹——他就完了。不过说实在的，他死得很幸福。真难以设想，这件喜事起了多大作用——谢苗甚至

开始能稍稍走动了。虽说走起来还很吃力，但偶尔扶着安努什卡，慢慢地从屋里走出来。那么，休养员们打听到这一切情况，就请求安努什卡帮个忙，到休养所里给大家唱歌。安努什卡是个懂礼貌的人，当然答应下来了。于是举办了音乐会。我们都参加了，以客人的身份参加了。全村的人都来了。要知道安努什卡不仅仅是谢苗的——她是我们大家的，是我们全村的。所长派了马去接谢苗。往常别想向他要到马，他是个非常节俭的庄稼人，可是这一回——你瞧！——他亲自去请谢苗了。我们来了，整个休养所里一片通明——真是灯火辉煌，周围摆满了用秋天的树叶扎的花束。全体休养员都像过节一样：女人穿着薄连衣裙，发出窸窣的响声，洋溢着奇异的香水气味。大家说："您的安努什卡是我们的骄傲。"是啊！安努什卡和谢苗走进了大厅，他们受到热烈欢迎！真不知道有谁会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简直难以想像。就像欢迎公主一样。当然现在没有公主了，可是对我们来说，她就是公主。她唱得那么好，只要一听就会浑身颤抖。谢苗，这个怪人，坐在那里，连眼泪都不擦。他说："我劳动了一辈子，现在感到轻松了。"可惜他没能再多活些日子——一星期以后他死了。他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无痛苦的死亡。把他安葬了，这是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天气暖和极了，连蝴蝶都在牧场上空飞舞，嬉戏。抬眼向天空望一望——简直像一张细纱织就的大网，好一个晴暖的初秋。河流和池塘呈现出一片蓝色，大地上方的空气那么清新，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整个公园里落满了干枯的树叶，洒满了金灿灿的阳光。无痛苦的死亡！是啊……安努什卡走了。我们预祝她生活幸福，——不可能有别的祝福了。

讲述这个故事的割草工沉默下来。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是在高空中，在一棵古老的椴树上，一只黄莺在小心地啼啭，仿佛表示赞同："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

1946年

沈念驹 译

沃罗涅日之夏

沃罗涅日近郊乌斯曼河上的禁伐林，是顿河草原边界上最后一片森林。它发出轻轻的喧哗，林中凉爽宜人，有一股青草味。但只要一走出林子，来到林间空地，阵阵热浪便扑面而来，阳光刺目。宛如大海一样的草原辽阔，多风，一直延展到地尽头。

映人眼帘的是土岗上舞动着翼轮的一架架风车、成群的老鹰、像孤岛一样彼此相隔很远的一座座古老庄园中的花园。

不过最先展现出来的是天空——草原上高远的天空，飘着硕大的青灰色云团。云团很多，但它们几乎从来不遮挡太阳。云团投下的阴影时而在草原这边移动，时而在草原那边移动。阴影移动得极其缓慢，以致可以在里面长时间行走而不会落到它后面，而且可以躲避灼人的太阳。

草原上，离一座长满椴树的老公园不远处，小小的卡明卡河在一条慢坡的小山谷里闪闪烁烁地流淌。小河几乎已经干涸，只有几个不大的河底深坑里注满了晒热的清水。水蜘蛛在水里钻进钻出，昏昏欲睡的青蛙蹲在岸上吃力地喘气——由于燥热，怎么也喘不过气来。

老远就能听见公园里的动静，那里挖的防空壕已经坍塌，长满了野马林果。公园里有许多山雀、红额金翅雀、红胸鸲、黄鹂和黄雀，它们发出啁啁啾啾的啼鸣，从天亮到天黑。鸟儿们一刻不停地在椴树树冠上飞来飞去，忙忙碌碌。椴树很高，只要望一

眼就会头晕目眩。

一座白色小屋掩蔽在树下的浓荫里。它从前属于如今几乎被遗忘的作家、契诃夫的同时代人埃尔杰利[1]。现在这里是座不大的休养所。

我和公园里的鸟儿们自有一番恩怨。我常常一大早就到卡明卡河去钓鱼。只要我一走进公园,数以百计的鸟儿便在枝头开始忙碌。它们竭力隐藏起来,把下雨一般的露水浇到我身上。它们劈里啪啦地从树丛里飞出来,就像从水里滑出来似的,慌慌张张地向公园深处飞去。

这大概是一幅美丽的景色,但是我被露水浇得浑身透湿,不大有兴致去欣赏了。我尽力走得很轻,不发出声响,但这无济于事。我越是悄无声息地向一丛落满鸟的灌木靠近,引起的惊慌就越大,落到我身上的冷冰冰的露水就越多。

我来到卡明卡河边。太阳徐徐升起。落满露水的荒漠草原闪闪发光。四周阒无一人。即使视力最敏锐的眼睛也看不出任何有人的迹象。然而只要我一抛钓竿,山沟里马上就钻出一个个赤脚的小男孩。

他们排成一个宽阔的弧形从后面徐徐靠近,但是走得非常小心翼翼,以致有时我只是根据自己背后集中的喘息声才知道他们来了。

孩子们一声不吭,用鼻子发出咻咻的喘息声,目不转睛地盯着红色的浮子。有时他们中有人用一只脚挠挠另一只脚。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鱼不会再上钩。这一点还难以解释,却是千真万确的。甚至只要有一个孩子站在

① 埃尔杰利(1855—1908),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加尔杰宁的一家、家仆、追随者和敌人》。

背后盯着浮子，鱼就压根儿不上钩。

开始我决定送东西把孩子们打发走。我给他们每个人一只镀金的鱼钩，不过说好他们得离开这里，不再妨碍我钓鱼。

孩子们拿了鱼钩，轻轻说了声谢谢，便真的走了。然而，半个小时以后出现了一群完全是新面孔的孩子。他们老远就叫喊：

“叔叔，给我们个鱼钩吧！”

我知道我犯了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

应当想出一个可靠的办法摆脱这些孩子。这时我想起了作家盖达尔的话。他使我确信，对孩子们最起作用的是和他们进行捉摸不透的谈话。

于是第二天，当孩子们围住我，开始用鼻子发出哧哧的喘息声，鱼又不再上钩时，我用没好气的声音头也不回地说：

“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为这件事要罚款一百卢布呢！”

“什么事？”最机灵的一个孩子迟疑不决地问。

“就是这件事，”我回答说。

孩子们彼此对看了一眼，开始慢慢地、小心地往后退，眼睛一直看着我。他们这样倒退着走了大约三十步，然后一下子转过身，四散着向草原跑去。最小的一个跑在后面，绊了一跤，接着突然用男低音大哭起来。那个机灵的孩子抓住他的手，啪地打了一下，生拉硬拽地把他拖走了。孩子们不见了。

我自己对刚才发生的事的惊异不亚于那些孩子。我笑了起来。有人在柳树丛后面嘻嘻地笑了一声，这是对我的笑的反应。

我向树丛后面望去。那里躺着两个男孩，脸埋在草丛里，笑得身子一抖一抖的，他们长着浅色头发，手里拿着绳鞭。

“你们怎么没有走？”

“我们不能走，”年纪大一点的那个男孩说，“我们是牧人。

我们的牲畜就在土岗子后面放牧。"

"要是没有牲畜呢?"

一个孩子得意地笑着站了起来。

"不!"他说,"反正我们不跑开。我们大了。而那些孩子还小。不管你答应他们什么,他们都相信。现在他们害怕了,以后好长时间不会再来了。"

我跟牧童维佳和费佳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同时也开始了我们非比寻常的交谈。

"您是谁? 是作家吗?"费佳马上向我发问。

"是的,我是作家。"

"您很早就当作家了吗?"

"很早。"

"有点看不出来,"费佳说,怀疑地望了望我。

"为什么这看不出来?"

"鱼在咬钩,可我看您老没注意它。"

"您说错了,"我说道。"这跟鱼无关。"

"得了吧,"费佳委屈地说。"怎么会无关呢!"

这时年纪小一点的那个牧童维佳插进话来。

"前年夏天,"他急匆匆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有两个作家也在这儿钓鱼。是若拉叔叔和萨沙叔叔。萨沙叔叔只要一抛钓竿,鱼马上就上钩,只要一拉,就拖出来了——这么大一条鲈鱼! 有半米长! 一条接一条。可是若拉叔叔办不到。若拉叔叔钓不到鱼。他坐呀坐的,坐了一整天,才拖出一条小拟鲤。瘦瘦的,半死不活的。"

"又瞎搀和!"费佳生气地说,"十足的傻瓜。若拉叔叔根本不是作家。懂吗? 萨沙叔叔可是那样的作家。他写了二十本书了。"

这时我终于明白了。在费佳眼里真正的作家是传奇式的人物,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绝对是多才多艺的,是一种“能手”魔法师。他应当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懂,什么事情都干得极好。

我不想使一个乡下小牧童这一天真的信念破灭。也许是因为这种天真的后面隐藏着有关真正的作家技巧的真理——一种我们已不再记得和我们并不是一直努力促其实现的真理。

不知为什么我感到羞愧起来。甚至在钓鱼这件小事上也是如此。从此我发誓决不放过一次鱼咬钩的机会,尤其当费佳在场时。这似乎已成为事关名誉的问题。当初我在卡明卡河边想过的问题,现在我在莫斯科却觉得有点可笑,但是我不想让费佳对什么人说:

“科斯佳[1]叔叔吗?他算什么作家!鱼咬钩时,他连钓竿也不会抖一下。他总是让鱼脱钩逃走。”

从此,每次见到费佳我都格外小心。他什么都要了解。他向我提了许多问题。但我对他的所有问题并不都回答得出。

同所有的牧童一样,费佳对各种草、花和植物都很了解,并喜欢谈论它们。我对植物也略知一二,但是在这里,在沃罗涅日郊外,有许多花草在我们俄罗斯偏北地区是见不到的。因此我对于自己从莫斯科带来一本植物图鉴十分得意。

我从草原上,从乌斯曼河边,从禁伐林里带回一大抱各式各样的花草,对它们一一进行鉴别。多亏了费佳,我渐渐沉浸在形形色色的叶子、花冠、花瓣、花蕊、穗子的诱人的世界之中,沉浸在植物的清香和纯净的色彩的世界之中。我的房间变得像一个乡下巫医的住所。墙上挂着一束束干草,草原植物的药味久久

---

① 科斯佳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小名。

地滞留在室内，连窗外花朵正在凋谢的椴树的气味也不能把它挤走。

我的胜利时刻终于来临了。

卡明卡河岸上开满了野荞麦纤细的花朵。它们好像一颗颗白色的小星星。

一次在黎明时分，我来到卡明卡河边。费佳也马上出现了。他坐到我身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嚼起来，详细地问我关于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况。

天空一片昏暗。鲜艳的浮子纹丝不动地漂在灰蒙蒙的水面上。鱼很少咬钩。

我看了一眼脚边的野荞麦花，发现它们全都合上了。

“要下雨了，”我对费佳说。

“您怎么知道要下雨？”

“根据这些花。”

我向他指了指合上的花。费佳皱起眉头，思索了好久。

“为什么下雨之前花要合上呢？”

“为了不让雨水冲走花粉。”

我开始向他讲述花粉、授粉和根据花朵可以判断出一天内的时间。我讲的时候，一条拟鲤咬钩了，但是我错过了机会。连费佳也没有发觉。他因我的讲述而十分兴奋。

“这些事您是从哪儿知道的？”他问，“从学校里吗？”

“从书本里。”

“唉，要是我也知道就好了……”费佳拖长了声音说，接着沉默下来。

“怎么样？你别再放牛了？到沃罗涅日去吗？”

“不！”费佳说，“我是本地人。我在这里感到自由自在。等我长大了，我要当农庄主席，代替西兰季·彼得罗维奇。我要在

自己村里盖温室，种花。什么事我没有想到啊！我要开办一座蜜糖厂。”

一滴雨垂直地落进水里。水面上由此泛出一圈圈细小的波纹。接着我们周围的青草立刻颤动起来，瑟瑟作响，整个水面布满了一圈圈细小的波纹，水潭上方传来微弱的、然而清晰的淅沥声。下起了温和的细雨。

阳光大片大片地照进远处柔软的乌云的断裂处，于是，草原上水汽升腾，闪闪发光。青草、庄稼和土地散发出越来越浓的气味。土岗后面飘来刚挤出来的牛奶的清香——畜群在那里放牧。

“看！”费佳对我说，“这可是一株玻璃草啊！”

一根根毛茸茸的野荞麦秆上布满了雨滴。我们脚边所有这种小植物都在闪烁，仿佛真的是用水晶玻璃制成的。

雨是无处可躲了，于是我们把费佳的棉袄顶在头上坐着。

“有吉兆的夏天！”费佳一本正经地说。

这几个字他也许是从哪个乡下老汉那里听来的。夏天确实充满了捉摸不定的好兆头——无论在轻轻的雨声里，还是在正在成熟的小麦的清香中——丰收的预报者。

1946 年

沈念驹 译

一枚小钢戒指

库兹马爷爷和自己的小孙女瓦留莎住在莫霍沃耶村，紧靠着森林。

正遇上严冬，狂风怒号，大雪纷飞。整个冬季没有出现过一个暖和的天气，也没有融化的雪水从木板屋顶上滴下来。夜里，冻得瑟瑟发抖的狼在森林里嗥叫。库兹马爷爷说，它们嗥叫是因为嫉妒人类：狼也喜欢住进农舍里，在炉子边蹭蹭痒，躺一躺，让结了冰的毛茸茸的毛皮暖和暖和。

仲冬时节，爷爷的马合烟抽完了。爷爷咳得厉害，抱怨自己身体虚弱，说如果能抽上一两口烟，他会马上觉得轻松些。

星期天瓦留莎到邻村彼列博雷去替爷爷买烟。村边有一条铁路。瓦留莎买了烟，把它装进一个印花布小袋子里扎好，就到车站去看火车。很少有火车在彼列博雷停靠。几乎总是丁丁当当、轰轰隆隆地从旁边飞驰而过。

站台上坐着两个战士。一个长着大胡子，有一只快乐的灰眼睛。火车吼叫起来。已经能看见它冒着蒸气，从远处黑压压的森林里拼命地向车站驶来。

“是快车！”大胡子战士说，“当心，小姑娘，火车会把你刮走的。你会飞到天上去的。”

火车一下子就冲到了车站。雪花卷了起来，糊住了眼睛。接着车轮开始哐当作响，彼此追赶着向前飞转。瓦留莎抱住路灯柱，闭上了眼睛：千万可别真的把她吹跑，可别真的被火车拉

走。火车开过去了，雪尘还在空中飘舞，渐渐落到地面上，这时大胡子战士问瓦留莎：

"你那只小口袋里装的什么？不会是马合烟吧？"

"是马合烟，"瓦留莎回答。

"也许你能卖给我一点？太想抽啦。"

"库兹马爷爷不让卖。"瓦留莎断然说，"这是他治咳嗽用的。"

"哎，你呀，"战士说，"你这个穿毡靴的小花朵！太认真啦！"

"那你尽管拿好了，"瓦留莎说着，把小袋子递给战士，"抽吧！"

战士抓了一大把马合烟放进军大衣口袋里，卷了一根粗粗的烟卷，抽了起来。他托住瓦留莎的下巴，笑眯眯地看了看她的蓝眼睛。

"哎，"他又说道，"你这朵梳小辫儿的蝴蝶花！我拿什么来回赠你呢？难道用这个？"

战士从军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钢戒指，吹掉上面的烟末和盐巴，在袖子上擦了擦，戴到了瓦留莎的中指上：

"戴着吧，别客气！这个小戒指可神奇了。瞧，它在闪闪发光！"

"叔叔，它为什么这么神奇呢？"瓦留莎满脸通红地问。

"因为，"战士答道，"如果你把它戴在中指上，它就会给你带来健康。无论是你还是库兹马爷爷。如果把它戴在这个手指上，就是无名指上，"战士拉了拉瓦留莎冻得发木发红的手指，"你就会得到极大的快乐。或者比方说，你想看看世界及其所有的奇迹，那你就把戒指戴在食指上——你一定能看见！"

"真的吗？"瓦留莎问道。

"你就相信他吧，"另一个战士从竖起来的军大衣领子里瓮

声瓮气地说，“他是个魔法师。听说过这个词儿吗？”

“听说过。”

“他就是那种人！”战士笑了起来，“他是个老工兵。连地雷也伤不了他！”

“谢谢！”瓦留莎说道，向自己的莫霍沃耶村跑去。

突然起风了，下起了铺天盖地的雪。瓦留莎一直在摸弄小戒指，把它转来转去，看着它在冬天的光线下闪闪发亮。

“那个战士怎么忘了告诉我小拇指呢？”她心想，“那会怎么样呢？对，我把戒指戴到小拇指上试试看。”

她把戒指戴在了小拇指上。小拇指很细，戒指戴不住，掉进了小路边深深的积雪里，立刻钻进雪底下去了。

瓦留莎“啊呀”叫了一声，就用双手在雪里扒起来。可是没有戒指。瓦留莎的手指发紫了，冻得麻木了，甚至弯都弯不起来。

瓦留莎哭了起来。戒指不见了！就是说库兹马爷爷的身体不会好了，她也不会有极大的快乐了，也见不到人世间及其所有的奇迹了。瓦留莎在戒指丢失的地方插了一根老云杉树枝，便回家去了。她用手套擦干眼泪，但是眼泪还是往外涌，并结了冰，因此眼睛觉得冰凉而疼痛。

库兹马爷爷见到马合烟很高兴，抽得满屋子烟气腾腾，关于戒指，他说：

“你别难过，小傻瓜！它在哪儿掉的，就会在哪儿待着。你去求求西多尔吧。它会帮你找回来的。”

老麻雀西多尔蓬起羽毛，像个小球似的栖息在架竿上。整个冬季，西多尔俨然主人一般，独立自主地住在库兹马的农舍里。它个性刚强，不仅叫瓦留莎，而且叫爷爷本人都把它算作家里的一员。它直接从盆儿里啄食稀饭，而竭力把面包从手里夺

出来。如果撵它走，它就生气，把羽毛抡擎起来，开始打闹，气呼呼地喳喳叫个不停，闹得邻家的麻雀也都飞来，落到房檐下倾听它的诉说，然后久久地吵闹着，斥责它的坏脾气。它有房子住，又暖和，又吃得饱，可它还不知足！

第二天瓦留莎捉住了西多尔，把它裹在头巾里，带到了树林里。云杉树枝从雪底下只露出一个末梢。瓦留莎让西多尔停在树枝上，请求它说：

“你找一找，挖一挖！兴许你能找到！”

然而西多尔斜睨着眼睛，怀疑地望了望雪地，喳喳地叫道：

“真有你的！真有你的！我才不干这种事呢！……真有你的，真有你的！”西多尔重复叫着，突然从树枝上飞起，飞回农舍去了。

戒指还是没有找到。

库兹马爷爷咳得更凶了。快到春天的时候，他爬到了炉炕上。他几乎再没有从那里下来过，越来越经常地要水喝。瓦留莎用小铁勺舀点凉水给他喝。

暴风雪在村子上空旋绕，农舍被雪盖住了。松树都陷进了雪里，瓦留莎已经无法在森林里找到丢失戒指的那个地方了。她常常躲在炉子后面，由于可怜爷爷而偷偷哭泣，并责骂自己。

“傻瓜蛋！”她轻声说，“净顾淘气，把戒指弄丢了。你该为此受罚！你真是活该！”

她用拳头捶自己的头顶，惩罚自己，库兹马爷爷问她：

“你在跟谁吵闹？”

“跟西多尔，”瓦留莎回答，“变得那么不听话！老想打架。”

一天早晨，西多尔在小窗上跳来跳去，用嘴巴敲着窗玻璃，所以瓦留莎被吵醒了。瓦留莎睁开眼，又眯了起来。长长的水滴从屋顶争先恐后地落下来。暖烘烘的光线射进了小窗。寒鸦

在大声啼叫。

瓦留莎朝窗外望了望。一股暖风扑面吹来，头发被吹乱了。

“春天终于来了！”瓦留莎说。

黑魆魆的树枝闪出了亮光，湿雪从屋顶上滑下来，发出沙沙的响声，村外潮湿的森林正傲慢而欢乐地发出喧响。春天在田野上行走，犹如一位年轻的主妇。只要她往峡谷里望上一眼，那里溪水立刻就开始汩汩流淌，淙淙作响。春天在行走，溪水的声音随着她的每一个脚步变得越来越响。

林中的积雪开始变暗。首先在雪地里露出冬季里落下的棕色针叶。接着露出许多干树枝——这还是十二月被风暴刮断的，——然后呈现出去年落下的黄叶，露出化尽了雪的一块块地面，于是款冬草在最后几个雪堆边上开花了。

在森林里，瓦留莎找到了那根老枞树枝——就是她在丢失戒指的地方插进雪地里的那根——便开始把枯叶、被啄木鸟抛下的空松果、断枝和腐朽的苔藓扒开。在一片黑黑的小树叶下面，有一个亮点像火光一样在闪烁。瓦留莎大叫一声坐了下来。就是它，小铜戒指！它一点儿也没有生锈。

瓦留莎拿起戒指，戴到中指上，便跑回家去。

她向农舍跑去，老远就看见了库兹马爷爷。他走出了屋子，坐在墙根的土台上，一缕马合烟的青烟在他头顶冉冉升起，直向天空，仿佛库兹马被春日的阳光晒干了，头顶冒出了水汽。

“你看，”爷爷说，“你这个冒失鬼，急急忙忙从屋里跑出去，都忘了关门，于是满屋子都吹进了淡淡的空气。我的病一下子就没啦。所以我现在要抽上一口烟，拿起斧子，劈点柴火，我们把炉子生起来，烤燕麦饼。”

瓦留莎笑起来，抚了抚爷爷蓬松的白发说道：

“多亏了这枚小戒指！它把您的病治好啦，库兹马爷爷。”

瓦留莎整天把戒指戴在中指上，为的是坚决把爷爷身上的病祛走。只有在晚上上床睡觉时，她才把戒指从中指上取下来，戴到无名指上。此后，应当出现巨大的欢乐了。但是欢乐迟迟没有出现，没有到来，瓦留莎没有等到便睡着了。

她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就跑出了屋。

大地上空布满宁静温暖的朝霞。天边还有星星在颤动。瓦留莎向林中走去。她在林中一块空地上停下了脚步。森林里什么东西在响？仿佛有人在小心地摇着一个个小铃铛？

瓦留莎猫起腰，谛听着，双手拍了一下：白色的雪莲花轻轻摆动着向朝霞频频点头，每一朵花都在嗡嗡作响，仿佛花里藏着一只会嗡嗡叫的金龟子，用爪子敲击着银光闪闪的蜘蛛网。松树顶端，一只啄木鸟咚咚地啄了五下。

"五点了！"瓦留莎想道，"多好的清晨！多安静啊！"

转眼，一只黄莺在洒满金色晨光的枝头唱起了歌。

瓦留莎站在那里，微微张着嘴谛听着，脸上笑意盈盈。和煦柔顺的风用力地向她吹来，她身旁有什么在沙沙作响。榛树摇晃起来，榛子花里撒下黄色的花粉。有人小心翼翼地拨开树枝，不露痕迹地从瓦留莎身边走过。杜鹃迎着她咕咕鸣叫起来，向她频频点头致意。

"是谁从这里走过？我怎么没有看清？"瓦留莎想。

她不知道，是春天从她身边走过。

瓦留莎对着整个森林大声笑了起来，然后跑回家去。这时巨大的欢乐——你无法用双手抓住的欢乐——在她的心里响了起来，唱起了歌。

春天一天比一天明媚、快乐。从天空直泻而下的光芒使库兹马爷爷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缝，但是无时无刻不带着盈盈笑意。接着在林子里，草地上，峡谷里，仿佛有人洒上了魔水似的，一下

子开出了许许多多绚丽多彩的花朵。

瓦留莎曾想把戒指戴到食指上，以便看看人世和它的全部奇迹，然而她望着所有这些花朵，滋润的桦树叶，明朗的天空和金黄的太阳，听着彼此呼应的鸡鸣，潺潺的水声，田野上此起彼伏的鸟啼，就没有把戒指戴在食指上。

“有我看的，”她想道，“人世间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像我们的莫霍沃耶这么好。这是多么迷人的地方！库兹马爷爷说得不错，我们的国家是真正的天堂，人间再没有这么好的国家了！”

1946年

沈念驹 译

“273”护林哨所

这篇特写是在乡间一所房子的阁楼里写的。窗户开着，所以灰色的飞蛾常常飞进来扑向烛光。周围一片沉寂，静到能听见楼下空房里挂钟的滴答声。远处奥卡河上，轮船的汽笛在鸣叫。村子正在沉睡，家家的窗户里一片漆黑。户外飘来湿木板的气味。

墙上挂着一幅加里波第① 的雕刻像，上面有他的签名，已退成了褐色。它怎么会在这里呢？事物的经历有时和人的经历一样，往往带有偶然性。我力图再现这幅肖像从它被雕刻出来的巴黎运抵俄罗斯中部乡村的旅程。

肖像上没有雕刻家的签名，但是雕版画的背面则粘着一张法国报纸。我猜测：这所乡村屋子从前的主人，一位早已作古的画家，曾在巴黎久居，经常造访屠格涅夫在布日瓦尔的居所，认识维亚尔多②，而且，显然见到过加里波第。

加里波第！意大利的天空，对罗马的远征，洋溢着橄榄树皮清香的空气，幻想、诗歌和赤贫的国度！

加里波第住在这里，一间拥挤的斗室里，和费奥多尔·托尔

①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人民英雄，民主革命之翼复兴运动的领袖之一。

② 维亚尔多(1821—1910)，法国女中音歌唱家，作曲家，到彼得堡演出时与屠格涅夫认识，从此两人成为密友。她作的许多歌曲均由屠格涅夫作词。

斯泰[①] 的浅浮雕作品《费尔沙姆佩努阿兹的战斗》并排而列。如果从花园向阁楼的窗户中望去，那么挂有加里波第肖像的房间，就如一间在一望无际的黑夜的海洋上光线微弱的船舱。

我是这幢空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最后一个居民，几天以后行将远去莫斯科，而一切物件，无论是浅浮雕还是加里波第的肖像，无论是画有水磨的古灯还是桌子和柳兰花束，这一切都将留在这里过冬。如果一年以后重返故地，看见这一切仍在原地未动，那会感到多么奇怪，而且在目睹这一切以后，又会多么奇怪地明白一个现象：一年的岁月使人平添了白发和经验，而这里一切都没有改变，也许只有那幅雕版画肖像稍稍有些泛黄。

我竭力设想当我不在此地时这个房间会是什么模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将会细雨连绵。风儿将把翘曲的落叶盖上屋顶。接着严寒将把灰白的沙地冻得一片僵硬，大雪纷飞，蓝灰色的天空低垂在屋子上方，直至春季。

柳兰花将冻结起来，一旦春天有人打开房门，便变成火红色的粉末，如灰尘一样四下飘飞。奇异的干枯世界！关于这一点，只要透过放大镜观察这些花朵，就能推断出来：那些花里一切都天造地设，恰到好处。这个将被扔进垃圾堆的干花束同样是复杂的，犹如这整个大地，连同植物、水和用透明的球形表层将其包裹的大气。

事物会强化对时间的感受。它们的生命往往比我们长久。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希望和这幅加里波第肖像活得一样长久。

作为某种绝无仅有、令人惊诧的我们的生活感受本身，融入了失望、损失和短暂出现的不完全的幸福。也许作家、诗人、艺

① 费奥多尔·托尔斯泰（1783—1873），俄国奖章刻制家、雕塑家、画家、版画家，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

术家的任务，就在于颂扬生活，恰似颂扬阳光下存在的最美好、最合理的东西。

早就尽人皆知，生活的魅力不仅在于对未来的期待和当前，在某种程度上还在于回忆。回忆往往与想像、创造相近似。我们有谁在回忆时不使自己的体验具有未能如愿的东西的特征？有谁在回忆时不在记忆中只留下体验过的事的实质？

回忆不是发黄的书简，不是衰迈老人，不是枯干的花朵和宝贵的遗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激动的、充满诗意的世界。

这里所说的种种无非是一篇冗长的开场白，为的是回忆和想像位于距那个房间五十公里地方的景物，加里波第则在那个房间里眯起眼睛望着世界。这里要谈的和回忆的就是从大湖区流出的普拉河。

一次，在一个秋季的傍晚，我们背上背囊，从乡村的屋子出发去窄轨铁路的火车站。临近夜间，沙地变得冷冰冰的，一颗熟识的蓝色星星在林边上空升起。

如同往常一样，一场争论开始了：这是什么星——木星还是别的什么星？它以自己闪烁不定的光亮从天空俯瞰着松林黑魃魃的树梢，长满帚石楠的沙质小山岗，木板屋顶和椋鸟笼子——俯瞰着这整个林区，它闪烁着，同时在星座间缓缓地开辟自己的道路，仿佛要显示自己的亮度和夜间的凉意。

窄轨火车的车厢内昏暗而拥挤。只有半夜时才升起的月亮在松林后面闪出光亮，用红铜色火焰照亮乘客们的脸。

旁边坐着一个约模十二岁的小姑娘，她穿一件浆过的粉红色连衣裙，辫子上系着粉红色发带，看上去像粉红色的头发上包着一块粉红色头巾。连她的眼睛也在月光下闪出兴奋的粉红色光芒。她正从州府所在的城市返回乡下来，她是从当上了技工学校校长的哥哥家做客回来的。她用尖细的、同样是粉红色的

噪音讲述着在城里看过的每一部电影，特别说到一部电影——片名她忘了——说电影里“马车上套了马，马将几位穿得漂漂亮亮的阿姨拉去做客”。

“你看过关于作曲家格林卡[1]的影片吗？”突然在暗处有一个嘶哑的男子声音问道。

“大概看过。不过我脑子被搞糊涂了，所以已经记不起来了。”

“这部影片是谁作的曲？”同一个声音严厉地问道，“你不知道？正是格林卡。再譬如，有一部音乐十分优美的歌剧《霍万斯基[2]叛乱》。它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3]写的。这些青年人应当知道。”

“怎么知道呢！”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应声说道，她一直在摸自己脚下放着的一袋洋葱，“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没那么多精力。”

“废话！”

“您说的是，”一个老头狡狯地说道，他一直在打盹儿，突然清醒过来，“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他在我们科罗斯托夫出过事……”

“谁出过事——他吗？”

“不错，我是说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出过事。前年春汛时河水暴涨。奥卡河漫出堤岸七公里。当然，夜里漆黑。黑得不管多好的视力也看不见！舵手看来有点喝醉了。他偏离了航道，把船搁浅在草地的土丘上了。而且搁得非常牢：一连拖了三个星

---

① 格林卡(1804—1857)，俄国作曲家，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创始人。

② 霍万斯基(？—1682)，俄国公爵、大贵族、军政长官。因反对政府被处死。

③ 穆索尔斯基(1839—1881)，俄罗斯作曲家。

期，硬是没有拖出来。船就这样在草地上变干了。在那里搁了一年，直到新的汛期到来。只有春汛才把船浮了起来。”

“你在胡说什么莫名其妙的事呀，老大爷，”那位通晓作曲家的人说，“你是说梦话还是怎么的？”

“他说的千真万确！”暗处一个青年人的声音说道，“轮船‘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号’确实出过事。我是亲眼看见的。草地上停着一艘轮船，它四周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简直可笑！”

“谁觉得可笑了，”老人喃喃地说，“为这件事舵手还吃了官司呢。”

“活该！”带着一袋洋葱的女人说道，“可别把轮船毁了！他们这些庄稼人呀，只要喝醉了酒，就什么事都无所谓了。轮船大概是国家的机器。他这个喝醉酒的笨蛋却只用一个手指去转舵轮。连看也别看这些傻瓜酒鬼才好呢。”

“如今酒鬼很少了，”门边一个看不见身影的人心平气和地说，一面抽着烟，“如今在我们农庄就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醉鬼。人们都清醒过来了。而且干起活来浑身是劲。”

“别人我不敢说，不过我自己的劳动日可都是完成了的，”上了年纪的那个女人马上应道，又摸了一下洋葱口袋；听得见干燥的洋葱皮的窸窣声。

“你的洋葱？从庄园带来的？”

“是的，是我的。我自己的。”

“要带到集市上去，是不是？去克列佩基？”

“到集市上去。”

“怪不得，”作曲家通说道，“我看见满车厢都是茨冈人。也是到克列佩基赶集去的。”

“哎哟，你真是个如画的美男子，”站在窗口的一个茨冈女人用胸音说道，一面划了根火柴准备点烟，“我们一共才六个人。

可你却嫌挤了……"

火柴的光照亮了茨冈女人的蓝头发。

"我们过的是游牧生活，"茨冈女人叹了口气说，"这种生活就跟梦一样，要再一次梦见它是永远也不可能的。"

"真是个非凡的民族！"作曲家通低声说道，一面俯身向着我，"有一次我去萨索沃。整个车厢挤得满满的，所有的人都带着沉甸甸的袋子。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茨冈女人，她抱着一个小女孩。一个绝顶漂亮的茨冈女人！她没有带任何东西，只有一个小包裹。那是包在头巾里的毫不起眼的一点东西。女孩醒了，想哭。这时茨冈女人解开包裹。我看过去，里面只有一块面包和三朵大大的大丽花。她把一朵花当玩具塞给了小女孩，小女孩便安静下来，玩起花来了。"

"就喜欢这样一类东西，"老头说。

那几个茨冈人走到车厢交接处，不知说了句什么，突然一个低沉的女声雄壮有力地唱起歌来，歌声把火车减震器的敲击声和树枝打到车厢窗玻璃上的劈啪声都盖住了。茨冈女人唱的是一首久已被人忘却的歌：

> 我看见了你的美貌，
> 犹如白雪皑皑的原野里一朵蓝花……

车厢里寂静无声。沐浴在月光里的森林飞驰而过。长满草木的道路深处弥漫着雾气，白茫茫一片。

大家都在静静地倾听茨冈女人唱歌，根据这一点可以看出，对美的这种感受，以及期盼与美相逢的心情，车厢里是无人不曾领略过的，无论他是什么人——是锯木工还是农庄的饲马员，是身穿粉红色衣裙的小女孩还是久经世面的老人，那位老人的眼神里只有对一切都充满慈爱的表情。

"是啊,"待茨冈女人的歌声一停,饲马员说道,"我有过一个妻子叫塔尼娅,瘦瘦的,像琴弦一样……"

饲马员突然打住不说了,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妻子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敢向饲马员打听塔尼娅的事,连那位带着一袋洋葱的上了年纪的好奇的女人也不敢问。她只是叹了口气,低低地俯下头去,用黑头巾的一角小心地揩了揩眼睛。

深夜,我们在一个叫列特尼基的小站下了车。道路两旁的小白桦林在轻轻作响。一股寒气从沼泽地里吹来。

我们迈着均匀的脚步走了很久,像行军一样。两小时后东方的天空开始呈现出一片明净而微弱的蓝色。远处,在森林上空,朝霞升起来了。而在这朦胧的朝霞里,星星比夜间燃烧得更加耀眼。

每前进一公里便增加一分荒凉感。我们徐徐步入一片辽阔荒僻的多林低地。

天色大亮了,我们在路边坐下来休息。一棵幼小的山杨在我们头顶上方抖动它那柔嫩的浅黄色树叶。树叶轻轻飘落下来,缠进蛛网和长有毒浆果的灌木丛里。

"完全是涅斯捷罗夫[①] 笔下的俄罗斯风光,"我们当中一个人说。

我们习惯于说"列维坦[②] 笔下的地方"和"涅斯捷罗夫笔下的俄罗斯"。这些画家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祖国那种异乎寻常的抒情力量。这些有小溪和赤杨树丛、有苍白的天空和多林山坡的画面,总是伴随着丝丝哀愁,这也许是因为每一次和这些地方相逢,同时就意味着与之别离,不过这丝毫没有什么坏处。我们

---

① 涅斯捷罗夫(1862—1942),俄罗斯油画家。

② 列维坦(1860—1900),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情绪风景画"的创始人。

感到哀愁，是因为我们无法将这清秋稍纵即逝的早晨变成金色的枯叶永久的簌簌喧嚷，变成清凉的湖泊无尽的闪光，变成轻盈的白云如烟雾般无休止的轮舞。

陡峻的沙丘下面展现出一片不知名的河流的滩地。滩地后面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松林，难以通行的森林屏障。林边可以看见一个村庄，一座因年代久远而变黑的木制教堂如幻影般耸立在黑暗中。

河滩上雾气弥漫，宛如一片蓝莹莹的河水。只有一个个草垛在河滩上方露出黑魆魆的尖顶，仿佛一座座小岛。

我们迟迟不动身。谁也不想移步。河对岸的村庄还沉在睡乡中。屋顶没有一缕炊烟升起。既听不见奶牛的哞哞叫声，也听不见公鸡的啼鸣。似乎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沉睡在寂静中的、中了魔法的土地。也许我们的先祖想像中的农民故事里用原木造房的村庄就是这番景象，在那些村庄里，忧伤而美丽的姑娘们年复一年地坐在纺车边，期待着自己心上人的到来。

朝阳缓缓升起，明净如洗，呈现出麦秸般黄澄澄的色彩。村边响起了悠扬的牧笛声。中了魔法的村庄苏醒了。

我们背上背囊，穿过落满露水的平原，向村子里走去。飘来杜香甜甜的气味。牧笛一直在吹，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在村口我们遇见了牧人。他赶着一群牛。每一头牛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铜制的“饶舌者”[1]。

“这就对了！”牧人脱下帽子，行了个礼大声说，“谢谢你们，朋友们，你们把猎枪带上了。狼闹得人没法活了。想想看，每天都有小母牛被吃掉。我们这一带难得有猎人光顾。”

---

① 指铃铛。

“这为什么?”

“因为森林太密,又都是沼泽。到我们这儿来路太难走。我们是最后一个村子。再往下,一百公里之内一个村子也没有了。只有森林。”

“这是什么村?”

“叫法不一样。按新的名称叫格里申诺,老的名称叫厂区。在彼得大帝时代这里曾是一座铁工厂。”

格里申诺原来是个平平常常的村子。所以毫无疑问,像它那样平常的村子,任何一种记述性文字都可能提到。然而它的平凡之中有一种宁静而熟悉的魅力:在窗框的雕饰中,高高的台阶上,栅栏上方荚蒾的浆果里,堆在每家门口的旧原木上,爱争吵的火红色公鸡身上,时而严厉、时而腼腆、时而和蔼的妇女的灰色眼睛里,女主人担着装满的水桶时小心翼翼的步态中,插在炖罐中盛开的枝繁叶茂的天竺葵里,头发晒成大麻色的孩子们中间。

村子尽头,硬硬的白沙地上长满洁净青草的一条小街上,耸立着一间四周开满鲜花的孤零零的农舍。台阶上坐着一只红棕色的猫,它长着一双极其阴沉的绿眼睛,简直叫人不敢多看它一眼。就在篱笆后面有一条淙淙流淌的河,河水呈浓茶色。这就是普拉河。

我望了望农舍,我的心一阵紧缩,——当你看见你向往多年的东西时,常会有这种情形。我曾经向往的是住进这样一间干净的农舍,住进林间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里住很长时间,安安静静地工作。我觉得惟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作品来:从容不迫、深思熟虑、尽心竭力。

我们登上农舍的台阶,敲了敲窗户。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包着白头巾的上了年纪的妇女。

“请进屋吧，”她彬彬有礼地说，既不问我们是什么人，也不问为什么敲她的窗。“我从窗户里看见了你们。我一看，是猎人来了，看得出是莫斯科来的，高高兴兴，受过教育。有人路过，我和阿辽沙总是很高兴。我们这儿难得有人路过。”

堂屋里很干净，也很干燥。不仅窗台上放着花，地上也有，十分鲜艳。在这间温暖而敞亮的农舍里它们大概感到很安适。

“阿辽沙马上就来，他在洗脸，”妇女说，“我有两个孩子。阿辽沙和卡佳。阿辽沙是村苏维埃主席，卡佳在克列佩基郊外的棉花厂工作。说不定你们路过了那里。那里一路上都铺了旧棉花。遇上沼泽地，司机就往车轮下垫旧棉花，好让汽车走起来轻松些。”

我们想起来了，夜间我们确实走过一条奇怪的软绵绵的路。

“这正是棉花啊！”妇女笑了起来，“你们没想到吧……瞧他来了，我的阿辽沙。”

堂屋里进来一个小伙子，他穿着饰有勋章绶带的制服，一条裤腿没塞进靴筒里的绿裤子，黄便鞋。他的举止和整个外貌显示出一种难以捉摸的优雅气质。他打招呼时低下头去，那头发是浅褐色的，泛着铜的光泽，然后他挺直了身子，于是我们看见他那双碧蓝碧蓝的、神色羞怯的眼睛。

这张脸上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在我没有想到阿辽沙和叶赛宁相貌十分相像以前，我似乎觉得我早就见过他，早就认识他了。我把这一点告诉了他。他微微一笑：

“可能的。我和他可是同乡呢：我们两个都是梁赞人。在前线时大家就给我起外号，叫我‘阿辽沙·叶赛宁’。”

“您喜欢叶赛宁的诗吗？”

“不全喜欢。有些东西我喜欢。譬如关于《我们北方朴素的天空上一块灰色印花布》。”

就这样，在僻静的乡间，我和村苏维埃主席阿列克谢[1]·索夫罗诺夫谈起了诗歌。后来又谈到了森林、格里申诺的农庄，谈到了这个地区的一切。

“我们的农庄很富裕，”老太太说，“看见奶牛了吗？它们吃得饱，产奶多。是雅罗斯拉夫尔良种牛[2]。这里的牧场水草丰茂，盛产蜂蜜。我们按劳动组合的形式干活。是阿辽沙建立起来的。制作牛轭、车轮、小桶、蜂箱。是个富饶的地方！光是蘑菇就有多少！这里的蘑菇不用采——可以收割。真的！”

“不错，”阿辽沙说道，“是个非常好的地方。不能白白到这里来。”

“什么？”

“没什么……您自己会看见的。您将来回到莫斯科，会在很长时间里经常梦见这个地方。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可是至今还不习惯。”

“对这样迷人的地方难道会习以为常吗！”阿辽沙的妈妈立刻同意说。

一个穿方格呢裙忙忙叨叨的老太婆，从门廊口急匆匆地走进堂屋，在门口站定，用皱皱巴巴的小拳头迅速擦了一下嘴巴。

“哦天哪！”她用哭腔说道，“上帝把客人送到好心人家里去，可是阿辽沙，我来找你却是为了乏味而不幸的事。”

“出什么事了，纳斯塔西娅奶奶？”

“你最好带上皮带把我的萨恩卡狠狠抽一顿。我管不了他了，我已经过了八十岁啦。而且我这个老太婆去打年轻人也不像话，虽然他是我孙子。”

---

① 阿列克谢是阿辽沙的本名。阿辽沙是爱称。

② 十九世纪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培育的一种乳牛。

"干吗要打他?"阿辽沙笑了笑问。

"什么干吗? 亲爱的,我可是懂法律的,法律不是白制定的。有应当救助老年人这样的法律吗? 有! 而且连歌曲里都唱:'我们这里老年人处处受尊敬。'我亲耳听见过,真的! 可萨恩卡他干什么来着! 天一亮你就得起床,在屋里忙来忙去:又要担水,又要生炉子,又要扫地,又要给鸡喂食,忙这忙那。忙得团团转,上帝保佑! 什么活儿都是我一个人干。他呢,脚一下地,就喝一罐牛奶,我只见他蓬头垢面的样子。然后就往牧场上跑,弄个皮球整天踢来踢去。究竟是谁想出足球这鬼东西的! 从早到晚,把两只鞋掌都踢没了。大家发了疯似的,满地跑个不停,嘴里又喊又吼:进球,进球! 比如说,要是一个人穷得一文钱也没有,还有什么可高兴的! 也不帮帮我这老太婆,光是进球进球!"

"这倒也是,"阿辽沙附和说,"我们的孩子们对足球太着迷了。我们管教管教他们就是啦。"

"前几天把球踢进了屋里,哎哟,可吓人哪! 整个屋子都摇晃了,颤动了,穿堂里公鸡突然怪声怪气叫了起来,猛地飞起,一头撞到了房檐上! 公鸡掉到地上,直翻白眼。我拿水浇它;我那只鸡一时间差点儿死掉。你自己想想看:怎么不吓死人! 就是人也会吓得没命,甭说牲畜了。那么说,你去管教管教?"

"放心吧。"

"那好,谢谢。"

老婆婆深深鞠了一躬,走到了外面,一跨出门坎,就一面急忙往家里走,一面喊了起来:

"萨恩卡! 到这儿来! 我倒要叫你看看踢足球的下场,你这个懒鬼!"

我们嘲笑了一会儿纳斯塔西娅老婆婆的苦恼,就和主人道了别。阿辽沙送我们到普拉河上的木桥边,说我们一定得去

273号护林哨所:那是个绝妙去处。

在普拉河对岸我们登上了一个沙质的慢坡高地,进了森林。森林迎接我们的是湿气弥漫的寂静和山岭上方明亮的蔚蓝色天空。没有风。黄粉蝶在林间空地上空飞舞。

越往里走,森林越显得僻静、肃穆、阴暗。蓦然间悬崖下面现出一条白亮白亮的河流,那是普拉河的旧河床,长满了白百合花和水荞麦。林间道路在河对岸拐了一个大弯,向上伸展开去,拐弯处交错着一道道温暖的光带。

我们的听觉渐渐习惯了这儿的寂静,我们开始分辨出隐约可闻的鹤唳和啄木鸟的敲击声。

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地方,在通往哨所的路附近,有一个深深的舒亚湖。每一个长满黑魆魆无法通行的赤杨树丛的林间高地,我们都当成了这个湖的岸边。然后它突然展现在松林间一座陡峻的小山下面,四周是幼小的山杨和古老的黑赤杨小丛林。

湖泊圆得像一只碗,湖水清澈而平静,映照出这整个湛蓝湛蓝、雾霭氤氲、流水潺潺的白昼及其深邃和清新。每一丛枸骨叶冬青,茉莱几乎透明的白花,长满木贼的树墩,长在青苔间羞涩的勿忘草,把头扎进水下根须间的小鱼群,这一切看起来是那样具有童话色彩,所以我们连说话也压低了声音。仿佛有人把我们放进了一个难以通行的光明地区,在那里可以看见林间的花朵在你眼前开放,露珠从花上徐徐流向接在下面的手掌上,褐色的叶子轻轻摆动,而根部粗壮的牛肝菌则顶着自己小小的棕色厚呢上衣挺直了肩膀,从树叶下面往上钻。

悬在上方的树木的影子投在水面上。树影中的湖水似乎非常深,非常黑。赤杨的落叶浮在这水面上,仿佛初秋随意抛洒的珠宝。秋天刚刚到来,尚处在它短暂生命的初始阶段。

如果能够延缓时间的进程,以便让湖泊上空这宁静的光明

和这美妙的天空恒久地保持蔚蓝，以便能够恒久地注视水面上鸟儿的飞影，注视向天空升腾的依稀可见的光芒，该有多好！

“完美”这个字眼的含义顿时变得明白晓畅。与此同时又开始感到一丝淡淡的惆怅。惆怅什么？惆怅的是不管一个人如何想方设法，他都无力传递这白昼、这水、这草和这极度宁静和魅力，一如他无法言喻此刻产生在他心中的一切感受的魅力。还有一种懊丧之情正在上升，那就是这一切只有你一个人看到，而此时这一切是应当让所有自己所爱、所亲近的人都看到的。当一个人在幸福的时候，他是慷慨的，他努力充当美好事物的引路人。现在我们是幸福的，但我们沉默不语，因为欣喜不能容忍任何声音，任何外在的表露。

湖泊附近的林间空地上有一张用桦树条钉起来的长椅。椅子边，一根杆子上钉着一块牌子：“吸烟处”。下面用铅笔写着：“注意，请爱护这片森林。严禁点火。护林巡查员阿列克谢·热尔托夫。”

长椅四周，不管我们横看竖看，地下只有一个烟头——这条路就是这样人迹罕至。在那些一周里也许只有两三个人经过的地方，对森林还如此关心，这就更加令人感动了。根据地图判断，这条路延伸大约五公里后消失在利涅沃湖后面的密林里。

护林哨所矗立在普拉河静悄悄的河湾上方一座山冈上。哨所屋顶上钉着一块木板，上面白底黑字写着——“273”。在森林上空飞行的飞机根据这个数目字来确定方位。

护林员阿列克谢·热尔托夫，一个饱经风吹日晒的老人，戴着一顶晒退了色的绿制帽，帽圈上有一个护林巡查员的标记——两片铜质的橡树叶，他坐在小屋边的长凳上看报，仿佛没有看见我们五个人正向着哨所徐徐走近。

这是明显的花招。他早就从小窗户看见了我们，故意拿张

报纸来到门口。阿列克谢·热尔托夫(他就是“辽沙大叔”)想用他这副样子表示过路人在这里并不新奇,他作为一个彬彬有礼、见过世面的人,对于我们是什么人、因何而来、去往何处根本不感兴趣。

与辽沙大叔的谈话,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那是一种狡猾的交谈,会叫不够老练的城里人晕头转向。

我们谈到了旱情,谈到了某地的森林起了火——应当认为是在克里乌什那边——谈到了收成,报纸上的新闻,克列佩基的集市,但是对宿夜的事和我们是什么人却只字未提。关于这些应当慢慢来,不能开门见山就问——在这一带地方这是不可破坏的风俗。

我们聊了一会儿,喝了从松树下的泉眼取来的泉水,对泉水称赞了一番,抽了一会儿烟,这时才切入正题:可不可以在辽沙大叔的屋里住几天,他的老伴同不同意给我们做饭?

“干草房大得很,草很多,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向来喜欢有客人来。至于吃喝——这可不关我的事。得问问我那老婆子阿里莎大婶。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同意。家务归她管。请进屋吧,我们进屋来商量。”

阿里莎大婶,一个干瘦矮小的老太婆,长着一张黝黑严厉的面孔,她当然说上帝保佑,怎么能做五个人的饭呢!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自从前年没有让林业局局长满意以来,她突然不称职了。她做了鱼汤,他却说太油了。说不定他嘲笑了她,这件事她至今没有忘记。这对女主人来说是件很叫人委屈的事。烧茶炊自然不在话下。可是要煮一锅粥,天知道怎么煮。看得出来,来的是城里人,舒服惯了,她煮的粥虽然很稠,却平平常常。

对于我们的劝说大婶总是固执地回答:

“反正我不知道怎么办……”

接着她忽然惊慌不安起来：

“你们干吗把背囊和猎枪扔在门口？拿进屋来吧。你坐着干吗？等轻轻松松抽烟吗？”她对老头喊道，“帮忙把东西拿进来。这些人都累了，走了一宿。你只顾说话。他们会在咱们家多住些日子——有你胡扯的时候。”

她开始急急忙忙地擦木板桌。

“我这就把牛奶先端来。想喝什么样的：早上挤的，还是傍晚挤的？我去把茶炊烧上，把鱼也炸上，鱼是老头子今天捕的。待会儿会看见的。”

风俗保持下来了，从这一刻开始，阿里莎大婶忙碌起来，跑进跑出，开始像关心自己亲生孩子那样关心我们。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和兴奋，她反复说：

“天哪，这三年谁也没有来做过客！谢谢你们，想到在我们哨所住上一阵。我的子女也会高兴的！他们完全和人们隔绝了。我自己在这个穷乡僻壤过了一辈子。我的女儿都很出色，又很漂亮！儿子也一样。现在他们在森林里巡查，帮父亲的忙。我们这儿的巡查没完没了：一个人无论如何应付不了。”

我们在哨所住了几天，在舒亚河钓鱼，在奥尔斯湖上打猎，湖里的清水只有几厘米深，水下是无底的黏稠的淤泥。打死的野鸭如果落在水里，无论如何捡不回来。在奥尔斯湖岸行走，得穿护林员穿的宽底滑板，以免陷进泥潭。

不过我们在普拉河上度过的时间最多。在俄罗斯我见过许多风景如画、远离尘嚣的地方，然而大概不会有机会看见比普拉河更加原始和神秘的河流。

河岸上旱地的松树林和百年橡树林，跟茂密的柳树丛、赤杨以及山杨树丛混生在一起。被风吹倒的大松树仿佛一座座铜铸的桥梁，横亘在咖啡色的、但是完全透明的水面上。我们就从这

些松树上垂钓顽强的雅罗鱼。

经河水洗刷和被风吹拂的沙滩上长起了款冬和鲜花。我们始终没有发现这些白色沙地上有一丝人的足迹，有的只是狼、驼鹿和鸟的足迹。

帚石楠和越橘一直长到水边，跟一丛丛鸭子草、粉红色的泽泻以及兵草交混在一起。

河道弯弯曲曲，形成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河湾。那些荒凉的河湾隐没在晒得暖烘烘的昏暗的森林里。水面上方蓝胸佛法僧鸟和蜻蜓一闪一闪地在两岸之间往返飞舞，高空中巨大的鹞鹰在翱翔。

周围的植物已过了花季。每一步都被无数的树叶、草茎、枝条和花冠挡住去路，面对植物界的这种攻击我手足无措，我们停下脚步，猛吸百年古松刺鼻的气味，吸得连肺都痛了。树下面铺着层层干松果，脚陷进里面，一直没到脚踝。

风有时从下游、从多林的空间、从秋空照耀着安详而依然炎热的太阳的地方吹来，掠过河面。想到这条河流流去的地方，几乎二百公里之内除了森林还是森林，没有人烟，心脏便不由得停止了跳动。只在河岸某处有几间蒸馏松香的工人的窝棚，森林里飘来阴燃着的松明甜丝丝的烟味。

然而这一带最奇特的要数空气了。空气是完全纯净的。这种纯净使空气中的一切都具有特殊的清晰度，甚至光泽。在阴暗的针叶中间，每一根干枯的松枝很远就能看见。它仿佛是用生锈的铁锻造而成。从远处就能看出每一根蛛丝，每一个长在高处的绿色松果，每一根草茎。

清洁的空气使四周具有某种不同凡响的力量和原始状态，尤其是清晨，在露湿万物、紫烟笼罩低地的时候。

中午，无论河流还是森林总在闪耀许许多多太阳的光斑：金

色的、蓝色的、绿色的、七色的。一束束光线时暗时明，把丛林变成一个生机盎然、闪烁不定的树叶的世界。眼睛由于观察浓郁而多姿的绿色而得到了休息。

鸟的飞翔划破了这闪闪发光的空气：由于鸟翅的振动，空气发出了声响。

林间的气息似波浪般阵阵袭来。有时难以辨别这些气息。这些气息中混和了所有的味道：那是刺柏、帚石楠、水、越橘、腐朽的树桩、蘑菇、睡莲发出的气味，也许正是天空本身的气味……天空是那样深邃和纯净，使人不由得要相信，似乎这空气的海洋也带来自己的气息——臭氧和从温暖的海岸奔向此地的风的气息。

有时很难表达自己的感受。然而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这种心理感受，也许可以最确切地称作对故乡魅力的景仰之情，这种魅力是任何描写都难以表现的。

屠格涅夫谈到过神奇的俄罗斯语言。但是他没有说到这一点，即语言的魔力产生于这神奇的大自然和人非凡的本性。

人的非凡性既表现在小处，也表现在大处：质朴、清晰、善意。质朴在于劳动，清晰在于思维，善意在于待人。而且不仅在于待人，还在于对待每一只善良的动物，每一棵树木。

辽沙大叔总是忧心忡忡、唉声叹气和期盼下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森林已经非常干燥，千万别因随便哪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而引发火灾。

第三天从早晨开始，森林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雨雾，这时辽沙大叔高兴了，喃喃地说道：

“要下雨啦！下雨有多好！要不森林就像一块火绒：眼看就会烧起来！”

每到晚上，哨所周围便响起驼鹿的哞哞叫声，于是辽沙大叔

伤心起来，因为今年的叫声变弱了，驼鹿的数目在减少，被狼吃掉得太多了。所以他决计派儿子到克列佩基去找当地的猎人，请他们对狼进行围猎。

第一天傍晚，辽沙大叔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从森林里巡查回来了。他们在农舍边的小湖里洗脸时，我们遇见了他们，他们显得腼腆而兴奋。

两个姑娘使劲用白粉擦那本来就晶亮晶亮的牙齿，晚上到正房喝茶的时候穿着瑟瑟作响的节日盛装，脸色黝黑，头发金黄。连下垂的睫毛也掩盖不住炯炯的目光。

大儿子显得拘束，非常客气，和我们谈莫斯科，谈希什科夫[①] 的《乌格留姆河》（他刚看过这本书），谈自己深藏心底、而今已经实现的理想：近日他要去弗拉基米尔林业技校学习。小儿子则沉默不语，脸含微笑，轻轻地拉着手风琴：

> 古老的华尔兹《秋的梦想》
> 手风琴手正在弹唱……

两个姑娘很快便不再局促不安。她们坐在桌子跟前，用手掌支着脸，贪婪地听着我们的谈话，用疑惑而愉快的眼神专注地望着我们。也许在她们看来我们是来自那个极富吸引力的大世界的外乡人，而那个世界她们或迟或早都会去的。

过了一两天才搞清楚，原来辽沙大叔和他的一家并非这个荒僻的地方绝无仅有的居民。

我们沿普拉河向下游走了很远去钓鱼。薄暮时分，从林子里小心翼翼地走出两个赤脚小男孩，来到陡沙岸上。他们怯生生地走近我们说道："你们好！"说完，很快在草地上坐好，以免惊

---

① 希什科夫（1873—1945），俄罗斯作家。

动鱼儿。

“怎么样?”年纪大一点的那个男孩喉咙嘶哑地小声说,“鱼咬钩吗?”

“有点儿咬住了。”

两个孩子彼此望了望,静默了一会儿,然后年纪大点的那个推了推年纪小点的那个的腰部,小的那个回过来也推了推大的那个。两个孩子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又彼此推了推。

“你们从哪儿来?”

“从新村来。”

“从哪个新村?”

“茹科夫斯克村。这个村在森林里。离辽沙大叔四公里。”

“你们新村有几户人家?”

“有两户。”

“你们到哪儿去?”

“就到你们这里呀!”

“怎么到我们这里呢?”

两个孩子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彼此看了一眼,又相互推了一下。

“你说吧,”大的那个用嘶哑的声音说。

“不,你说。你大。我小。”

“怎么会是到我们这里呢?”我又问道。

“给你带信来啦。”

神秘的气氛明显地浓了起来。

“谁来的信?”

“猎人的信。也是莫斯科来的。他住在我们新村。”

大点的那个男孩从怀里掏出一张字条,递给了我。字条上用铅笔写着:

“得知在这荒僻之地来了莫斯科人。非常高兴,非常想请你们今晚到我们这儿喝杯茶。”签的是个陌生的名字。

“你们怎么在这儿找到我们的?”

“顺着脚印。这儿并不远。我们找你们一共跑了大约十公里路。”

“你们干吗坐了半个小时一声不吭?而且也不把信交出来?”

“我们害怕,”年纪大点的那个大胆地说。

说完这句话,两个男孩一下站了起来,向林子里跑去。小的那个边跑边回头看,一路上磕磕绊绊。

傍晚我们去找那个神秘的猎人。我们随身带了一盏“蝙蝠牌”马灯。

潮湿的小道上笼罩着夜雾。一轮寒月升起在密林上空,沿着亘古不变的轨道运行。猫头鹰低低地飞翔。马灯只照得见地面:树根、青草、黑魆魆的水洼。后来前方现出一小团烟雾腾腾的火光,于是我们朝隐没在夜色中的两间农舍走去。农舍附近燃着一个个火堆。

原来新村的居民为了吓退野狼,通宵燃着篝火。

迎接我们的是个上了年纪的干瘦猎人,一个真正的隐士。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农舍里,他请我们喝浓茶,小牛犊一直想从穿堂间钻到屋里来。

猎人原来是泥炭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几年以前为了勘探新的泥炭储藏地,他来这里进行过一项小小的科学考察,从此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所以每年秋季都来这里度假。据猎人说,我们是近年来第一批到这儿来的莫斯科人。他怎么会不邀请我们过来呢!

我们回去时已是夜间。沼泽地里有只鸟在低沉而凄凉地鸣

叫。月亮已向地面低垂。银色的月光透入密林，那里一头驼鹿在哞哞叫，忧伤地呼唤着什么人。

哨所的窗户里还亮着灯：还在等我们。辽沙大叔坐在桌子边，戴一副铁架眼镜正在看厚厚的一九四八年年历。两个姑娘拥抱着，坐在俄罗斯式火炉旁一把长椅上，摇摇晃晃地轻声哼着歌：

送别的时候，
请把花边披巾给我系上。
我和你犹如披巾的两角，
在这些日子相聚首……

我在干草棚里醒来已是深夜。月亮落了。星星透过木板屋顶的缝隙在闪烁。远处，似乎在地角天边，狼在低声嗥叫。钻进暖和的干草里倾听这夜的声音，想像这林地。漆黑的道路，湍急而寒冷的河流，而那河岸上搬运工人睡得正沉，只有篝火的木炭还在夜雾中继续燃烧，这多么令人心旷神怡。

清晨我们去了斯帕斯－克列佩基。这是个宁静而晴朗的日子。林区渐渐远去，隐入柔和的雾霭里，罩上了告别的晨雾。初来的鹤群悠扬婉转地鸣叫着，从我们头顶上空飞过。

1948 年

沈念驹 译

白雪覆盖的平原

雪从傍晚就开始下了，入夜，整个平原都盖上了一层薄雪。

海洋翻起长长的波浪，向沙滩涌去。波浪不知疲倦地喧响不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艾伦对这种喧响早已习惯，不再把它当回事了。相反，四周的寂静使他惊诧。他觉得，这寂静是和雪一起降临在大地上的。

寒冷的雪和反射出烛光的漆黑窗玻璃。也许从海上能看见这烛光，那里波浪使沉重的渔船摇晃不定。渔夫们望着这微弱的灯光，便会想到沸腾的锅和干爽的床铺。

艾伦微微一笑。人类的希望和幻想的永久的自欺和天真！假如这些渔夫能够成功抵岸，穿过平原到他家里来做客，那他们可真是好样的！他们会在这里看见什么呢？一个家徒四壁的房间，一支蜡烛，一张行军床和壁炉里冰凉的炉灰。还有就是他，裹着一条破围巾、冻得瑟瑟发抖、狼狈得连话也说不出来的艾伦。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孤单。就连在炉灰里弄得沙沙作响的老鼠也比他幸福。它是一只灰色的快活老鼠，而他却是一个伟大的、谁也不需要的美国诗人。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那里已经开始了漫长的冬天。

人们喜欢议论幸福。然而没有人懂得最大的幸福就在于理解。他既不希求荣誉，也不希求安逸。他只希望周围的人能理解，他的想像力和能力足以使成千上万的人，而不是两三个人得到欢乐。

他渴望永远奉献。奉献得越多，他就变得越富有。

他可以坐在十字路口的石头上，给一个黑人的孩子讲述自己新的构思。这个构思太像一个童话故事了，以致艾伦在讲述的时候由于出乎意外，自己也笑了。黑孩子也哈哈大笑起来，并用两只小黑手拍着两侧腰部。

他可以在公共马车里对偶然同路的女人讲他对她的爱慕之情，这爱慕之情是刚刚产生的，是突然产生的。这种爱情很快就会结束——在她下车的第一站。然而艾伦知道，这爱情是不会结束的。因为有记忆，它不会让他安宁的。

艾伦非常清晰地想像着这次相遇，似乎他应当立刻坐到桌前，把它写下来。一个年轻女子由于旅途而困惫的面容，海鸥在昏暗的水面上空的尖叫，马儿的响鼻，车轮下沙沙作响的沙子——然后，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周围出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奇异世界。

女子抬起眼睛，露出微笑，于是他发现她脸上局促不安的神情。这个人是谁？是从我们有时暗暗思索但不相信其存在的那个国家来的客人吗？或者是疯子？

为什么太阳冲破一排雨云，海上的泡沫犹如疏松的积雪亮得耀眼？为什么马车夫唱起了那支勾魂摄魄的歌，对爱情却只字不谈？为什么从远处山冈传来林涛的呼啸，而稀疏的雨点沉重地打在驿车篷顶上？为什么彩虹倒扣在平原上空，仿佛边界上的一座拱门？这嘈杂的嗡嗡声是怎么回事？莫非是金龟子从窗外飞过？为什么她的一只手在发抖，而嘴却竭力想说："您是什么人？不该对我说这个。"

他知道她是对的，知道是他破坏了长年来所过的不可动摇的生活，从今以后她那糊着条纹墙纸的房间、丈夫的声音、咖啡磨的嗡隆声和品行端正的客人——所有这一切将会使人觉得死

气沉沉和枯燥之味，就像充满了难以胜任的操心事的寻常日子。

“别人可能会责怪我偏爱女人和孩子，”艾伦思忖道。

那好吧。让我们回想一下别的事。莫里斯顿的医院里，伐木工躺在相邻的病床上，快要死了。老头被一棵松树压倒了，他只有死了。

当然，他只有死了。但是夜里，在死前两小时，他睁开了眼，问艾伦：

“老弟！哎，老弟！您知道什么是森林吗？”

“知道，”艾伦想了想答道，“它大概和海洋一样，如果从孤零零的顶端去看的话。它喧闹，晃动，太阳落进叶丛里，就像落进黑暗的深渊。如果鸟儿在头顶上停下来，连叫五声，那就是说，这里某个地方，五码[①] 之内藏有古代宝物。很容易找到，于是一只铁皮箱子从沙子里拖出来了。可以把它打破，在那里找到——不，不是金币！——而是为您女儿准备的婚纱。她好像叫卡曼吧？”

“对，”伐木工说，“她是叫卡曼。”

“您有没有单独碰上过熊？”艾伦问。

“那还用说！”伐木工说，“它用它那绿眼睛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我们彼此眨了眨眼，便各自走开了。我们都是森林居民，犯不着惹事儿。而卡曼，”伐木工突然补充说，“才十九岁。我给她写了信，说我很快就会康复。”

用什么能够安慰他呢？只能用假话。

“您知道，”艾伦说，“您只要闭上眼睛，深深地吸口气，在心里呼唤卡曼的名字，一切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试试看！来！风往往到傍晚才停，太阳在您的小屋上空照耀着松林。您尽情

① 英美长度单位，1 码等于 0.9144 米。

地望着天空，但是您看见的仅仅是一朵白云，它是那样小，仿佛松鸦身上掉下来的一片羽毛。再也没有别的了。我知道您想等到天黑定了，星星开始闪烁的那个时刻。这就是说，该吃晚饭了。晚饭当然已经做好——卡曼把盆子碰得丁当响。低声唱着歌儿。哎，见鬼！我把歌词忘了。”

“啊，”伐木工猜到了，“唱的大概是关于一只乞讨的小熊崽，它死缠着小姑娘乞讨？”

“对，对！正是这首歌。我想起来了。我来唱，不过得小声唱，以免助理护士听见。她们认为所有给我们带来欢乐的东西都是有害的。”

他开始低声唱起来：

冬冬！——把门敲响的是
一只湿淋淋的野兽——
饥肠辘辘的小熊。
“请原谅我，——
我能不能向卡曼
借点儿小钱用？”

伐木工听着这首歌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生命在他体内静息下来，仿佛遥远的丁冬声。

伐木工被安葬在离医院不远的墓地。上了绊索的马匹在绿油油的坟茔间放牧。

艾伦自告奋勇，在木十字架上题写了墓志铭。他写道：

在此安息的是托马斯·比尔，伐木工，六十三岁。他是被倒下的松树砸死的。他一生勤劳，所以他是个高尚的人。愿上帝在天堂赐给他安宁。

艾伦正在康复，这是他住院的最后几天了。他常去比尔的

墓地。他喜欢思索：在这个还没有长出青草的坟丘下边，躺着一个本来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的人。

他们大概会交上朋友的，因为用不着对伐木工解释与艾伦的生存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生活中的种种麻烦。艾伦会在和他交谈怎样开锯路和招来鸟儿时就得到休息的。

出院之前，艾伦给伐木工的女儿写了封信，告诉她父亲临终的情况。接着他便没有了踪影，似乎担心卡曼会赶来，在莫里斯顿碰上他。

艾伦走到窗前。海洋波涛汹涌，震荡着海岸。

"再也不会有了！"艾伦说道，冷得缩紧了身子，"再也不会有了！"他又说了一遍。

过去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他对此感到惋惜。如果撇开贫困、痛苦和他与人们交往时每每产生混乱的那些岁月，那么还是有一些像这落雪一样温馨、安宁的日子的。

佛吉尼娅死了。人们叫她"圣三一花"。这个州有一种清香的花就叫这个名字，每年春季开花。

他对她的死感到愧疚。他没有能力去挣几十个美元来请医生，给这间破旧的小屋生火，为佛吉尼娅创造一种哪怕是相似的安宁。他只能幻想。这是他生活中惟一的事情。

他还能做什么呢？当她发高烧躺在草垫上的时候，他惟一能做的就是给她盖上自己那件破大衣，然后转过身去饮泣吞声。即使在他们家住熟了的那只野猫也比艾伦知道应该做什么。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夜，它一直卧在她怀里，用自己的体温使她感到温暖。

那时，冬天也是这样，大海也和现在一样汹涌喧响——它顾不上佛吉尼娅的病痛。千百年来，它把山一样的绿色海浪推向

大地。这是多么宏伟的事业，以致在它面前人的不幸看上去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西，犹如簌簌作响的一颗沙粒。

“真的再也不会有了吗？”艾伦问道，把脸转向黑暗的房间。

他和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一起生活了多久呀！它们又是多么顺从地和他一起负荷着生活的重担！佛吉尼娅在世时它们就在这里了。她触摸过这些东西。可以和它们轻声交谈，不过反正你是听不到它们一个字的回应的。

“为什么你们还在，而她却不在了？”艾伦大声问。

东西沉默不语。

“好了，没什么，”艾伦说道，“别生气。我永远不会抛弃你们。”

东西没有回答。

“我的天！”艾伦说，“这一夜可怎么熬过去啊！”

他坐到桌前写了起来。这使他稍稍感到一点慰藉，虽然他知道他的每一篇新作都会引起恶意的、最好情况下也是相当大的误解。在美国，人们对他就像对待外星人一样。

这个穷困的诗人竟敢用他那尖刻和华丽的语言破坏端正的品行和不可改变的观念，把一个清醒的世界变为供人嘲笑的丑八怪！他竟敢把自己的臆想冒充为某种像交易所、星条旗、教堂和事务所一样确实存在的东西！

除了短暂虚假的欢愉和漫长而折磨人的内心痛苦，这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为什么要毒害心灵和侈谈那些美丽的虚无？为了换取多余的眼泪？为了让人失望？为了什么？

“不对！”艾伦心里说道，“我是个快乐而随和的人。请你们不要愁眉苦脸！对着我笑起来吧！我想给你们增添一点幸福。可你们却像躲避毒药一样急急忙忙躲避它。笨蛋！”

“我深信，”艾伦写道，“人能创造奇迹。如果我没有机会证明这一点，那么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一定会出现另一个人，他会比我更好地证明这一点。我根本不想说（千万别这样说），只有我才能创造某种奇迹。然而我毕竟发现人们乐意相信我为他们杜撰的故事，而且马上就彼此传扬开了。于是人们产生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我所杜撰的、从来就不曾有过的那些东西是确实存在的。难道这不是奇迹吗？

“我们知道，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而海军上将纳尔逊[①] 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阵亡。然而我们同样确切地知道，哈姆莱特王子实有其人，而麦克白夫人无法洗去自己手上的血迹……”

有人猛烈地敲墙，大概是用拳头敲的。艾伦用胡乱扔在桌上写着一行歪歪斜斜数字的发黄的纸盖住了写满字的纸，起身走到前厅。风吹进打碎的窗户，听得见门外有一匹马不耐烦地用蹄子刨着冻硬的地面，打着响鼻。

艾伦没有呼应夜间来客，径自打开了门。

“啊！”他说，“是格里戈利医生！您怎么下决心在这样的夜晚来这里？”

格里戈利弯着腰走进前厅，脱下帽子，抖掉上面的雪花。这个人身材瘦削，个子高大，面颊呈红褐色。他眯起本来就很小的眼睛，微微一笑，向艾伦伸过手去。

“这是我的责任，”他用有点嘶哑的声音答道，“我刚才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地方，在弗里德那儿。他得水肿病快要死了。

---

①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统帅。

在西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见到您了。我决定顺路来一趟，看看您是否非常健康，艾伦。"

他们走进房内。

"可惜……"艾伦自言自语地说，望了望漆黑冰冷的壁炉。

"不必费心，"格里戈利说，"只要口袋里常有这玩意儿就行……找两只杯子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瓶威士忌，放到桌子上。

起先他们默默不语、慢条斯理地喝了一杯。海洋咆哮得更加猛烈，完全发狂了。烛光在帕拉斯[1] 女神大理石的脸上颤动——女神的半身像放在一只旧橱里。

"您这里净是灰尘，"格里戈利终于说道，"灰尘和寒冷！"

他回过头去看着帕拉斯。

"把这个女人头，这个胜利女神砸掉！"

"为什么？"

"她既没有给您带来胜利，甚至也没有带来成功。"

"怎么知道，"艾伦克制地说。

"什么怎么知道！"格里戈利大声说。"您的命运明摆着，就像这个酒杯。您想把自己当成什么人就当成什么人吧。天堂的使者，或者地狱的使者。我反正都一样。您还能臆想出什么来，艾伦？许多东西？好极了！可是为此您会得到什么呢？灰尘和寒冷？或者就像那边壁炉里老鼠吱吱的叫声？"

艾伦凝目看了看格里戈利。医生喝得很少，却已经醉了，并且跟往常一样开始找茬儿。艾伦笑了笑。

"您为自己的想像而自豪，"格里戈利气呼呼地说，"可是您从中连一个子儿也榨不出来。您不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您就

---

① 帕拉斯，雅典娜的别名之一，希腊神话中司智慧和胜利的女神。

像我这样夜间出去走一走看。冒着这样的大雪,骑着一匹老马。为了什么?为了得到乞丐和游手好闲者的感激?从这种感激里同样榨不出一个钱,就像从您的诗歌里榨不出钱一样。"

"我非常专心地在听您说呢。"

医生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

"我真该死,不过我应当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我曾请求到泰勒将军的军队里去当军医。我喜欢这场墨西哥战争[①]。人们在那里大发不义之财。"

"美国充斥着无赖和探险家,"艾伦委婉地说。

"淘金者,"格里戈利纠正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犯不着做老实人,艾伦。"

格里戈利盯着艾伦看了一会儿。

"我好像是喝了点儿酒。不错!那又怎么样呢,艾伦?您能从您的幻想中抖出哪怕一个美元吗?除了这一点,您的脑袋到底值几个钱?"

"接着说下去!"

"噹!"医生大声说,"为这颗脑袋我连自己那把破伞也不愿给。"

"我不想听任何酒后胡言,"艾伦平静地说,"您妨碍我了。"

"反正您无法选择谈话的对象,"格里戈利低声喃喃地说,"我妨碍什么了?妨碍发明点金石?还是长命水?"

艾伦气得眼睛都发黑了。

"好!"他大声说,"既然您嘲弄想像……您看见撕下来的这张写着数字的纸了吗?"

"这是小铺老板的账单,"格里戈利说道,给自己斟了点威士

① 指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发生的战争(1846—1848)。

忌,“看见了。我们看看,处在您现在这样的境地,您还能杜撰出什么来。”

“这不是小铺老板的账单。您是个脑筋迟钝的人,格里戈利。尤其是在您喝醉酒和讲粗话的时候。这页纸是我在一部对开本的古书里发现的。在描述庞赛·德·莱昂[①] 海军上将发现佛罗里达那部分找到的。这本书是我在西点从一个黑人那儿买到的。它有点胡椒和陈年旧物的气味。”

“就是黑人的气味,”格里戈利回答说。

“这张纸贴在两张书页之间。根据墨水、纸和笔迹判断,它大约有两百年了。这是一份秘密记录。您能弄清它是什么吗?”

“我连想都没想过!”

“干这种事,您的脑袋瓜根本不灵,”艾伦笑了笑,客气地解释说,“需要找到关键。我找到了,并把这份记录复原了。花了好几个小时。”

“啊—啊,”格里戈利不以为然地拖长声音说,“那里有什么特别的吗?”

“您在学校里学过征服美洲的历史。您当然知道私掠船和海盗。其中有一个人叫布莱克。他是英国人,但为西班牙国王效劳。”

“谢谢您的最新消息!”格里戈利轻声喃喃说,“布莱克!他是这片土地上最有钱的下流坯。”

“临死前,布莱克把自己的财宝埋起来了。没有人知道埋在什么地方。人们寻找了一百年,而且……”

“找到了吗?”格里戈利问。

---

① 庞赛·德·莱昂(约1460—1521),西班牙人,征服者。一五〇八年发现波多黎各。一五一三年发现佛罗里达海岸,曾对印第安人进行灭绝性战争。

"没有。不过现在就是找到了也没有任何价值了。"

格里戈利绝望地挥了一下手。

"哦,艾伦,这是古老的童话!是讲给躺在壁炉边的瘫痪老奶奶听的。"

"记下来!"艾伦正色说道,我要把这个陈旧的记录破译出来,我口述,您笔录。现在我念这些数字就像您开药方那样轻松。但是我至今一直没有时间把这份数字记录用文字表达出来。"

"真有趣!"格里戈利低声含糊地说,拿起笔猛地推开艾伦的手稿,做好了写的准备。

"写吧!'我,真正鼎鼎大名的布莱克,遗嘱能够读懂我这份临终记录的人不得将它用来为害于人,而要造福于人。我要他在至高无上的上帝神位前发誓。如果他找到我在历次海战中积聚的宝物——愿上帝饶恕我使无辜的人流血!——那么他就能获取其中的百分之一,其余的要给予他在附近遇见的第一个女孩,条件是这个女孩身上除了一件破连衣裙外,什么也没有穿。

"'如果不执行我的命令,那么在死者复活日,我要从坟墓里站起来,用人的智慧所能想出来的最可怕的审判来清算这个骗子。

"'埋藏的宝物在布伦瑞克堡南方的杰凯尔岛上,如果从岛的北端,从伊格拉角出发,则在第三座小山的下面。找到小山的中部后,要向西南量一百一十七步,到一个地方,那里,在一堆乱石中有一块黑色拉长石的碎片。从这块碎石再数三十步到二百四十一度角,这时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这些宝物足以使全人类震惊。就是我大仁至圣的国王所拥有的还不及这些宝物的三分之一,虽然在他统治的地方太阳从不落山,任何风暴吹不到中途便已停息。'"

“都写下来了吗?”艾伦待他写完最后一个字问道。

“写下来了。一个有趣的笑话。”

“谢谢您,”艾伦从医生手下边拿过格里戈利写满字的纸,不经心地夹进了那对开本书里,“现在您相信想像的力量了吧?”

格里戈利缓缓地看了艾伦一眼,向古书丢了个眼色,用两只红肿的手拍了一下膝盖,哈哈大笑起来。

“您太会愚弄头脑了,”他温厚地直言道,“您为什么至今没有把这宝物挖出来呢,艾伦? 啊? 没有时间? 还是因为您的富有,您不需要这宝物呢?”

艾伦没有回答。

“好啦!”格里戈利心平气和地说,“够啦。把这些儿童式的妄想搁一边去吧。我现在操心的是另外的事。您怎么样?”

“失眠,”艾伦回答说,“这是最难受的。我想把整夜在我脑子里盘旋的思想记下来。可这时那些思想却中断了。”

“身体虚弱?”格里戈利问。

“是的,身体虚弱。”

“神经像琴弦一样用力绷着,”格里戈利说,“可是它们的强度却不比蜘蛛网大。”

他沉思起来。

“我拿您怎么办? 我坦白地告诉您——您应当住院。”

“又要住院!”艾伦忧郁地大声说,“不! 无论如何也不去!”

“哦,天哪!”格里戈利叹了口气,“还是不肯! 我可以给您开些治失眠的药粉。但是这救不了您。”

“什么也救不了我。”

格里戈利严厉地看了看艾伦,从坎肩口袋里掏出几个纸包,在纸包间翻了一阵,拿起一包递给了艾伦。

“现在就吃。天亮前就能睡着。可以就着威士忌吃。这样

效果更好。"

艾伦将松散的白粉撒入盛着威士忌的酒杯里，一口喝了下去。

"夜快过去了，"格里戈利说。"为了观察您的健康状况，我可以在您这里坐到天亮。可是等您睡着了，我离开了，谁来关门呢？"

"我现在就可以把门关上。"

"您总是非常殷勤的。"

格里戈利站了起来，由于动作过猛，带起的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夜色顿时暗淡下来，于是艾伦看见了窗外映照在好像是月亮寒冷反光的光亮中的海洋泡沫飞溅的远方和窗前一棵乌木。

"您怎么办呢？"格里戈利恶狠狠地说道，"您关不关门？我劝您点上蜡烛。"

格里戈利走到前厅，黑暗中，他碰到了椅子上。他来到外面，解开了马，拍了拍马脖子，然后大声说：

"晚安，艾伦！"

艾伦没有应答。当敞开的门外已经听得见渐渐远去的马蹄声时，他来到前厅。马在奔驰。

"山谷里传来马蹄清晰的嘚嘚声！"艾伦说道，竭力使每一个词的重音与马蹄的嘚嘚声相合。于是他又说了一遍："山谷里传来马蹄清晰的嘚嘚声！"

他回到房间、点上蜡烛，拿起对开本书，在桌子上方把它翻过来抖了抖。接着把它挨页翻了一遍。格里戈利作的记录不见了。艾伦笑了起来：

"我战胜了。连这只干鞋掌也被我战胜了。现在让他把整个杰凯尔岛挖个遍吧。那里有的是沙子，够挖一千年。"

艾伦拿起有数字的纸。这是一页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一家小铺子里曾用这张纸给艾伦包过奶酪——纸上还留着一个个油渍。

"可怜的孩子！他怎么也不会解二元方程。"

海洋上空突然响起了遥远的炮声。闪现出一道火红的亮光。

艾伦熄灭了蜡烛，仔细望着黑暗处。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一道急速的亮光把波涛染成了黯淡的铜色，出现了一艘装有四十门大炮的军舰。它正在全速前进，开着火。它的桅杆上挂着一面黑旗，上面画着一只白色的人手。

布莱克！他在追踪什么人？烟雾遮住了海浪。是的，这当然是布莱克，上个世纪的来客。

可是为什么他从海岸那边朝艾伦的屋子走来，深一脚浅一脚陷进沙子里？为什么风吹动着他那无袖上衣的花边翻口？大鼻子的、脸部有烧伤的布莱克。强盗和想出在旗帜上画一只人手的爱开玩笑者。

"我会很容易和他说通的，"艾伦说道，闭上眼睛，把头枕在桌子上。

天气变得又黑又闷，但是艾伦仍然看见，在这样的黑暗中，平原上到处紫罗兰都开花了。花朵发出轻细的声音，仿佛每一朵花里都安了一根小小的琴弦。

"是啊，这是梦，"艾伦如释重负地想道，"多么甜蜜的毒剂呀！要想活下去，却又没有力量来抵抗它。佛吉尼娅，你的圣三一花已经开了。把手伸给我！就是这样。为什么它冰冷冰冷的，我怎么听不出你的声音？我知道你的每一根手指，因为我曾经依次给它们讲过故事。这是什么深渊，要把我引向哪里，引向马尔斯特列姆吗？

"帮帮我！让我睁开眼睛，佛吉尼娅！"

清晨一个胆怯清瘦的少女——卡曼·比尔——走到艾伦的屋子跟前。

风停了，但是天阴沉沉的。海洋上空时而微微闪现出蓝色。

卡曼敲了敲门，但没有人回答。她发现门没有上锁，便轻轻走进屋里。

一个个头不高的清癯的人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头枕在打开的对开本书上。

"艾伦先生！"卡曼呼唤了一声。

那人没有回答。

这时卡曼的心怦怦跳着走到艾伦身边，扳起他的脑袋。他死了。

卡曼吃力地将他安顿在行军床上。

艾伦脖子上戴着一个挂在小链子上的小巧的圆形颈饰。卡曼把它打开了。那里有一张美丽非凡的年轻女子的肖像。旁边有艾伦的亲笔题字：我的母亲。

卡曼俯下头去，小心地用双手捧住艾伦的脑袋，温柔地将它捧紧，吻了吻他的双唇。

艾伦的面容非常漂亮。他似乎从来就没有像现在那么值得爱。

艾伦被安葬在海洋附近的一个沙丘上。他的墓上盖着一块石板，上面有他的名字和一行题词：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四十岁。

他死后一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的夜晚，医生格里戈利骑着一匹老马驰近墓地。他跳下马，环顾了一下四周，走到墓前，快速地从雨衣里掏出一把重锤，用尽全力向墓盖石砸去。石

板碎成了几块。

马受了打击声的惊吓，跳了开去，沿着海岸狂奔起来。格里戈利默默地跟在后面追赶，但他迟延了一下，以便把锤子扔进海洋。后来，马和格里戈利都消失了。

春天，墓盖石的裂缝里钻出了圣三一花的幼芽，不久，整个墓盖石上都是这些清香的花朵。

1949 年

沈念驹 译

野 蔷 薇

夜间河面上下了雾。轮船无法继续行驶了:雾中既看不见水路标,也看不见转弯处的灯火。

轮船紧靠着陡峭的河岸,停息下来。只有搭到岸上的跳板在均匀地吱吱作响。水手们沿着跳板拉开缆绳,将它紧紧系在一棵老爆竹柳上。

玛莎·克利莫娃半夜醒来。四周静悄悄的,以致听得见远处船舱里一位旅客的鼾声。

玛莎在铺位上坐起来。敞开的舷窗里透进一股新鲜空气和柳叶甜甜的清香。

雾茫茫的灌木丛低低地垂挂到甲板上。玛莎觉得,轮船好像莫名其妙地停在陆地上,停在密密的灌木丛里。接着她听见河水轻轻的汩汩声,估计轮船已经泊岸了。

灌木丛里不知什么啁啾叫了一声就不响了。接着又啁啾叫了一声。又复归寂静。仿佛有人啁啾叫了一声,侧耳谛听,想用声音来试探这寂静和夜的反应。不久这啁啾声变为悠扬婉转的啼鸣,一声短促的尖叫便戛然中止了。顿时有数十只鸟的鸣叫声对这尖叫作出呼应,蓦然间夜莺清脆的啼啭响彻了灌木林。

"听见吗,叶戈罗夫?"上面有人问,大概在指挥台上。

"即使在谢克斯纳也没有听见过夜莺这样的鸣叫,"下面有人用略为沙哑的声音回答。

玛莎微微一笑,向前伸出双臂。在朦胧的夜色里,这双手臂

看上去黝黑黝黑的——只有手指的指甲呈现出白色。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忧郁呢?”玛莎轻声问道,“我在期待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期待什么。”

她想起了奶奶常说的话,说世界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少女的愁绪,于是说道:

“蠢话!什么少女的愁绪!只不过我要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因此感到有点可怕。”

玛莎不久前刚从林学院毕业,现在从列宁格勒乘船到下伏尔加去工作——种植集体农庄的林地。

玛莎认为自己不过有点惶惑不安,其实是自我解嘲。她真的感到害怕。她设想上级领导来到了林区——一定是个满身尘土、脸色阴沉的人,穿一件口袋鼓得下垂的黑短上衣,一双粘满泥巴的靴子——望着她,望着她的双眼(“完全像两只锡盘子,”她想着自己的眼睛),望着她的发辫,想道:“漂亮极了!这些梳小辫儿的姑娘我们还不够吗!说不定还一个劲儿地背教科书呢。我们可顾不上教科书!就像突然刮起了‘热风’似的,亲爱的,你那些教科书在这里帮不了你什么忙。”

在长长的旅途中,玛莎已习惯了对穿黑短上衣脸色阴沉的上级的想像,不再怕他了。但是心中的愁绪仍然没有消除。

玛莎不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愁绪,而是一种感受,这种感受也许还没有确切的定义,——面对未卜的前程,面对大地质朴的美景及其河流、雾霭、深夜和岸边沙沙作响的白柳,心里感到很紧张。

没有一点睡意。玛莎穿上衣服,来到甲板上。一切——栏杆、铁丝舷栏和柳条椅都被露水打湿了。

前甲板上传来压低了声音的对话。

“我对他说,”一个年轻的水手说道,“‘爷爷,爷爷啊,别扔,

让我抽一口。'他把烟头给了我。我吸了一口,问他:'爷爷,你半夜三更在草地里干什么?'他说:'我在守候朝霞。'他自己也笑了。'也许在我有生之年这是最后的朝霞了。这个你理解不了。你还年轻。'"

两个水手静默不语了。树丛里重又响起夜莺的啼啭。

玛莎两肘支在栏杆上。远处的夜色里响起和谐的鸡鸣,——显然,雾那边有一座村庄。

"这是第几遍鸡叫?头遍还是二遍?……"

玛莎心想,她不知道什么时候鸡叫头遍,什么时候鸡叫二遍。这一点她在书本里读到过几十次了,可还是不知道。

劝玛莎乘船走的是奶奶,她是河运船船长的遗孀。玛莎为自己听从了她的劝告而高兴。起先轮船在蓝黑色的涅瓦河航行,然后越过拉多加湖。玛莎第一次见到灰色的湖水和低低的岬角上石砌的灯塔。见到了汹涌的斯维里河,马林斯基运河上的船闸,长满木贼的河岸,码头上老是那样聚精会神地用弯钓竿钓欧鲌的小男孩。

同路人不断变换,但玛莎觉得他们都很有趣。在别洛焦尔斯克,一个年纪轻轻却两鬓斑白的飞行员登上船来。他大概是在别洛焦尔斯克,在他妈妈——一个瘦瘦的老太太,穿一件灰色花布连衣裙——那儿休假的。她在码头上替儿子送行时悄悄流着泪,飞行员则从甲板上对她说:

"妈妈,你别忘记:我钓的那条鱼挂在地窖里、梯子后面。你给瓦西卡送一条河鲈。"

"我不会忘的,帕沙,决不会忘,"老太太一面用卷成一团的手帕擦眼睛,一面点头说。

飞行员微笑着,开着玩笑,目不转睛地望着老太太。他的面颊在颤动。

后来又有一批演员登船。他们叽里呱啦闹个不停，说着俏皮话，很快就跟全体乘客熟悉了。此时娱乐厅里因河上的雾气而受潮的钢琴一直有人弹奏，几乎没有停过。

一个上了年纪的、尖下巴的、动作敏捷的演员唱得比谁都多。玛莎惊讶地听他唱的歌——这样的歌她至今连一首也不知道。这个演员唱得最多的是一首关于一个堕入爱河的小偷的波兰歌曲。他想从黑夜的天空偷来星星送给心爱的姑娘，却没有偷成，为此姑娘把他赶了出去。

这个演员每次唱完这首歌，总要大声拍打钢琴的琴盖，说：

"这首歌的寓意是明确的。对热恋中的人们宽容些吧。不要反对！我的话完了。"

他整了整自己打成花结的黑领带，在小桌边坐下，叫了啤酒和里海拟鲤。

在切列波韦茨，船上出现了几个建筑学院的学生。他们从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回莫斯科。他们是到修道院来实习的——丈量和写生古建筑。

一路上学生们都在争论石雕、拱顶、安德烈·鲁布廖夫[①] 和莫斯科的高楼大厦。

轮船上出现了大学生以后，上了年纪的演员不知为什么安静了下来，不再唱那支关于小偷的歌了，而且一直坐在甲板上阅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涯》。他看书时戴着眼镜。因此他的面容变得慈祥而衰老了。这时玛莎明白了，演员们所有华丽动听的词句，不过是一种陈腐的习惯，这个人要比他想给人们的印象好得多。

这时全体乘客无论是飞行员、演员还是大学生都睡了。只

---

① 鲁布廖夫(约 1360/70— 约 1430)，俄国画家，莫斯科画派的著名大师。

有玛莎一个人站在甲板上，倾听夜的声音，努力将它们一一解读。

天空传来遥远的轰鸣声，接着慢慢静息下来。想必是夜雾之上飞过一架夜航飞机。岸下边有条鱼拍打了一下，然后远方某处响起了牧笛声。牧笛声是那样遥远，以致一开始玛莎弄不清这悠扬而悦耳的声音究竟是什么。

有人在玛莎背后划了一根火柴。她回过头去。背后站着飞行员，他点起了烟卷儿。他把燃烧的火柴扔到水中。火柴透过夜雾徐徐落下来。火柴的火苗周围形成一团彩色水气。

"夜莺不让人睡觉，"飞行员说，玛莎虽然没看见，但猜得出黑暗中的他在微笑，"就如歌词里说的：'夜莺，夜莺，别去打搅士兵，让士兵们稍稍睡会儿觉……'"

"我可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夜莺，"玛莎说。

"到苏联各地走走吧，否则您还得再去打听，"飞行员回答说，"这样的国家就是做梦也不是总能见到的。"

"这是因为您在天上飞，"玛莎说，"大地总在您的翅膀下面变化。"

"我不这么想，"飞行员答道，接着好久没有再说话，"天亮了，"他终于说道，"东方已经开始变蓝……您去哪儿？"

"去卡梅申。"

"伏尔加河上是有这么一座小城。炎热、西瓜、西红柿……"

"那么您去哪儿？"

"我还得往前。"

飞行员把双肘支在栏杆上，看曙色渐渐变亮。牧笛声已经近了些。起风了。雾开始移动。它在河上被一团团地吹走。开始看得出湿漉漉的灌木丛和灌木丛中间一个柳条编的窝棚，窝棚边一只炉子冒着烟。

玛莎也在观望曙光。金光闪闪的天边闪烁着最后一颗星星,仿佛一滴银水。

"从今天起,"玛莎思忖道,"我要完全按另一种方式生活。以往我什么也没有好好注意。现在我要注意所有东西,把它记住并珍藏在心里。"

飞行员转过脸向着玛莎。

"姑娘想得出神了,"他喃喃自语说,一面又把脸转过去,但是马上又看了她一眼。

他想起很久以前读过的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说世界上没有比清晨的孩子和少女的眼睛更美的事物了——他们的眼中还是沉沉黑夜,同时却已亮起清晨的曙光。

"也许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一句蠢话,"飞行员想。

穿防水布雨衣、皮肤被风吹得粗糙的大副从指挥桥楼上跑下来。

"没睡觉?"他乐呵呵地叫住玛莎说,"过一小时才开船。可以到岸上去逛逛。"

"我大概会去,"玛莎对飞行员说,"顺便采些花。"

"那好哇,"飞行员表示赞同,"走吧。"

他们沿摇摇晃晃的跳板上了岸。窝棚里钻出一个老头,说不定就是那个在夜间守候朝霞的老人。顿时,晨雾的上方升起了一轮太阳。

周围长着深绿色的野草,宛如一片静止的深水。草丛里依然发出夜间凛冽的寒气。

"你在这里做什么,大爷?"飞行员问老头。

"我是编筐工匠,"老头答道,一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慢慢儿编。编笼式张网,集体农庄装土豆用的筐子,小篮子……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对草地有兴趣?"

"只是想看看。"

"你们可真快!"老头笑了起来,"我在这里,在这片草地上住了七十年了,就是这样也来不及瞧个够。你们就沿这条小路走到那棵黑杨那里。不要再往前走了。前面的草高过头顶——露水会把你们浇湿,一整天都干不了。那儿的露水可以用陶罐收集起来喝。"

"你喝过吗?"飞行员问。

"怎么没喝过!是治病的好东西呢。"

玛莎和飞行员沿小路缓步而行。玛莎走了几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小路绕一棵黑杨拐了过去,她便停住了脚步。

小路两旁野蔷薇长得像两堵陡直的高墙,开的花简直像鲜红而滋润的火焰,连落到树叶上的晨光和花朵也显得寒冷而暗淡了。野蔷薇花似乎永远从带刺的枝叶间分离出来,悬挂在空中,犹如明亮的小火。背上有金色花纹的黑熊蜂在野蔷薇丛里操劳地嗡嗡叫着。

"荣膺乔治十字勋章的勇士,"飞行员说。

确实,熊蜂酷似乔治勋章的短带子。而且它们表现得英勇无畏,不把人放在眼里,甚至还对他们发怒。

野蔷薇丛到一个地方中止了,空地上盛开着翠雀花,蓝蓝的,几乎蓝得发黑,宛如一支支匀称的蜡烛。翠雀花后面是各种各样野草,长得非常稠密,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光波:红色和白色三叶草,猪殃草,雪白的滨菊,野锦葵,它的花瓣在阳光下呈现出透明的玫瑰色,还有数百种其他花草,它们的名称无论玛莎还是飞行员都叫不出来。

鹌鹑啪的一声从脚下飞走了。长脚秧鸡藏在横倒在地上的大树下,吱吱叫着,似乎在嘲笑一切人。黄莺颤动着飞向高空,然而它们的鸣声不知为什么和它们在空中飞翔的地方并不吻

合，那声音仿佛是从河边传来的。那里轮船呼哧呼哧地“咳”了一阵，开始鸣笛，呼唤玛莎和飞行员往回走。

“这是怎么搞的?”玛莎心慌意乱地望着花朵说，“这是怎么搞的? ……”

她急急忙忙用双手摘了很多花。轮船第二次鸣响了汽笛，已经响得很急、很猛烈了。

“究竟是怎么搞的!”玛莎懊丧地说着向那个地方转过身去，那里，在树丛的上方，轮船的烟囱里有一股浓烟冉冉升起，她喊道:“马上就到! 我们来了!”

他们快步向轮船走去。玛莎的连衣裙已经湿透，拍打着她的双腿。原先在脑后盘成发髻的辫子散开了，垂了下来。飞行员走在后面。他一边走一边用刀子割了几支开着花的野蔷薇枝。

为了撤跳板而等候他们的水手们瞥了一眼大捧的花，说道:

“原来为这个! 整个草地都被摘光了。好了，谢苗，撤，同时!”

大副在指挥桥楼上说道:

“把花送到娱乐厅去。给全体乘客! ……”然后对着话筒喊道:“最低速，前进!”

轮子沉重地转起来，外轮的叶片在水里搅起一片泡沫，河岸离开了，灌木丛发出沙沙声。

玛莎开始对告别这河岸，这草地、窝棚和编筐工匠大爷感到惋惜。这里的一切似乎一下子对她都变得亲切了，她仿佛就在这儿长大似的，而那位大爷就是抚养她、教育她的人。

“真奇怪，”玛莎在沿着梯子向娱乐厅攀登的时候想道，“我甚至不知道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州，在哪个区，在哪座城市附近。”

娱乐厅里既干净又凉爽。太阳尚未将溜光的板壁、小桌和胡桃木钢琴晒热。

玛莎开始整理花朵，将它们分别插在花瓶里。飞行员从下面甲板上提来一桶清水。

“我妈妈在别洛焦尔斯克有个小花园。”飞行员一面帮玛莎分插花朵一面说，“可是有大堆大堆的鲜花。尤其是万寿菊。”

“您在别洛焦尔斯克休息得好吗?”玛莎问。

“还不错。看书，整理自己的生活。在那里，在别洛焦尔斯克，也没什么好做。”

“怎么个‘整理’法?”玛莎感到纳闷。

“我把见过、做过、想过的都记下来。然后分析我过得对不对，错在哪里，再计算近来生活馈赠给我什么。”

“那又怎么样呢?”

“往后就会明白现在的一切。可以用清醒的头脑去生活。”

“以前我就不知道，事情常常是这样的，”玛莎说着，专注地望了望飞行员。

“您不妨试试，”飞行员微微一笑，建议说，“您自己会感到奇怪，充实的生活原来是什么样子。”

“好极了!”玛莎背后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玛莎转过头去。

一个演员站在门口，肩上搭着一条厚绒毛巾。他穿一件蓝睡衣，衣袖的翻口是棕色的。

“好极了!”他重复了一遍，“我喜欢早晨的谈话。早晨我们的思想通常十分清晰，就如刚洗干净的双手。”

“得了吧!”飞行员快快地说。

“不错，全是蠢话!”演员表示赞同。“别生气。我无意中偷听了你们的谈话，于是想补充一个细节。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

我本人可以说是直到生命快要结束时才领悟了这一点。"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伟大真理呢?"飞行员问。

"'我不喜欢你的讽刺,'"演员用故意装出来的蹩脚朗读者的浑厚声音说道,一面大笑着,"这真理很简单。生活中的每一天总有某种好东西。有时是富有诗意的。就如您所说的,当您整理自己的生活时,您不由自主地会回忆起它的这种主要是富有诗意的、合乎情理的内容。这是十分美好的!也是令人惊异的!我们四周的一切都充满了诗意。去寻找它吧。这就是我这个老头给您永久的临别赠言。请别拒绝。我的话完了。"

演员笑眯眯地走了,玛莎却沉思起来,确实她周围的一切非常简单,同时却又异乎寻常。在列宁格勒,在林学院时,这些不怎么明显,不比现在,在旅途上。也许这正是往昔藏而不露,而今在她面前展现的那种富有诗意的命运,这种命运存在于生活的每一天。

伏尔加河上每天都刮风。青蓝的天空从河面上和船舷两侧飞驰而过,波涛翻涌。玛莎仿佛觉得风在戏耍的同时正把这些夏日一天接一天地在她面前全部飞速地带走。

每到傍晚风便停息了。大河将自己的水流从黑暗带入黑暗。只有船上的灯火从黑暗中挖出一个照亮的小水圈。

玛莎感到高兴,有时又有点惆怅。她怎么也不会相信她的如此美好地开始的新生活会变成另一番模样。

玛莎在卡梅申下了船。伏尔加河上空风儿吹来黄黄的雾气。

飞行员和演员走到码头上为玛莎送行。

玛莎茫然地和飞行员道别。飞行员不知怎么办才好,回到船上,站在船舷旁,从那里望着演员和玛莎道别。

演员摘下宽檐帽,握住玛莎的双手,用眯起的笑眼望了望玛

莎的脸。

“您会幸福的，”他说，“但是我比您更幸福。因为我是个老人。”

“您说什么？”玛莎问。

“您不可能理解上了年纪的人所领略到的那种幸福！”演员神色庄重地说，“看见爱上另一个人的苔丝狄蒙娜[1]眼睛上的泪水的那种幸福。”

他放开了玛莎的手，拿着帽子向跳板退去。轮船鸣响了第三声汽笛，离岸了。

风从散发出石油味的河面上扑面吹来。一个花白胡须的矮个子老头在玛莎旁边转来转去，低声问：“要搬行李吗，女公民？”但是玛莎没有听见，所以没有答话。这时矮个子老头在旁边一张长木椅上坐下来，抽起了烟——开始等待玛莎最终定下神来。

一天以后，玛莎已经住在远离卡梅申的地方，一间草原上的流动车厢式小屋里，小屋在一个有着光秃秃的黏土质泥岸的池塘边。在这间被称为“官屋”的厢式小屋里，住着集体农庄林区的工作人员。

地段段长原来根本不是满身尘土和脸色阴沉的人，相反，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喜欢说笑的人。然而林区人们的情绪从玛莎来到的第一天起就不安定。大家都在为送来下种的一批新橡子而担心——会发芽吗？令人担心的是从东南方向逼近的燥热风：在伏尔加河后方，整个天边都弥漫着透明的烟雾。“盐碱地”这个词不断地重复出现在人们口中。对幼林来说最难缠、最危险的敌人就是盐碱地——这些草原上致命的“苔藓”，这种在断面闪烁着盐晶白色反光的黄土。

---

[1] 莎士比亚悲剧《奥瑟罗》中的女主人公。

一次玛莎按照飞行员的建议整理自己的生活，发现她的生活截然分成三个部分——列宁格勒的生活，轮船上的旅行生活和在伏尔加河畔草原上的工作。生活中分出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好的内容和自己的诗意，就如年老的演员说的那样。

在列宁格勒有可以眺望拉赫塔上空夕照的房间，有女友，学院，书籍，剧院和花园。在旅途上玛莎第一次领悟了那些转瞬即逝、然而深深触动心灵的相遇的魅力，领略了辽阔的俄罗斯河区迷人的风光。而这里，在草原上她理解了自己工作的伟大意义和力量。

对于飞行员的记忆，对于他在抱怨夜莺的惊扰而尴尬地微微一笑的记忆，对于他犹如在别洛焦尔斯克时那样，在卡梅申从轮船的甲板上望着她，而双颊却在微微颤动的情景的记忆，在她心灵深处是不会消亡的。一个人竟从身旁过去了，这一点是十分可惜的。

玛莎经常回想起不久前的那次旅行，所以有一次她甚至做了个梦。她梦见了浸润在露水中的稠密的野蔷薇。时值黄昏。一弯柔和的新月静卧在蓝蓝的夜空，犹如被刈草人遗忘的一柄银光闪闪的镰刀。是那么宁静，心头又是那么轻松，玛莎甚至在梦中笑了起来……

新植的林带犹如一条绿莹莹的小河在山丘间蜿蜒而过，伸向干燥的草原，草原上一条条宽广的大道上正扬起一圈圈淡红的尘柱。

工作很多。要在新植的橡树间松土，种合欢树。玛莎干起这活来特别操心，对幼树甚至怀着一种温情。

玛莎晒黑了。她的辫子被阳光晒得退了色。她变得像个草原上的姑娘。衣服、双手、周围的一切都散发出艾蒿的气味。连黑狗纳尔赞毛茸茸的皮毛上也散发出艾蒿的气味，当全体工作

人员到草原上出工时，它便守卫着厢式小屋。

守卫厢式小屋的是纳尔赞和七岁的小男孩斯乔帕，林区地段段长的儿子。

他们俩成天坐在厢式小屋的阴影里，听着黄鼠的尖叫和风吹到一棵弯弯扭扭的野梨树上的声音。梨树发出很强烈的声响，仿佛是用青铜浇铸成的。

夏季快结束时，新植林遭到了跳鼠的袭击。为了去掉身上的跳蚤，它们在橡树边挖了许多小坑，再在这些小坑的土里打滚。从斯大林格勒召来一架"莱农号"飞机，向新植林抛洒施了毒的燕麦。

一天傍晚，斯乔帕坐在厢式小屋的台阶上削马铃薯时，纳尔赞抬起头，吠叫起来。低低的草原上空，从太阳下山的方向飞来一架小飞机，发动机懒洋洋地发出轻微的轰鸣。

它飞过厢式小屋的上方，来了个急转弯，便降落到干燥的草地上，滑行了几步就停了下来。

飞行员从驾驶舱里出来，摘下飞行帽，朝小屋走去。飞行员还年轻，但两鬓却已添霜。在飞行员的上衣上斯乔帕看见两道勋章绶带的痕迹。

纳尔赞没有猛扑过去向飞行员狂吠，而是钻到小屋下面，在那里隐蔽地汪汪叫起来。

"你好，小朋友！"飞行员说，在台阶上和斯乔帕并排坐下，开始抽烟，"这是第十五地段吗？"

"是的，"斯乔帕怯生生地回答，"您是到我们这儿来的吗？"

"是到你们这儿来的。我要把跳鼠都毒死……"

"看您有那么多勋章，"斯乔帕想了想说，"可您却来毒跳鼠。我们原以为会给我们派个航校的学员来。"

"是我自己坚持要来你们这儿的，小家伙。"飞行员答道，静

默了一会儿,"玛莎·克利莫娃在这儿工作吗?"

"在这儿,"斯乔帕答道,眯起了眼睛,"有事吗?"

"她在哪儿?"

"在那边,森林里,"斯乔帕向新植林方向挥了挥手。

"真的,森林!"飞行员笑了起来,他站起身,头也不回地向新植林走去。

斯乔帕目送着他。天色已经暗下来,草原上已看不太清楚。然而斯乔帕仍然看见玛莎从草原上走来。飞行员快步迎着她走去,但是玛莎没有走到飞行员面前,她停了下来,用双手捂住了脸。

天已经完全黑了。草原上一颗飘移的星星悬挂在池塘上方,从广袤的高空窥视着黑暗的池水。

"为什么玛莎用手捂住了脸?"斯乔帕想了想,便重复了一遍他父亲经常对玛莎开玩笑的那句话:

"她是我们这儿的怪人!"

纳尔赞整夜都在对安详地静卧在干燥、温暖的土地上的飞机汪汪吠叫。

1951 年

沈念驹 译

宝　　藏

奥卡河以北的这整片林区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昏昏欲睡的森林”。

我和阿尔卡季·盖达尔走遍了方圆几十公里的当地森林。这是很久以前，三十年代初的事了。

我们东游西荡时，好几次谈到民间古老的说法“昏昏欲睡的森林”。我们赞叹俄语的精确性。密密的丛林真的仿佛在昏睡中凝滞不动似的。昏昏欲睡的不仅是森林，还有森林里的湖泊和水色微微发红的懒洋洋的河流。这些河流的两岸长着一种花，叫“杜鹃泪”。民间把这种花叫做“瞌睡花”。这种植物和昏昏欲睡的森林倒是很相称。杜鹃泪的枝叶睡意朦胧地垂挂着，一直弯到地面。

我们见过广漠的荒地，焦林和被风吹折的树木。沼泽冒着冷飕飕的水气。成群的蚊子和马蝇在大地上方嗡嗡叫。整块整块的森林被毛虫吃掉，布满了蜘蛛网。

我们希望苏维埃政权能尽快抽出时间来治理这些荒芜的地方，也希望人最终能参与到这里日渐衰微的大自然的生活中去。

在一个叫做“官渠”的采伐场，有一座四堵墙壁的旧小屋。小屋就立在一条长满慈姑的小渠的岸上，这渠就是“官渠”，采伐场也因此而得名。

这条水渠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把大泽里的水排掉而挖的，但是看来失算了——沼泽并没有干涸，水渠却一直保留了下

来，仿佛是对省里土壤改良学家们失败的工作的一个纪念。

夏天小屋里住着两个采松脂的人——瓦西里老人和他的孙子，大约九岁的男孩季沙。

一次我们在瓦西里的小屋里过夜。

事情发生在傍晚。采伐场上空弥漫着昏黄的雾气。鸂斯在冒着松节油气味的树墩间跳来跳去，发出唧唧的叫声。矮林后面昏沉沉的残阳正在下山。水渠里小鱼苗窜来窜去，水老鼠吱吱尖叫。

小屋里很闷热。墙上挂着一幅退了色的石印画《攻陷冬宫》。

我们随身带了些糖、面包干，于是瓦西里吩咐季沙去烧茶炊。

喝茶的时候瓦西里一面用袖子擦额头上的汗，一面说：

"干我们这一行就一个好处：长寿。我们采松脂的人活得硬朗。我们身体里面都浸透了松脂。什么病也不会生。连蚊子也不叮采松脂的人。当然啦，如果看看鸟类的飞翔，那么这算什么生活呢！除了松脂就是木炭，除了荒地就是焦林！是啊，荒地！"他重复了一遍，用被松脂弄黑的手指小心地拿了一块雪白的糖。"从前是深山老林，现在还是深山老林！政府似乎把我们这地方给忘了。"

"还没有轮到，"季沙说。

"要是把我召到莫斯科，仔细向我了解一下就好了，——啊，我就告诉他们！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你替我把这件事张罗一下吧。怎么样？为了去莫斯科……"

"有点难办，"盖达尔回答说，"在这儿你天不怕地不怕，可到了莫斯科你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决不会！"季沙反对说，"我们爷爷的胆子可大了。"

"说得对!"瓦西里叫起来,"说得对,季什卡,哪怕让雷劈死!"

"那么你在莫斯科说些什么呢?"盖达尔问。

"首先就说森林。这是什么样的森林啊,我的妈呀!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发现森林里枯树在多起来。碎木屑——一堆一堆的!有了这些碎木屑就会生出各种各样的虫子,就来啃树木!可湖泊又怎么样呢!横七竖八地塞满了倒下的黑橡树。连底钩都没地方抛——一下子就弄坏了。那些沉在水底的橡树干下面藏着深色的河鲈鱼,仿佛躲在洞里的强盗。样子就像这个托盘!"

瓦西里指了指悲戚地嗞嗞作响的茶炊下面的铁皮托盘。

"沼泽里的泥炭简直没有底!河里是麝鼹、水獭、圆肚雅罗鱼。可森林又怎么样!浸水的草地沿奥卡河延伸了几百公里。等到春暖花开,真叫你爱不够。但是我注意到,草地上好草越来越少了。长满了杂草、山楂、藤蔓。所以就像人们常说的,我们这地方就不被重视了。可是如果把它管起来,这将是块金土地啊。"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醒来,周围一片寂静,甚至能听见夜间露水从房顶上滴在翻倒的水桶上的声音。

太阳刚升起。它不像傍晚那样昏暗,而是经过一宿的休息变得明亮了。

我们沿水渠走去,想找一处水较深的地方洗个澡。

"停下!"盖达尔突然说,"这是什么?看那边,树丛后面?"

这个"什么"原来是一个大约七岁的女孩。她一发现我们就藏到一丛毒浆果后面了。

我们走到小女孩跟前。她坐在草地上,用一双蓝蓝的大眼睛惊惶地望着我们。旁边放着一罐牛奶,用一块干净的抹布

裹着。

小女孩包着一块退色的黄头巾，穿一条长长的黑裙子，大概是从姐姐那里接过来穿的。

“你是什么人？”盖达尔问，“请坦白说！”

“我从沙摩林来，”女孩急忙回答，她站了起来，踩着了裙子的下摆，差点摔倒。“我们的村子就在那边，水渠后面。一共有九户人家。”

“你是季沙的妹妹？”

“是的！我叫丽莎。季沙冬天在学校里念四年级。”

“你呢？”

“没有！我还小。我每天早上带着牛奶往这儿跑。那你们是谁？”

“勇敢的旅行家，”盖达尔答道，“在这儿寻找一种可以燃烧的白石头。石头下面埋藏着神奇的宝物。你见过这种石头吗？”

“没有，”女孩有点发窘，回答说，“说不定别人见过，我可没见过。这是什么样的宝物？”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我们白天离开了采伐场。又是缓缓延伸的荒芜的林间道路，由于红褐色的落叶，道路变得很滑。松林的梢顶有节奏地喧哗着，白云在深邃的天空中消散，啄木鸟怒气冲冲地斜睨着我们，敲击着干枯的树木。

从那以后过了相当于几个世纪的二十多年。国内没有一个角落不发生惊人的变化。

自然，我想了解当初我和盖达尔漫游过的那个地方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变化。这个林区在奥卡河后面。当我乘载重汽车驶到浮桥边时已经是迟暮了。

浮桥刚刚开桥。拖轮顶着逆流忙忙碌碌地拍打着轮叶，拖着一串驳船。驳船甲板上放满了新的“胜利”牌汽车。

我走出驾驶舱，深深地吸了口气——河对岸飘来香味浓郁的空气。

“这是三叶草，”上了年纪的司机对我说，“这儿所有的草地都种了三叶草。”

我们很快来到了这些草地上。黑暗中看不清草地，但我知道我们沉进了灰色而清凉的草海中。

“这一带地方，”司机说，“有一个人。您可别错过和他认识的机会。他叫季洪·切尔诺夫。是本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没听说过吧？”

“没有，没听说过。”

“是个了不起的人。完全是个有新思想的人。（司机喜欢用科学术语表达。发动机他叫“内燃机”，说到植物时他说，“植被眼看着发展起来了”。）那就是说您没听说过切尔诺夫？”

“我已经二十年没来过这里了，怎么会知道他呢。”

“时间确实相当长了，”司机同意说，接着补充道：“就是说，这一带地方您现在认不出来了。如今我们的草地上放满了机器的陈列品。跟展览会一样。什么样的机器没有啊！沼泽地的松土机，灌木铲除机，开沟机，播草机。荟萃了所有草地上用的工程技术。其实——这就是改造大自然！”

司机沉默了一会儿。

“可是我和您在这叫波良内的地方到哪儿过夜呀？时间很晚了。”

我们决定一见到窗户里有灯光的房子就停下来。

我们就这么办了。一座有两个窗户里亮着灯的房子坐落在村口。

"原来这是学校!"司机高兴地说,"一个女教师住在这里。据说也是一位有新思想的姑娘。"

我们叩了门。一位梳着两根深色长辫的姑娘给我们开了门。她说我们可以在空学校里过夜,并表示愿意给我们喝茶。

我们谢绝了喝茶,但是姑娘还是把我们带进了自己的房间。在电灯光下我看了姑娘一眼,想道,在世界上我还没有遇见过比她更可亲可爱的人。那双眼睛尤其漂亮:完全是蓝色的,还有点羞怯。

桌子上放着盖达尔的明信片。我留神地朝姑娘望了一会儿。

"您不记得我了?"

姑娘望了我一眼,摇摇头。

"那么,您还记得盖达尔吗?"

"当然!"姑娘叫了起来,"请等一等! 您和他曾经到过'官渠'? 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事啊!"

"您就是丽莎?"

"是啊,丽莎。我现在就去沏茶。应该谈谈。哥哥马上就从区执委会回来了。"

"是不是季沙?"我问。

"是啊,是季沙。他是我们的主席。"

"就是说,我们找对地方了,"司机得意洋洋地说。

"简直是奇迹!"丽莎一面摆桌子,一面说,同时无缘无故地笑着。她激动得两颊绯红,甚至有点气喘吁吁,"您可知道,当时盖达尔还从莫斯科给我寄信来呢。说的就是神奇的宝物。我还小,不识字。这封信是季沙念给我听的。他信上写得真好:'丽莎,我们没有找到宝物,虽然我们向所有遇见的鸟儿和野兽都打听了。后来我遇见一位头发花白的采蘑菇老人,他说白石头下

面没有任何宝物，而且从来不曾有过，但世界上有惟一的真正宝物——好心肠。所以你，丽莎，努力吧，让自己有一副好心肠。还要多读书。'这件事看来非常不顺利，但我读了这封信，心里还是感到很轻松。"

"温馨的话语对人的心理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司机说。

"喏，瓦西里怎么样了？"我问道，"还健在吗？"

"不，已经死了。"

"他总是说，死神不收采松脂的人。"

"这是他常说的一句俏皮话。他是十分关心自己地区的人。老是说这儿将是块黄金宝地。要是他现在能四周看看就好了。草地上的灌木丛连根拔了，地也耕过了，施了肥，已经播下了优质的饲料用草。现在的草地您认不出了：整个儿成了一个花圃。建了水电站。森林里秩序井然。所有的枯树都清除了，开出了消防通道，凡是空地都种上了松树。在'官渠'，树木已经长高了，——多么茂盛的松树啊，已经和天花板一般高了。密密实实，走都走不过去。"

"是季洪·伊万诺维奇操心的结果，"司机说。

"是的，季沙做了很多工作，"丽莎赞同地说，"他在我们这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是土壤改良家。我就是教教书。教俄语和俄罗斯文学。"

我们又谈了好久，可是季沙还是没有回来。我见到他是次日早晨在区执委会，在一间敞亮的房间里，地板刚擦洗过，还是潮的。太阳已在晒地板。窗户开着，窗外草地渐渐地笼在烟雾里。草地上有时这里，有时那里，闪耀着云母般的湖泊。

季沙瘦瘦的，佩带着红星勋章，穿一件没有肩章的军服，我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来。他穿着整洁，脸刮得干干净净，尽管看得出来他工作了几乎一个通宵。

季沙(对我来说他仍然是季沙,虽然大家都叫他季洪·伊万诺维奇)绕过了他从一个采松脂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土壤改良家和区执委会主席的话题。对我的问长问短,他支支吾吾地说:

"这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我们这儿这样的人多着呢……"

一个高挑个儿、脸上有雀斑的司机向窗户里探视了一下。

"季洪·伊万诺维奇!"他用恳求的语气说,"快走吧。要不它们呆久了会把笼子都咬破的。它们的样子怪吓人的——不看还好!"

"大概不会吃掉吧,"季沙答道,"这就走。我们在这儿,"他向我转过身来说,"办起了河狸养殖业。在白河新运来了一批河狸。从沃罗涅日附近运来的。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去看看您那些老地方。"

我同意了。我爬进载重车的车厢。河狸在箱子里气呼呼地咕咕叫着,转来转去。出村以后汽车开进了森林。道路沿坚实的沙丘上升。

这地方以前到处倒伏着被风暴吹折的树木,现在稠密的刺柏和榛树长成了一片矮林。

呼吸起来感到非常轻松。也许正是因此季沙突然指出:

"此言确实不虚:'在他们的过道间风呼呼叫,呼吸沁人肺腑'。"

我们在林间一条小河上的水电站旁停了下来。在高处,松林的上空,午间的风正在劲吹。可是风却吹不到地面。下面是无风的。

水电站的运作几乎是无声无息的。只在坝边隐隐约约有汩

汩的水声，还听得见电站里面有人在低声唱《萨特阔》[1] 中的咏叹调："石洞里的钻石数不清……"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小的一座用松树墩子盖的水电站。里面很干净，很清凉，洋溢着松香味。榛树的枝叶从敞开的窗口探进来。凳子上坐着一个脸晒黑的、穿背心的年轻人。

"我们的电气技师，"季沙介绍我和他认识。

年轻人显得有点腼腆，说道：

"季洪·伊万诺维奇，我在这儿值班，很抱歉，凡是我知道的歌剧，我都唱过了。"

"大剧院办到家里来了，"季沙冷冷一笑，然后向我转过脸来说："这个电站是我们自己建的。是集体农庄自己动手干。不像电站，而像一个玩具！不久在里涅沃湖旁边就要由各农庄合建一座烧泥炭的大电站。到那时我们就会有电耕犁、电力挤奶器，电锯也将在林间作业。"

从前我经常到里涅沃湖去，所以我难以想像那里不久将出现一座电站大厦。二十年前里涅沃湖是那样荒凉，按林业工作人员的说法，不是随便哪只鸟敢往那里飞的。

这一整天我都沉浸在新鲜感里。一切都照射出、闪耀出、流溢出这种新鲜感：白桦和松树的树干、树叶、空气、林间的湖水。

"感到惊奇了吧？"季沙问，"可您记得这里曾经是多么愚昧，多么荒凉吗？如今已经在自由地呼吸了。"

我们从水电站乘车来到白河。这里笼罩着一片禁猎区的宁静。针叶绿莹莹的反光落在缓缓流淌的河水上。养兽专家来了，他是一个表情严肃、沉默寡言的人，把河狸从笼子里放出来。

---

① 萨特阔是诺夫哥罗德壮士歌中的主人公，后成为多种文艺作品的主人公。这里指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的歌剧《萨特阔》。

河狸在下水之前先用利爪清洗和梳理皮毛，对我们不理不睬。

“多么讲礼仪的野兽！”司机赞叹说。“不愿意弄脏了河水。”

傍晚我们终于来到了“官渠”。那里几间木房里安顿着林业管理机构。四壁小屋依然完好无损。它被改作了松子烘干房。

我和季沙在水渠的岸上坐了一会儿。夜幕在东方降落。一条沉甸甸的鱼在噼里啪啦地戏水。

“好像是欧鳊，”季沙说，“瓦西里爷爷在的时候，这儿只产条鳅。您来得正是时候。一切植物都在开花。这是最美的季节。去过草地了吗？”

“没有，还没去过。”

季沙静默了一会儿。

“每一个地区，即使它看上去最不起眼，都有丰富的资源，”他说道，又重复了一遍：“丰富的资源。也许丽莎对您说过了宝物的事？当然这是对的，美好的心灵就是宝物。不过我认为每一个地区都埋藏着自己的宝物。世界上没有比我们这儿更可爱的地方了。以往人们老是说：地方这么穷，又是灰化土，吃的是土豆，到处是沼泽，蚊子成群，遍地烂草朽木；可是现在您瞧，它居然发展起来了！人又怎么样呢？您记得人们的口头禅：‘以后再说’，‘以后再说’，‘我们能往哪儿钻哪’，‘难道你能一干就成功吗’……可现在人们有多高兴！我催大家，大家也催我——干吧，干吧！人们迫不及待地去追求生活。如今什么都需要——水电站、开采泥炭、通往州府的公路、采集草药、新的牲畜品种、造林、花园、养蜂场、新办的学校。工作多得不得了。可乍一看，似乎是个不起眼的地区。当然主要还是我们草地的经营。这几天我们州委书记到克里姆林宫去汇报一项计划了，要把奥卡河滩地改造成莫斯科供奶基地。为这件事他召开过一个会议。在会上我们决定直观地向政府展示我们的财富和资源。仿佛赤身

露体地展示我们的草地。因为书面报告是一回事，而展示我们如何支配利用是另一回事。为此我们决定把这里生长的所有花草都运到莫斯科。所有品种。当然是鲜货。”

“你们怎么把这些花草运到那边呢?”

“用汽车。盛在有水的直筒里。您知道，这是整捆整捆的花啊!”

儿天以后，开始采集草和花。

这件事由丽莎安排。她召来了高年级的学生。我到她那儿去的时候，大约三十个男孩和女孩坐在学校旁边的原木堆上，热烈地争论着哪些草地上的鲜花最大，品种也最多。一些人说在斯塔里寨边沿地区;另一些人说在斯图捷涅茨湖岸边;还有一些人赞成那是在一个叫木贼的神秘地方的说法;一个头上有一绺头发向上翘的最小的女孩含着泪大声说:

“别这样说! 你们说得就是不对! 应当去太平滩。那儿，哇，花儿是什么样儿啊!”

大家都知道，采花最好是在清晨，趁暑热还没有开始，或者傍晚前，炎热开始消退的时候。否则花儿很快会凋谢。

决定在傍晚前采花，把它们带到波良内，就地进行挑选，连夜送往莫斯科。

我和丽莎以及学生们一起去草地。和我们同行的还有许多人，其中也有我的司机。

每个人都努力想找到最大的花朵。每个人都说他采的花简直是神花。

我们从草地回来已是晚上。太阳下山了。湖上升起了雾。低地里长脚秧鸡在鸣叫。

盛开着野蔷薇——灿烂的六月之夜的旅伴。

在渐渐暗淡下去的明净的天空，喷气式飞机拖着迅速延伸的白色气尾。这气尾直冲一颗在我们上方微微闪烁的星星。这气尾和这星星都映照在斯塔里察河水里，河水也因此而宛如傍晚的天空一般深不可测。

在斯塔里察河沿岸的野蔷薇丛里已经蕴藏着黑夜。惟有灌木丛间的花朵在尚未熄灭的晚霞反光的映照下，还闪射着光亮。然后在树丛里，一只夜莺为了不破坏这晚间的宁静，啪地响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脆响亮的啼啭，便静默了。

木星在天边幽暗的森林上空升起，开始徐徐地升到草地、柳林和夜雾上空——我们熟悉而亲切的大地上空。

1953年

沈念驹 译

开往辛菲罗波尔的直达快车

开往辛菲罗波尔的直达快车驶离莫斯科库尔斯克车站的时间是晚上九点。

六月方尽。正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时节。在北方，此时正是白夜最好的季节。现在这些明亮的夜晚也把自己的边缘伸展到了莫斯科。太阳直到晚上快九点才下山。在街上的高楼大厦后面是看不到太阳的。然而根据笼罩着城市——它的所有广场、街道、花园和庭院——的温暖而浅红的暮色，可以猜测太阳已在希姆基水库后面遥远的地方，在北河车站的后面，向着地尽头徐徐降落。下山的太阳是巨大而明净的，预示明天将是一个炎热无风的日子。

车站上不久前刚洒过水的柏油站台散发出雨水、烟雾和鲜花的气息。送行的人里许多人都拿着花束。由于闷热而发蔫的花的香味，无论站台上还是车厢里都能闻到，车厢里，花束已经插在玻璃杯里，杯里盛着发黄的车厢用水。

"我真不明白，"脸上布满皱纹的列车员看着花束说，"为什么人们为所有乘坐我们这趟快车和开往索契的快车的人送行时要带鲜花。可是送乘'红箭'① 或去西伯利亚的特快列车的人就很少带花。这是什么原因？"

早就发现一种现象，乘客在向列车员出示车票时会紧张不

①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间往返的特快列车。

安，虽然车票不可能出任何差错。而且在乘客中总会有人对自己的车票信心不足。他一定会在各方面听从列车员，甚至对他点头哈腰，仿佛他的车票如有问题这会对他有帮助似的。

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位乘客。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人，戴一顶蒙尘的绿色宽檐帽。他站在队伍的最后面。他把手提箱放在两腿中间，为防万一用两膝夹住，焦急不安地在西装口袋里掏着，寻找自己的车票。

"说的是，列车员同志！"他用细细甜甜的嗓音大声说，"我也发现了。"

"多么有洞察力的一位公民，"列车员没好气地说，"您最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人们到南方去是高高兴兴的，"戴绿色宽檐帽的人嘻嘻一笑，回答说，一面还在寻找自己的车票，"是去休假的人。所以要送花。"

"可是在南方这些花比这儿多一千倍，"列车员表示异议，"干吗还往南方带？我们去克里米亚带着花。从克里米亚回来也带着花。"

"那些花当然会留下许多垃圾，"戴宽檐帽的人说，但是他没有说到点子上。列车员突然大为生气。

"好奇怪的想法，"他说，满腹狐疑地看看戴帽子的乘客，"莫斯科全城都是花。我们的工厂也到处是花，您竟说出这样不合时宜的想法来。您的车票呢！"

车票原来没有问题，于是戴绿色宽檐帽的人满头大汗地把手提箱拖到车门口的平台上，对列车员说：

"同志，您在执行公务时聊闲天是不应当的。不应当！"

有一种现象也是人们早就发现了的，乘客们喜欢在车厢里遇上由父母亲委托顺路的旅客或列车员照管的一个小男孩或小

女孩。这时候就会有无休无止的操心事。

整个车厢的人便会争先恐后地注意让这个男孩或女孩履行父母送别时的嘱咐。从远古时代起这些嘱咐就总是一成不变的：别在停靠站上下车，别把身子探到窗外去，把准备路上吃的东西都吃光，听大人的话。

现在车厢里，正好在我们的包房里，来了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姑娘。她叫娜斯佳。

娜斯佳是被父亲送到车站的，不过我没有见着他。我到达时距开车只有五分钟了，当时娜斯佳的父亲已经走了。他非常紧急地要去赶一个重要会议。到了辛菲罗波尔，娜斯佳的姐姐应当会来接她。

除了娜斯佳，包房里还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瘦瘦的人，他留着剪得短短的花白头发；还有一个穿烟灰色西装的小伙子。他的嘴唇微微地撅着，仿佛他准备吹口哨似的。由于这一点，一开始我并不喜欢他，可是不久我看他就完全顺眼了。他原来是个可爱而乐于助人的人。

就如旅途上常见的那样，我们很快就彼此认识了。原来那位上了年纪的人是个研究土壤学的教授，而小伙子则是位民俗学家，精通民歌、传奇和童话。

列车在莫斯科郊外纵横交错的铁轨网里胸有成竹地飞奔，直至最终挣脱这网络，进入田野，车窗外一抹落照映红了整条地平线。

娜斯佳坐在窗口，收紧两腿，眺望着落照。她还怕生，只回答别人的问话，回答时声音也轻得勉强能听见。

土壤学家说他对这条路，用他自己的话说，熟悉得能“背出来”。

“我已经数不清了，究竟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回，”他说，“从童年之初起我每年要在这条路上乘车走两三趟。总起来我在这

条路上走了大约一百五十趟,不会再少的。"

"这是为什么呢?"民俗学家问。

"我是辛菲罗波尔人。到现在我在那里还有许多亲人。所以我经常乘这趟车。有时来休假,有时办公事。此外我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郊外还有土壤学方面的许多工作。"

过了谢尔普霍夫站,我们一起让娜斯佳喝了茶,她便躺到了上铺上。

我出去到过道里抽烟。所有的包房都已关上了门,夜间的空气透过洞开的车窗吹进空空荡荡的过道。黑暗中飞速闪过潮润的桦树林、闪着暗淡星光的小沼泽、空荡荡的车站、孤灯下石头站台上的一堆堆白垩粉、乡间的灯火、浓浓夜雾中的草地,继而又是哗哗作响的白桦林。

待我回到包房,大家都已经睡了。只有顶棚下的娜斯佳没有睡。在夜间的灯光下,小姑娘的眼睛看上去是纯蓝的。

"你为什么不睡觉?"我问娜斯佳。

"我倒是很想睡着呢,"她压低声音答道,"好在早上快点醒来去望窗外的景色。过道里有一个很好的窗口,可是整个晚上那位穿吊带裤的胖伯伯老在那儿站着。"

"是戴绿色宽檐帽的那个?"

"是的,是那个。他的背把什么都挡住了。所以我想早早地醒来,好第一个站在这个窗口。所以我怎么也睡不着。"

"那你就数一千下,"我说。

"出声数吗?"娜斯佳问。

"对,不过要小声。"

她开始数数,数到四十就没有声音了。我关了蓝色小灯,顿时窗外的夜色变得亮起来,车站上白色灯光的正方形光斑开始每过半个小时就在包房里一掠而过,宛如有人在翻转练习本白

色的纸页。

我早早地醒了，但是娜斯佳已经不在包房里。她站在过道里一个开着的窗口前，轻轻撩起窗纱，望着无尽的田野、清晨绿荫下呈现出来的一派蔚蓝的小山谷、村庄、枝叶银光闪闪的爆竹柳、带井台的路边小亭、懒洋洋流淌的小河和多草的河岸上一群群白鹅。

最叫娜斯佳开心的是当她看见一条毛茸茸的乡下小狗的时候，小狗尾巴上粘着一颗颗干苍耳，心事重重地沿着路堤奔跑，显然是为了什么刻不容缓的事。

在铁路的弧形道上，娜斯佳把身子探出窗外，看到了沉重而柔和地隆隆作响、仿佛装上了铁甲的整列用金属制造的车厢。这些车厢已经蒙上了几个州的尘土——莫斯科的、奥廖尔的和库尔斯克的，到傍晚还将蒙上乌克兰的黄色尘土，而到辛菲罗波尔后车厢将完全变成灰色的，炽热的，经过国内一千俄里的奔驰而疲惫不堪。于是列车将停在瑟瑟抖动的克里米亚白杨树叶下的备用铁轨上冷却一整夜。

土壤学家也醒得很早，一面望着窗外，一面吸烟。

"您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啦？"我问他。

"我一直担心睡觉时错过一个地方，"他答道，"即使火车夜间从这个地方经过，我也总是醒过来，去望望窗外，虽然什么也看不见。我已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

"大概是您的故乡？"我问道，"有某些值得怀念的东西？"

"问题就在于这地方我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值得怀念之处。我一次也没有到过那里。"

"您说的我不太明白，"我犹豫地说。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土壤学家答道，"得从革命前说起，

当时我还在念中学。我随父亲从辛菲罗波尔去莫斯科，整天吊在窗口，就像娜斯佳这小姑娘那样。在库尔斯克郊外的一个地方，在干燥的草原上，我看到峡谷边缘有一间孤零零的农舍。农舍周围连篱笆也没有。风吹来了尘土，农舍立在这风尘里就如笼罩在雾里似的。于是我思量着，这间农舍里究竟住着什么人呢？可想而知，如果冬天住在这屋子里，又碰上暴风雪压顶而来，该是多么可怕。人生只不过是过往的列车。从此我开始注意这间屋子。列车从旁边经过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每一次我都能发现某些变化。一次我看见农舍边有一个妇女，她扎着头巾，扎得很低，几乎要盖到眼睛上了。她正在给黏土砌的炉灶生火，身边一只用旧筐子做的摇篮里大概躺着一个婴儿。可以看见一条破棉被的边缘。

“后来农舍附近开始有新来的人居住，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小村落，它是那样贫困和凄凉，就跟这间孤零零的农舍一样。出现了穿破衣服的小孩。他们站在路基旁，用单调的声音喊道：‘叔叔，给扔点面包吃吧！’‘叔叔，给扔点面包吃吧！’我们扔给他们面包，面包掉在地上，沿沙地滚过去。孩子们抓住了面包，头也不回地往村子里跑。年复一年，我眼看着贫困在增长。您知道，本来只有一间可怜的农舍，后来就变成了好几间；本来只有一个鼓起肚子的挨饿婴儿，后来却有许多了。

“革命开始以后，我好几年没有见到这个小村子。您想像一下，几年以后，当我刹那间再见到这个村子时，我是多么激动。依然是那个村子，但是它后面已经是一片向日葵的海洋，而在我那间农舍（我早在心底里开始称它为“我的”了）旁，我看见一个扎着三角红头巾的黑黝黝的少女，大概就是当初躺在摇篮里的那个。她正在门口喂鸡。

“从此以后我每次都发现新东西。出现了年轻的葡萄园。

农舍也变年轻了。墙根的土台边开放着红的和黄的锦葵花。有一次我见到了小学生。他们拿着书在奔跑。长满杂草的田界看不见了。整个草原翻滚着成熟的小麦的波浪。后来出现了风力发电站。几乎在一公里外就能从火车里望见它的翼轮。就这样产生了新的特征。花园发展起来了。沿街已经有白柳在喧哗。只是有一次我经过的时候没有看清村子——它整个儿被畜群扬起的灰尘遮住了。在老农舍的地方,这里那里都已经矗立着新瓦房。

"就这样有一次我见到了康拜因。事情发生在傍晚。它在草原上行驶,整个儿沐浴在金色的晚照里。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去,我渐渐变老,而我周围的生活却变年轻了。但是我毫无怨言。"

土壤学家向窗外瞟了一眼。

"已经快到了。我们到过道里去吧。村子在那一面。"

在过道里,我们站在窗前。热风吹拂着头发。远处,在一条低低的合欢林带后面,露出了风力发电站格状的白色塔楼,绿树成荫的群山,村苏维埃屋顶上的红旗,村里凉爽的街道,花园里许许多多的鲜花,茂盛的嫩玉米,载着孩子的卡车和拉着载汽油桶的大车的瓦灰色犍牛。

"您的那间屋子在哪儿?"我对土壤学家大声说。

"马上就看见了。喏,就是这间!喏!"

在树木和高高的锦葵中间,这间农舍几乎看不出来。我只看见明净的窗玻璃的闪光和一个年轻妇女,她穿一件浅色夏装,扎一块薄三角头巾。她站在门口望着飞驰而过的列车。

"您看,池塘!"土壤学家对我大声说,"以前没有池塘。就是说他们在山沟里筑坝截住了水。"

一个大大的,也许还很深的水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池塘的岸上一架小内燃机噗噗地响着,把一缕青烟喷向天空——正

在抽水。旁边孩子们在游泳。

这一切随着隆隆的机声和车轮的丁当声在我们身边疾驰而过，然后就湮没在列车扬起的尘土里。又重新出现被成熟的庄稼染成一片金黄、并在地平线上呈现一派蔚蓝的绵绵不绝的草原。

“是的，”土壤学家重复说，“我正在变老，而生活正在变年轻。不过没关系。我有一个，照乌克兰的说法，叫念头。”

“什么念头？”

“明年一定要乘车来这里，到这个集体农庄来。我要走进自己的屋子里，对这个可爱的妇女说，我注意她的生活已有好多年，看见过她躺在旧筐子做的摇篮里，知道她的母亲，而且他们村子的全部历史都曾在我眼前经过。任何一个活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

他沉默下来，开始沉思。我突然产生一个欲望，想在随便哪个站下车，回到这个村子里，住进位于这炎热的草原中间、在懒洋洋的白云下、一望无际的小麦的海洋中带锦葵的那间小农舍。融入这些心地朴实的人们的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工作，创造那种绝无仅有、更为美好的东西，那种东西迄今尚未创造出来，你却毕生追求着它——创作一本关于普通人的幸福的书。

我走到娜斯佳身边。她向我回过头来说：

“刚才有过这样一个村庄……简直是奇迹一般的村庄。等我中学毕业我要来这里当教师。”

“我们将有太多的人在这里汇合，”我回答说，但是娜斯佳没听懂我的话，便掉过头去了。列车在河上的桥上隆隆驶过。桥头的守桥人向娜斯佳点了点头，微微一笑。

1953 年

沈念驹 译

无轨电车上的白嘴鸦

这还是那个早春时节，当时只根据一些勉强觉察到的征候——莫斯科街头的雾气、这雾气结成的水珠从不久前种下的椴树黑枝条上滴下来、松软的和风——就可以猜到春光和煦的日子为期不远了。风使积雪塌陷下去，生出一个个小孔。不过这后一个征候大概并不属于莫斯科。临近三月底，莫斯科只在有些庭院里还残留着积雪，而暖和的柏油马路上早已没有了。在莫斯科，冬季已被人们用机械传送带清扫进了自动翻斗车，毫无保留地运到了城外。

我想讲述的那件事发生在5路无轨电车上。

众所周知，莫斯科人乘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时很少说话，更多的是阅读。在这辆从停靠站启动向剧院胡同驶去的5路电车上，乘客的情绪也一如往常。然而女售票员突然喊了一声：

"等等！这是什么？"

"这是白嘴鸦，"一个约摸八岁的小姑娘惊慌地说。

白嘴鸦已经暖和过来，栖在小姑娘短大衣里的胸前，偶尔从大衣里把嘴巴伸出来一会儿。不过警惕性很高的女售票员发现电车上有禁止携带的鸟类，这就足够了。

"如果不许携带它，那我就下车，"小姑娘说道，同时脸也红了。

"瞧你说的，小姑娘！"女售票员大声说，她停止了递票，向小姑娘挤过去，"坐下吧，别担心。嚯，多漂亮的小鸟！这是什么

鸟？真的是白嘴鸦吗？”

白嘴鸦胆子大了起来，往外面看了一眼。售票员小心地用一根手指抚了抚它尖尖的脑袋，笑了起来。

“不用害怕，它不咬人，”小姑娘说，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它很严肃，但很温和。”

“这是什么白嘴鸦，”一个拿着硬纸板夹的老头说，“分明是椋鸟。”

“公民，如果您连鸟的外表都认不出来，就别说得那么肯定，”一个穿铁路工作服的上了年纪的人说。

“我们在莫斯科怎么去识鸟啊，”一个扎头巾的老婆婆说，“对我们来说无论白嘴鸦、椋鸟、麻雀还是雨燕，都是一码事。”

乘客们开始站起来，挤到小姑娘身边。每个人都想摸一下白嘴鸦。白嘴鸦让人摸它，但是轻蔑而高傲地望着每一个人。

一个身体结实、面色严峻的将军艰难地穿过人群从车门口向后面挤过去。

“您要去哪儿，将军同志，”一个没有戴帽子的瘦瘦的小伙子说，“朝相反方向？”

“我到白嘴鸦那边去，年轻人，”将军说，并用有感染力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到白嘴鸦那边去！”

将军挤到小姑娘跟前，从她身边拿起白嘴鸦，在手掌上托了一会儿，仿佛要掂分量似的，然后还给小姑娘，说：

“你把它送到哪儿去？”

“动物园。我要在那里把它放飞。”

“在我们谢伊姆河上，”突然一个年轻中尉说道，他恭敬地望了望将军，“真是个鸟类王国。白嘴鸦当然是一种聪明而富有独立性的鸟，但是它不会叫。可我们那儿有夜莺。非常好的夜莺。春天我们那里每到夜晚整个地区都在歌唱。”

"您听说过曼泰费埃尔教授吗?"将军问中尉。

"是的,听说过,将军同志!"

"他知道每一种鸟的习性。而且能说出所以然。还有,对于鸟类鸣叫的各种唱段、呖呖鸣声、悠扬啼啭、啁啾欢唱、哧哧打喷嚏以及其他鸟儿的悦耳鸣叫,在苏联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精通、那样喜爱的了。简直是个有魔法的老头!"

"您在这儿下车吗?"一个眼带笑意的年轻女子问将军,"或者不下车?"

"我在下一站下车,"将军答道,丝毫不因年轻女子的问题而难堪,"好像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似的,不就是往回走两个街区嘛。你们知道吗,我曾经目睹一件令人惊异的事。发生在战时列宁格勒郊外。当时是春季。椋鸟飞回来了,在自己的笼子上空盘旋,鸣叫。不幸的是这些椋鸟笼在我们和法西斯匪帮之间的真空地带。那帮匪徒就用自动步枪向椋鸟开了火。你们要知道,椋鸟的叫声惊扰了他们。遇上了一帮神经有毛病的坏蛋。这时我们的人憋不住了,'嗨,来吧!'我们的战士向法西斯匪徒开了火,他们一下子哑了。"

"就是说他们替椋鸟讨回了公道,"售票员说,"将军同志,您刚开始讲的时候我就这么想了。"

"那还用说! 椋鸟自古以来就和俄罗斯人同行。"

"售票员!"一个气呼呼的声音喊道,"您为什么不给我车票?"

"这就给,"售票员不满地答道。她仍然站在小姑娘身边抚摸白嘴鸦的脑袋,"这些人一点心肝也没有!"

"您声音小一点,公民,"老婆婆对那位心怀不满的乘客说。

"就是说春天不远了,"铁路工作者叹息说,"稠李树要开花了。鸟类将开始在俄罗斯上空飞翔,带来自己的歌声。"

"不过我还是该下车了,"将军说,"再见了,同志们!"

大家和将军告别。他出了车厢,不知对什么微笑着,而且就这样微笑着沿街走向早就被错过了的停靠站。

乘客们还久久地谈论着白嘴鸦——报春鸟,谈论萨夫拉索夫[①]的《白嘴鸦归来》,谈论莫斯科将逐渐成为一个花园,在这花园里每一只鸟都会感到自由自在,而且不久整个城市从早到晚都有鸟儿在歌唱。

"我们这儿正在出现多么令人惊异的景象,"拿硬纸板夹的老头说,"政府关心人们的福利,而这种福利,你看,就连啁啾欢唱的鸟类也能分到一份。"

"应该如此,"没有戴帽子的那个瘦瘦的小伙子肯定地说。

"真会这样!"扎头巾的老婆婆说,"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一点。"

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了,这个故事我以后会讲的。

1953年

沈念驹 译

---

① 萨夫拉索夫(1830—1897),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俄国现实主义风景画奠基人之一。

蓝　色

一个瘸腿人头戴一顶小便帽，一边沿海岸在卵石上走，一边笑。

几个小男孩从巉岩上钓鰕虎鱼和锯隆头鱼，彼此大声呼叫着说一件事，说红头发若尔卡强占了维季卡将军[1]的一只大蟹作鱼饵，已经好几天了，还不拿出来还他。

发现海滩上有人在笑，孩子们警觉起来，不再说话了。他们显然在想，究竟是留在巉岩上，还是走掉好。

“全体撤离！”维季卡将军终于用绝望的声音喊道，“这个叔叔是个疯子！他自己对自己在笑。”

“不是！”最小的一个男孩因为着急，结结巴巴地大声说道，“根本不是！这是从戈尔洛夫卡来的矿工。他就是住在休养所的那个人。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

突然，所有的孩子都用手掌遮住眼睛来阻挡波浪的反光：三条比目鱼被他拉上来了！从太平湾！他是因为成功才笑的。而维季卡竟大喊大叫——“疯子！”他自己才是疯子呢，这个维季卡。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你推我搡地从巉岩上爬下来，到了岸上，迎着瘸腿人跑去。还在岸上时孩子们就叫开了：“叔叔，您是在哪儿钓到的？用什么钓的？用咸鳀鱼还是鲜鳀鱼？啊，叔叔，

---

① 这是小孩的绰号。

让我们提一会儿吧。你别拉！他让我提，不是让你。你倒真机灵！"

矿工在孩子们的簇拥下向我们走来。这个人个子高大，背有点驼，脸瘦瘦的。他微笑着，为自己的猎获物感到自豪，而且显然等着别人问长问短。

我们两个——乌克兰作家戈尔连科和我——竭力掩饰自己的羡慕，向他仔细打听他是怎么钓到这三条鱼的，摸摸它们背部带刺的肉瘤，总的来说对这三条非同一般、似乎斜着压扁的鱼感到惊讶。孩子们在周围喧闹不停。

这是一代快乐而叫人操心的小黑海舰队队员。学校的功课结束了，于是孩子们每天不断地到这被陡峭的山崖把镇子隔开的空旷的海湾来。

在长满橙黄色地衣的山崖上，野鸽在那里做窝。一群群鸫鸟在盛开的野蔷薇上空翱翔。飘逸着略带苦涩的百里香气息和海洋深处的凉气。海豚发出轻微的呼噜声，紧傍着海岸在水里翻腾出没，驱赶着鳀鱼。

孩子们在这僻静的海湾躲过了母亲和众多阿姨婶婶们公正的怒火，躲过了叫人厌烦的威胁和责骂："看你，等着我来收拾你！""瞧，人家彼佳是个多干净的孩子。可你究竟像谁呀，混小子！"

这个滨海小镇南北东西方圆二十公里内发生的一切，孩子们都知道。所有的事他们都知道得很详细：鲻鱼什么时候来，渔夫们怎样捕捉黑海的角鲨（它晒干的尾巴是孩子们兴奋地用来交换渔线、渔钩和坠子的），谁来到了休养所，渔用摩托艇"母鸽号"的功率有多大，哪儿可以挖到"像金子一样闪光"的一块块黄铁矿，哪一条海滩上被海水磨圆的光玉髓最多。

他们这些小黑海舰队队员颇能博得我们这些休养者的好

感，有时硬要为我们服务，诸如为我们捕捉和晒干海马，或者解开绊在水底石头间带钩的渔绳——所谓的自动捕鱼器，等等。

只要我们中间有谁在捕鱼时把自动捕鱼器绊住了，一声听不懂的叫喊就会沿着海岸传开去："梅列科普！"于是所有孩子都跳进水去解脱（或者就如他们用渔民的行话所说的"奥特梅列科比季"）自动捕鱼器。

梅列科普！绊住了！这个词使来这儿的人感到开心。孩子们甚至开始被叫做"梅列科普人"。为了寻找"梅列科普"这个词的词根而进行的研究也毫无结果。企图弄清孩子们用他们的语言表示"风平浪静"的词"波纳季亚"的来源，同样没有结果。

那些日子东克里米亚海岸一直是"波纳季亚"。黎明时尤其风平浪静。天空似乎一夜之间便垂到了地面，用自己蔚蓝的天幕覆盖了山岭、峻峭的海岬、远方的海岸和已经休息的大海。呼吸起来感到凉爽和轻松。一轮巨大的太阳冉冉升起，于是在微微的昏暗中时而这里，时面那里有一缕颤动的光亮起来，一眨眼又熄灭了——那是太阳的光辉突然射到了被拍岸的波浪冲刷的山崖，照亮了山上瓦顶更棚上的玻璃，或者透过了绯红色的迎春柳丛。

东克里米亚处处是鲜花和静谧。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特别去处，不像克里米亚的其余部分。这地方有干爽灰色的群山、罂粟花冠艳红似火的田野、大海浓浓的蓝色和静谧。

耳朵很快适应了大海的喧哗。那声音不久就不再被觉察。这时海岸上大概只剩下惟一一种声音：风儿吹拂下的草叶的沙沙声。

东克里米亚是块富庶的土地。根据海水从水下洞穴中冲刷出来的许许多多石头可以猜测，当地的土壤和克里米亚惟一一座死火山卡拉达格山的内部蕴藏着什么。

那里什么都有：蓝花岗石，大理石——有时黄得像象牙，有时绯红，有时雪白，烟色的玉髓，五光十色的玛瑙，能治病的光玉髓，绿玉髓，布满各种复杂图案、名称奇怪的“费尔农比克斯”的石头，碧玉，酷似水的晶体的水晶，浮石，熔岩，小珊瑚石，还有许多在风暴过后潮湿的沙滩上闪闪发光的其他石头。

东克里米亚也是一块叙述历史的土地。这里的海浪常常抛出西徐亚人[①]的耳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钱币，希腊人花瓶的碎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士兵们的刺刀，深水炸弹的弹片和有孔的德军钢盔。渔民如今用这些钢盔来熬抹在渔帆船上的焦油。

现在人们从苏联最不相同的部分来到这悠久而富饶的地方休息。休息使人们彼此接近，并不亚于工作。我们大家很快就亲近起来，我们觉得我们早就相互认识。只有戈尔洛夫卡来的那位矿工由于腼腆暂时还独来独往。

不过现在在海岸上他在我们身边坐下，告诉我们他是第一次带妻子弗罗霞——一位在幼儿园工作的职员——到黑海边来休息，这里蔚蓝的天空和阳光简直使他看不见东西。迄今为止他只见过亚速海，而且是在战争期间，当时他在琼加尔郊外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

他讲述时有几次深深地吸口气笑了起来。看得出来，在这儿无人可与他分享休息的乐趣。

“我的弗罗霞总是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他指指一位瘦瘦的年轻女子说。她正在海滨浴场上走着，一面在看书，“老是看书。我把渔绳甩进海里，她却坐在巉岩的阴影里看书。我换了地方，她常常没有察觉。不过话要说回来，书是好书：卡达耶夫的《雾

① 约公元前七世纪居住在黑海北岸的部落。

海孤帆》。"

弗罗霞走到我们跟前，问了好，掏出一块干净手帕擦去了矿工额上的汗水。

"我很好，别担心，"矿工低声说，可弗罗霞却向我们莞尔一笑，仿佛在为自己辩解似的，说道：

"他可不能多晒太阳。他和他那比目鱼简直疯了一样。天一亮就在海边坐着，一直坐到天黑。吃午饭了——还得我使劲拖他走。无论在矿井里干活，还是在海边休息，我的斯乔帕的脾气都一个样。"

她在打开的书上压了一块海边的卵石，以免被风吹乱了书页，静默了一会儿，又微笑着说：

"我发现，一个人在休息的时候，不管他年纪有多大，他都变得像个小孩。就说您吧，也是这样，"她转过脸，对戈尔连科说，"每天和孩子换钓蟹的钩子。有一次我甚至还看见您帮一只甲虫的忙。"

戈尔连科脸红了，承认确实有过那回事。

甲虫久久地劳作着，用各种种子、粪便和干鳀鱼的残渣滚成一个大球——储备过冬的食物，然后沿一条陡峭的小道向上推滚到自己的洞穴里。甲虫气喘吁吁，拼命地推，感到十分吃力，跌倒了好几次，但还是抓紧圆球不放。只是正要到洞口时，甲虫显然已经筋疲力尽，——球从紧抓的爪子里滑脱了，从山上滚下来落进了深谷。

甲虫绝望地团团转。这时戈尔连科下到峡谷里，找到了球儿，带上来放在了洞口。甲虫晃动自己的触须，围着球儿跑了几次，终于将它滚进了洞里。

"劳而无功总是可怜的，"弗罗霞说。"我读过您的书。是听别人说了才知道您的。是妹妹告诉我您的情况的。她是园艺工

作者，在苏梅郊区的集体农庄工作。"

"她都对您说了些我的什么情况?"戈尔连科谨慎地问。

"您似乎徒步走遍了整个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地区。只带一根铁棒和一只背囊。这是真的吗?"

作家低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他被弄得措手不及。

"妹妹还说您在一个村子里亲自为老年妇女，那些阵亡战士的母亲，收割了全部干草。"

我也听说过这件事。我还听说每年夏天戈尔连科都要徒步走访乌克兰的许多集体农庄，而且在我们的作家之中如此熟知集体农庄生活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在各个农庄里，人们对他相当熟悉——一个瘦瘦的个子、风尘仆仆、被太阳晒黑的人，有一双机敏的灰眼睛。在农民中间他有许多朋友——从须发花白的爷爷到年轻妇女和"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正是人所共知的那些小伙子，他们由于害羞，回答问题时只是用一只赤脚擦着另一只，只在特殊情况下用于哑的嗓音轻轻说话。

农庄庄员们和戈尔连科商议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所以女人们一面叹气一面说：

"一个人就这样为了人们的快乐操碎了自己那颗金子般的心。"

戈尔连科在农业方面有广博的知识，那是经验的积累。无论他说什么——小麦的品种啦，"扇车"水磨机啦，河流和瓜田缺水啦，甜菜的糖分啦——由于随着他对事业、对人们和奇异的南国故土的热爱而产生的某种难以捉摸的特征，所有这一切也都赋予了具有真正诗意的特征。

农庄的生活对他来说并非只是写书的素材。它就是他的分内事，他的履历。他不仅在文章和书里为自己的老乡们"过短的

寿命"而"焦急",事实上也是如此。对他来说劳动是神圣的事,是光荣的义务,无论是长年培育乳畜新品种,还是繁殖镜鲤鱼。

他在自己所到之处都带进一种令人叹服的乌克兰式的幽默。不能说他的道路都布满了长春草和万寿菊。所有暂时还隐藏在集体农庄内部的贪婪凶残之徒都怕他,报复他,他们是些当会计的骗子手,靠花言巧语蒙骗苏维埃政权的吹牛"英雄"。某些农庄的主席自以为是,不正当地谋取轻信的领导对他们的宠爱,他们就公开蔑视他,因他像个流浪汉或"倒霉的光棍汉"似的徒步走遍了整个乌克兰,而且走的是尘土飞扬的大道或杂草丛生的小径,在堆禾草的棚子和窝棚里过夜。没有如他们设想的那样,按一个"真正作家"应有的派头去乘坐豪华的私家轿车。

说起来难为情,连我们的作家中也有人嘲笑过戈尔连科。他们冷笑着对他说,乌克兰流浪哲学家格里戈利·斯科沃罗达[①]的时代早已过去,并以轻薄的嘲弄神情望望他,仿佛在望一个本性难移的怪人。

不管戈尔连科遇见什么人,他都会在对方不知不觉间弄清楚有关他的工作、生活与知识的一切情况。没有一件小事不使他努力从中汲取生活的经验。

现在在克里米亚,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山崖上五颜六色的地衣,含碘的藻类,管理葡萄园,克里米亚各种品种的烟草,每一种风在当地的叫法,甚至潜鸭肺部的结构,这种鸭在听到"梅列科普人"投向它们的石块发出第一声啸鸣时就能久久藏身水下。

所有这一切,无论是重大的或微小的,都十分精确地进入了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因此和他的每一次谈话,都是他尚未形

---

① 格里戈利·斯科沃罗达(1722—1794),乌克兰哲学家、诗人、教育家。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起过着贫困的流浪生活。

成文字的一本有趣的书的特殊片断。

有时我和戈尔连科谈到未来。这样的话题最多发生在早晨，在海岸边。也许这是因为尚未苏醒的大海上的寂静和闪光唤起了对新的美好时日必然来临的信念。

“决定未来的不是关于人类幸福的高谈阔论，”戈尔连科说，“而是对毫无例外的每个普通人耐心细致、每日每时的关怀。”

几天以后我们四个（不包括明察秋毫、无所不在的孩子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几乎形影不离。原来我们这些截然不同的人都有着许多共同的思想和彼此感兴趣的故事——关于矿井、顿巴斯的昔日、草原上的土岗、不久前的战争、弗罗霞在那里成长的小城格尼切斯克、集体农庄的森林、渔民的习俗、诗歌、写作技巧和其他种种在引人注目这一点上并不逊色的事物。

弗罗霞最喜欢诗歌。有一次，戈尔连科躺在海滨浴场开始轻声朗诵普希金的诗句“飞渡的云团变得渐渐稀疏……”，这时她转过脸去哭了起来。不过她马上又大笑起来，于是在她眼里闪动的感激的泪花和喜气洋洋的笑容，仿佛以一种新的暖意为熟悉的词句作了注释：“傍晚的星星，悲伤的星星，你的光辉给凋零的平原洒满银光……”

我们装作没有注意弗罗霞的眼泪，但是矿工却说：

“真奇怪！不管怎么样，还是活在世界上有意思。”

不久，我和戈尔连科坐汽车北上回家。

白杨在道路两旁喧哗。一堆堆芳香的树叶在车窗外飞速地扑面而过。突然在这万绿丛中出现了爬满常青藤的一座座淡紫色花岗石山崖。清澈的小溪横穿公路，丁丁冬冬地流淌。每次遇到这样的溪流，汽车都要减速，似乎想畅饮这清水。

罂粟的花瓣随风轻扬，宛如一群群蝴蝶。远方蒸腾的热气

里耸立起一座陡直的石梁，司机严肃地说，他在这平整的山壁上见到过钉进岩石里的系缆绳的铁环，因为据说在远古时代这里曾是大海。

在辛菲罗波尔早晨的集市上样样东西都挂满了晶莹的露珠：牛奶罐、冰凉的萝卜、葱束和硕大的牡丹。

我们离开了，但是休养在继续。怡人的克里米亚无论如何不愿意放我们去北方。草原上，群山柔和的山脊还在远方久久地呈现它蔚蓝的色彩。

在锡瓦什湾的岸边，琼加尔桥的对面，我们才和克里米亚告别。

发热的汽车停在一座小山上合欢树羽状叶的阴影里休息。从这里可以望见亚速海，直至它红褐色黏土海岸的最边缘，都注满了浓浓的蓝色。海上的山岬上一座小镇呈现出一片白色，犹如许多海鸥停在低矮的花园中婆娑的绿荫里休息。这就是工人小城格尼切斯克——弗罗霞的故乡。

也许戈尔连科因此才想起了弗罗霞和从戈尔洛夫卡来的矿工，于是向我讲述了他们恋爱和生活的故事。原来他已经赶在我前面了解了这一切。我也觉察了弗罗霞对待矿工那种童稚的温柔，所以我觉得我目睹了一种伟大而忘我的爱情。

这个故事非常优美，虽然十分普通。

在琼加尔郊外的一场战斗中，矿工负了重伤。一个女救护兵匍匐着来到他跟前。她就是弗罗霞。她对他进行了包扎，就在此时她自己也被炮弹的弹片击伤。这时矿工几乎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包扎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然后他们就久久地躺在草原上，直至被人收留并送往卫生营。弗罗霞对戈尔连科说她是一个孤儿，一个人生活，而在这里，在这个多风的夜晚她听到身边被她抢救的那个人沉重的呼

吸，于是明白现在对她来说他不是外人，同情的伟大力量使他们成为了亲人。

昏暗的星星在锡瓦什湾上空闪烁，映照在海湾的死水里，这时弗罗霞认为，现在在这冰冷的草原上，在这个被杀人的炮火不祥的闪光照亮的臭海岸边，在多刺的草丛间，她找到了惟一比死亡更强大、比痛苦更强大、比世间一切都更强大的东西——一个亲人的心灵。

"就这些，"戈尔连科说，"生活没有给他们的爱情添加任何装饰品。让作家们去杜撰修饰品吧。不过我认为这完全是多余的。"

我同意他的观点。后来当汽车在公路上飞驰，路两旁的扎波罗热草原在昏暗的暮色中笼罩在雾里、烟里而隐没的时候，我想到在这些休养的日子里，除了在那里与最朴实的人们相遇外，没有发生过任何非同寻常的事情。而在他们的朴实之中却展现了多少彼此间的善意、愉悦、心灵的纯洁和对自己事业的忠诚，甚至不需要任何豪迈的壮举来使这个高尚的民族受到好评和爱戴。

1953 年

沈念驹 译

一篮云杉球果

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①] 在卑尔根[②] 附近的森林里度过秋天。

整个森林连同适合蘑菇生长的空气和瑟瑟作响的树叶声，都显得很美。但是尤其美丽的要数海边的山林。在那里听得见海浪拍岸的声音。雾气不断地从海上吹送过来，由于湿气很足，苔藓长得蓬蓬勃勃。一绺绺绿色的青苔从树枝上挂下来，一直垂及地面。

此外，山林里还活跃着欢乐的回音，就如嘲鸫鸟[③]似的。那回音就等着接应任何一种声音，然后越过巉岩把它反弹回去。

一次格里格在森林里遇见一个梳两根小辫子的小女孩——护林人的女儿。她正往篮子里捡云杉球果。

时令正是秋季。假如能把地球上所有的金和铜收集起来打成千千万万片薄薄的树叶，那也只能组成这漫山遍野秋装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且和这真正的树叶，尤其是山杨树叶比较起来，锻造的树叶看上去就粗笨不堪了。谁都知道山杨树叶即使遇到鸟叫也会颤抖。

"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格里格问。

---

① 格里格(1843—1907)，挪威作曲家，指挥家。

② 卑尔根，挪威港市，在比峡湾。

③ 嘲鸫鸟，又叫嘲鸫鸟，雀形鸟类，分布于美洲，善于啼鸣，并能模仿各种声音。

“达格尼·佩德森，”小姑娘轻声回答。

她轻声答话并非由于害怕，而是由于腼腆。她不可能害怕，因为格里格的双眼含着笑意。

“真糟糕！”格里格说，“我没有可以送给你的东西。我口袋里既没有带玩具娃娃，也没有带彩带，更没有带长毛绒兔子。”

“我有一个妈妈的旧玩具娃娃，”小女孩答道，“她曾经会闭眼睛。就像这样！”

小女孩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待她重新睁开眼的时候，格里格发现她的瞳仁是绿莹莹的，里面闪烁着树叶的光芒。

“可是现在她睡觉却睁着眼，”达格尼伤心地补充说，“老人都睡不好。爷爷也整夜哼哼唧唧的。”

“达格尼，你听着，”格里格说，“我想出来了。我要送给你一件有趣的东西。不过不是现在，要过大约十年。”

达格尼甚至拍了一下手掌。

“嗬，要这么久！”

“你要明白，我还需要把它制作出来。”

“那么是什么东西呢？”

“以后你会知道的。”

“难道一生中，”达格尼正色问道，“你一共才能制作出五六件玩具来？”

格里格窘住了。

“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犹豫地回答说，“我把它做成功也许只需要几天时间。但这些东西不是送给小孩儿的。我做这些礼品是给成年人的。”

“我不会把它拆坏的，”达格尼恳求地说，一面扯着格里格的袖子，“我也不会把它折断。您看得见的！爷爷有一艘玻璃做的玩具船。我给它擦灰尘，哪怕最小的一个片片我也一次没有弄

下来过。”

“她完全把我弄糊涂了，这个达格尼，”格里格沮丧地想道，于是说了些成年人在孩子面前陷入尴尬境地时常说的话：

“你还小，许多事还不理解。学会忍耐吧。现在把篮子给我，你提着它很吃力。我送你回去，我们还能说些别的事。”

达格尼叹了口气，把篮子递给了格里格。篮子确实很重。云杉球果含有许多树脂，所以比松果要重得多。

当树丛间露出护林人房子的时候格里格说：

“好吧，达格尼·佩德森，现在你自己跑回家去吧。挪威有许多女孩儿和你同名同姓。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哈盖鲁普，”达格尼答道，接着皱皱眉头问：“难道您不去我们家啦？我们有一块刺绣的桌布，一只红褐色的猫，还有一艘玻璃船。爷爷会让您把它拿在手里。”

“谢谢。现在我没有时间。再见，达格尼！”

格里格抚了抚小姑娘的头发，就向海的方向走去。达格尼紧锁双眉目送着他。她把篮子挎在身子一侧，一些球果从里面倒了出来。

“我要写一首乐曲，”格里格打定主意。“在封面上我要吩咐印上：‘献给护林人哈盖鲁普·佩德森的女儿达格尼·佩德森，祝贺她年满十八岁。’”

在卑尔根一切都按老的方式进行。

凡是能吸收声音的一切东西——地毯、厚门帘和柔软的家具——格里格早就从家里清理掉了。只剩下一只旧沙发。这沙发坐得下十个人，所以格里格舍不得扔掉。

朋友们说作曲家的家像一个樵夫的陋室。它惟一的摆设就是一架钢琴。如果一个人具有想像的天赋，那么他在这白白的

四壁中间会听出神奇的声音——从北方大洋上在雾里、风里滚滚涌动的波涛，吹奏出来的民间史诗般强烈音响的轰鸣，到哄破布做的小娃娃睡觉的小姑娘的歌声。

钢琴能唱出一切——唱出一个人心中追求伟大理想的激情，唱出爱情。白色的和黑色的琴键在格里格强劲的手指下飞速跳动的时候，道出了满怀愁绪，发出了欢快的笑声，响起了暴风雨的轰鸣和愤怒的吼声，但是蓦然间又戛然而止万籁无声了。

于是在寂静之中只有一根细细的琴弦在久久回响，仿佛灰姑娘受到姐妹们的欺侮后在嘤嘤啜泣。

格里格把身子向后一仰，倾听着，直至厨房里这最后一丝音响止息，那里早就住进了一只蟋蟀。

水滴在龙头里宛如节拍器那样精确地一秒秒数着时间的嗒嗒声，变得清晰可闻。水滴反复在说着一句话：时间不等人，应当赶紧完成计划好的一切。

格里格谱写送给达格尼的乐曲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冬季开始了。全城笼罩在雾里，只露出屋顶。

来自不同国度的生锈的船只纷至沓来，停在木码头边昏昏欲睡，轻轻地吐着蒸气。

不久开始下雪。格里格从自己的窗口看到雪花斜飞，挂到树梢上。

不管我们的语言多么丰富，音乐当然是无法言传的。

格里格描写的是未婚少女和幸福迷人的巨大力量。

他在谱写时看到一位少女睁着一双水灵灵绿莹莹的眼睛，高兴得气喘吁吁地迎面向他跑来。她拥抱着他的脖子，将热乎乎的面颊紧贴在他花白的、刮净的面颊上，"谢谢！"她虽然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感谢他，却这样说道。

"你就像太阳，"格里格对她说，"就像和煦的风和新鲜的早

晨。你心里盛开着白色的鲜花,使你全身充满了春天的芬芳。我看到了生命。不管人们怎么向你讲述生命,你永远要相信,生命是异常优美和美丽的。我已是老人,但我向青年奉献生命、工作和才华。我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一切。因此我可能比你还幸福,达格尼。

"你是闪耀着神秘光芒的白夜。你是幸福。你是朝霞的光芒。你的声音会使人的心灵颤动。

"而且一切都会得到祝福,无论你周围的一切,轻轻触碰你的一切,你轻轻触碰的一切,使你高兴的一切,还是使你沉思的一切。"

格里格这么思索着,就将他思索的一切弹奏出来。他怀疑有人在偷听。他甚至猜测到谁在这么做。那是树上的山雀,从港口散步归来的水手,邻居家的洗衣女工,蟋蟀,从低垂的天空飘落的雪花和穿着织补过的衣服的灰姑娘。

每一个都按自己的理解在倾听。

山雀激动不安。不管它们如何辗转不息,它们的唧唧叫声掩盖不了琴声。

散步归来的水手们分坐在屋前台阶上一面嘤嘤啜泣,一面倾听。洗衣女工弯着腰,用手掌擦着哭红的眼睛,摇着头。蟋蟀从瓷砖壁炉的缝隙里爬出来,从缝隙里窥视着格里格。

飘落的雪花停顿下来,悬浮在空中,想听听如清泉般从屋子里流溢出来的琴声。灰姑娘则面带笑容望着地板。她的一双赤脚边放着一双水晶鞋。水晶鞋彼此碰撞着发出颤音,来呼应从格里格屋里飞出来的和弦。

与音乐会上穿着入时、彬彬有礼的听众相比,格里格更看重这些听众。

十八岁那年达格尼中学毕业了。

父亲借此机会吩咐她到克里斯蒂安尼亚[1]他姐姐玛格达家去作客。让娃娃(父亲还把她当成小娃娃,其实达格尼已出落成一个拖着一双沉甸甸的淡褐色辫子的娉婷少女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模样,人家怎么生活,也让她乐乐。

谁知道将来等待达格尼的是什么呢?也许是个诚实而又爱她,但有点小气和乏味的丈夫?或者是一份在乡村小店里当售货员的工作?或者在卑尔根许多轮船公司办事处中的一家谋个差事?

玛格达在一家剧院里当裁缝。她丈夫尼尔斯在同一家剧院里当理发师。

他们住在剧院里的一间斗室里。从那里望得见飘扬着五颜六色海轮旗帜的海湾和易卜生纪念碑。

敞开的窗户里整天传来轮船的鸣笛声。尼尔斯姑夫对这些轮船的声音已经研究得透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可以正确无误地听出哪一艘在鸣笛——是来自哥本哈根的"诺德尼号",还是来自格拉斯哥的"苏格兰歌手号",还是来自波尔多的"贞德号"。

玛格达姑妈的房间里有许多剧院用品:锦缎,丝绸,透花纱,带子,花边,古色古香的细毡帽,上面插着黑色鸵鸟毛,茨冈人的披肩,白假发,装有铜马刺的长筒靴,长剑,扇子和折弯处磨旧的银白色鞋子。所有这些都得缝补、修理、清洗和熨平。

墙上挂着从书本和期刊上剪下来的画片:路易十四时代的骑士团骑士、穿撑裙的美女、古西欧骑士、穿萨拉凡的俄罗斯妇女、水手和头戴橡枝冠的海盗。

进房间需要上陡直的楼梯。那里总是散发出涂抹过的颜料

---

[1] 克里斯蒂安尼亚是挪威首都奥斯陆在一六二四至一九二四年间的名称。

和油漆的气味。

达格尼常到剧院去。这是一件叫人心醉神迷的事。但是看完戏后达格尼久久不能入睡，有时甚至在自己床上哭泣。

玛格达姑妈吓坏了，便安慰达格尼。她说不能盲目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事。但是尼尔斯姑夫却为此而叫玛格达为“抱窝的母鸡”，他说情况相反，戏里演的事什么都该相信。否则人们就什么戏也不需要演了。于是达格尼便相信了。

然而玛格达姑妈仍然坚持说，为了多长见识，应当去听音乐会。

尼尔斯对此也不反对。“音乐嘛，”他说，“是天才的镜子。”

尼尔斯喜欢说高雅而又难以捉摸的词语。说到达格尼，他说她像序曲的第一和弦。而玛格达呢，用他的话来说，则对人有一股神奇的控制力。这股力量的表现就是玛格达缝制的是戏装。可是谁不知道，一个人每次在穿上新装的时候就彻底换了个模样。结果常常是这样，同一个演员，昨天是面目可憎的凶杀犯，今天成了热情奔放的恋人，明天又将是国王的侍从丑角，后天则成了人民英雄。

“达格尼，”在这种场合玛格达姑妈便大声嚷嚷，“把耳朵堵起来，别听那些可怕的胡说八道！这个睡阁楼的哲学家，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那是温暖的六月。正值白夜。音乐会在市立公园露天举行。

达格尼同玛格达和尼尔斯一起去听音乐会。她想穿自己惟一的一件白连衣裙。但尼尔斯说漂亮姑娘的穿戴，应该在周围环境中显得不同一般。总之，他那些滔滔不绝的话，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归结为一条，那就是在白夜一定得穿黑衣，反过来，在黑

夜要显示衣服的白颜色。

要驳倒尼尔斯是做不到的，达格尼穿了一件柔软的丝质黑天鹅绒连衣裙。这件衣服是玛格达从服装保管室带来的。

达格尼穿上这身衣服时，玛格达服了，认为尼尔斯大概是对的——除了这件神秘的丝绒衣服，任何衣服都不会使达格尼端庄白皙的面容和她那带有年深日久的黄金光泽的长长发辫显得那么鲜明。

“你看看，玛格达，”尼尔斯姑夫轻声说，“达格尼是那么漂亮，仿佛是初次去和情人约会。”

“说的正是！”玛格达答道，“你第一次来和我约会时我怎么没有看见身边有个疯狂美男子。你在我面前简直是个饶舌鬼。”

于是玛格达亲了亲尼尔斯姑夫的头。

港口的那门古老大炮照例在晚间鸣响，接着音乐会便开始了。鸣炮表示太阳已经下山。

尽管已经是晚上了，但是无论指挥还是乐队队员都没有打开乐谱架上方的灯。夜晚是那么明亮，在椴树叶丛间亮着的灯，只是为了使音乐会更加漂亮才点的。

达格尼第一次听交响乐。它在她身上产生了奇异的作用。乐队奏出的所有悠扬婉转的乐音和轰鸣，都在达格尼脑海中唤起一幅幅梦境般的画面。

然后她浑身一颤，抬起了头。她仿佛觉得穿燕尾服的那个瘦瘦的男人在宣布音乐会节目时提到了她的名字。

“是你在叫我吗，尼尔斯？”达格尼向尼尔斯姑夫扫了一眼问道，随即皱起了眉头。

尼尔斯姑夫望着达格尼的眼神既不是惊恐，又不是赞叹。玛格达姑妈把手帕紧紧地摁在嘴上，用同样的目光望着她。

“发生什么事了？”达格尼问道。

玛格达抓住她的手悄声说：

“你听！”

这时达格尼听到穿燕尾服的人说：

“最后几排的听众要求我再说一遍。总之，现在将要演出的是爱德华·格里格献给护林员哈盖鲁普·佩德森的女儿达格尼·佩德森的著名音乐剧，以祝贺她年满十八岁。”

达格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得连胸口都痛了。她想用这口气忍住涌到喉咙口的泪水，但是无济于事。达格尼低下头，用手掌蒙住了脸。

起先她什么也没有听见。风暴在她内心汹涌。后来她终于听到牧笛在清晨歌唱，弦乐轻轻一颤应声而起，用几百个人的声音作出反响。

悦耳的乐音逐渐增强，逐渐高涨，发出狂风一般的怒号，迅速吹过林梢，将树叶纷纷刮落，将草儿吹得摇曳不停，迎面吹来一滴滴清凉的水珠。达格尼感觉到有一股气流从音乐中飘逸过来，于是强制自己安宁下来。

不错！这是她的森林，她的故乡！是她的山岳，是牧笛的歌声，是她的大海的喧哗！

玻璃的船舰使海水泛起泡沫。风儿吹得它们的缆索发出阵阵呼啸。这声音不知不觉地变为林间此起彼伏的铃声，变为在空中翻飞的鸟儿的欢唱，变为孩子们的呼喊，变为一曲少女之歌——黎明时亲爱的人儿将一把沙子撒进她的窗户。达格尼在自己的山间听到过这支歌。

那就是说，这是他！那个头发花白的人，他帮她把一篮云杉球果送到家里。这人原来是爱德华·格里格，神奇而伟大的音乐家！可她还责怪他不会抓紧工作呢。

原来这就是他答应十年以后完成的那份礼物！

达格尼毫不掩饰地流出了感激的泪水。在那以前,乐声已充溢了从大地到低垂在城市上空的白云之间的全部空间。由于音乐的声浪,云端出现了轻盈的涟漪。透过这涟漪闪烁着点点星光。

音乐已经不是在歌唱。它在呼唤。它呼唤人们到那个国度去,在那里任何痛苦都不能使爱情冷却,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夺去对方的幸福,在那里发光的太阳就像童话里好心的女魔法师头上戴的王冠。

在此起彼伏的音响中突然冒出一个熟悉的声音。"你就是幸福,"是他在说,"你就是朝霞的光芒!"

乐声停止了。起先是徐缓地,继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地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达格尼站起来,快步向公园的出口走去。大家回过头来看她。也许有几位听众脑子里想到了,这个姑娘就是格里格把自己不朽的作品献给她的那个达格尼·佩德森。

"他已经死了!"达格尼思忖道,"为什么?"如果能见到他该有多好!但愿他能在这里出现!她该怀着跳动得多么激烈的心脏迎着他跑去,抱住他的脖子,把泪湿的面颊贴紧他的面颊,只说一个词:"谢谢!""为什么?"他会问。"我不知道……"达格尼会这样回答。"因为您没有忘记我。因为您的慷慨。因为您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人应当生活的最美好的境界。"

达格尼走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她没有发现尼尔斯跟在她后面,是玛格达吩咐他来的,他竭力不让她发现自己。他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走着,口里喃喃自语着他们无人一顾的生活中发生的奇迹。

昏暗的夜色已经降临到城市上空。然而北方的曙光已经把淡淡的金色涂抹到各家的窗户上。

达格尼走向海边。大海还沉睡在梦乡,没有一丝拍岸的水声。

达格尼攥紧了双手,她自己虽然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对这个世界的美的感受,但这种感受却已充溢了她的全身,她呻吟起来。

“听着,生活,”达格尼轻声说,“我爱你。”

她睁大了眼睛望着轮船上的灯火,笑了起来。这些灯火在清澈的灰色海水里徐徐晃荡。

尼尔斯站在远处,听到了她的笑声,便走回家去了。现在他对达格尼可以放心了。现在他明白了,她的生活不会虚度。

1954 年

沈念驹 译

穿旧军大衣的老头

在我们俄罗斯，孤零零地散落在田野和小树林中间的村庄有成千上万。成千上万个村庄是那样的不起眼，就像灰色的天空，就像那些浅色头发的农民的孩子。这些孩子遇见陌生人，总是垂下眼睛站着，但是如果他们抬起了眼睛，那么眼睛便射出那样一种信任的目光，使得对方为此而感到紧张。

在不可胜数的索斯诺夫卡、尼科尔斯科耶、戈列雷·德沃里克中间，难得碰上一个村庄拥有引人注目的、有时还是不同凡响的名称，就像坦波夫州的好望角，或者奥斯特罗戈日斯克近郊某地的摇篮村那样的名称。

有这样奇怪名称的乡村，总是让人觉得它们一定和有趣的故事有联系，它们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在我对俄罗斯农村知之甚少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我有机会更好地了解祖国以后，我确信几乎没有一个村庄——甚至最贫困的村庄——没有引人注目的故事和人物。

就拿现今图拉州的小城叶夫列莫夫——就是那个叶夫列莫夫，用契诃夫的话说是俄罗斯所有县城中最偏僻的一个——的四郊为例吧。这座小城周围的乡村该有多么荒僻啊！

乍一看，情况确实如此。然而这只不过是乍一看。

一九二四年整个夏季我都住在叶夫列莫夫近郊的波戈沃村。已经是革命后的第七个年头，但是外部的变化暂时还不那

么多。

村外依然是稀稀拉拉的燕麦地在单调地瑟瑟作响，风吹过麦地，带起阵阵麦浪。依然是叮满苍蝇的摇篮，里面躺着头戴肮脏退色的包发帽的吃奶婴儿。赶集的日子里，大路上大车辘辘地开过，农妇们裹着包脚布，颠颠晃晃地坐在上面，用故意装出来的欢乐嗓音尖声怪气地唱着粗俗的歌曲。在腐烂的水坝边，无精打采地潺潺流淌着一条叫克拉西瓦亚密恰（当地居民叫克拉西瓦亚密奇）的小河。

在波戈沃住了一阵以后，我得知距叶夫列莫夫不远保留着莱蒙托夫父亲的庄园。那里有一间干得裂缝的房子，墙上挂着一件诗人尘封的军服。据说莱蒙托夫前往高加索流放地时经过这里，便在父亲那里稍作停留。我知道，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曾在克拉西瓦亚密恰河两岸打过猎，契诃夫和蒲宁也到过叶夫列莫夫。

不过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想寻找的却是现在的事，寻找与新时代相关的人。

然而仿佛故意跟我为难似的，波戈沃甚至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国内战争——即使目睹不久前发生的事件的人也一个没有。同样，仿佛也是故意安排好似的，村里住着一名退休上校，根据人们的说法判断，他是一个孤独而沉默寡言的人。他为什么迁到波戈沃来，谁也没能对我解释清楚。

“住着就住着呗，”农民们说，“眼下又没有做坏事。租了间小屋，自己给自己煮土豆吃，再就是成天拿根钓鱼竿坐在河边。怎么说他呢——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头啦。”

“他为什么住在这里呢？”

“鬼知道！向他打听这事似乎不合适。前年来的，就住下了。咱们这地方闭塞得很。他这个旧军官在这儿要担心的事当

然要少些。您自己知道，如今军官就跟口蹄疫似的。谁见了都想从一边绕着走。”

我是在克拉西瓦亚密恰河上水磨坊的拦河坝附近遇见这位退休上校的。

那是一个阴沉沉、凉飕飕的日子，夏季有时会出现这样的天气。松散的云团在大地上空徐徐爬行，透过云层很不情愿地落下几滴雨点。后来雨停了。

我到磨坊的水潭边钓鱼。拦河坝附近的一根原木上坐着一个瘦瘦的老头，他留着长长的花白胡子，穿一件旧军大衣，戴一顶灰便帽。大衣上本来应有镀金制服钮扣的地方缝上了普通的黑钮扣，就像女人斗篷式外衣上的那种。

老头抽着用一截瓦斯管做的烟斗。烟斗想必很沉。老头在原木上磕烟斗时，那声音就像在敲钉子。

老头钓鱼用一根钓竿，一开始没有注意我。

我用的是三根钓竿，因此我这儿的鱼老是脱逃。我给一根钓竿换蚯蚓时，另一根钓竿就像故意跟我为难似的一定有鱼咬钩。我去抓那根钓竿为时已晚，拉出水面只剩下咬剩的一段蚯蚓了。而老头却有时不慌不忙地拖出一条条大大的铅色软口鱼和肥肥的拟鲤鱼。

他望望我手忙脚乱伺弄钓竿的样子，不以为然地咳上几声。显然他看到我这样子感到很恼火。最后他忍不住了，便说道：

“年轻人，钓鱼应该用一根钓竿，以便保持心境平静。您这样只会使神经紧张。”

我听从他的劝告，收起了两根钓竿，开始用一根竿子钓。当即就钓上一条大鲈鱼。老头冷冷一笑。

“看见了吧！”他说，“用三枝枪一下子打三个靶是打不中的，大都会落空。看到您这样荒唐地空钓，心里就不舒服。”

我们从河边回波戈沃村时，天色已经很晚了。老头走得很慢，望着脚下，一次也没有抬起头来。所以我们到达村子时已是漆黑一片，既潮湿又不舒服。

一路上，老头告诉我如何煮豌豆做钓软口鱼的鱼饵，所以我没有适当的机会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到波戈沃来住。据我所知，他在这儿没有一个亲近的人。

红红的乌云在西方徐徐消失。麻鹬凄凉地鸣叫着。冰凉的雨点重又淅淅沥沥地打在牛蒡叶上。夜晚这种愁闷气氛感染了我，使我想到暮年的孤独，想到在我旁边蹒跚而行的那个穿旧军大衣的人。

我们聊天时，老头只有一次提到自己，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过驻波兰的奥索韦茨要塞司令。就在那里的博布尔河上，他钓的可不是这种软口鱼！

夏季一天天过去。老头对自己的过去固执地缄口不言，而向他打听又确实不合适。有一次我试图转弯抹角地向他打听需不需要什么帮助，然而老头对我的问话只报以一声冷笑，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任你怎么办，这个老头的全部经历却变得更加神秘了，尤其在我得知一个情况以后：每个月他收到从叶夫列莫夫寄来的什么通知便进城去，回来时虽很疲乏，却很满意。而且每次都带礼品回来给乡下孩子和自己的邻居娜斯佳——一个尚未年老已被丈夫抛弃的多子女妇女。他带给孩子们的是有黏性的水果糖，带给娜斯佳的有时是一包茶叶，有时是一个线团。

我没有见到过像娜斯佳那样性格温和的人。她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流露出她那束手无策的样子和善良心地。她总是歉疚地微笑着，慌里慌张地整整头巾下的头发，而她的手却在发

抖。她看人的目光是不知所措的，我简直不好意思进屋去看她——娜斯佳会立即跑过去用衣服下摆擦凳子和桌子，把抱窝的母鸡连同小鸡都赶到过道里，脸红得泪汪汪的，还急急忙忙摆上有点瘪陷和发绿的茶炊。

终于到了秋季。我打算过几天回莫斯科去。

离开有些地方时，总想什么时候还会回来。这比离开你明知将永不复返的地方要轻松些。在后一种情况下必会产生一种痛苦的感觉，仿佛你在这里留下了一小块心脏。

不管你离开的地方多么寂寥和沉闷，不管你到这个地方感到多么压抑，你心里总要留下一份惋惜，而且可能是一份爱意。

一个母亲大概也是这样爱自己那个玩烂木片的病弱孩子的。她爱他爱得要掉眼泪，爱得要痛苦呻吟——他是那样无可奈何，注定在健康而欢笑的孩子中间只能是孤独一人。

我想到孩子显然是因为娜斯佳就有这样一个有病而文静的男孩。他名叫彼佳。

他已经六岁，但几乎还不会说话。他成天坐在路上，把尘土从一个手掌倒进另一个手掌，不吭一声。

一次我走到他身边，蹲下来和他说话。他惊恐地望了我一眼，皱起眉头，无声地抽动起来——用袖子掩住脸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我手足无措地问，碰了碰他洗破了的衬衫下抽动着的瘦骨嶙峋的肩膀。

我什么也弄不明白。我只看见这个小小的、哭得透不过气来的生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而别人又无从得知的巨大痛苦。

"你怎么啦？"我又说了一遍，蓦然间一个想法像刀刃一样划了我一下："说不定他明白自己有什么毛病？"

娜斯佳从农舍里跑出来，抓住孩子的双手，跟往常一样露出

歉疚的笑容说：

“他有病，是个傻瓜，笨得很，我这孩子。您别生气。不管您对他多好，他就会哭。”

突然娜斯佳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她用恶狠狠的声音说：

“这些该死的粗汉，恶棍，我恨不得亲手把他们都掐死！他们活着光知道整桶整桶地喝酒，骂娘。再就是生下一批这样的孩子，接着你的心就要为他们流血累死。我这孩子还小，但是个活生生的人。可没有人替他说话。”

我刚决定离开这里，马上又情不自禁地想留下来。周围的一切突然展现出一副新的面貌——无论人、牧场还是这黑黝黝的秋天的大地。

下着雨，阴云密布的白昼宛若黎明时分，农舍里变得潮湿而寒冷。只有一堆堆落叶用冷冷的黄色火焰给大地增添了光彩。

动身前，我最后一次和老头——他叫彼得·斯杰潘诺维奇——去钓鱼。在这天以前雨已停了，可是大地上方整天都弥漫着雾气。即使到中午雾也不散。

我问老头他可要在莫斯科办什么事。

“没有，谢谢，”他答道，“我是再也见不到莫斯科了。在这里度完余生。我无处可去，也无事可去。我是个老懒汉，既无妻室，又无儿女。关于朋友也无话可说。有的已经作古，剩下的也都各奔东西了。而且说实话，在旧军队里我也没什么朋友。不过一二人而已。”

“为什么？”我问道。

“我是个士兵的儿子。父亲是骑兵司务长。按旧时的说法我出身农家，出身平民。平民出身。如果不是这一点，我从旧军队里退伍的时候会只有上校军衔吗？像奥索韦茨这样的要塞司

令，理应当上将军。老实说吧，我之所以被容忍，无非是由于办事认真，再就是熟悉炮兵业务。干炮兵我可不赖。"

"您为什么不结婚？"

"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件丢人的事，"老头答道，接着停下来喘口气。他那骨瘦如柴、脊背微驼的样子，使我感到有点像可怜的堂吉诃德的形象。老头的眼里流出了泪水。他掏出一块方格红手帕，擦掉了眼泪。

"现在我有点后悔这件事，"他缓过气来后说道，"不是因为我没有妻子，去她的吧，妻子，我看够了这些军官太太，而是因为既无女儿又无儿子。如果无人可以关心，活着也是空虚的。冷冷清清地活着。所以我就为别人的孩子，那些小娃娃瞎张罗。"

我终于壮起胆问他：

"您怎么来到波戈沃的？"

"这呀，亲爱的，从地理的角度说可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说了反正您也不会相信。简直是人到老年的一桩荒唐的奇遇。其实我到这儿来的过程很简单。我听说有条克拉西瓦亚密恰河，听说这里景色迷人，就决定在这里度过余生。而在作出这个决定前却有过一件叫人惊异的事。我本人至今对此还惊讶不已。"

"什么事？"

"您这个人神经有毛病！"老头责备地说，"我喜欢说话有条有理。可您老是这呀那呀打岔，又没有任何意思。总是静不下心来。"

"好，彼得·斯杰潘诺维奇，"我歉疚地说，"我再也不打断您的话了。"

"这就好！革命爆发了，那时我已经退休，住在卡利亚津。退休金当然没有了，肩章也拆下来啦，带纹章的钮扣也拆掉了，

就是便服没有搞到。买不起。我明白我应当离开卡利亚津到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去。在卡利亚津我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样。我知道我应当隐没在茫茫人海中。可是除了莫斯科还有什么地方人多呢？我于是到了莫斯科。在彼得罗夫公园一个老寡妇家租下一角地方。我退休金余下的钱已寥寥无几。但是勉强维持着，一点点挤出来马马虎虎糊口度日。我那位房东老太太是个身体虚胖而心地非常好的女人，她大概有病——器质性心脏病。女儿和她一起住，是个共青团员。她似乎没有注意我。我也弄不清楚——是真的没有注意我还是装装样子。不过说实话，我这个人一向很随和，尤其是在当时，只要留意一下我当时的窘境就不难明白。像我这样孤零零一个人，有一句口号：静静地坐着，没有特殊需要别把鼻子伸出洞去。沙皇军队在人民脖子上套了枷锁。这我一直是明白的。而在生活中一切都是要偿还的。

“是的，我过得很寒酸，你想像不出比那更寒酸的处境了，直到终于花完我最后的几个卢布。谁也不愿意死，而且在我的房东面前也不好意思。我两夜没有睡，一直思量着，最后想到只有那条路：去乞求施舍，要饭，做个彻头彻尾的乞丐。”

老头停顿下来，似乎困惑莫解地望望我。

“您设想一下——当一个真正的乞丐！这不是生活，而是像坟墓里那样的腐烂。自己不喜欢自己，看着自己就反感。当时我一直在寻思：上帝快点让我死吧，随便怎么死都成，即使是最卑贱地死去，也比这么屈辱地活着强。有的人能习惯，我却做不到。讨饭也要技巧、经验、装样子。而这方面我一窍不通。

“我在彼得罗夫公园里行乞，再也没有走远一步，我有点害怕。我走近一家房子乞讨。我站在角落里，眼睛也不敢抬，不好意思正面朝行人看。我拄着棍子站着，嘴里喃喃地说着，那些话

现在想起来都叫人恶心。'给我这个无家可归的老头买块面包的钱吧。'说实话,人们没好好施舍过。我那件军官大衣把大家吓跑了。常常受到侮辱,简直叫人气得头都发冷。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都忍下了。

"晚上我回到自己的角落,数小钱、铜币,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雾茫茫的一片。您相不相信,我不止一次想到自尽。如果不是碰上一个机会,那就已经自尽了。做这种事用不了很长时间。"

我和老头走到磨坊的水潭边,在一根潮湿的原木上坐下——那是彼得·斯杰潘诺维奇往常坐的地方。

"好像有点冷,"他说,于是竖起了大衣领子。领子的反面还是鲜艳的蓝灰色,正面却已退色、泛黄。

虽然没有风,天倒确实冷起来了。云团表面出现了几乎冬天才有的一层瓦灰色,在这样的天气这种现象总是常见的。

"是啊,"老头抽起烟斗说,"一个夏天我回家比平时早,带回来的钱少得您简直不会相信。一个小男孩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硬币。这就是全部!一天乞讨的结果。这枚硬币大概是他玩掷角子游戏用的——完全被磨破了,损坏了。就是电车上也不收这种钱,除非在残废人市场。

"那时我的腿已经开始浮肿。我打定主意,夜里就结束这令人讨厌的生活,再不能为活下去而苦苦挣扎了。还活着干什么?谁需要我这个丧失社会地位的人?我不知怎么产生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想法,觉得应当和故土、和明朗的天空、和太阳(它已经西斜了)、和鸟还有树道个别。

"我走上街头,坐在公园大门口一条长凳上。那时候彼得罗夫公园里的道路有点像乡下的路,长满了野草,头顶上莫斯科的老椴树在风中沙沙作响。

“我坐着，脑子里一片空白。斜对面，正对着我们住的屋子，是航校学生的宿舍。这些人好嘲弄人，好打架闹事。对谁都纠缠不休，尤其是对我。一见到我，就从窗口探出身子，大声呼叫：‘老家伙！斯科别列夫[①]！老古董！’我像聋子似的走了过去。

“我就这样坐在长凳上，看见一位个子不高的先生从我们这边走过来，他穿一身黑西服，戴一顶便帽。他从容地走着，双手反背在西装的后襟下，看样子在思索着什么。他停下来望望椴树，仿佛在树丛里找寻什么，又继续向前走。走到我身边时他停了下来，说话很快，仿佛开玩笑似的：

“‘您允许我和您一起坐一会儿吗？’

“‘请吧，’我说，‘谁坐这儿都不会被禁止。只是请您坐得离我远一点儿。’

“他眯起眼睛，收敛起笑容，非常专注地瞧了我一会儿。

“‘这是为什么？’他问。

“我没有吭声，他又重问：

“‘这是为什么？’

“‘您怎么自己没瞧见，’我有点没好气地回答，‘我是个要饭的。’

“他又瞟了我一眼，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不错，我瞧见了。您过得很不好。’

“‘没有比这更坏的。只不过靠别人的怜悯勉强活着罢了。从人家手里讨口饭吃。’

“‘您从前是军官吗？’

“‘是军官，’我回答。‘是狗！身上打上烙印的人——就这么回事！’

---

① 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步兵上将。

他突然露出微笑，显得那样和蔼，我简直呆住了。

"'等一等。'他说，'您别激动。军官也是各不相同的。'

"'这就对了，各不相同，可是所有的人得出的答案却只有一个。我本人当过奥索韦茨要塞司令，曾经叫所有那些一心想虐待士兵的人闻风丧胆。我尽一切可能提出诉讼。俄罗斯的士兵是圣人。这点您请记住。俄罗斯士兵的双手造就了我们的全部历史，顺便还有你们的革命。'

"这时他稍稍往后仰了仰身子，大声笑了起来，从那笑声里我感觉到我在回答他的时候露出了笑容。他开始详细询问旧军队的情况，奥索韦茨的情况和不久前的那场战争的情况。我把一切都对他作了详细说明。同时我说我们作为军人，早就从密令中得知在准备战争了，他对我这些话不知为什么特别感兴趣，而且老是说'对，对！是啊，是啊！后来怎么样？'接着他直截了当地问我：

"'您对布尔什维克怎么看？他们会出什么问题吗？'

"'当然啰，'我说，'不会出问题！您这是干什么，亲爱的先生！难道您自己没发现！这一切好是好，不过还应当留心，不能让人民丧失道德面貌。'

"他重又看了我一眼，那神情似乎有点寻根究底，同时说：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不过像您这样生活，可不行。绝对不行！我给您往一个地方写张条子，您带着这张条子到那里走一趟，说不定会给您帮助。'

"他掏出便条本，迅速地在上面写了几行字，交给了我。我拿了，折起来放进口袋。我拿着这张字条有什么用！谁会来帮助一个军官？当然我感谢了他的一番诚意，他走了。我在他后面问道：

"'怎么，您在这一带地方散步吗？'

"'是的,'他说,'我病了,医生吩咐我每天散步。'

"他走了。这次相遇以后我的心头变轻松了。'原来,'我想,'世界上还有高尚而富有同情心的人。这位先生并不认为和我相识是件丢人的事,还和一个乞丐、一个旧军官说话。'

"我这样坐着,东想西想。我看见几个航校学生向我奔来。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但他们仍然是头发乱蓬蓬的,甚至面色有点苍白。他们走到跟前,问道:'您知道您刚才跟谁说话吗?'我怎么知道跟谁说话。但我是那么厌恶这批航校学生,心里对'老家伙'、'斯科别列夫'的怒火油然而生,所以浑身哆嗦起来。'知道,'我说,'从这儿滚得远远的。你们只会嘲笑老年人。'

"他们一下子蔫了,乖乖地走了。可是到傍晚,他们派一个小孩送来一包茶叶和糖,不少于一磅。'干吗送这个来?'我想。'就是说我把他们赶走了,他们良心发现了。'

"我非常爱青年人。如果没有青年人,我们活着也没有意思。那会是极其无聊的。所以不值得跟这些航校学生计较。

"我又开始讨饭。有什么办法呢?我把这张字条忘了。我把它夹进一本旧书中,那是丹尼列夫斯基① 的《焚毁的莫斯科》(这是我惟一的财产),您想像一下,当然忘了。冬天我感到非常难熬,甚至觉得我会倒在什么地方的雪地里死掉。直到这时我才想起了字条。我找到了它,它已皱得像嚼过的一样了。

"条子上写着地址,某主管部门,——我没有弄清楚。但是字条搞得这样难看,我可不好意思到那个部门去。而且得走很远的路,在市中心,要进城。在我的乞丐生涯中,我还没到过这个地方。我还是壮起胆去了。房东简直是逼着我去。'您呀,彼得·斯杰潘诺维奇,'她说,'是个小娃娃,不是个退伍上校。遇到

① 丹尼列夫斯基(1829—1890),俄罗斯和乌克兰作家。

什么事都畏畏缩缩。奇怪，当初怎么会任命您当要塞司令。您还是去教仁学，而不是开炮。'

"我一路走着，眼也不抬。自从讨饭以来我就有了这个习惯——不正眼看人。这样心里轻松些。至今我还不能去掉这个习惯。大概您也发现这一点了。老年人的习惯是很难去掉的，也是很顽固的。

"总而言之我走到了。这个部门很大，但很安静。到处都铺着长条地毯。看门人还是门房——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叫——十分坚决地对我说：'应当把大衣脱掉，公民。'可是我怎么脱呢。我大衣里几乎没穿什么衣服。'你对老人，'我对门房说，'尊敬一点。别出人家丑了。我是凭这张字条来的。'我给他看了条子。他看了看条子，忙成了一团，把一把椅子挪到我身边说：'请坐一会儿，老大爷。我马上把您报告上去。'他离开了，一眨眼又回来了。他后面跟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公民，面孔很严肃，但和蔼地微笑着。他搀起我的胳膊，领我走去。我走着，破鞋上开始融化的雪整团整团往下掉。这一生中我丢尽了丑。

"这个人带我到办公室，把我安顿在皮圈椅里坐下，问我有什么证件没有。我把所有的都交出去了。豁出来啦！他出去了，时间在流逝。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一个人坐着，已经有点为卷进这件事而不高兴了。我甚至想一走了之，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没有证件。就在这时这个人回来了——看来是个不小的长官——他递给我养老金领取证和购买食品、衣服还有什么东西（不知是买燃料呢还是就诊的）的票证，让我签了字，交给我一沓钱。'这些，'他说，'是第一笔养老金。您大概挨饿挨了很久了。'

"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安慰我说：'您干吗激动不安，彼得·斯杰潘诺维奇。我们，他说，珍重劳动，尤其像您这样精通自己业务又诚实的人。您是凭自己的功劳得到这些东西的。'

'您从哪儿得知我的功劳呢?'他笑了。'从您的履历中。从您的履历登记表中。'老天!这是从军官履历表中知道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和他像朋友一样道了别。我出了屋,无精打采地回自己的彼得罗夫公园去,头也不抬——眼睛里含着泪,而且那个习惯也克服不了。

"我走到特维尔大街。天已经黑了,人行道上亮起了灯。商店橱窗也亮了。我心想,'让我进去买点便宜面包和灌肠也好,我要请请房东。'

"一路过来,我第一次抬起眼睛,这时我仿佛被闪电击中了似的。橱窗里陈列着一幅肖像。我一瞧——是他!那人正是给我条子的那位个子不高的先生!肖像下面印着题词:弗·伊·列宁(乌里扬诺夫)。相邻的橱窗里也有他!老天,信不信由你!

"就这样,我什么也没买,急忙回家去了。我内心一直在哆嗦——您会相信的,我愿意为这个人献出自己最后的全部热血!他把我从自己精神的牢狱中解放出来。我欠了他很大的情,现在还有惟一的一件事感到遗憾,我没什么可以报答他。往后我已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健康的身体,更没有时间了。

"我回到家中,可以说是跑回来的,我忙对房东的女儿,一名共青团员说:'请把列宁的肖像拿来。我要验证一件事。'她从自己的房间里拿来一份报纸。报纸的名称叫《贫民》。报上登着他的肖像。就是这一张,我给您看。"

老头用不灵活的手指解开大衣,掏出一个缠着带子的旧钱夹。他解开带子,从夹子里掏出从报上剪下来的一张很旧的列宁像。

"从那时起我终生把它带在自己的心口,"他用嘶哑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说,"就是他啊,这个人!"

老头的脑袋颤动起来。泪水顺着他发黄的、布满皱纹的面颊淌下来，但是他没有把它擦掉。

我们久久地默坐着。

雾变浓了，大滴大滴的露珠从发黄的柳叶上滴下来。远在天边的一艘轮船在鸣叫。从波戈沃飘来淡淡的烟味和黑麦面包气息。克拉西瓦亚密恰河后面的路上，大车在辘辘作响，一个姑娘的声音唱着：

> 我们不富裕的村庄
> 隐没在高高的庄稼中间……

"您现在看见了，她多么美好，咱们的俄罗斯，"老头静默了一会儿后说道，"亲爱的，我不知怎么的，有点累了。上了年纪啦！咱们走吧！"

十年以后我有机会沿铁路支线从图拉到叶列茨，经过叶夫列莫夫。

又是秋天。硬席车厢像铁皮做的似的咣当咣当直响。电灯光很暗。疲惫的旅客们打着呼噜。我对面的上铺躺着一个刮净面孔、穿高筒猎靴的老头。原来老头是去叶夫列莫夫的。他一直在仔细打量我，后来说道：

"好像是熟人。我在哪儿见过您——想不起来了。不会是在别处，是在波戈沃。"

原来是波戈沃的铁匠。他记得我，但是我怎么也认不出他来了。铁匠告诉我退休上校六年前死了。

"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铁匠说，"从我们的政府那里领取养老金。因为他干过一番事业，不过谁也不清楚是什么事业。他自己对这一点绝口不提。过得很节俭，似乎在攒钱。所以村里

人传说,他被吝啬征服了。这倒说得也是——人到老年大部分会变得吝啬。可事实却是另一码事。结果是我们这个老头在感到自己日子不多的时候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献给了我们的学校。他说为了使人民不丧失道德面貌。给娜斯佳——您记得她——留了相当多的钱。他为她的孩子,为彼佳非常难过。彼佳前年也死了。他在这个世上活不长!活不长!我这样认为:这是件好事。"

铁匠在叶夫列莫夫下了车。我走到站台上以摆脱车厢里的浊气。列车在沉睡。从那里散发出带油味的暖气味。

夜间,按我的估计,这里应是波戈沃,并且应是一片漆黑,然而却亮着一抹蓝莹莹的微光。

我久久猜度着,现在从波戈沃露出来的究竟是什么光,但是一直猜不出。可又无人可问。

上述的一切是个真实的故事。退休上校的叙述是凭记忆记录的。我记忆中惟一没有保留下来的是老人的姓。他似乎姓加夫里洛夫,但我不敢肯定这一点。

1956 年

沈念驹 译

珍贵的尘埃

想不起我是从哪里听说清洁工让·沙梅的故事的。他靠清扫他居住街区的一些小手工业作坊为生。

沙梅住在城郊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当然可以对这一地区详细地描述一番，这样可以将读者从故事的主线上引开。不过需要说明，巴黎城郊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古旧的城堡。在本故事发生的年代，这些城堡还在金银花和山楂之类灌木丛的掩映之中，灌木丛里栖息着鸟类。

清洁工的小屋就紧靠在北面城堡的墙脚下，与铁匠、鞋匠、捡烟头的和乞丐的小屋为邻。

倘若莫泊桑当时对这些棚户居民的生活多一些兴趣，他可能会多写几篇优秀的短篇小说。这也许会在他已经取得的成就上增添新的桂冠。

遗憾的是除了密探之外，没有人对这里看上一眼。即使密探也只有在搜查赃物时才会光顾。

左邻右舍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啄木鸟”，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想到他干瘦，尖鼻子，帽子下边总支棱出一绺头发，像鸟的冠毛。

以前，让·沙梅也有过好日子。那是墨西哥战争时期，他在“小拿破仑”军团里当兵。

沙梅很走运。他在韦拉克鲁斯染上了严重的热病。这个患病的士兵没有与敌人遭遇就被遣送回国了。团长借机托沙梅把自己八岁的女儿苏珊娜带回法国。

团长是个鳏夫，因此无论到哪里都把女儿带在身边。这次他决心和女儿分开。因此把她送到鲁昂姐姐家去。墨西哥的气候对欧洲的孩子是致命的。况且混乱的游击战争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危险。

沙梅回国途中，大西洋上正是热浪滚滚。小姑娘一路沉默不语。甚至看到鱼从油乎乎的海水里跳出来，她也没有笑容。

沙梅对苏姗娜悉心照顾。他当然明白，她不仅需要他的关怀，还需要他的抚慰。但作为殖民军中的一名士兵，他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抚慰她呢？用什么办法让她高兴呢？掷骰子吗？还是唱军营里粗俗的小曲？

但总这样回避也不是办法。沙梅觉察到小姑娘总用一种困惑的目光看他。于是他决心把自己的身世断断续续地讲给她听。讲拉芒什海峡岸边的那个小渔村，不放过一点点细节，讲流沙，讲退潮后的水洼，讲村里那所带破钟的小教堂，讲给街坊四邻诊治胃病的他的母亲。

在回忆往事时，沙梅找不出一点能使苏珊娜开心的事。可让他感到惊奇的是小姑娘听得津津有味，竟逼他反复讲，要他讲得更详细。

沙梅拼命回忆，竭力从记忆中搜索所有的细节，最后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些细节是否真的有过。这已经不是回忆，而是回忆的淡淡的影子。这些影子像一团团的雾，很快就消散了。沙梅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有一天会去重温一生中这段多余的生活。

有一次他突然模模糊糊地想起金蔷薇的故事。不知是沙梅看到一个老渔妇家耶稣受难像十字架下边挂着那朵雕工粗糙的发黑的金蔷薇呢，还是听周围的人讲过关于那朵金蔷薇的故事。

不，好像有一次他甚至看见那朵金蔷薇，而且记得它熠熠生

辉,当时窗外没有阳光,海峡上一片昏暗,暴风雨大作。沙梅越来越清楚地回想起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闪烁的几点亮光。

全村人都纳闷:为什么这个老太婆不肯把这件珍宝卖掉。卖掉可以为她赚一大笔钱。只有沙梅的母亲说出卖这朵金蔷薇是罪过,因为那是老太婆的情人送给她的祝福礼物,当时老太婆还是一个爱笑的小姑娘,在奥杰伦一家沙丁鱼罐头厂当工人。

"像这样的金蔷薇,世间少有,"沙梅的母亲说,"谁家要是有这么一朵,肯定走运。不仅这家人,无论谁轻轻碰它一下都会走运。"

沙梅当时还是个孩子,他非常盼望老太婆时来运转。但是连一点要走运的迹象都没有。老太婆的小屋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天黑了屋里连灯火也没有。

沙梅没有等到老太婆转运就离开了村子。一年以后,一个在哈佛尔邮轮上当司炉的熟人告诉他,老太婆的画家儿子突然从巴黎回来了。那人蓄着大胡子,很开朗,但是古里古怪。从那时起小破屋就完全变了样。小屋里欢声笑语,生活富足。据说,当画家的随便涂上几笔就能赚大钱。

一次,沙梅坐在甲板上,用铁梳子为苏珊娜梳理被风吹乱的头发,苏珊娜问:

"让,会有人给我送金蔷薇吗?"

"一切都可能,苏姬[1],"沙梅回答说,"你也会碰到一个怪人的。我们连里原来有一个干巴瘦的士兵。他太走运了。他在战场上捡到半副金牙。我们全连用它换酒喝光了。那是安南战争的时候。炮手们喝得醉醺醺的,拿打炮寻开心,一炮打出去,炮弹从炮膛里直落到一座死火山的山口上爆炸了。突如其来的意

① 苏姬,苏珊娜的昵称。

外使火山口也开始喷发。鬼晓得这座火山叫什么名字。好像叫喀拉喀塔卡火山吧。喷发得可真厉害啊！当地老百姓有四十人丧生。想想看，为这半副金牙竟然死了这么多人！后来才知道这半副金牙是我们上校丢的。事情当然暗中了结了，军团的威信高于一切嘛。不过当时我们可真喝了个够。"

"那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苏姬怀疑地问。

"我说过了，在安南。在印度支那。那里的海冒着火，像地狱一样，水母像芭蕾舞女演员镶花边的短裙。那里潮湿极了，一夜之间我们靴子里就长出了蘑菇！我要是撒谎，你把我吊起来！"

这事以前，沙梅听过许多士兵撒谎，但他自己从来不说谎话。并不是因为他不会，而是感到没有必要。但是现在他认为让苏珊娜开心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沙梅把小姑娘带到鲁昂，亲手交给一个撇着发黄的嘴唇的高个子妇女，那是苏姬的姑妈。老妇人的衣服，浑身上下缀满了黑玻璃珠，像马戏团的一条蛇。

小姑娘一见她就紧贴着沙梅，抓住他退色的军大衣。

"不要紧！"沙梅小声说，轻轻推了一下苏珊娜的肩膀，"我们这些普通士兵不能选择我们连长。苏姬，就忍着点吧，你是女兵啊！"

沙梅走了。他好几次回头看了看这所孤寂的房子的窗口，连风都不来吹动这里的窗帘。狭窄的街道上，可以听到两旁小店里传出忙乱的钟声。沙梅的军用背包里收藏着苏姬的纪念品——她扎辫子用的一条揉皱了的蓝色缎带。不知为什么，缎带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好像它在一篮紫罗兰里放了许久。

墨西哥的热病损害了沙梅的健康。他没有拿到军衔就从军队复员了，从一名士兵去当普通老百姓。

多年来他始终生活在贫困之中。沙梅尝试过多种卑贱的职业，最终当上了一名巴黎的清洁工。从此尘土和污水味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甚至从塞纳河吹来的微风中，从林荫道上干净利落的老太婆们出售的一束束鲜花上都能闻到这股味道。

日复一日的生活汇聚成黄色的云团。但是在沙梅的内心深处偶尔也会浮出一片缥缈的粉红色的云，那是一件苏珊娜的旧连衣裙。它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春天的气息，仿佛它也曾在一篮紫罗兰里放了许久。

苏珊娜，她在哪里？她怎么样？沙梅知道她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她父亲因伤去世了。

沙梅一直打算去鲁昂看望苏珊娜。可他每次都推迟了行期。最终他明白自己已经错过了时机，苏珊娜肯定已经把他忘了。

每当他回想起他们分别时的情景，他总责骂自己是蠢猪。他不是去亲吻小姑娘，而是把她朝那个臭老婆子推过去，说："苏姬，就忍着点吧，你是女兵啊！"

都知道，清洁工是夜里干活儿的。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一整天紧张但不一定对人们有好处的活动所产生的垃圾，要在一天结束时才能汇总；其次是巴黎人的视觉和嗅觉不容玷污。夜里除了老鼠，几乎没有人会留意清扫垃圾的工作。

沙梅已经习惯夜里干活儿，甚至喜欢一天中的这段时间，尤其巴黎破晓的那一刻。塞纳河上雾气迷蒙，但它从不漫过桥栏。

一次，就是在这样一个雾蒙蒙的黎明，沙梅在走过残废军人桥时，看到一位少妇穿一件淡紫色镶黑花边的衣服。她站在桥栏旁，凝望着塞纳河。

沙梅停下脚步，摘下满是灰尘的帽子，说：

"夫人，这个时候塞纳河河水很凉。还是让我送您回家吧。"

“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了，”妇人匆匆地回答说，朝沙梅转过身来。

沙梅一失手把帽子掉到地上。

“苏姬！”他悲喜交集，说，“苏姬，我的女兵！我的小姑娘！我总算又见到你了。你大概把我忘了吧。我是让·欧内斯特·沙梅，第二十七殖民军团的普通士兵。是我把你带到鲁昂你那个可恶的姑妈家的。瞧你出落成一个美人儿了！你的头发也梳得真漂亮！我这个当勤务兵的可一点也不会梳！”

“让！”那妇人尖叫了一声，扑到沙梅怀里，搂住他的脖子大哭起来，“让，您还跟过去一样好心肠。我都记得！”

“哎呀，说傻话！”沙梅喃喃地说，“我的好心肠能给谁带来好处。你怎么了，我的小姑娘？”

沙梅把苏珊娜拉到身边，抚摸并亲吻了一下她那光亮的头发，这是他在鲁昂时不敢做的。他立即闪开，生怕苏珊娜会闻出他衣服上的鼠腥味。但是苏珊娜在他肩上贴得更紧了。

“你怎么了，小姑娘？”沙梅不知所措，又说。

苏珊娜没有答话。她止不住恸哭。沙梅明白，现在什么也不要问。

“我在城堡边上有一间小屋。离这里不算远。当然屋里一无所有。但是可以烧热水，在床上睡觉。你可以在那里洗洗脸，休息一下。总之，你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沙梅急急忙忙说。

苏珊娜在沙梅那里住了五天。这五天巴黎上空升起了一轮非同寻常的太阳。所有的建筑物、甚至包括一些最古老的被烟熏黑的建筑物，所有的花园，连沙梅的小棚屋都像宝石一样在这轮太阳的光辉照耀下熠熠生辉。

没有体验过少妇熟睡时几乎听不到的轻微呼吸声带给你的激情，你就不会懂得什么是温馨。她的双唇比含露的花瓣还要

鲜亮。夜里流下的泪花在她的睫毛上闪烁。

是的，苏珊娜的遭遇不出沙梅所料。她的情人，一个年轻演员负心了。但是苏珊娜在沙梅家度过五天足够让他们和好。

沙梅也参与了此事。他不得不替苏珊娜送信给那个演员，而当那个演员要塞几个苏[①] 的茶钱给他时，他又把那个懒散的花花公子教训了一顿，教他要讲礼貌。

不久，演员就乘出租马车来接苏珊娜了。一切都按照常规：一束鲜花、亲吻、含泪的笑、追悔和存有芥蒂的轻松。

这对年轻人临走时，苏珊娜显得那样匆忙。她忘记跟沙梅道别就跳上了出租马车。但她即刻想起来，涨红了脸，歉疚地向沙梅伸过手去。

“既然你按照自己的趣味选择了生活，”末了，沙梅埋怨说，“那就祝愿你幸福吧。”

“我还一点都不知道呢，”苏珊娜说，眼眶里闪着泪花。

“你别激动，我的小宝贝儿，”年轻演员不以为然地曼声说，接着又说：“我迷人的小宝贝儿。”

“假如有人送我一朵金蔷薇就好了！”苏珊娜叹气说，“那样才会幸福呢。我记得您在船上讲的故事，让。”

“天晓得！”沙梅回答说，“不管怎么说送给你金蔷薇的不会是这位先生。对不起，我是当兵的，我不喜欢虚有其表而腹中空空的人。”

一对年轻人面面相觑。演员耸了耸肩。马车启动了。

沙梅通常把一天从手工艺作坊扫出的垃圾全部倒掉。但是自从他这次遇到苏珊娜之后，他就不再把从首饰作坊扫出来的碎屑倒掉了。他开始悄悄把这些碎屑装到一个口袋里，带回家

① 苏，法国五生丁辅币，二十苏为一法郎，一九四七年起停止使用。

去。街坊们都说这个清洁工"疯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碎屑中掺有金屑,因为首饰匠在加工时总会锉掉一些金子。

为了苏珊娜幸福,沙梅决心从加工珠宝的粉尘中把金屑筛出来,用金屑铸成金锭,然后再用金锭打成一朵小小的金蔷薇。也许,正像母亲对他说过的,这朵金蔷薇会给许许多多普通人带来幸福。谁知道呢!他决心在这朵金蔷薇没有做成之前,不再和苏珊娜见面。

这事沙梅对谁也没有说。他害怕政府和警察。这帮刁钻的鹰犬什么都想得出来。他们会说他是贼,把他关进监狱,没收他的金子。不管怎么说,这金子毕竟是别人的。

沙梅入伍前曾在村中本堂神甫农场里当过雇工,因此懂得怎样扬谷子。如今他学到的那套本领派上了用场。他想起怎样簸谷子,沉甸甸的谷粒落到地上,而轻飘飘的谷糠则被风吹走。

沙梅装了一只小簸扬机,每天深夜在院子里扬珠宝的粉尘。在没有看到斜槽里有几乎看不见的金屑以前,他心里很着急。

过了许久他才积攒出够铸一小块金锭的金屑。但他并没有立刻把它交给首饰匠打金蔷薇。

这并不是因为他缺钱,只要把金锭的三分之一作加工费,任何一个首饰匠都会满意地接下这件活计。

问题不在这里。和苏珊娜见面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沙梅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害怕那一刻的到来。

他想把早已被他深埋在心底的柔情只献给她,献给苏姬。可谁又稀罕一个形容枯槁的丑八怪的温情呢!沙梅早就发现,凡是遇到他的人,惟一的愿望就是赶快走开,忘掉他那张皮肤松弛的消瘦发灰的脸和刺眼的目光。

他的小屋里有一块破镜子。沙梅有时也照一下,但是刚照就骂骂咧咧地把镜子扔了。他这副丑陋的样子,两条害风湿病

的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还是不看为好。

当金蔷薇终于打成以后，沙梅才听说苏珊娜已于一年前离开巴黎到美国去了，而且据说永远不会回来了。没有人能说出她的地址。

最初沙梅甚至感到松了一口气。可是后来企盼与苏珊娜亲切而又轻松会面的愿望不知为什么变成了一块锈铁。这块刺人的铁片堵在沙梅胸口，正好在心脏旁边，沙梅祈求上帝尽快让铁片刺人他衰弱的心脏，好让心脏永远停止跳动。

沙梅不再去打扫作坊了。他在自己的草棚里，面壁躺了好几天。他一直沉默，只有一次他用破衣服的袖子紧紧捂住眼睛笑了。但是没有人看见。街坊四邻甚至没有人来看望沙梅——家家都在忙自己的事。

关心沙梅的只有那个上了年纪的首饰匠。正是他用金锭给沙梅打了一朵非常精致的蔷薇花，花枝上还有一个尖尖的小花骨朵儿。

首饰匠常来看望他，但是没有给他带药来。他认为药对沙梅不起作用。

果不出所料，就在一次首饰匠来探望的时候，沙梅悄悄地死去了。首饰匠抬起清扫工的头，从发灰的枕头下边拿出用皱巴巴的蓝缎带裹着的金蔷薇，随手带上吱吱作响的门，从从容容地走了。缎带散发出一股老鼠的气味。

正值晚秋时节。苍茫的暮色在晚风和时明时灭的灯火中摇曳。首饰匠想起沙梅死后的面容改变了许多，变得严峻而平静。首饰匠觉得那张面孔上的痛苦表情甚至很美。

“生活没有给予他的一切，由死神给予了，”首饰匠就喜欢瞎琢磨，他大声舒了一口气。

首饰匠很快就把这朵金蔷薇卖给了一位上了年纪、落拓不

羁的文学家。据首饰匠看来，这人并不富裕，没有能力买这样贵重的东西。

显然，首饰匠对这位文学家讲金蔷薇的故事，在这次交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应该感谢这位老作家，正是由于他的札记，从前第二十七殖民军士兵让·欧内斯特·沙梅这段心酸的经历才为人所知。

这位作家在他的札记中写道：

"每一个瞬间，每一个偶然投来的词语或眼神，每一个缜密的思想或一句戏言，每一个人类心灵的细微活动，以及杨树的飞絮，夜间映在水塘里的点点星光，这些同样都是金粉的碎屑。

"我们文学家在几十年里搜寻这无数的细沙，为自己悄悄把它们收集起来，熔成合金，然后铸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长诗。

"沙梅的金蔷薇啊！我认为它多少可以说是我们创作活动的示范。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花力气去探究怎样从这些珍贵的微尘诞生出汹涌澎湃的文学洪流。

"但是，正如那位老清洁工的金蔷薇是为了给苏珊娜带去幸福，我们的创作也同样是为了祝愿大地变得美丽，召唤人们为争取幸福、欢乐、自由而战斗，愿人类心胸宽广，愿理性的力量战胜黑暗，愿它像不落的太阳永放光芒。"

曹苏玲 译

人物的反叛

旧时代，人们搬家，经常雇用当地监狱里的犯人搬运东西。

我们这些孩子总怀着好奇和怜悯的心情急切地等待这些囚犯的出现。

大胡子看守们腰里别着大口径短筒左轮手枪，犯人都由他们押着。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穿灰囚衣戴灰圆帽的犯人。对那些腰间用窄皮带系着丁当响的细细镣铐的犯人，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投以特别敬重的目光。

一切都很神秘。但最令人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很平常，显得疲惫不堪，无论如何也无法令人相信他们是杀手，是罪犯。相反，他们不仅讲礼貌，而且很客气，搬大件家具时，生怕碰伤或损坏东西。

我们这帮孩子在大人许可下，想出一条妙计。妈妈把看守们领到厨房去喝茶，我们就乘机往犯人口袋里塞面包、香肠、白糖、烟草，有时还塞钱。这些东西都是父母给我们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冒险的事。当囚犯们朝厨房那边使眼色，一边悄悄向我们道谢，把我们送的小礼物重新藏到里边暗兜里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开心。

有时犯人们悄悄把信交给我们。我们就贴上邮票，大伙一起去把信投进邮筒。投邮前，我们还要四下里看看，看附近是否有警察或巡警。仿佛他们能猜出我们发的是什么信。

我记得囚犯中有一个留花白胡子的，都叫他班长。

搬东西由他指挥。有些东西，特别像橱柜、钢琴之类，会卡在门口，无法掉头，有时犯人们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把家具搬到指定的地方。它们好像在故意作对。遇到这种情况，班长就会指着这只柜子说：

"它愿意待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好了。你们干吗要折腾它！我干搬运有五年了，摸透了它们的脾气。它要是不愿意待在这地方，你再费劲儿，它也不会让步。你就是把它毁了，它也不会依你。"

我之所以想起老犯人的这段至理名言，是因为我想到作家的提纲与人物行为的关系。家具和这些人物的行为有某些共同之处。人物常常起来同作家作对，而且几乎总是赢家。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

当然，几乎每位作家都对自己未来的作品制定了提纲。有些提纲还拟得详细、精确。另一些作家则拟一个大致的提纲。还有一些作家的提纲则只有简单几个彼此毫无关联的字。

只有具备即兴创作才能的作家，创作时无需提纲。在俄罗斯作家中高度具备这种才能的是普希金，而当代散文作家中则要推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 了。

我认为有才华的作家可以在没有任何提纲的情况下写作。他的内心非常丰富，任何一个主题，一个思想或一件事都能激发他源源不断的联想。

契诃夫年轻时曾对科罗连科说：

"您桌上放着一个烟灰缸。要是您乐意，我可以马上写出一个关于烟灰缸的故事。"

---

①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2—1945)，俄罗斯作家，著有《苦难历程》三部曲及《保卫察里津》等。

他当然能写出来。

你可以想像，假如有人在街上拾到一张揉皱的卢布，他就从这张卢布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一开始简直像闹着玩，轻松而又简单。但小说很快就深入下去，扩展开来，充满了人物、事件、光华和色彩，被想像所驱使，波涛滚滚地奔腾起来，要求作家不断做出新的牺牲，奉献出珍藏的大量形象和语汇。

在这样偶然开始叙述的故事中，产生了思想，产生了人们复杂的命运。至此作家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他会像狄更斯那样边写边流泪，像福楼拜那样痛苦呻吟，或像果戈理那样哈哈大笑。

就像在山里，一个轻微的声音，一声猎枪响都会引起积雪像一条光灿灿的带子似的顺着陡峭的山涯滑落下去。它很快就变成一条宽阔的雪河一泻千里，几分钟后在山谷里发生了雪崩，于是地动山摇，空谷轰鸣，空气中飞扬着闪烁的雪尘。

许多作家都提到有才华且具有即兴写作才能的人，很容易产生这种创作状态。

无怪乎非常了解普希金写作情况的巴拉丁斯基① 曾说：

> ……年轻的普希金，性似浮躁，却光彩照人，由他信笔写来的一切都那么振奋人心……

我说过，有些提纲像文字的堆砌。

举一个小例子。我有一个短篇小说《雪》。在创作这篇小说前，我写了一页东西，这个短篇就是从这页笔记产生的。笔记是什么样子呢？

“被遗忘的一本关于北方的书。北方的基本色调——箔。

①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

河上的蒸气。妇女们在冰窟窿里洗衣服。烟。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门铃上的铭文:'我挂在门上,请多拉几下!''门铃,瓦尔代[1] 的礼物,在拱门下有气无力地响。'门铃叫'瓦尔代的礼物'。战争。塔尼娅。她在哪里,在哪座偏远的小城里?孤单一人。浮云背后黯淡的月色——可怕的远方。生活被浓缩在小小的光圈里。灯的光圈。墙里好像整夜有什么东西嗡嗡响。树枝擦着玻璃。严冬深夜,我们很少出门。这需要检查……孤独和等待。一只愤愤不平的老猫。怎么也不能使它满意。一切仿佛一目了然——连钢琴上带螺纹的蜡烛(橄榄绿色的),但暂时别的还没有。找带钢琴的房子(歌唱家的)。疏散。等待的故事。别人的房子。老式的,但也有它独特的舒适的地方,橡皮树,斯坦波尔或梅萨克苏季老牌烟草的味道。住过一位老人并已去世。胡桃木写字台上铺着带黄斑点的绿呢。小姑娘。灰姑娘。保姆。暂时再没有别人了。俗话说,有情千里心相印。可以只写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等什么?等谁?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使她心如刀绞。人们在无数道路的交叉路口偶然相遇,但他们不知道,正是他们过去的生活为这次相逢作了安排。概率论。适应人心。对于傻瓜,一切都很简单。国家陷入雪中。一个人出现的必然性。不知什么人一直在给死者写信。一摞信都放在桌上。线索就在这里。什么信?写些什么?海员。儿子。在他到来之前的恐惧。等待。她爱心无限。信变为现实。又是带螺纹的蜡烛。但质地不同。乐谱。带橡树叶花纹的毛巾。钢琴。白桦的轻烟。调音师——捷克人都是优秀的音乐家。裹着头巾,只露出眼睛。真相大白!"

以上勉强可称作是一个短篇小说的提纲。如果你不知道故

---

[1] 瓦尔代,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州的城市。

事，那么读了这篇笔记就会明白，尽管这个提纲进展缓慢，含糊不清，但却对主题和情节进行了顽强的探索。

经过作家细心考虑并校正的最精确的提纲又怎样呢？老实说，它们大多是短命的。

刚刚开头的作品一旦出现人物，而这些人物按照作者的意图开始活动，他们会立即开始与提纲作对，与提纲展开斗争。作品开始按照自己内在的逻辑展开，而推动力自然是作家给予的。人物按照各自的性格行动，尽管这些性格的塑造者是作家。

如果作家强迫笔下的人物不按产生的内在逻辑行动，如果他强迫他们回到提纲的框架中来，那么他的人物就会开始僵化，变成机器人，傀儡。

列夫·托尔斯泰非常简单地说出了同样的想法。

一个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客人埋怨托尔斯泰，说他强迫安娜·卡列宁娜卧轨太残忍。

托尔斯泰笑笑回答说：

“这个意见使我想起普希金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对一位朋友说：‘想想看，塔季扬娜跟我开了一个多么大的玩笑。她嫁人了。这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对于安娜·卡列宁娜我也可以这么说。我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也总是跟我开一些我不喜欢的玩笑！他们做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做，现实生活中会发生，而不是我想让他们做的事。”

所有的作家都深知人物的这种一意孤行。“我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说，“不知道五分钟后我笔下的人物会说什么。我好奇地注视着他们。”

有时次要人物会取代所有其他人物，成为主角，改变了故事的全部进程，使它按照他的意愿展开。

因此，只有在作家写作的时候，作品才真正开始鲜活地出现

在作家的意识之中。于是，提纲的突然改变和被破坏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和糟糕的了。

相反，这是很自然的，它证明真实的生活闯入并充满了作家的提纲，毅然决然将作家最初为提纲制定的框架推开，破坏。

这丝毫无损于作家的提纲，也不会把作家的作用仅仅归纳为按照生活的提示记叙一切。因为作家作品中的形象的生命是由作家的意识、他的记忆、想像力以及他的一切内心情绪所决定的。

曹苏玲 译

阿尔什万格商店事件

一九二一年冬，我住在敖德萨早先的一家服装店"阿尔什万格公司"里，未经许可我就擅自搬进了二楼的试衣间。

我占用了三个带雕花玻璃镜的大房间。镜子牢牢地镶在墙上，我和诗人爱德华·巴格里茨基[1] 想把镜子从墙上摘下来，拿到新市场去换些食品，想尽办法也没有成功。连一面镜子也没有起动。

试衣间里除了三只盛着烂刨花的空箱子之外，没有别的家具。幸好玻璃门倒是很容易就能从合页上卸下来。每天晚上我都把它卸下来，搭到两只箱子上，铺上铺盖当床睡。

玻璃门很滑，因此，每天夜里我都要和旧褥子一起滑到地上好几次。

只要褥子一动，我就会醒。我躺在那里，屏住呼吸，连手指也不敢动一下，傻头傻脑，还指望褥子停下来。可它还是铁面无情地继续往下滑，我的这一招也没起作用。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年冬天冷极了。从海码头到小喷泉都上了冻。凛冽的东北风把花岗岩马路扫得光光净净。雪一次也没有下，可这似乎比马路上堆着雪更冷。

试衣间里有一只小白铁炉。但没有东西生火。而且也不可能靠这么一只可怜的小炉子烧暖三个大房间。因此我只用它烧

[1]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1895—1934)，俄罗斯诗人。

红萝卜茶。有几张旧报纸就够用了。

第三只箱子当桌子用。每天晚上在箱子上点一盏油灯。

我躺下,把所有暖和的东西都盖在身上,借着油灯的灯光读格奥尔基·申格利译的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①] 的诗。这些诗是闹饥荒那年在敖德萨出版的。我可以证明它们并没有削弱我们的勇气。我们感到自己像罗马人一样刚强,并且常常想起申格利的诗:"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在流血……"

血,我们当然没有流,但我们这些愉快的年轻人有时免不了挨冻受饿,不过我们从不怨天尤人。

楼下一层的店铺里,一个美术劳动组合开展了一项忙碌而有些可疑的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在敖德萨以绰号"招牌王"闻名的爱唠叨的老画家。

这个组合承接定做招牌,缝制女帽,定做"木脚"(一种女鞋,制作时突出希腊、罗马的纯朴古风,往木底上钉几条带子就算完成了!),作电影广告(广告都是用水胶涂料画在不平整的胶合板上)。

有一次,工作室很走运,承接了当时黑海上惟一的一艘轮船"佩斯捷利号"的"船首装饰"。这艘船准备首航巴统。

装饰用一块铁板,之后在黑的底色上画上金色的植物图案。

装饰工作吸引了许多人,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也从附近的哨位上跑来看看。

我当时在《海员报》当秘书。在报社工作的许多是年轻作家,有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巴别尔、奥列沙和伊里夫。有经验的老作家中常来编辑部的只有安德烈·索博利,他和蔼可亲,总爱激动,坐不住。

① 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1803—1839),古巴著名诗人。

一次，索博利给《海员报》送来一篇他写的短篇小说。小说写得拉拉杂杂，没有条理，但题材很有趣，而且的确很有才华。

大家读过小说之后，都感到棘手，写得这样潦草是不能发表的。但谁也不敢向索博利提出请他修改。索博利在这方面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这倒并非出于作者的自尊心（这一点索博利恰恰几乎没有），而是因为神经过敏：他不能回头再看自己写的东西，对它们已经失去了兴趣。

我们聚在一起反复考虑：怎么办？在座的还有我们的校对老勃拉戈夫。他是过去在俄国发行量最大的《俄罗斯言论报》的社长、著名出版家瑟京最得力的助手。

他沉默寡言，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心有余悸。他仪表堂堂，跟我们编辑部里衣衫破烂、打打闹闹的年轻人格格不入。

我把索博利的稿子带回阿尔什万格商店，准备再看一遍。

深夜（其实顶多不超过十点，但是被夜色笼罩的城市黄昏时大街上就已空旷无人，只有狂风呼号），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敲响了商店的大门。

我把报纸紧紧卷起来，点着，拿着它权当火把，去打开用一截锈煤气管顶住的笨重店门。我不能端油灯去，因为空气有一丝流动它就会熄灭，甚至看它一眼也会熄灭。

当你陷入沉思，盯着它看，它会即刻劈劈啪啪地抱怨，一明一灭地闪几下，就悄悄地熄灭了。因此我甚至尽量不去看它。

“有位先生求见，”若拉说，“我首先要证实一下他的身份，才能放他进来。这里是画室。据说，单单颜料就值三千亿卢布。”

当然，如果想到，比如我吧，每月从《海员报》领到的薪水是十亿卢布（这笔钱按市场价可以买到四十包火柴），那么这笔数目就不如若拉心目中想像的那么令人吃惊了。

门外站着的是勃拉戈夫。我证明了他的身份。若拉把他放

进店里来，并且对我说，过两个小时他要来烤烤火，喝点开水。

"是这样，"勃拉戈夫说，"我一直在考虑索博利的那篇小说。是一篇很有才华的东西，不能让它埋没掉。要知道，我有老报人的习惯，从不放过好作品。"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

"把稿子交给我。人格担保，我决不改动一个字。我就在您这里待一夜，因为回家，回兰热龙已经不行了，会被剥猪猡的。我当着您的面把稿子过一遍。"

"过一遍是什么意思？"我问，"过一遍的意思就是改动一下吧？"

"我跟您说过，一字不加，一字不减。"

"那您做什么呢？"

"等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我觉得勃拉戈夫的话有些蹊跷。在这个狂风暴雨的冬夜，我感到一种神秘的东西也跟随这个不爱多说话的人一同来到了阿尔什万格商店。我想解开这个疑团，因此同意了他的请求。

勃拉戈夫从衣袋里掏出一截特别粗的教堂里用的蜡烛头，上边缠绕着金色螺纹。他把蜡烛点着，放到箱子上，然后坐到我的破箱子上，拿起一支木匠用的扁铅笔，埋头看稿。

半夜，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了。我正好烧了开水，沏了茶，不过这回不是用胡萝卜干而是用切成细末的烤熟的甜菜。

"你们可要注意，"若拉说，"从远处看你们简直跟在制造假钞一模一样。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改稿子，"我回答说，"下一期报纸用。"

"你们应该想到，"若拉说，"不是每一个干公安的都明白你们在干什么。我要感谢上帝，虽然没有上帝，现在是我值勤，而不是别的笨蛋。我把文化看得高于一切。至于那些制造假钞

的，简直是万能，他们能用一块废纸制造出美元，也同样能用废纸做一张居住证。据说，巴黎的卢浮宫里，在一只黑丝绒的垫子上摆着一只非常美丽的大理石雕的手。那不是萨拉·贝尔纳[1]的手，也不是肖邦或薇拉·霍洛德纳亚的手。而是一个欧洲有名的制造假币者的手的模塑品。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他被斩首，手却在那里陈列，好像他是一位提琴名家似的。这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吧？"

"我看未必，"我回答，"您有糖精吗？"

"有，"若拉回答说，"是糖精片。我可以给您一点。"

勃拉戈夫到天亮才把稿子看完。我们去编辑部，等打字员把稿子打出来，他才拿给我看。

我通读完以后，目瞪口呆。这是一篇简洁明晰、结构严谨的散文。一切变得鲜明突出。原来的浮皮潦草，用词混乱都无影无踪了。而他在处理这篇稿子时的确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减一个字。

我看了勃拉戈夫一眼。他正在抽一支用黑得像茶叶似的库班烟叶卷的很粗的香烟，露出微笑。

"太好了！"我说，"您是怎么做的？"

"就是把所有的标点符号都点对。索博利把标点符号点得乱极了。我特别注意点句号。还有分段。老弟，这至关重要。甚至普希金也谈到过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用来突出思想，摆正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句子易懂，声调正确。标点符号和音符一样。使文章紧凑，不致松散。"

小说发表了。第二天索博利闯进编辑部。他像往常一样，没有戴帽子，头发蓬乱，两眼不知为什么闪闪放光。

---

① 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女演员。

“谁动了我的小说?”他用异常的声音喊道,挥起手杖敲了一下桌子,桌上摆着报纸的合订本。桌上像火山爆发,尘土飞扬。

“谁也没有动过,”我回答说,“您可以对照一下原稿。”

“撒谎!”索博利喊道,“胡说!我会弄清什么人动过!”

眼看要打起来了。胆小怕事的同事们开始悄悄往外溜。我们的打字员柳先卡和柳夏听到争吵声,像通常一样,穿着木底鞋呱嗒呱嗒地飞跑过来。

这时勃拉戈夫平静地,甚至有气无力地说:

“如果您认为在您的稿子上正确地点了标点符号就是动了的话,那么,是我动的,这是我当校对的职责。”

索博利朝勃拉戈夫跑过去,抓住他的双手,用力摇了一下,随后抱住老人,按照莫斯科的习惯,吻了他三下。

“谢谢!”索博利激动地说,“您给我上了非常好的一课。只可惜太晚了。我觉得我在自己过去的作品面前是罪人。”

晚上,索博利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半瓶白兰地酒,带到阿尔什万格商店来。我们请来勃拉戈夫、巴格里茨基和交了班的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我们在一起为文学和标点符号把白兰地喝了个精光。

通过这件事,我终于相信,恰当地打一个句号对读者起着多么惊人的作用。

曹苏玲 译

勃勃生机的源泉

一次，几位朋友聚会时，左拉说，作家根本无需想像力。作家进行创作，应当只根据准确的观察。就像他，左拉，那样。

当时在座的莫泊桑问：

"那么，您根据报纸上的某一则短讯就写出大部头的长篇，而且创作时往往几个月足不出户，这您又作何解释呢？"

左拉没有做声。

莫泊桑拿起帽子就走了。他的离席很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侮辱。但他并不在乎。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想像，即使是左拉。

莫泊桑和每位作家，和你们与我一样，很重视想像。他认为那是繁荣创作思想的最好根基，是诗和散文极好的土壤。

它是艺术勃勃生机的源泉，它也正是狂热的拉丁区诗人们所称道的"永恒的太阳和神灵"。

但是，这一轮光焰夺目的想像力的太阳只有接触土地才会燃烧。浮在空中它是不会燃烧的，那时它只会熄灭。

什么是想像呢？回答这类棘手的问题，最好还是像盖达尔那样。他用疑问的目光看着对方，问：

"你又想挑刺呀？办不到！反正我不会说。"

为了让我们自己对某些概念多多少少有比较清楚的理解，最好还是跟孩子们谈谈。

孩子们常问："这是什么？""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他们逼我们对这些问题找出答案，如果我们不绞尽脑汁找出说得过去

的答案，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如果有一位小朋友能说出“想像”这个词，那么对话大概就会是这样的：

“想像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答案是诸如“艺术的太阳”或艺术“最神圣的东西”之类，那我们就会把自己引入迷宫，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尽快从与你对话的小朋友身边跑开。

孩子们需要简单明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回答他们说，想像是人类的本性。

“什么本性？”

“是人类利用对于生活的观察，以及思想感情的积累，创造出现实生活以外具有虚构人物、虚构事件的一种虚构生活的本能（当然，要讲得更简单）。”

“那是为什么？”对方会问我们，“既然已经有现实的生活，为什么还要虚构出另一种生活来呢？”

“因为现实生活广阔而复杂，一个人对它永远不可能有完整而全面的了解。况且还会有许多他没有看见或经历过的事。比如，他不可能回到三百年前去做伽利略① 的学生，不可能成为一八一四年占领巴黎的参加者，或者在莫斯科用手触摸卫城②的大理石圆柱。也不可能在罗马的街道上与戈果理散步，聊天。或者出席国民公会③，听马拉④ 发表演说。或者从甲板上眺望倒映着满天星斗的太平洋，就算是因为此人生平从未见过大海。

---

①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力学家。

② 卫城，古希腊城市建有堡垒的高起部分。

③ 国民公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代表会议。

④ 马拉（1743—1793），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但人总想知道一切，看到一切，听到一切，总想感受到一切。而想像正好向他提供现实生活还未来得及向他或不可能向他提供的一切。想像填补了人类生活的空白。

这时，您当然会忘记与您谈话的人，开始说一些他听不懂的事。

谁能断然划出想像与思想之间的界线呢？这条界线是不存在的。

想像创造了引力定律、牛顿的二项式，创造出特里斯丹和绮瑟[①]的悲剧故事，原子裂变、列宁格勒海军部大厦，创造了列维坦[②]的《金色的秋天》、《马赛曲》、无线电、电灯、哈姆莱特王子、相对论原理和影片《小鹿巴比》[③]。

没有想像，人类的思想是不会结果的，正如没有现实生活，想像也不会结果。

法国有一句话："伟大的思想出自内心。"不妨更确切些说，伟大的思想出自整个人。整个人促使伟大思想的出现。心、想像、理性，正是产生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根基。

但是，即使我们的想像力再丰富，有一件事也难以想像。那就是想像力突然消失，这也意味着它所激起的一切也随之消失。失去想像力，人就不成其为人了。

想像力是伟大的天赋，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

如上所述，想像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它从现实中吸取营

---

① 特里斯丹和绮瑟，法国骑士小说《特里斯丹和绮瑟》中的主人公，他们的爱情故事在西欧各国广为流传。

② 列维坦(1861—1900)，俄国杰出的写生画家、现实主义风景画大师。

③ 《小鹿巴比》，美国迪斯尼系列动画片中的一部，拍摄于一九四二年，写小鹿巴比失去父母后，独自在大森林中生活的遭遇。

养。从另一方面讲,想像经常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进程,影响我们的事业、思想和人际关系。

关于这一点,皮萨列夫[①]说得好。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想像自己正置于一幅灿烂美好未来的图画之中,如果他不会幻想,那么就不可能迫使他产生激情去为未来的大厦从事繁重的劳作,也不可能顽强地投人斗争,甚至为之付出生命。

在一把小小的折刀上,
偶然发现一粒遥远异域的微尘——
于是世界显得奇妙,
仿佛裹着彩色的雾。

以上引自勃洛克的诗。另一位诗人说:

每一处水洼——都飘散着海洋的气息,
每一粒石子——都蕴含着沙漠的意味……

遥远异域的微尘和路边的石子啊!想像往往正是从这些纤尘和石子开始了它难以抑制的活动。这使我想起一位西班牙老贵族的故事。

也许这位老贵族过去有过美好的生活,但在我讲的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却在卡斯特利翁属于他自己的庄园里过着贫困的生活。庄园不过是一小块土地和一所像城堡中的单人囚室一样阴森的石砌房子。那是他的祖先留下来的产业。

这个贵族是单身,家里只有一个老保姆。她只能勉强给他做简单的饭菜,其他一切,她都记不起来了。跟她聊天也聊不出什么结果。

这位贵族整天坐在尖拱形窗下一只破扶手椅里看书。只有

---

① 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政论家,文学批评家。

书脊胶干裂的声音划破沉寂。

这位贵族有时望望窗外。那里挺立着一棵枯树，树干像铁一样乌黑。远处地平线上是绵延起伏的荒丘。这一带是西班牙一个偏僻荒凉的省份，但是这位老贵族已经习惯了。

他已经不年轻了，不能弃家出走，去经受什么风尘和旅途劳顿，何况途中还会遇到许多麻烦。再说，在西班牙王国的这片土地上，他既无亲属，也无友好，有什么必要出门远行呢！

这位老贵族过去的生活经历，很少有人知道。据说，他有过妻子和一个漂亮的女儿，但她们在同年同月死于瘟疫。从那以后，他就闭门索居，甚至连夜间或遇恶劣天气上门的不速之客，他也不愿意接待。

一次，一个穿粗布斗篷，满脸风尘的人叩门。那人把一头驴拴在那棵黑树上。晚饭后，坐在熊熊的炉火旁，那人向老贵族讲述——感谢圣母！——他航海去西方探险，总算平安回来的经过。那是国王听信了一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讲的诱人故事，于是派去了几艘帆船。

他们横渡大洋，在海上航行了几周，听见海妖塞壬① 的呼喊声。这些海里的女妖向他们讨好，请求把她们接到甲板上取暖。她们像用床单一样，用长发裹住自己赤裸的身体。

船长下令不理睬这些海妖。水手们被激怒了。他们渴望爱情，渴望丰满而富于弹性的女人的胴体。

这一切以闹事失败而告终。三个领头的被吊到横桁上。

他们在海上漂流，终于看到了从未见过的被海草覆盖的大海。海草丛中盛开着大朵蓝色的花。当时刚做完弥撒，船队开始绕过这一片被海草覆盖的海面，正在这时，地平线上突然出现

---

① 塞壬，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

了一片美丽而神秘的新陆地。和风从岸边送来树林轻柔的沙沙声和令人陶醉的草木的清香。

船长登上舰桥，抽出佩剑举向天空，利剑闪着金光。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他们终于发现了埃尔多拉多这个国度，这里的山脉富含宝石、黄金和白银。

老贵族默默地听这个人讲述。

这人临走时从皮囊里取出一只从埃尔多拉多带来的玫瑰色贝壳，送给老贵族，以感谢他的晚餐款待和留宿。老贵族觉得这是一件不值钱的小东西，就收下了。

那人走后，夜里起了暴风雨。闪电在沙石覆盖的平原上缓缓划过，时隐时现。

贝壳摆在老贵族床旁的桌上。

老贵族醒来看见贝壳被天火映得通明。贝壳深处有玫瑰色的光、泡沫和彩云交织成的仙境，这景致也时隐时现。

一道电光掠过。老贵族期待着下一道闪电，他又看到贝壳里那仙境，比上一次更清楚。只见宽阔的瀑布似的水流从陡峭的岸上泡沫翻滚，波光闪烁地奔腾入海。这是什么？想必是河流吧。他甚至感觉到河水的清凉，感觉到水花溅到脸上。

他觉得这是挥之不去的梦给他带来的感受，他于是起床，将扶手椅拉到桌旁，面对贝壳坐下，朝它俯下身去，不知为什么一颗心怦怦直跳。他想仔细观察，要从深藏在贝壳中的那个地方，发现更多新奇的景象。但是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消失了。

老贵族不敢点蜡烛，他害怕在昏暗的烛光下，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幻视，贝壳里什么也没有。

他一直坐到天明。晨光中贝壳毫无奇特之处。贝壳里除了一丝隐隐的模糊闪光之外，什么也没有，仿佛那神奇的地方一夜

之间早已退到千里之外去了。

当天，老贵族就到马德里叩见国王，请求国王恩准他自费装备一艘帆船，去西方探寻那个神秘的地方。

国王体察下情，批准了他的请求。但是，老贵族走后，国王对贴身的侍卫说：

"这个老贵族分明是疯了！单靠一艘帆船，他能干什么？但是上帝连疯子也给引路。说不定这个老头还会给咱们王国增加新的领土呢。"

老贵族向西方航行了好几个月。他只喝水，吃得很少。焦躁不安使他身心交瘁。他竭力不去想那神奇的地方，担心永远不会到达彼岸。即使看到那地方，那里也只是一片荒漠，一块块草地和被风卷起的灰色尘柱。

老贵族祈求圣母帮他摆脱这种失望情绪。

做工粗糙的木雕圣母像悬挂在船头。她随船向前驶去，在浪头上摆动。她那双凸出的蓝眼睛凝视着远方的大海。镀金剥落的头发上和褪色的红斗篷上溅着闪闪的水花。

"给我们指路吧！"老贵族祈求圣母说，"那地方不可能没有。我在梦中和梦醒以后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过它。"

一天晚上，水手们从水中捞起一根折断的树枝。这说明接近陆地了。

树枝上有大片大片的树叶，像鸵鸟的羽毛。树叶散发着甜丝丝的情香。

这一夜，船上谁也没有睡。

万丈霞光中，海面上终于出现了那地方，重峦叠嶂，色彩缤纷。清澈的河水从山峰上奔泻入海。欢快的鸟群在葱茏的树梢上翱翔。因为林木茂密，鸟儿无法飞入树林，只得在树梢上盘旋。

岸上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花果的清香。仿佛胸中每吸入一口这样的馨香就会使人长生不老。

太阳升起,被笼罩在瀑布迷茫水花之中的那地方,突然大放异彩,像透过水晶玻璃器皿折射出的七彩阳光。

整个地方像天上的女神和光明女神遗忘在海滨的一条腰带,光焰夺目。

老贵族双膝跪地,向那块神秘的土地伸出颤巍巍的双臂,说:

"感谢神明,感谢你!是你让我在垂暮之年萌发了追求新奇事物的愿望,使我的心底里渴望见到那神奇的地方。否则,我永远不会看到它,而面对眼前单调的丘陵景色,我的双眼会干枯,会失明。我想用我女儿的名字佛洛伦西亚来命名这块幸福的乐土。"

几十道小彩虹从岸边向帆船迎面扑来。老贵族感到头晕目眩。其实这是阳光透过瀑布翻飞的水花映出的万道彩虹,不是彩虹向帆船迎面扑来,而是帆船急速地向彩虹靠近。

桅杆上面面船帆威风凛凛地刷刷响,奉命升起的节日彩旗也欢快地呼拉拉飘扬。

老贵族扑倒在温暖潮湿的甲板上,突然不做声了。他那颗疲惫的心已经受不住这天赐予他的强烈的莫大欢乐。他死了。

据说,后来被命名为佛罗里达的地方,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看来没有必要详细讲述这个故事。但有些主要的关键性细节,还是应该勾勒一下,以便明确一种思想,即生活中产生的想像,有时也能支配生活。

披粗布斗篷的人使老贵族产生了想像。这位老贵族就被想像深深吸引。因此,他才在贝壳深处看到了那奇妙的地方。

想像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人们相信它。如果不相信，想像就变成无聊的智力游戏，变成毫无意义的孩子们的万花筒。

相信想像就是一种力量，它迫使人在生活中寻找想像的事物，为想像的实现而奋斗，响应它的召唤，像老贵族那样，最终在现实中创造他想像的事物。

但首要的是想像与艺术、文学与诗歌的联系最紧密。

想像基于记忆，记忆则基于现实的现象。记忆的积累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有一种规律——联想的规律，或罗蒙诺索夫所说的"综合想像的规律"，它将杂乱无章的回忆，按相互类似或时间、空间上接近，加以分类，换句话说，加以概括，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锁链。这条联想的锁链就是想像的线索。

联想的丰富意味着一位作家内心世界的丰富。内心世界丰富，那么任何一种思想或题材就立刻会现出鲜明的轮廓。

有一些高浓度的矿泉。你只要随便往泉水里放一根树枝或一根钉子，过一会儿，树枝或钉子上就会附着许多白色晶体而变成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人类的思想在陷人记忆的源泉中，在丰富的联想氛围里，大概也会出现同样的变化。思想会变成艺术作品。

可以随便举出联想的例子。但是，必须记住，每个人的联想，都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他的回忆相联系。因此，一个人的联想可能与另一个人的联想大不相同。同一个字，对于不同的人，可以引起不同的联想。作家的任务在于将自己的联想传达给，也可以说，带给读者，使读者产生同样的联想。

罗蒙诺索夫在他的《修辞学》中举了一个最简单的联想的例子。用罗蒙诺索夫的话说，联想"就是由一个已经想到的事物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比如，我们心里想到船，就会同时想

到船航行的海，由海想到风暴，由风暴想到浪，由浪想到岸边的涛声，由岸想到石子等等”。

可以说，这是最简单的联想。联想通常要比这复杂得多。

我举其中的一个例子。

“此刻我正在里加湾沙丘上一所小房子里写作。性格开朗的拉脱维亚诗人伊默曼尼斯在隔壁朗诵他自己写的诗。他穿一件高领红毛衣。这种毛衣，我还是在很久以前，在战争时期，看见导演爱森斯坦穿过。我在阿拉木图街上与艾森斯坦邂逅。他拿着一大包刚买的书。他的选择很奇怪：《排球指南》、中世纪史文选、代数教程，以及诺维科夫－普里波伊[1] 的《对马》。

“导演应当什么都知道，”爱森斯坦说，“而且对一切都要用视觉形象表现出来。”

“连代数公式也要求这样吗？”我问。

“当然！”爱森斯坦回答说。

诗人弗拉季米尔·卢戈夫斯科伊[2] 当时正在写一部长诗，其中一章是写爱森斯坦的，题为《阿拉木图——梦之都》。诗中描写了悬挂在爱森斯坦房间墙壁上的墨西哥假面。那是他在中美洲旅行时带回来的。顺便说一句，在墨西哥还生活着濒于灭绝的马雅族。他们只剩尖塔形的庙宇和马雅语的一些单词。相传古马雅语中的许多单词最初都是学者们从密不透风的尤坦卡大森林中的鹦鹉那里听来的。鹦鹉们将这些单词一代代传下去。

总之，征服美洲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卑劣无耻的历史。应

---

① 诺维科夫－普里波伊（1877—1944），俄罗斯作家。代表作《对马》是一部反映俄日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

② 弗拉季米尔·卢戈夫斯科伊（1901—1957），俄罗斯诗人。

当对这段历史加上这样的标题。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最好标题是:《卑劣无耻》。它正好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搜求标题可真是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啊!

构思标题是一种特殊的才能。有些人写得很好,但不善于给自己写的东西拟定标题。相反,有些人很会讲,却写不出来。这些人只是夸夸其谈。需要有真正的才华,像高尔基那样,从不同的侧面,讲述同一个故事,然后,不是重复口述的故事,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写出一篇新颖的小说。高尔基讲故事精彩极了。一件真实的事,经他一讲,就增加了许多细节。同一个故事,他每讲一次都加入新的细节,这些细节不断变化,变得越来越有趣。他口述的故事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创作。因此,高尔基在索然无味、锱铢必较、对他讲的故事的真实性抱怀疑态度的人中间,感到寂寞难耐。他紧皱双眉,沉默不语,仿佛说:"同志们,跟你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无聊透了!"根据真实事件生动地讲述一个故事,许多作家都具有这种才能。特别是马克·吐温[①]。有一位专门纠缠细节真实不放的批评家指责马克·吐温撒谎。马克·吐温震怒了,对那位批评家说:"如果您自己不会撒谎,而且没有撒谎的本事,甚至对怎么说谎连一点概念都没有,您凭什么就能断定我是不是在说谎呢?只有精于此道的人,才敢于这样武断。而您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经验的。您在这方面完全外行,一无所知。"

伊里夫[②] 说,他在马克·吐温的故乡小城,看见汤姆·索亚和哈克贝里·费恩[③] 的雕像。雕像上费恩手里还抓着一只死猫

①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作家。

② 伊里夫(1897—1937),俄罗斯作家。

③ 汤姆·索亚和哈克贝里·费恩,分别为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的尾巴。说实在的，为什么不能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塑雕像呢？比如，堂吉诃德[1] 或格利佛[2]，保尔·柯察金[3]、塔季扬娜·拉林娜[4]、塔拉斯·布尔巴[5]、彼埃尔·别祖霍夫[6]，契诃夫的三姊妹[7]，莱蒙托夫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或别利[8]。”

上面所说的，就是一串联想。它可能是源源不断的。如果将这一串联想的第一环和最后一环——别利的红绒线衫和塑像——套在一起，那么这一串原本非常自然的联想就变成了梦呓。

关于联想我讲了这么多，实在是因为它与创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我关于想像的长篇阐述中，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没有想像就没有真正的散文，也没有诗歌。

对于想像讲得最透彻的恐怕是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9]了：

“杂乱正是创造真实的、崇高的、富于诗意的事物的前奏。让天才之光穿透这黑暗吧。势均力敌的纤尘因爱与和谐而重新充满活力，它们紧密地相互贴近，排列整齐，聚合成一颗水晶般的璀璨晶体，静止下来，于是出现了山岳和弥漫的大海，生命的

---

① 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

② 格利佛，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中的主人公。

③ 保尔·柯察金，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

④ 塔季扬娜·拉林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

⑤ 塔拉斯·布尔巴，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中的主人公。

⑥ 彼埃尔·别祖霍夫，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

⑦ 三姊妹，指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契诃夫剧作《三姊妹》中的主人公。

⑧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或别利，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⑨ 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俄国作家。

活力在崭新世界的前额上写满了苍劲的象形文字。"

夜幕降临,精神的力量渐渐复苏,暂时它还没有名称。称它什么好呢?称作想像、幻想、对人的意识中最细微处的观察、灵感?心灵的振奋或宁静?快乐或忧伤?天晓得!

我熄了灯,夜渐渐亮起来。黑暗中透着雪的反光。海湾冻着冰。它像一面昏暗的大镜子映照着夜色,使朦胧的夜色中透着光亮。

可以看见波罗的海松树黑色的树梢。有节奏的隆隆车声渐渐变强,那是电气列车从远处经过。随后又寂静下来,静得仿佛能听到窗外针叶最细微的沙沙声和不知什么发出的轻轻的哔喇声。这些声音伴随着星光的闪烁。也许正是霜花从星星上轻轻地飘落下来,发出哔哔喇喇和窸窸窣窣的声音吧。

屋里空空荡荡。只有我独自一人。旁边是浩瀚的大海。沙丘后边是一片开阔的沼泽和低矮的树林……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只要点上灯,坐到桌旁,开始随便写点什么,孤独感就即刻消失了。我并不孤单。在这间斗室里,我可以跟千千万万人,跟整个世界对话。我可以对他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让他们笑,让他们伤心,让他们思考,愤怒,激发他们的爱心和同情,牵着他们的手,像向导那样,在生活中为他们引路。这生活是我闭门在这斗室中创造的,但它却闯进了大千世界。

牵着他们的手,去迎接朝霞。朝霞必然会升起的。已经隐约可以看它微微撩起东方的夜幕,照亮了此刻刚刚露出蔚蓝色的遥远天际。

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我很激动,我只是想把此刻充满我的理性、心灵和整个身躯的一切传达给人们。思潮在我胸中涌动,但它究竟流向何方,究竟如何来表现自己,我自己

也还不清楚。但我知道我将为谁写作。我将与整个世界对话。通过视觉想像来弄清这个概念——整个世界——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

你常常会想起某人，比如想到一个两眼炯炯有神的小姑娘。有一次在牧场上，她突然朝我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气喘吁吁地说：

“我在这里等您好久了。已经采了一大把鲜花，而且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二章背了九遍。全家都在等您，因为您不在，我们都觉得没意思。您来给我们讲讲您在湖上遇到的事，求求您编出点有趣的事。不编也行，就讲讲您看到的事，因为牧场本身就美极了，野蔷薇已经第二次开放了！总之，一切都美极了！”

也许为这样一个女人写作，多年来的痛苦、欢乐、温情使她的生活与我紧密相连，如今我们已无所畏惧。

也许为朋友写作。像我这样的年龄，我的朋友们已经在逐年减少了。

不过，最终，我是为那些愿意读这些作品的人写作的。

我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也许因为我想讲的事情太多，我还没有找到一种思想能像磁石那样，把其他思想都吸引过来，让它们都一一排列在我要讲述的范围之内。

凡从事写作的人都熟悉这种心境。

屠格涅夫说：“无怪乎诗人们谈到灵感。当然诗神并未从奥林波斯圣山① 上下凡，也没有给他们带来现成的诗，但他们常常有类似灵感的特殊心情。费特② 在一些受到人们讪笑的诗中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唱，只是他的短诗‘逐渐成熟

① 奥林波斯圣山，希腊神话中诸神居住的地方。

② 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被认为是纯艺术派诗歌代表。

了',这非常透彻地说明了这种心境。有时你会感到想写,但不知道究竟要写什么,只是感到会去写。诗人的这种心境被称作'诗兴萌发'。这种时刻是艺术家的惟一享受。如果没有这种享受,谁也不会去写作了。之后,等到需要清理头脑中的思绪,把它们写到纸上的时候,苦恼就开始了。"

半夜突然传来一声鸣叫。那是远处轮船的汽笛声。天寒地冻,它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昨天里加报纸报道,一艘破冰船从列宁格勒驶人里加湾。看来一定是那艘破冰船的汽笛声。

我突然想起一艘破冰船上领航员的故事,说他的船在通过芬兰湾时,在冰面上看到一束冻了的干野花。花上盖着薄薄的一层雪。是谁将它们丢在这一片茫茫的冰雪上的呢?看来是最初刚刚上冻,一艘船通过这里薄薄的冰层,从船上掉下来的。

于是,出现了形象。它以一种莫名的力量开始引出一个还十分模糊的故事。

要解开这束冻花的秘密。人人都来参与解这个谜团。看过这束花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尽管我并没有看到过那束花。这是那个在牧场上朝我跑过来的小姑娘采的那束花吗?也许正是那束花吧。可那束花怎么会掉在这里的冰上?只有在超越时空限制的神话里才会有这样的事。

于是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纯粹女性的对花的看法。与我们男人的看法不同。对我们说来,花不过是装饰品。对于女性,花是生物,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客人,而我们这些成年男子疲于奔命,对于这个世界只是偶尔扫上一眼,不屑一顾。

真扫兴,顷刻之间竟已是朝霞满天了。阳光会驱散这些想法,使它们在刻板的人们心目中变得十分可笑。

阳光下许多神话会收敛，像蜗牛一样躲进自己的硬壳里。

但是，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故事却诞生了。童话、故事、小说一旦出现，要阻止它是不可能的。这样做无疑在扼杀生命。它们自己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绽放花蕾。

将童话写到纸上的时刻终于到了。要将它写出来多半和用语言表达淡淡的青草的气息同样困难。写作时几乎屏住呼吸，生怕吹落覆盖在童话上的薄薄粉层。你必须加紧写作，因为模糊显现的光亮、影像和单独的画面都会一闪即逝。不能迟疑，不能落后于想像的奔跑。

童话写完了。我想怀着感激的心情再看一眼那双藏着童话的炯炯有神的眼睛。

曹苏玲 译

夜行的公共马车

我本想单独用一章写想像的力量和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但是经过考虑，我没有写上述的章节，而是写了诗人安徒生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取代那一章，它使人对想像有更清楚的概念，比泛泛地谈这个题目好。

在威尼斯古老而肮脏的旅店里是找不到墨水的。他们要墨水干什么？用它给房客们开虚假的账单吗？

不过当赫里斯蒂安·安徒生住进这家旅店时，锡制的墨水瓶里真还剩下一点墨水。他开始用这一点墨水写他的童话。但是眼看着童话越来越发白，因为安徒生已经往墨水瓶里加了好几次水。不过他依旧没有写完，这篇童话的喜剧性结局就留在墨水瓶底里了。

安徒生微笑了一下，决定下一个童话叫《留在干涸的墨水瓶底里的故事》。

他爱上了威尼斯，称它是"凋落的荷花"。

海上，一团团秋天的云在低空翻滚。条条运河里的污水拍溅着水花。十字路口吹着冷风。但是，只要太阳一冲出云层，墙垣的绿霉下边就露出粉红色的大理石来，窗外的城市像古老威

尼斯的艺术大师卡纳列托[1]的画。

的确，这座城市尽管显得有几分苍凉，但却非常美丽。为了还要去其他城市，已经到了要同它告别的时候了。

因此，当安徒生吩咐旅店的仆役购买傍晚去维罗纳的公共马车车票时，并没有感到特别遗憾。

仆役跟这家旅店倒很般配，懒洋洋的，总带着几分醉意，手脚不干净，却天生一副忠厚老实的面孔。安徒生的房间他从来没有收拾过，石板地也从来没有打扫过。

从红丝绒窗帘后边不时飞出成群的金光闪闪的蛾子。洗脸只好用一只破瓦盆，瓦盆上画着在海滨洗澡的乳房丰满的女郎。油灯打碎了。代替它的是桌上摆着的一个笨重的银烛台，上边插着一截脂油烛头。烛台大概从提香[2]时代起就没有擦洗过。

从一楼廉价的小饭铺飘来一股烤羊肉和大蒜的气味。一群年轻妇女随随便便用破丝带系着旧天鹅绒胸衣，整天在那里嘻嘻哈哈，吵吵嚷嚷，弄得人昏头昏脑。

有时这帮妇女互相揪住头发厮打起来。安徒生偶尔从厮打的妇女身旁走过时，会停下来欣赏她们散乱的发辫，欣赏她们气得通红的面孔和燃烧着复仇火焰的目光。

但是，最迷人的自然是从她们眼眶里流到面颊上的那一颗颗小钻石般愤怒的泪珠。

一看见安徒生，女人们就都不做声了。在这位身材瘦削、风度优雅、鼻子尖尖的先生面前，她们觉得难为情。尽管她们都尊称他为“诗人先生”，但却认为他是个怪僻的外地人。她们认为他是个古怪的诗人。他体内流淌的血没有激情。他不会跟着吉

---

① 卡纳列托(1697—1768)，原姓卡纳尔，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

② 提香(1490—1576)，意大利伟大画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卓越代表人物。

他的音乐唱那些悲悲切切的船歌，也不会逐一爱上他遇到的女人。只有一次他从扣眼儿里拿下一朵红玫瑰，送给一个很难看的洗盘子小姑娘。她还是跛脚，走起路来像只鸭子。

仆役去买票的时候，安徒生连忙跑到窗口，拉开厚厚的窗帘，看见他正吹着口哨沿运河边走去，一边走，一边顺手拧了一下卖小虾的女人的乳房，结果吃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来仆役站在拱桥上，聚精会神地啐了好久，想把吐沫啐到漂在桥桩旁的半只空蛋壳里。

他终于啐中了，蛋壳沉了下去。接着他又走到一个戴破帽子的孩子身边。孩子在钓鱼。他坐到孩子身旁，茫然地盯着漂子，等游过来的鱼上钩。

"天哪！"安徒生绝望地喊道，"莫非因为这个傻瓜，我今天就走不成了吗？"

安徒生把窗户推开。窗玻璃震得哗哗响，连仆役都听见了。他抬起头来。安徒生高举双臂，愤怒地挥舞双拳。

仆役摘下孩子头上的帽子，高兴地向安徒生挥了挥，把帽子又扣到孩子头上，跳起来，在拐角的地方不见了。

安徒生大笑起来。他一点也不生气。就连这些可笑的小事都使他的游兴与日俱增。

旅途中常遇到出乎意料的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女人狡狯的眼波会在睫毛下突然一闪，什么时候陌生城市的塔楼会突然在远处出现，载重货轮的桅杆会在地平线上摇晃，不会知道阿尔卑斯山上暴风雨大作时，你脑海里会出现怎样的诗句，是谁的歌喉像旅途中的铃铛向你唱起含苞欲放的爱情小曲。

仆役送来了公共马车的车票，但没交出找回的零钱。安徒生揪住他的衣领，客客气气地把他拉到走廊上，开玩笑地拍了一下他的后脖颈。仆役顺着摇摇晃晃的楼梯，三步并作两步地冲

下楼去，一边放开喉咙唱起来。

公共马车驶出威尼斯时，稀稀落落地下起雨来。夜幕开始笼罩这一片泥泞的原野。

马车夫说，从威尼斯驶往维罗纳的公共马车必须在夜间起程，这准是撒旦定的规矩。

乘客们谁也没有搭话。马车夫沉默了一下，愤愤地啐了一口，并警告乘客们说，除了铁灯里的一截蜡烛头外，再没有蜡烛了。

乘客们并不在意。于是马车夫开始怀疑乘客们的头脑是否健全，他又说，维罗纳这地方很闭塞，正派人到那里不会有事做。

旅客们都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谁也不愿去顶撞他。

乘客总共只有三个人：安徒生、一个脸色阴郁的老神甫，还有一位披黑斗篷的太太。安徒生一会儿觉得这位太太很年轻，一会儿又觉得她上了年纪；一会儿觉得她非常漂亮，一会儿又觉得她并不好看。这都是因为铁灯里的烛头作怪。它随心所欲，每次照出这位太太都不一样。

"要不要把蜡烛熄掉？"安徒生问，"现在用不着。等需要的时候，可又没得点了。"

"意大利人可从来不会有这种想法！"神甫激动地大声说。

"为什么？"

"意大利人没有预见的本领。他们总是突然醒悟，大喊大叫，但已追悔莫及了。"

"可见您，"安徒生问，"神甫大人，是不属于这个轻率浮躁的民族了？"

"我是奥地利人！"神甫生气地回答说。

谈话中断了。安徒生熄灭了蜡烛。沉默片刻后，那位太

太说：

“在意大利这一带，夜间出行最好不点灯。”

“可车轮声照旧会暴露我们，”神甫反驳说，接着又不以为然地说：“太太们外出旅行都应该有一位亲属陪同。”

“我的陪同，”太太回答说，狡狯地一笑，“就坐在我身边。”

她是指安徒生。安徒生为此脱帽向这位旅伴表示谢意。

蜡烛刚一熄灭，各种响声和气味就更加厉害了，仿佛它们都为对手的消失而感到高兴。马蹄声，车轮在砾石上滚动的辚辚声，弹簧的震颤声，雨点敲打车篷的声音，都变得更大了。从窗外吹进来的潮湿的青草和沼泽的气味也更加浓烈了。

“真奇怪！”安徒生喃喃地说，“我以为在意大利能闻到橙树林的气味，想不到闻到的却是我国北方的气味。”

“等一会儿就不一样了，”太太说，“我们正在往小山坡上爬，那里的空气要温和些。”

马匹慢步走着。马车真的正在爬一个不太陡的小山坡。

但是夜色并没有退去。相反，道路两旁延伴着老榆树。扶疏的枝叶间一片漆黑，浓重而静谧，隐约可以听到它与树叶和雨滴的低语。

安徒生放下车窗，一条榆树枝伸进来。安徒生从枝条上摘下几片树叶留作纪念。

他像许多想像力丰富的人一样，旅途中总要搜集小东西。这些小东西有一个特点：它们能重现过去，能使他，安徒生，回忆起在拾随便一块马赛克的碎片，一片榆树叶或一块小小的驴蹄铁时的心情。

“夜啊！”安徒生自言自语说。

这时夜的黑暗比阳光更使人感到快慰。黑暗能使人平静地思考一切。如果安徒生思考得厌倦了，黑暗可以帮助他想出许

多以他为中心的故事。

在这些故事中，安徒生总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年轻英俊，朝气蓬勃的人。他总是慷慨地把感情脆弱的批评家们称之为"诗之光"的词汇装点在自己周围。

事实上安徒生长得很难看，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他身材细高，很腼腆。他的手脚活动起来像提线儿木偶，一摇一摆。在他的家乡，孩子们管这种小木偶叫"罗锅儿"。

具备了上述特征，他是不可能指望受到女士们的青睐了。但每当年轻女子从他身旁经过，像走过一根路灯柱似的，他心里还是感到委屈。

安徒生打盹了。

他醒来时，首先看到的是一颗绿色大星星，在大地上空闪闪发光。显然夜已经很深了。

马车停着。车外传来说话声。安徒生侧耳倾听。原来是马车夫在跟中途拦车的几个女子讨价还价。

这几个女子的说话声清脆而婉转，因此这场悦耳的讨价还价使人联想起古歌剧中的宣叙调。

按这几个女子出的价钱，马车夫不同意带她们到一个显然不起眼的小城镇。她们于是争先恐后说，钱是她们三个人凑的，再没有更多的钱了。

"好了！"安徒生对马车夫说，"您开价简直开得没道理，不够的由我来补。要是您对客人不再这么粗野，不再胡说八道，我还会给您加钱。"

"好吧，美人儿，"马车夫对三个女子说，"上车吧。感谢圣母，让你们遇上了一位大手大脚的外国王子，他只是不愿因为你们耽误了马车。你们对于他只是过期的通心粉罢了，一点用处

也没有。”

“啊，耶稣！”神甫哼了一声。

“姑娘们，坐到我身边来吧，”那位太太说，“这样咱们会暖和些。”

姑娘们一边小声说话，一边递东西，爬上马车，跟车上的人打招呼，不好意思地谢过安徒生之后，就坐下不言语了。

即刻散发出一股羊奶酪和薄荷的气味。尽管一片漆黑，安徒生仍然模糊地看到姑娘们廉价耳环上的小玻璃珠在闪闪发光。

马车走动了。砾石在车轮下沙沙作响。姑娘们又嘀咕起来。

“她们想知道，”那位太太说，安徒生猜想她一定在黑暗中偷偷地笑，“您是什么人。您真是一位外国王子，还是一位普通的外国游客？”

“我是预言家，”安徒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能预卜未来，还能在黑暗中看到一切。不过我不是招摇撞骗。如果说是的话，我大概可以算是哈姆莱特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一个可怜的王子吧。”

“那么，像现在这么黑，您都能看到什么？”一个姑娘好奇地问。

“就拿你们说吧，”安徒生回答说，“我看你们看得清清楚楚，你们的美貌使我倾心。”

他说完这话，觉得自己的脸发凉。每当他构思长诗或童话时出现的那种感受又要出现了。

在这种心情下，轻微的不安，不知从哪里来的源源不断的词汇，以及突然产生的诗的力量和能驾驭人的心灵的感觉，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

仿佛在他的一个故事里，有一只古老的魔箱，盖子噌地一声飞起来，箱子里藏着没有说出的思想和没有表露的情感，藏着大地的全部魅力，它的一切花朵、色彩、声音，馥郁的风，大海的辽阔，林海的涛声，爱情的痛苦和婴儿呀呀的语声。

安徒生不知道这种心情叫做什么，有人说是灵感，有人说是诗兴，也有人说那是即兴创作的才能。

"我一觉醒来，突然听见黑夜里你们的说话声，"安徒生沉吟了一下，又平静地说，"可爱的姑娘们，能认识你们，甚至像对偶然相遇的姐妹们那样爱上你们，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比方说您这位生着满头柔软的浅黄色头发的姑娘吧，您爱哭，特别喜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您在菜园里干活儿的时候，连野鸫都会落到您的肩上。"

"哎呀，尼科林娜！他这是说你呢！"一个姑娘出声地说。

"尼科林娜，您怀有一颗火热而温柔的心，"安徒生依旧平静地继续说，"倘若您的所爱遭遇不幸，您会毫不犹豫地翻过雪山，走过干旱的沙漠，不远万里去看望他，救助他。我说得对吗？"

"既然您这么想，"尼科林娜尴尬地嘟哝说，"我想我会去的……"

"姑娘们，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安徒生问。

"尼科林娜、玛丽亚和安娜，"一个姑娘很乐意地代表三人回答说。

"玛丽亚，您的美貌我不愿加以评论，因为我的意大利语说得不好。但年轻时，我曾对诗神起过誓，不论我在什么地方看到美，我都要赞颂它。"

"耶稣啊！"神甫低声说，"他被毒蜘蛛蜇了一下。他疯了。"

"有些女人具有惊人的美貌。她们几乎都性格内向。她们独自承受着满腔炽烈情感的燃烧。热情似乎从内部烧灼着她们

的面庞。玛丽亚，你正是这样的女性。这种女人的命运常常非同一般。要不就很悲惨，要不就很幸福。”

“您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吗？”那位太太问。

“现在就正好遇上，”安徒生回答说，“我这番话不仅是对玛丽亚说的，也是对您说的，夫人。”

“我想，您说这番话不是为了要消磨这漫漫长夜吧，”太太用颤巍巍的声音说，“这样对这个可爱的姑娘太残酷了。对我也一样，”她又低声说。

“夫人，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

“那么，怎么样呢？”玛丽亚问，“我将来幸不幸福呢？”

“虽然您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但是您希望从生活中得到的太多，所以您要幸福是不容易的。不过在您的一生中，您会遇到一个人能配得上您那颗高远的心。您选中的人当然是出类拔萃的。他也许是一位画家、诗人、为意大利自由而战的勇士……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或是海员，但都胸怀宽广。这其实都一样。”

“先生，”玛丽亚腼腆地说，“我看不见您，所以我才敢问您，如果这个人已经占据了我的心，我该怎么办呢？我总共只见过他几次，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去找他呀！”安徒生大声说，“找到他，他会爱上您的！”

“玛丽亚！”安娜兴冲冲地说，“就是维罗纳那个青年画家吧……”

“别说了！”玛丽亚喝斥她。

“维罗纳不是一座大城市，要找一个人不难，”那位太太说，“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叶连娜·格维奇奥利。我住在维罗纳。维罗纳的每个人都会告诉您我家在什么地方。玛丽亚，您到维罗纳来，就住在我家里。一直等到我们这位可亲的旅伴预言的大

喜事到来。”

玛丽亚在黑暗中摸到叶连娜·格维奇奥利的手，把它贴到自己火辣辣的面颊上。

大家都陷入沉默。安徒生发现那颗绿色的星熄灭了。它已经落到地平线下了。这说明已经是后半夜了。

“那么，您为什么不说说我呢？”安娜问，她是三个姑娘中话最多的一个。

“您会有许多孩子，”安徒生很肯定地说，“他们会一个个排队拿奶。每天早上您要花许多时间给他们梳洗。您未来的丈夫会帮您的忙。”

“该不是皮特罗吧？”安娜问，“皮特罗这个傻瓜，我才用不着他呢！”

“您每天还要花许多时间去挨个儿吻这些流露出好奇目光的男孩女孩。”

“在教区说这些疯话，真是天晓得！”神甫忿忿地说，但没有人理会他的话。

姑娘们又贼贼喳喳地在嘀咕什么，谈话还不时被笑声打断。后来玛丽亚终于说：

“先生，现在我们想知道您是什么人。一片漆黑，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我是一个云游四方的诗人，”安徒生回答说，“我是个青年。一头浓密的鬈发，晒得黝黑的面孔。湛蓝的眼睛总含着微笑，因为我逍遥自在，至今还没有心上人。我惟一要做的，就是给人们做一些小礼物，或随便做一些让亲近的人快乐的小事。”

“比方说，什么事呢？”叶连娜·格维奇奥利问。

“怎么说呢？去年夏天我在日德兰，住在一个当林管所主任的朋友家里。有一天，我到树林里散步，来到一片林间空地上，

那里生长着许多蘑菇。我当天就重新去到那里,在每一棵蘑菇下边放上包着银纸的糖果,海枣,或蜡制的小花,顶针,缎带。第二天,我带着林管所主任的女儿到树林里。她当时七岁。她在每一棵蘑菇下边都找到这些意外的小玩意儿。只是海枣不见了,大概被乌鸦叼走了。她高兴得眼中大放异彩,您要是看见该多好啊!我让她相信这些小东西都是地精[1]藏在这里的。"

"您欺骗了一个天真的孩子!"神甫忿忿地说,"这是天大的罪过!"

"不,这不是欺骗。她会一辈子都记住这件事。我向您保证,有过这种经历,她的心不容易变得冷酷。再有,我要提请您注意,神甫大人,我不习惯听取那些强加于人的教训。"

马车停了。姑娘们却像着了迷,都坐着不动。叶莲娜·格维奇奥利低头不语。

"喂,漂亮的姑娘们啊!"马车夫喊道,"醒醒吧!到了!"

姑娘们又唧唧咕咕说了些什么,站起身来。

黑暗中两只纤细但却有力的胳臂突然搂住了安徒生的脖子,滚烫的嘴唇触到他的唇上。

"谢谢!"炽热的嘴唇悄悄地说,安徒生听出是玛丽亚的声音。

尼科林娜谢过他,悄悄地温存地吻了他一下,头发蹭得他的脸直发痒,安娜则使劲出声地吻了他。姑娘们跳下车。马车又沿着石子铺砌的路驶去。安徒生朝窗外看了一眼。除了微微发青的天空下黑糊糊的林梢外,什么也看不见。天将破晓了。

维罗纳金碧辉煌的建筑使安徒生感到震惊。建筑物的外观

[1] 地精,西欧神话中守护地下财宝的侏儒。

似乎一座比一座凝重。建筑结构的协调本应使人们得到心灵上的平静。但是安徒生心里并不平静。

傍晚，安徒生来到通往上边古堡的一条狭窄的小街上，拉了格维奇奥利的古老房子的门铃。

叶连娜·格维奇奥利亲自出来开门。绿色的天鹅绒衣服完美地显露出她苗条的身材。天鹅绒的反光映照着她的眼睛，安徒生觉得她那双眼睛碧绿碧绿，像瓦尔基利亚女神[①] 的眼睛，美得无法形容。

她伸出双手，用冰凉的手指握住他的大手，然后把他让进一间小客厅。

"我太想念您了，"她坦率地说着，负疚地一笑，"我觉得没有您心里空落落的。"

安徒生的脸色发白了。一整天他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暗暗地想起她。他知道自己会狂热地爱上一个女人的每一句话、掉下来的每一根睫毛，爱上她衣服上的每一粒灰尘。他明白这一点。他认为，如果自己任这种爱情燃烧，他的心是难以承受的。它会给他带来太多的苦恼和欢乐，泪水和欢笑，使他无力经受爱情的变化无常。

说不定正是由于这种爱情，他那些源源不断涌现的色彩斑斓的童话会黯然失色，离开他，一去不返呢。到那时，他还有什么价值呢?!

因此，他的爱情总是没有回应的。这样的情况他已经遇到过许多次了。像叶连娜·格维奇奥利这样的女人常常是反复无常的。会有那么可悲的一天，她会发现他很丑。连他对自己也反感。他常常觉得背后有嘲弄的目光。这时他两腿发木，走起

---

① 瓦尔基利亚女神，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女神。

路来踉踉跄跄，真想有地缝可钻。

“只有在想像中，”他说服自己，“爱情才会永恒，才会永远被耀眼的光圈所环绕。看来我想像中的爱情比实际生活中所体验的爱情要美好得多。”

因此，他抱着坚定的决心来看叶连娜·格维奇奥利，看看就走，以后永不见面。

但是，他不能对她直说。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他们只不过昨天在公共马车上相遇，而且彼此什么也没有说。

安徒生站在客厅门口向周围打量了一下。屋角里的大烛台照射着狄安娜[1]白色的大理石头像，那神情仿佛因为自己的美貌而脸色苍白。

“是谁把您的容貌雕成狄安娜，使您的美貌留芳百世？”安徒生问。

“卡诺瓦[2]，”叶连娜·格维奇奥利回答说，垂下了眼睛。她大概猜透了他心里的一切想法。

“我是来告别的，”安徒生用低沉的声音喃喃地说，“我就要离开维罗纳了。”

“我认出您是谁了，”叶连娜·格维奇奥利看着他的眼睛说，“您是赫里斯蒂安·安徒生，著名的童话作家和诗人。可是看来您在自己的生活中却害怕童话。连一段短促的爱情您都没有力量和勇气接受。”

“这是我沉重的十字架，”安徒生承认说。

“有什么办法呢，我可爱的流浪诗人，”她难过地说，一只手搭到安徒生肩上，“走吧！想办法解脱吧！愿您的眼睛永远含着

---

①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月亮和狩猎女神。

② 卡诺瓦(1757—1822)，意大利雕塑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

微笑。不要挂念我。但是，如果一旦您因贫病或衰老而受到折磨时，只要您说一声，我会像尼科林娜一样步行翻过雪山，走过干旱的沙漠，不远万里去安慰您。"

她坐到扶手椅里，用双手掩住脸。大烛台上的蜡烛在劈啪作响。

安徒生看见一颗晶莹的泪珠从叶连娜·格维奇奥利纤细的手指间流下来，滴到天鹅绒衣服上，然后又慢慢地滚下去。

他扑过去跪倒在她脚下，把脸紧贴在她温暖、有力而温馨的脚上。她没有睁开眼睛，伸出双手，扶起他的头，俯下身，吻了他的嘴唇。

第二颗热泪滴到他脸上。他觉得又涩又咸。

"走吧！"她轻声说，"愿诗神宽恕您的一切吧。"

他起身，拿起帽子，快步离去了。

维罗纳上空回荡起晚祷的钟声。

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但却终生彼此思念。

也许，正因为如此，安徒生在去世前不久曾对一位年轻的作家说：

"我为自己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代价。我为它放弃了自己的幸福，那些无论想像有多么强烈，多么光彩夺目，都应由现实来取代的时刻，我却错过了。

"我的朋友，要善于为别人和自己的幸福掌握想像，而不是为了悲伤。"

曹苏玲 译

一本构思已久的书

很久以来，大约十多年前，我就考虑写一本非常难写的书，但我当时认为，甚至至今仍认为这本书是有趣的。

这本书应当由一些杰出人物的奇闻轶事组成。

轶事应当写得短小、生动。

我甚至已开始为这本书草拟了杰出人物的名单。

我决定把我遇到的几位最普通的人物的经历写入本书，他们默默无闻，被人遗忘，但实际上比起已经成名和备受爱戴的人，他们并不逊色。只不过因为生不逢辰，未能在身后在他们后代的记忆中留下哪怕一点点印迹。他们多半是受某种热情所驱使而献身事业、忘我工作的人。

他们中间有一位是内河航船的船长奥列宁－沃尔加里。他的经历非常神奇。他出生在一个爱好音乐的家庭里，曾在意大利学过声乐。但他想徒步环游欧洲，于是放弃了学业，当真做了一名街头歌手，走遍了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每到一个国家，他都在吉他的伴奏下用所在国的语言演唱。

我是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一家报纸编辑部认识奥列宁－沃尔加里的。一次下班后，我们请求奥列宁－沃尔加里为我们唱几首他在街头唱过的歌曲。我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吉他，于是这个身着内河航船船长制服、个子不高的干瘦老头竟变成了一位造诣精深的音乐家，一位卓越的演员和歌手。他的声音显得很年轻。

我们屏息静气聆听着酣畅淋漓的意大利歌曲，高亢激越的巴斯克人[①] 的歌曲和小号伴奏下弥漫着硝烟气息的欢快的《马赛曲》。

奥列宁－沃尔加里漫游欧洲之后，就在海船上当了一名水手，通过了远洋航海员的考试，多次纵横航行于地中海上，后来回到俄罗斯，在伏尔加河上当船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负责莫斯科与下诺夫哥罗德之间的客运工作。

他第一个冒着风险，引领伏尔加河上一艘大客轮，通过莫斯科河一处狭窄而腐朽的水闸。所有的船长和工程师一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他第一个建议把驰名的马尔丘格地方的莫斯科河疏直，河流在这里迂回曲折，甚至看一眼地图上河流在这地方不计其数的转弯都会令你头晕目眩。

奥列宁－沃尔加里写了许多关于俄罗斯河流的出色文章。现在这些文章均已散失、湮没。他熟谙几十条河道的漩涡、浅滩和沉树。关于改善这些河道航行的条件他有自己简单而惊人的计划。

空闲时间他将但丁的《神曲》译成了俄文。

他为人严谨、善良，一天忙到晚。他认为一切职业都同样光荣，因为都是为人民服务，它给予每一个人机会来表现自己是“这块美丽土地上的好人”。

我还有一位朴实可爱的朋友。他是俄罗斯中部一座小城地志博物馆馆长。

博物馆在一所古老的房子里。除了馆长的妻子之外，没有其他助手。夫妻二人不仅把博物馆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还亲

---

① 巴斯克人，居住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个民族。

自动手修缮房屋，储备木柴，干所有的粗活儿。

有一次，我正好遇上他们在干一件很奇怪的活儿。他们在博物馆杂草丛生的各个荒僻角落转来转去，把散乱在周围的石子和碎砖头都捡回来。

原来孩子们用石子打碎了博物馆的窗户，为了让孩子们没有随手可扔的子弹，馆长就下决心把各个角落的石子都捡回到院子里来。

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品，从古老的花边或十四世纪的稀世扁砖和泥炭模型，到不久前才放养到周围沼泽里的阿根廷河狸鼠标本，都经过研究并写了详细说明。

可是这位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由于腼腆而不时咳嗽几声的谦逊的馆长，在给人看画家佩列普廖奇科夫的一幅画时，竟然眉飞色舞，满面春风。

这确是一幅非常美妙的风景画，透过一扇深邃的窗口呈现出一派北方苍茫的傍晚景色，沉睡的小白桦，一片不大的湖面，湖水像银箔一样闪闪发光。

他的工作很难做。很少有人看重他。但他却默默地工作，对任何人也没有要求。即使他的博物馆不会带来大的收益，但有他这么一个人，对于当地人，尤其对于年轻人，难道不是敬业、谦和、热爱故土的典范吗？

不久前，我找出为这本书草拟的杰出人物的名单。名单很长，无法一一罗列。因此只从中信手选取了几位作家。

在列举每位作家姓名的同时，我简单地记叙了我对每位作家的杂感。

为清楚起见，我摘录几段笔记如下。

契　诃　夫

他的笔记在文学中作为特殊的体裁而独立存在。但他在写作中却很少运用它。

伊里夫、阿尔方斯·都德的笔记，托尔斯泰的日记，龚古尔兄弟、法国作家勒纳尔，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和诗人的笔记，都作为一种有趣的体裁而存在。

这些笔记在文学中有充分的权利作为一种体裁而独立存在。但我却与许多作家的意见相左，我认为这些笔记对于作家的主要工作几乎没有用处。

我有一段时间也写笔记。但每当我从笔记本中摘取一段有趣的笔记，放入我的小说或故事中时，结果正是这段文字显得死气沉沉。它游离于作品之外，仿佛成了累赘。

对此我只能作这样的解释，最好从记忆中选取素材。留在记忆中难以忘怀的，才是最珍贵的东西。而那些必须记下来才忘不了的，就不太珍贵，对作家的用处也不大。

记忆像一只神话里的筛子，能筛去糟粕，留下金屑。

契诃夫还从事第二职业。他做过医生。作家如果有第二职业，而且有一段实践，这显然对他有好处。

契诃夫行过医，这不仅使他获取了对人的知识，对他的风格也有所影响。如果契诃夫没有做过医生，也许他不会写出像解剖刀那样锐利、分析精确的作品来。

他的一些短篇小说(诸如:《第六病室》、《没意思的故事》、《跳来跳去的女人》，以及其他许多短篇)都是心理诊断的典范之作。

他的作品容不得丝毫微尘和污斑。契诃夫写道:“必须剔除

多余的东西，把‘按照……’，‘借助于……’等等从句子中清除掉，要注意句子的节奏感，不能在一个句子中把‘开始’和‘停止’并列。”

他毫不留情地把“食欲”、“风骚”、“理想”、“圆盘”、“银幕”这类字眼从文章中剔除出去，这些字眼令他厌恶。

契诃夫的一生是有教益的。他说过，他曾在许多年里一点一滴地去掉自己身上的奴性。只要把契诃夫自青年时代直至晚年的照片，按年龄一一排列开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外表上那一点庸俗气已逐年消失，他的面孔变得越来越严肃、深沉、完美。他的衣着也更加雅致、随便。

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个角落，它在我们每人心目中都占有一席之地。那个角落就是奥特卡的契诃夫纪念馆。

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这个纪念馆就像一扇里边亮着灯的窗口。透过窗口可以看见黑魆魆的花园里那几乎被遗忘的童年，听见玛丽亚·巴甫洛夫娜——那个几乎全国尽人皆知，而且像亲人一样热爱的亲爱的契诃夫的玛莎，听到她亲切的说话声。

我最后一次到这个纪念馆来是一九四九年。

我和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坐在下边的阳台上。芬芳的白色花丛遮住了海和雅尔塔。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说，这一大蓬枝叶繁茂的灌木丛是安东·巴甫洛夫亲手栽种的，它仿佛还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她记不起来了。

她说这话时显得很随便，仿佛契诃夫还活着，刚刚还在这里，只是临时出门，到莫斯科或尼斯去了。

我从契诃夫的花园里摘下一朵茶花，送给与我一道来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这里做客的小姑娘。但是这个漫不经心的“茶花女”竟把茶花从桥上掉到武昌－苏的山涧溪流里，于是它漂向黑

海去了。跟她不能生气，特别是在每一条街拐弯的地方我们似乎都能碰到契诃夫的这个日子里。他要是听到，为了丢掉在他的花园里摘的一朵小花，而去责怪一个不知所措的灰眼睛小姑娘时，他会不高兴的。

亚历山大·勃洛克

勃洛克有一首早期不大出名的诗《温暖的夜笼罩着岛屿》。

这首诗中有一行诗句，舒缓而缱绻。它唤起对豆蔻年华的模糊回忆："我那缥缈的理想之春啊……"

这句话非同一般。这是光，正是这种光使勃洛克大彻大悟。

我每次到列宁格勒，总想去普里亚什卡河（不乘公共汽车或电车，而是步行），去看看勃洛克故居，他曾在那里居住，并在那里逝世。

有一次，我在荒凉的街区和漂着一层青苔的运河中间迷了路，怎么也没有找到勃洛克的故居。这时我偶然在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巷里看到一所褪色的房子，砖墙上挂着一块纪念牌。原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这里住过。

只是在不久前，我终于找到了普里亚什卡河畔的勃洛克故居。

晚秋用缤纷的落叶填满了污浊的河流。普里亚什卡河对岸就是城郊的码头作业区。可以看到工厂、造船厂、船只的桅杆、烟雾和那暮色苍茫的天空。但是普里亚什卡河上却荒凉、寂静，像在边远的省份。

对于像勃洛克这样的诗人，这地方是一个很奇怪的藏身之地。勃洛克找这么一处幽静和近海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它可以还给一颗惶惶不可终日的人类的心灵以平静。

居·德·莫泊桑

他向我们隐瞒了他的一生。

勒纳尔论莫泊桑

莫泊桑在里韦拉有一艘"俊友号"游艇。在这艘游艇上他创作了一篇最悲惨的震撼人心的作品——《在水上》。

在"俊友号"游艇上，莫泊桑雇用了两名水手。年龄大一点的叫贝尔纳。

两名水手丝毫也没有向莫泊桑表露他们都在为莫泊桑担心，尽管他们看出"主人"近来有些不对劲，不说他的思想能使他发疯，单单头痛也会让他受不了而发疯。

莫泊桑去世的时候，这两名水手向巴黎一家报纸编辑部寄去一封文字不怎么通顺的短信，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间巨大的悲痛。也许只有这两个普通人知道，与一般对莫泊桑的误解相反，他们的主人有一颗自尊而又羞怯的心。

他们能为纪念莫泊桑做些什么呢？他们只能尽全力使他心爱的游艇不致落入冷漠的陌生人手中。

两名水手尽了全力。他们尽力拖延游艇的出售。但他们是穷人，只有上帝知道，这对他们是多么困难。

他们求助于莫泊桑的朋友，求助于一些法国作家，但结果都是枉然。游艇最终还是转入游手好闲的富豪巴泰勒米伯爵手中了。

贝尔纳临终的时候，对周围的人说：

"我想，我曾是一名不坏的水手。"

没有比用这句话更朴实地来表达他度过的光明磊落的一生

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理直气壮地用这句话来评价自己。

这句话是莫泊桑通过手下一名水手之口，给我们留下的遗言。

他走过了一段极为短促的写作道路。他说："我像一颗流星一样走进文学生涯，也将像闪电一样走出来。"

他是人类陋习的毫不容情的观察者，解剖者，他称生活是"作家的临床诊所"。辞世前不久，他所追求的是纯洁，歌颂痛苦的爱情和欢乐的爱情。

甚至在他临终的时刻，他感到自己的头脑已被一种毒盐完全吞噬，绝望之中他仍然在想，自己短促而庸碌的一生中究竟舍弃了多少真挚的感情。

他召唤人们向何处去？他带领人们向何处去？他做过什么承诺？作为一名小艇的桨手和作家，他可曾用自己强有力的双手帮助过他们？

他明白，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倘使他的作品中多一些同情，他会作为善良的化身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

他像一个愁眉苦脸，怕难为情的弃儿，向往着温情。他相信爱情不仅仅是渴慕，也是牺牲，是掩蔽的欢乐，是这个世界的诗。但为时已晚，留给他的只是良心的谴责和抱憾。

他感到惋惜，深深地悔恨自己随意地抛开和嘲弄了幸福。他想起一位俄国女画家巴什基尔采娃，当时她几乎还是个小姑娘。她爱上了他，他却用嘲讽的，甚至有几分卖弄风情的书信来回答她的爱情。他的男性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不再要求别的什么了。

巴什基尔采娃又算得了什么！更使他感到懊悔的是巴黎一家工厂的年轻女工。

波尔·布尔热叙述过青年女工的这段故事。莫泊桑很气愤。

是谁授权给这位心理分析家恣意闯入真正的人间悲剧之中呢？当然是他自己，是莫泊桑的过失。但他有什么办法呢，盐已经在他的头脑里一层层地沉淀，他已无能为力！有时他甚至已经听到尖尖的小晶体刺入他的头脑，发出嗞嗞的声音。

一个女工！一个天真美丽的姑娘！她读过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平生只见过莫泊桑一面，就怀着一颗像她闪亮的眼睛一样纯洁的火热的心爱上了他。

天真的姑娘啊！她听说莫泊桑还没有结婚，是单身汉，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疯狂的念头，要向他奉献自己的一生，关心他，做他的朋友和妻子，奴隶和婢仆，这个念头在她胸中是那样强烈，她无法抗拒。

她很穷，穿得也不好。她整整一年忍饥挨饿，一生丁一生丁地攒钱，好为自己置办优雅的服装，穿着去见莫泊桑。

服装总算办好了。一大清早，当巴黎还在沉睡，还被笼罩在云雾般的梦境之中，初升的太阳透过云雾射出暗淡的光，这时，她已经醒来了，也只有这时才能听到街心花园的林荫路上，鸟儿在鸣啭。

她用冷水冲过澡，像戴精巧、芬芳的珠宝似的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穿上薄薄的袜子和闪闪发亮的小鞋，最后才穿上非常漂亮的衣裙。她照了照镜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影子。面前站着一个由于快乐、激动面容光焕发的、苗条的美丽少女，爱情使她的眼睛变得乌黑，娇媚的小嘴殷红。她将要这样出现在莫泊桑面前，向他表白一切。

莫泊桑住在郊外的别墅里。她拉了小栅栏门的门铃。给她开门的是莫泊桑的一个朋友，一个追求享乐，追逐女性的无耻之徒。他色迷迷地盯着她，冷笑说，莫泊桑先生不在家，带着情妇到埃特雷塔去了，过些天就回来。

她尖叫了一声，就用一只戴着绷得太紧的软羊皮手套的手抓住栅墙的铁柱走开了。

莫泊桑的朋友追上去，扶她坐上一辆出租马车，送她去巴黎。她哭着，语无伦次地说要报复，就在当天晚上，她故意跟自己过不去，故意气莫泊桑，委身给这个花花公子了。

一年之后，她已经成了巴黎闻名的年轻交际花。当莫泊桑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件事后，他没有把他赶走，没有赏他耳光，也没有要求跟他决斗，只是冷冷一笑，觉得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很有趣。说不定还是写短篇小说的好素材呢。

多么可怕啊，时光不能倒流，不能回到当年，这个姑娘像芬芳馥郁的春天，站在他的房子门口，怀着对他的信任，用她的一双小手向他捧出自己的一颗心！

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现在他用他能想到的最亲昵的名字呼唤她。

他疼痛得扭曲着身子。他这位高不可攀的伟大的莫泊桑，心甘情愿亲吻她的脚印，请求她宽恕。但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这段故事只能提供给布尔热写一篇不大好理解的人类感情方面的有趣故事罢了。

不大好理解吗？不，现在他已经很清楚了！这些感情都是最美好的！它是我们这个尚不完美的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若不是毒盐，他现在就会倾全力，用他的才华，他的写作技巧去写它。盐在吞噬他，尽管他大口大口地把盐吐出来，气味刺鼻。

马克西姆·高尔基

关于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已经写得很多了，如果他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那么就很容易感到为难，从而却

步，在已有的关于他的文章之后，不再增添片言只语。

高尔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甚至想说，存在一种"高尔基的感情"，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感觉到他的存在。

对我说来，高尔基代表了整个俄罗斯。我不能想像俄罗斯没有伏尔加河，同样不能想像俄罗斯没有高尔基。

他是具有无穷才干智慧的俄罗斯人民的全权代表。他热爱俄罗斯，非常深入地了解俄罗斯，正如地质学家所说，了解俄罗斯时空方面的每一个"剖面"。在这个国度里没有任何被他忽略的东西，而且他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即高尔基的方式来看待一切的。

他是一个捕捉各种才干智慧的人，一个决定时代的人。有像高尔基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初次见面，我首先就被他非凡优雅的仪表所惊倒，尽管他有点驼背，说话声音有些暗哑。他正处于精神的成熟和鼎盛时期，这时他内心的完美，在他的外表、言谈举止、衣着，对于他的整个面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从他那双宽阔的手，他关切的目光，他的步态和他随随便便，甚至有些像艺术家那样不修边幅的穿着上，都看得出他那透着自信的优雅风度。

高尔基的形象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就像一位作家向我讲述过的样子。他在克里米亚，在捷谢利高尔基家里做过客。

这位作家有一天醒得很早，他来到窗前。暴风雨在海上肆虐。从南方到来的强劲的风在花园里呼啸，风信仪吱吱作响。

离作家住的小屋不远，有一棵大杨树。要是果戈理，他会说，这是一棵蹿天杨。作家看见高尔基站在树下，拄着手杖，抬头全神贯注地凝望着这棵又粗又壮的大杨树。

白杨沉甸甸的茂密树叶在风暴中抖动，喧哗，所有的树叶都被狂风吹得拼命倒向一边，翻出银白色的背面。杨树像一架管风琴呜呜地鸣响。

高尔基摘下帽子，望着这棵杨树，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后来他说了一句什么，就向花园深处走去了。但他仍几次停下来回头看这棵杨树。

吃晚饭的时候，作家壮起胆来问高尔基，他在杨树下说了些什么。高尔基并不觉得奇怪，他回答说：

"好了，既然您在暗地里监视我，我也就只好承认了。我是说：多么强大的力量啊！"

有一次，我到郊外戈尔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的别墅去看他。那是一个夏日，周围飘浮着盘卷、轻柔的云团，莫斯科河对岸繁花似锦的绿色山岗透过淡淡的阴影，更显得五色缤纷。屋里吹着和煦的风。

高尔基和我谈起我新近写的一个中篇小说《科尔希达》，当时他把我看作是亚热带自然的专家，这使我感到非常尴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围绕狗是否会患疟疾展开了争论，高尔基最后认输了，他甚至含着温和的微笑回忆说，他有一次在波季附近看见一群害疟疾的母鸡，蓬着毛，不住地哼哼。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像他当时那样说得清清楚楚，绘声绘色了。

当时我刚刚读完我们的海员格尔涅特船长写的一本非常罕见的书，书名叫《冰苔》。

格尔涅特有一段时间曾任苏联驻日本海军代表，这本书就是在那里写的。因为找不到懂俄语的排字工人，他亲自去印刷厂排版，用日本产的薄纸，总共印了五百册。

在这本书里，格尔涅特船长阐明了自己有关中新世亚热带

气候回到欧洲的独特理论。在中新世时期，在芬兰湾两岸，甚至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都生长着茂密的木兰树和柏树的大森林。

在这里我不能详细讲述格尔涅特的理论，这需要很多篇幅。但格尔涅特毋庸置疑地证实，如果能成功地融化格陵兰的冰盖，那么中新世就会回到欧洲，自然界就会开始一个黄金时代。

这一理论惟一的不足之处，是根本不可能融化格陵兰的冰层。在已经发现原子能的今天，也许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向高尔基讲述了格尔涅特的理论。他一边用手指在桌上敲着鼓点，一边听我讲，我以为他听我讲，只是出于礼貌。没想到他竟被这一理论吸引住了，被这一理论的严谨、无懈可击，甚至被它的庄严郑重所折服了。

他对这个理论讨论了很久，兴致越来越高，他还要我把这本书寄给他，他好在俄罗斯大量再版。而且反复说，每走一步都有聪明、美好的意外事物在等待我们。

但是，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没有来得及出版格尔涅特的书，他不久便去世了。

维克多·雨果

在维克多·雨果的流放地拉芒什海峡的泽西岛上，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像。

纪念像建造在滨海的悬崖上。纪念像的底座不高，总共二三十公分。周围杂草丛生。因此看起来雨果就像直接站在地上。

纪念像塑造的是雨果顶着狂风前进。他弯着腰，身上的斗篷在飘摆。雨果扶住帽子，怕被吹掉。他正倾全力与海上风暴顽强搏斗。

纪念像建造在一处荒凉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见《海上劳工》[①] 中的水手吉利亚特溺水的那块岩石。

极目四望，周围是无边无际的咆哮的大海，涛涛巨浪冲刷着崖脚，一丛丛海草被托起，漂漂摇摇被卷进海底的洞穴，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起雾的天气，可以听见远处灯塔上的警报器发出悲凉的笛声。到了夜晚，灯塔的灯光投在海天汇合的海面上。灯光有时沉入水中。单凭这一点迹象就说明，海水将多么巨大的浪涛推向泽西海岸，遮住了灯塔投下的光柱。

维克多·雨果周年忌时，泽西的居民挑选了岛上最漂亮的姑娘，将几枝槲寄生摆放在纪念像的脚下。

槲寄生长着茂密的椭圆形橄榄绿色的树叶。据当地传说，它会给生者带来幸福，让逝者获得永生。

这传说果真应验了。雨果逝世后，他的叛逆精神始终在法兰西徘徊游荡。

他是一个感情热烈、满腔激情的狂热的人。他总是夸大他在生活中看到的和他所写的一切。他就是这样看待一切。生活是由表现得昂扬、激越的愤怒之情与喜悦之情构成的。

他是仅由精神乐器组成的语言乐队的伟大指挥家。铜号欢快的铿锵声，定音鼓的冬冬声，悲凉刺耳的长笛声，双簧管低沉的吹奏声。这就是他的音乐世界。

他作品中的音乐也像拍岸的涛声一样强有力。这音乐使大地震颤，也使脆弱的人类的心灵震颤。

---

① 《海上劳工》是雨果于一八六六年发表的，描写一个意志坚强的渔人吉利亚特战胜了海洋的狂风恶浪和章鱼暗礁，但他没有闯过爱情这一关。他发现未婚妻戴吕舍特爱上青年牧师艾伯莱兹，在成全了他们的美满姻缘之后，便怀着绝望的心情让海潮淹没了。

但他并不同情他们。他狂热地竭力用自己的愤怒、狂喜,用沸腾的爱情去感染全人类。

他不仅是自由的骑士。他是自由的喉舌,自由的报信人和歌颂自由的诗人。他好像站在大地上的每一个十字路口高呼:“公民们,拿起武器吧!”

他像一阵飓风,一阵旋风,闯入了一个古典的、稍嫌落寞的世纪,带来接连不断的大雨,树叶,乌云,花瓣,硝烟和从帽子上掉下来的帽徽。

这阵风叫作浪漫主义。

他向欧洲停滞的空气吹了风,送来阵阵充满理想的气息。

孩提时代,当我一口气第五遍读完他的《悲惨世界》时,我就被这位狂热的作家惊呆了,被他迷住了。我刚刚看完这本小说,当天就又从头看起来。

我找来一张巴黎地图,把小说故事情节发生的所有地点都标出来。我仿佛亲身参与了一切,在我的心灵深处至今仍把冉·阿让、珂赛特、卡福汝当做我童年时代的朋友。

从那时起,巴黎已不仅是维克多·雨果人物的故乡,也成了我的故乡。虽然我从未到过巴黎,但我却爱上了它。而且,这种感情与日俱增。

维克多·雨果的巴黎是与巴尔扎克、莫泊桑、大仲马、福楼拜、左拉、儒勒·瓦莱斯、阿纳托尔·法朗士、罗兰、都德的巴黎,与魏尔兰和兰波,梅里美和斯丹达尔,巴比塞和贝朗瑞的巴黎是一脉相通的。

我收集了一些关于巴黎的诗,抄在一个单独的本子上。可惜我把它弄丢了,但其中许多诗句我都能背出来。这些诗句多种多样,有华丽的,也有朴实的。

您会看到世世代代为之祈祷的，
神奇的城市。
心灵会忘记责备。
疲累的手会颤抖。
在卢森堡花园的喷泉旁，
您会像缪塞小说中的弥米，
在阔叶法国梧桐下，
沿着小路远去……

雨果令我们许多人产生了这种对巴黎的初恋之情；为此，我们感激他，特别是那些无缘亲眼目睹这座伟大城市的人。

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如果自然界能对人抱有感激之情，感谢他了解它的生活，歌颂它的生活，那么它首先应当感谢的就是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这只是他在城里用的名字，而在那些他觉得和在家里一样的地方，在护林巡查员的小屋里，在雾幕笼罩的河滩地，在云层密布或繁星点点的天空下，在俄罗斯的田野上，都简单地叫他"米哈雷奇"。显然，当他消失在都市中时，人们会难过，因为只有在铁皮屋顶下筑巢的燕子才能使他想起他那"仙鹤的故乡"。

如果一个人摆脱后天沾染或强加给他的一切，开始只"按照心意"生活，那么普里什文的一生就是他的榜样。这种生活方式包含着最伟大健全的理性。"按照心灵"生活，与内心世界表里一致的人永远是创造者，艺术家，丰富充实生活的人。

如果普里什文一直做农艺师(这是他最初的职业),那么不知他一生会做出些什么。至少他未必能向千百万人揭示俄罗斯自然是一个最美妙的光明的诗的世界。他根本不会有时间去做这些。大自然要求专注的观察和不间断的内心工作,以便在作家内心建造自然界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用思想丰富我们,用艺术家看到的它的美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

如果仔细读一遍普里什文的全部作品,你会深信普里什文体察人微,他的所见所闻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来得及向我们讲述。

普里什文能把秋天的每片落叶写成一首长诗,像他这样的巨匠,只活一辈子是不够的。而落叶千千万万。多少落叶带走了作家没有说出的思想,如普里什文所说,这些思想像落叶一样那么随意地散落了!

普里什文出生于古老的俄罗斯城市叶列茨。布宁也生长在这一带地方,他与普里什文一样,都善于用人类的思想情绪,为大自然增添色彩。

这又如何来解释呢?显然,这是因为奥尔洛夫东部一带以及叶列茨周围的自然界都是非常俄罗斯化的,非常纯朴,不富裕。正是大自然的这种本性,甚至它的严酷,显示出普里什文作为作家的高超洞察力,越是单纯,大地的本质也就表露得越清楚,目光越敏锐,思想越集中。

闪光、五彩缤纷的晚霞、闪烁的星空、表面闪着光辉、像由树叶和花朵组成的、气势澎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似的热带植被,比起这一切来,单纯对于心灵的作用更强烈。

要写普里什文很难。应当把他的作品摘抄在珍藏的笔记本里,反复去读,不断去发现字里行间珍贵的东西,进入他的作品,就像沿着一条隐约可见的小径,进入泉水汩汩、草香四溢的密林,沉人人的单纯理性与心灵所具有的纷繁的思想与心绪中去。

普里什文认为自己是“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但是他错了。他的散文要比许多长诗和短诗富于更强烈的诗意。

普里什文的作品，用他的话说，是“不断有新发现的无穷乐趣”。

我多次听见刚刚读完普里什文作品的人说同样的话：“这才是真正的魅力！”

从进一步的谈话中，我们弄清了人们用这句话说明普里什文独具的那种难以解释但却鲜明的魅力。

这种魅力的秘密何在呢？他的作品的神秘之处又在哪里呢？“魔法”、“妖术”等字眼通常是与童话相关连的，但普里什文并不是童话作家。他是实实在在的人，大地之子，是周围世界的见证人。

普里什文的魅力，他的魔法的秘密恰在于他的洞察力。

这种洞察力在于能从每件小事中发现有趣的东西，在令人生厌的表象下看到深层的内涵。

一切都闪耀着诗的光辉，像披着露珠的小草。一片最微不足道的杨树叶都有它自己的生命。

我拿起一本普里什文的书，读起来：

“夜在皎洁的月色下逝去了，天快亮时，下了霜。周围一片白色，只是水洼没有上冻。太阳一出来就热起来，树上和草上覆盖着浓重的露珠，黑魆魆的树林里云杉的枝条闪着斑斓的色彩，全世界的金刚石都不足以装点这景致。”

在真正用金刚石组成的这一小段文字中，一切是那么朴实，准确，洋溢着永恒的诗意。

细读这段文字，您会同意高尔基的话，他说普里什文“具有非凡的才能，善于将普通词汇灵活组合，使人甚至在感官上有所感受”。

但这还不够。普里什文的语言是人民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有在俄罗斯人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中，在劳动中，在人民性格的纯朴与智慧中才能形成。

“夜在皎洁的月色下逝去了”，寥寥数语非常清楚地描绘出笼罩着沉睡国度的夜沉静而庄严的进程。“下了霜”，“树上和草上覆盖着浓重的露珠”，这都是人民的、鲜活的语言，决不是偷听来的，或是从笔记本中抄来的，完完全全是他个人的，自己的。普里什文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他不是仅仅从旁观察人民，以便获取写作的素材，遗憾的是作家通常都这样做。

植物学家们有一个术语——草甸子。这个词通常指野花盛开的草地。草甸子像一片片湖泊似的分布在河流两岸的河滩地上，开满了百十种各色怡人的花朵。

有充分的理由称普里什文的散文为俄罗斯语言的“草甸子”。普里什文的词语都开花，闪光。它们时而像小草沙沙作响，时而像淙淙的泉水声，像小鸟啾啾地鸣叫，像最初的冰凌发出哗唰的响声，最后，也像一行缓缓移动的星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普里什文的散文之所以富于魅力，是因为他知识渊博。人类知识的任何领域都蕴涵着无穷的诗。诗人们早就应当懂得这一点。

如果诗人精通天文学，那么他们所喜爱的星空这一主题便会更加雄伟。

不了解星座的名称，对夜空的描写不够，是一回事，同样一个夜晚，如果诗人懂得星辰运动的法则，映在湖中的不是一般的星座，而是光灿灿的猎户星座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普通的知识有时也会为我们开辟新的美的领域，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我们每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现在我想谈一件事，那就是普里什文的一句话向我解释了我一直认为偶然的一种现象。他不仅作了解释，而且，我可以说，他还赋予这种现象以合乎情理的美。

我早就注意到在奥卡河沿岸水浸的草地上，有些地方盛开的野花似乎都集中成一块块单独的花圃；而另一些地方，在普普通通的杂草中间又弯弯曲曲地绵延着密密匝匝开着同一种野花的花带。当你乘上“Y-2”型小飞机就看得特别清楚，这种飞机是飞到草地上去消灭泥潭和水洼滋生的蚊子的。

多年来我一直观察这些高高的、馥郁的花带，并为之神往，但不知怎样来解释这一现象。坦白地说，我也根本没有去思考过它。

但是在普里什文的《一年四季》中，在题为《花朵的河》的一小段文字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总共只有一行：

“凡春洪奔流过的地方，现在到处是花的洪流。”

读完这一段之后，我即刻明白那盛开着一条条花带似的地方，正是春洪泛滥过的地方，春洪过后，留下了肥沃的淤泥。这像是一幅用鲜花标志出的春洪地图。

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杜布纳河流过。几千年来，人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这条河很出名，地图上也能找到。它静静地在莫斯科近郊葎草丛生的小树林，在绿色的山岗和田野间流过古老的城市和乡村，流过德米特罗夫、韦尔比洛克、塔尔多姆。成千上万的人到过这条河上。他们中间有作家、艺术家和诗人。但谁也没有发现杜布纳河有什么值得写的特别地方。没有人像走过尚未开发的地方那样走过这条河流的两岸。

普里什文却做到了。这条微不足道的杜布纳河在他的笔下，在雾霭中，在落日的余辉下，像地理上的新收获，新发现，像

我国最美丽的河流之一，开始闪光了。他描写了这条河流的生活，它的植被，它特有的地貌和两岸居民的习俗和历史。

我们过去有过，现在也有像季米利亚泽夫、克柳切夫斯基、凯戈罗多夫、费斯曼、奥布鲁切夫、缅兹比尔、阿克谢尼耶夫这样的学者诗人，也有英年早逝的植物学家科热夫尼科夫，他写过一本描述春秋两季植物生活、富于严肃科学性的引人入胜的书。

我们过去有，现在也有像梅利尼科夫－彼切尔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皮涅金等等这样的作家，他们擅长把科学作为散文的要素之一应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

但普里什文在这些作家中占有特殊地位。他将他在民族学、物候学、植物学、动物学、农艺学、气象学、历史学、民俗学、鸟类学、地理学、方志学，以及其他科学领域的渊博知识有机地纳入了他的创作生活。这些知识并不是死的重负。它们在普里什文胸中，不断丰富他的经验，他的洞察力和他透过富于诗意的表现形式看到的或大或小，但却出乎意料的那些科学现象，这种能力是普里什文所特具的。

普里什文目光敏锐，但他在写人时，却常常好像眯起眼睛。他对非本质的东西不感兴趣。无论伐木工人、鞋匠、猎人或著名学者，令他感兴趣的只是他们每人心中的幻想。

揭示心灵深处的幻想，这就是他的任务所在。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被一个人隐藏得最深的莫过于幻想了。也许因为它承受不了最轻微的嘲笑，甚至玩笑，当然更经受不住漠不关心的手的触摸。

只有向志趣相投的人才能放心地倾诉你的幻想。普里什文就是与我们这些默默无闻的幻想家志趣相投的人。只要想想他的短篇小说《鞋》，就很能说明问题。小说写的是马里纳树林的几个老鞋匠，他们想给共产主义社会的妇女们制作世界上最精

致，最轻便的鞋。

普里什文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日记。笔记中有许多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于写作技巧的思考。他在这方面的见解与他对自然界的见解同样透彻。

普里什文有一个论散文朴实性的短篇，在思想的正确性方面，我认为堪称典范。这篇小说题为：《著作者》。小说中有一段作家与牧童关于文学的对话。

下面就是他们的谈话。小牧童对普里什文说：

"如果你写真事就好了，怕都是瞎编出来的。"

"不都是瞎编的，"我回答说，"不过多少有一点。"

"要是我写，我就那么写！"

"都写真事？"

"全都是。就说写夜吧，写沼泽地带的夜是怎么过去的。"

"怎么过去的呢？"

"就这样过去的！夜。水洼旁边有一棵老大老大的灌木。我坐在树底下，小鸭子呷，呷，呷，呷……"

他不言语了。我以为他在找词儿，或是找形象的说法。可他却抽出扎列卡[1]，在上面钻起孔来。

"那么，后来呢？"我问，"你不是要如实地来写夜吗？"

"我不都已经照实说了吗？！"他回答说，"灌木老大老大！我坐在树底下，小鸭子整夜呷，呷，呷，呷。"

"不过太短了。"

"怎么会'短'！"小牧童很吃惊，"呷，呷，呷，呷，不停地叫了一整夜……"

---

[1] 扎列卡，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的一种民间管乐器。

我一边在想这段故事，一边说：

“太好了！”

“也不算坏呀，”他回答说。

普里什文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是胜利者。这不禁使我想起他的话：“……即使只有荒凉的沼泽是你胜利的见证，那它也会繁花似锦，春天将永远与你同在，只有春天，光荣属于胜利。”

是的，普里什文散文的春天将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和苏维埃文学中。

亚历山大·格林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这些普通中学的中学生迷上了名叫“万有文库”的出版物。那是用黄纸作封面，八磅铅字排的小书。

这些书很便宜。花十戈比就能读到都德的《达达兰》或哈姆松的《秘密祭》，花二十戈比就能读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或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万有文库”只是偶尔破例出一两本俄国作家的作品。因此，当我买到新出版的一本书时，我觉得《特卢利的蓝色瀑布》这个书名很古怪，封面上作者署名亚历山大·格林，我自然以为格林是外国人。

书里有几个短篇小说。记得我就站在买到这本书的书亭旁，随便翻开书读起来：

“没有比利斯更乱，更奇妙的港口了。这座操着多种语言的城市，像一个最终下决心在一处偏僻地方落户定居的流浪汉。房屋凌乱地建在一些像是街道的地方。普通含意的街道在利斯不可能有，因为城市建在用阶梯、桥梁和羊肠小道相连的山岩和小丘的断面上。

"一切都隐蔽在浓密的热带植物丛中,在扇形的绿荫下闪烁着妇女们炽热的孩子般目光。黄色的石子,蓝色的树影,古老的墙壁上如画的裂纹。在一处像小丘般高起来的院子里,孤零零的光脚汉叼着烟斗,在修理一只大木船。远处传来歌声和这歌声在山谷里的回响。在帐篷和大伞下,一个个市场摊位都架在木桩上。武器的寒光,艳丽的衣裙,芬芳的花木,这一切仿佛在梦中,使人暗暗产生对恋爱和幽会的渴望。港口很脏,像一个清洁烟囱的青年工人。卷起的帆,帆的梦,插着翅膀的早晨,绿色的水,岩石,无涯的海。夜晚,催人欲睡的点点星光,洋溢着欢笑的木船——这就是利斯!"

我站在正在开花的基辅栗树的浓荫下,一口气读完这本别致的梦幻般奇妙的书。

我突然感到向往那风的光辉,那清澈海水的淡淡咸味,向往利斯,向往它炽热的小巷和妇女们闪烁的目光,那夹杂着白色碎贝壳的粗糙的黄石子,那冲向碧空的桃红色烟云。

不!这也许不是向往,而是想亲眼目睹这一切,追求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海港生活的强烈愿望。

我立刻想起,对于这个闪光的世界,我已经知道一些它的特点。这位不知名的作家格林只不过把这些特点集中写到一本书里罢了。可我是在哪里看到这一切的呢?

不久我就想起来了。当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城市仿佛是从碧绿的海涛中涌出水面,迎着耀眼的阳光,到处是一道道天蓝色的阴影。所有塞瓦斯托波尔市的欢乐和杂乱都写在格林的作品中了。

我开始往下读,读到一首水兵的歌:

> 南十字星座在远方闪烁,
>
> 一起风罗盘就会醒来。

上帝啊，保佑我们的船，

饶恕我们吧！

当时我还不知道，格林为自己的小说编歌。

人们为美酒而陶醉，为太阳的光焰和无忧无虑的欢乐而陶醉，为生活的慷慨，为它永不疲倦地将我们引向它光辉而阴凉的诱人角落，为这一切所陶醉，最后，为“高尚的情感”而陶醉。

这一切都在格林的作品中。它们像离开令人窒息的城市里的乌烟瘴气之后，吸入阵阵芬芳馥郁的不习惯的空气一样，令我们头晕目眩，令我们陶醉。

我就这样认识了格林。当我得知格林是俄国人，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格林斯基时，我并不感到特别吃惊。也许因为我一直认为格林是黑海沿岸人，是包括巴格里茨基、卡达耶夫等一批黑海沿岸作家的代表人物。

当我看到格林的传记，得知他那背叛者和颠沛流离的流浪者闻所未闻的沉重生活时，我吃惊了。不明白这个孤僻的、受尽折磨的人，经受过生活的磨难仍然能保持丰富而纯洁的想像力的巨大才能，保持对人的信心和腼腆的微笑。难怪他说自己“总是在低矮房屋的废料和垃圾堆上看到云雾缭绕的景色”。

他完全可以用法国作家朱尔·勒纳尔的话来说明自己。勒纳尔说：“我的祖国啊，那里飘荡着最美丽的云。”

如果格林去世后，仅为我们留下《红帆》这首散文诗，那就足够使他跻身于那些召唤人们、激起人们的心灵去追求完美的杰出作家的行列了。

格林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是为幻想辩护的。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我们知道，我们所刻意追求的未来是由无法遏止的人类本性——善于幻想，善于爱——产生的。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

应当预先警告要为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写传的人，他们会吃许多苦头，或者如常言所说，“尝到苦头的滋味”，因为给巴格里茨基写传，要确定事实不容易。

巴格里茨基讲述了许多关于自己的奇怪荒诞的故事，这些故事最终融人他的生活，使人有时难辨真伪。不能确定事实，但“惟一的是真实，除了真实，别无其他”。

而且，我还不能肯定是否值得去做这件徒劳无益的事。巴格里茨基编造的东西，在他的传记中还是富于特色的部分。他自己也深信这些编造的东西。

没有这些编造的东西，就很难想像出这位生着笑眯眯的灰眼睛，气喘吁吁，但声音悦耳的诗人。

在爱琴海两岸居住着一个美丽的民族——“近东人”①。他们快乐、勤劳。他们联合了希腊、土耳其、阿拉伯、犹太、叙利亚、意大利等不同民族的代表。

我们苏联也有自己的“近东人”，那就是“黑海人”，也来自不同民族，同样乐观开朗，好说好笑，勇武强悍，热爱他们的黑海，热爱燥热的太阳、海港的生活、“敖德萨妈妈”，热爱杏和西瓜，热爱多彩的沸腾的滨海生活。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就属于这样一类人。

他有时像赫尔松大木船上懒洋洋的水手，有时像敖德萨捕鸟的“小伙子”，有时像科托夫斯基② 部队中一名放荡不羁的战

---

① 近东人，指旅居近东地区的法、意等国侨民的后裔。

② 科托夫斯基(1881—1925)，前苏联将领，国内战争英雄。

士，有时又像蒂尔·乌兰什比格。

以上这些似乎不能并存的特点，加上他对诗忘我的热爱和非常渊博的诗才，就构成了他完整的、富于魅力的性格。

我第一次与巴格里茨基相遇是在敖德萨的防波堤上。他刚刚写完长诗《西瓜》，这首诗在感觉和语言的表现力上是惊人的，仿佛溅上了暴风雨中黑海的浪花。

我们把长长的自动捕鱼钩索抛到海里钓鳂虎鱼和羊鱼。一只只从奥恰科夫来的黑色木船，张着打满补丁的帆，满载着带条纹的花皮西瓜，从我们身旁驶过。吹起一阵强劲的海风，大木船摇晃起来，海水没到两侧的船舷，周围溅起水花。

巴格里茨基舔了舔咸丝丝的嘴唇，喘着气，开始有板有眼地朗诵起长诗《西瓜》来。

一个姑娘在岸上捡到一只被海浪冲上来的西瓜，西瓜上刻着心的图形，显然是从遇难的纵帆船上抛下来的。

> 这里没有人告诉她，
>
> 她手上捧的是我的一颗心！……

他喜欢背诵任何一位诗人的诗。他的记忆力非凡。他朗诵的时候，即使朗读非常熟悉的诗篇，也会突然出现新的动听的旋律。无论在巴格里茨基之前，或在他之后，我都没有听到过像他这样的朗诵。

诗中的每一个词，每一节诗的音律，在质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使人感到痛苦和忧伤。无论是彭斯[①]的《约翰·亚缅内·泽尔诺之歌》，勃洛克的《唐娜·安娜》，或是普希金的《为了遥

---

① 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苏格兰农村青年的日常生活和诗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

远的故乡的海岸……》,无论巴格里茨基朗诵什么,听者都会不禁激动得喉头哽咽,这说明要落泪了。

我们从码头来到希腊市场。那里有一家茶馆,一杯茶还带一份糖精、一片黑面包和羊奶干酪。我们从一大早就没有吃东西了。

当时敖德萨住着一个老乞丐。全城的人都怕他。因为他乞讨的方式不同一般。他不低三下四,不伸出颤巍巍的手,也不带着鼻音唱:“大慈大悲的老爷们哟,看看我这个残废人吧!”

完全不同!他高高的个子,胡须灰白,眼睛通红,专门在各茶馆行乞。还没有跨进门,他就用沙哑洪亮的大嗓门,向茶客们劈头盖脸地大骂起来。

《圣经》中骂名昭著的最残酷的先知耶利米,面对这个乞丐,引用敖德萨人的话,大概也“黯然失色”了。

“你们的良心何在,你们是人不是人?!”这个老头大喊起来,接着立刻回答自己有意提出的问题:“你们坐在这里吃面包夹油腻的羊奶干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可我这个老头子,从早晨起就腹中空空,像一只木桶,饿着肚子,到处奔走!你们算什么人!你们的老娘要是知道你们成了这个样子,她们没有活到亲眼看到你们这么无耻,她们心里会高兴的。喂,同志,您干吗把脸转过去?您耳背吗?您最好还是为您的黑良心求得平安,帮帮我这个肚皮空空的老头子吧!”

大家都赏给他点什么。谁也经不住他数落。据说,这个老乞丐用讨来的钱大做盐的投机买卖。

在茶馆里,给我们端来了茶和用湿亚麻布包着的美味咸干酪。羊奶干酪吃得我牙床都疼了。

就在这时,老乞丐来了,一进门就大骂起来。

“啊哈!”巴格里茨基带着不祥的预示说,“他大概要倒霉了。

只要他到我们这边来。让他到这边来试试！只要他敢过来！”

“那又怎么样呢？”我问。

“他会倒霉的，”巴格里茨基回答说，“嘿，倒霉！只要他到我们这张桌上来。”

老乞丐一步步朝我们这边挪过来。终于在我们桌旁停下，用疯狂的目光盯着羊奶干酪，看了一会儿，喉咙里呼噜呼噜响，也许他气坏了，直喘气，说不出话来。但他总算清了清嗓子，喊起来：

“到什么时候这两个年轻人才能良心发现啊！咱们站在旁边看看，瞧他们忙着把干酪吃完，我不说一半，就连四分之一的一小块干酪也不愿赏给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子。”

巴格里茨基站起来，一只手紧贴着胸口，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直僵僵的老头子，满腔热情地低声开口说话，他说话声音颤抖，含着泪水，像在念悲剧台词那么激动：

> 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那疲累而苦难的兄弟啊，不管是谁，都不要灰心丧气！

老乞丐突然打住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巴格里茨基，他的眼睛发白了。然后，他开始慢慢向后退，当听见说“你相信吧，到时候连巴尔也会灭亡”时，他转身碰倒了椅子，屈膝朝茶馆门口跑去。

“你看看，”巴格里茨基认真地说，“连敖德萨的乞丐都经不住纳德松[1]！”

茶馆里一片哄笑。

---

① 纳德松（1862—1887），俄国诗人。主要诗作有：《歌手》、《幻想》、《不，缪斯，不要召唤！》等。

巴格里茨基整天泡在干河口湾那边的草原上设套索捕鸟。

在莫尔达万卡街巴格里茨基那幢用白粉刷过的房子里，挂着十几只笼子，关着脱了毛的小鸟。他很喜欢炫耀这些小鸟，尤其是几只特别的云雀。这些难看的草原上的云雀，和其余的鸟儿一样，羽毛凌乱。

啄空了的谷壳不停地从鸟笼里落到客人和主人头上。

巴格里茨基把仅有的一点钱，都用在喂养这些鸟上了。

敖德萨报纸付给他的稿酬微乎其微，一首非常优秀的诗只付五十卢布。几年之后，年轻人都知道这些诗，并且能够背诵。

而巴格里茨基却认为这是公正的。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价值。遇到实际问题，他很拘谨。他第一次来到莫斯科时，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到出版社或编辑部去过，总是拉上一个“朋友”为他壮胆。由朋友出面代他商议，他只在一旁微笑不语。

在莫斯科，他住在奥贝津斯基巷我家地下室里。他一来就预先对我说：“我是到你家来寄宿的。”实际上，整整一个月他的确只进过两次城，其余的时间就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沙发床上，咳得喘不过气来。

在沙发床上，他被埋在书和别人的诗稿，还有空香烟盒堆里。他把自己的诗写在这些空烟盒上。有时候烟盒弄丢了，他心里即使不痛快，也很快就过去了。

他就这样整整待了一个月，谢尔文斯基[1]的《乌里亚拉耶夫性格》使他欣喜若狂，他有时讲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有时和“文学少年”座谈，那都是他刚到莫斯科时云集到他身边的敖德萨人。

---

[1] 谢尔文斯基(1899—1968)，俄罗斯诗人。《乌里亚拉耶夫性格》是他的叙事长诗。

不久他就完全搬到莫斯科来了。他不再养鸟，而是养了几大缸鱼。他的房间简直像水底世界。他能在沙发上一坐就是几小时，注视着五颜六色的鱼，陷入沉思。

从敖德萨的防波堤上也能看到同样神秘的水底世界。珊瑚似的银色水草的草茎也是这样摆动，蓝色的水母缓缓游动，一边推动着海水。

我觉得他搬到莫斯科来是一个错误。巴格里茨基不应当离开南方，离开海，离开敖德萨，甚至不应当离开他心爱的敖德萨的食品——茄子、蕃茄、羊奶干酪、新鲜鲭鱼。他是被南方，被多孔的黄色石灰石——敖德萨便是由这种石灰石建造的——所散发的热温暖的，浑身散发着艾蒿、盐、洋槐和海的气味。

他还没有成熟，没有像他说的为再攀登几座艰难的诗的高峰做好准备，就早逝了。

在他的灵柩后边行进的是骑兵连的马队，马蹄踏着花岗石路面发出嘚嘚的马蹄声。这令人想起《奥帕纳斯之歌》，想起"闪着白色方糖光辉"的科托夫斯基的马，想起和巴格里茨基手牵手，沿着尘土飞扬的滚烫的道路并肩走过的辽阔草原的诗歌，作为《伊戈尔远征记》和塔拉斯·谢甫琴科的后继者的诗歌，像百里香那样芬芳，浓郁，像海边的姑娘一样黝黑，像吹拂着故乡黑海的"近东地方"[①] 清新的风一样欢快。

曹苏玲 译

---

① 近东地方，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

不久他就完全搬到莫斯科来了。他不再养鸟，而是养了几大缸鱼。他的房间简直像水底世界。他能在沙发上一坐就是几小时，注视着五颜六色的鱼，陷入沉思。

从敖德萨的防波堤上也能看到同样神秘的水底世界。珊瑚似的银色水草的草茎也是这样摆动，蓝色的水母缓缓游动，一边推动着海水。

我觉得他搬到莫斯科来是一个错误。巴格里茨基不应当离开南方，离开海，离开敖德萨，甚至不应当离开他心爱的敖德萨的食品——茄子、蕃茄、羊奶干酪、新鲜鲭鱼。他是被南方，被多孔的黄色石灰石——敖德萨便是由这种石灰石建造的——所散发的热温暖的，浑身散发着艾蒿、盐、洋槐和海的气味。

他还没有成熟，没有像他说的为再攀登几座艰难的诗的高峰做好准备，就早逝了。

在他的灵柩后边行进的是骑兵连的马队，马蹄踏着花岗石路面发出嘚嘚的马蹄声。这令人想起《奥帕纳斯之歌》，想起"闪着白色方糖光辉"的科托夫斯基的马，想起和巴格里茨基手牵手，沿着尘土飞扬的滚烫的道路并肩走过的辽阔草原的诗歌，作为《伊戈尔远征记》和塔拉斯·谢甫琴科的后继者的诗歌，像百里香那样芬芳，浓郁，像海边的姑娘一样黝黑，像吹拂着故乡黑海的"近东地方"[1] 清新的风一样欢快。

曹苏玲 译

---

[1] 近东地方，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